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山水狂飙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第一回 蒋介石恣情滕王阁 刘甫澄千里走南京

话说湘江之战，血洒沃野，尸横江河，从中央苏区撤出的中央红军损失惨重，5个军团两个纵队8.6万人，生者只有3万余人。这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用兵以来的第三次“大胜利”。第一次是1927年“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的清党；第二次是同年在福建、广东地区把共产党南昌起义部队打了个七零八落。这第三次的“胜利”，是蒋介石反革命军事“围剿”的顶峰，是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的最低谷。

历史像是一场恶作剧。在中国的土地上，把战争的一方推向顶峰和把另一方推向低谷的，竟同是两个德国人！一个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65岁的冯·赛克特，一个是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充当顾问的34岁的奥托·布劳恩。

历史也在作弄人。给蒋介石带来极大荣光和声望的湘江之战，在战争进行前夕，充任战场指挥官的蒋介石竟不在南昌行辕，而率娇妻、私人顾问和一帮侍从到西北视察去了……

且说蒋介石是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第五次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全面“围剿”的。风险大，决心大。在川北地区，有以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的军阀势力对红4方面军的“六路围攻”；在湘鄂西，有何键、刘建绪的西路军对红2、6军团的“围歼”；在鄂豫皖，有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的“进剿军”对红25军的“围剿”。几大战场，全面展开。蒋介石则坐镇南昌，以总司令身份重点指挥对“朱、毛赣匪”的“围剿”。他要做出一个样子来，要挽回历次“围剿”丢失的面子。他调集了50万大军，集中了200多架飞机，雇请了一个庞大的德英美军事顾问团。他气壮如牛，“再不剿灭共党，何以为人！”

南昌，一时成为中国政治、军事的重心。

蒋介石的“南昌行辕”，半是在南昌，半是在庐山。九江所属的庐山，风景宜人，乃游览胜地。蒋夫人宋美龄如是主张：“剿匪剿匪，我可不想跟着共匪钻山沟咯！”“大令”一想也是。迭经4次“剿共”大失利，人都有些迷信了。蒋介石说：“夫人说的是咯，我也不喜欢南昌咯。匪党在南昌搞起暴动来，叫我们解决了，阴魂不散咯。前几次搞得那么糟，兴许就是何键、何应钦不该把行营设在南昌城里。”妇唱夫随，蒋、宋一帮人马，还有那个外籍军事顾问团，便浩浩荡荡地上了庐山。后来，说是前方“剿匪战事”进展良好，委座“为同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以励将士奋发剿灭共匪”，才将行辕搬进了南昌城。庐山距南昌百里，也是宋氏三小姐命当富贵，蒋介石在庐山办了个军官训练团，专门培养“剿共”专家的，委座得经常去训话，外籍军事顾问团又都是军官训练团的教官，来去也麻烦。于是，在夫人的敦促下，往往一上山便不走了，又忙着处理军务。这样，南昌行辕的军令，还是自庐山出。因之后人有“南昌行辕，庐山真面目”之说。

其实，蒋介石不喜欢南昌，也未必喜欢庐山。庐山多雨多雾，成天烟霏茫茫。乍上庐山，如同云雾笼罩着五老峰，蒋介石心头也笼罩着一层浓云，对于第五次“围剿”能否取胜，他实在没有多少把握。他觉得什么都不缺，就是少了某种有效的战略战术。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原来的那一套战略战术，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朱、毛赣匪”面前失去了效应？为此，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第五次“围剿”的新战略新战术，他采纳了有实战经验的将领柳维垣、戴岳关于“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策略，并在1933年7月创办于庐山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据统计，至1934年1月底，江西共筑碉堡4000多座。同时，蒋介石频繁地召见外籍军事顾问团，亲自给他们介绍战场情况和敌方的战术特长。在同顾问团的接触中，他默默地喜欢上了希特勒的同僚、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将军。在庐山的“美龄庐”，他多次单独约见冯·赛克特，向其讨教“剿共”的战略战术。“冯将军！”他用中国方式称呼冯·赛克特：“我们现在的兵力是足够的了，5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问题在于打法了。你们西方的共党只在城市搞暴动，好对付。中国的共党却是滑头得很，南昌暴动叫我们打散以后，钻到农村去了，在山沟里同我们打游击，这一手很麻烦人的。中国又地域辽阔，迂回地盘大。前几次我们费力不小，却收效甚微。顾问团诸位，特别是阁下，是不是多在这方面想些办法，本人将择善而从之。”

冯·赛克特在国内便研究了中国的“剿共军事”，也研究了蒋介石。来到中国，又多次听了蒋介石的敌情、地形介绍，以及一些有实战经验的国民党将军提出的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思想已臻成熟，便说：“堡垒推进，稳扎稳打！你们现在这个办法好。先围起来，筑堡固守，尔后一处一处地击破；击破一处，再固守一处；步步为营，步步推进。你们中国人削萝卜是怎么削的？是不是这样，这样？对，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地、一层一层地削。委座说的是，中国地域辽阔，比我们德国大多了。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同你们打游击战，运动战。运动战可以用运动战来对付，拿破仑和苏沃洛夫乐于此道；但也可以不用运动战来对付，或者说不能用运动战来对付，如果是强大的军队对付弱小狡猾之敌的话。没有必要跟他东奔西跑嘛。对付狡猾之敌，巧办法是笨的，笨办法才是巧的。嘿，我又想起你们中国的一句话：关门打狗。把门关得紧紧的，你想撞开也撞不开，尔后一棒一棒地打，岂不稳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第一是筑堡，第二是筑堡，第三还是筑堡！围剿围剿，你围都围不住他，怎么剿？”

于是，第五次“围剿”一开始，“围剿”的各路大军，先筑堡，再打仗；打了仗，再筑堡。“堡垒推进”半年，果然奏效。“共匪”的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力量在一天天的削弱。待到1934年的下半年，蒋介石发现，堡垒推进的办法，稳妥有余，速度不够，“照现在的速度公算起来，岂不得好几年才能把这块萝卜削了？”蒋介石终究是蒋介石，他的实际作战经验并不比冯·赛克特差。北伐军总司令，脑子里还一直有着那个时期的“长驱直入”，那是多么痛快呀！他再次约见冯·赛克特：“冯将军，我曾经说过的，中国地盘大，大小城市多，大包围，大圈子，大萝卜，削起来太慢呐。我也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语：夜长梦多。现在日本人又不大体谅我们的难处。请问是不是考虑一下推进速度？”冯·赛克特乐了，花白胡须抖了起来，说：“委座的意思是不是要把穿插分割加上去？”蒋介石说：“对呐对呐。在形成大包围、筑堡固守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来个穿插分割，把大萝卜变成小萝卜，再一刀刀地削，一块块地搞掉呢？”冯·赛克特点头称是，说：“委座不愧

为中国伟大的军事家！我也正这么想啊，当大萝卜已经抓到手了，已经洗净去皮了，自然就得切块了，要不怎么一口一口地吃啊？我们德国人当年在巴黎，就是以赛纳河为界，按街区分工，一块一块地拿下巴黎城的。但是，请委座注意，即使对付小萝卜，也得堡垒推进，不能让他们像神话中的蛇一样，断成几截又连了起来。”

就在这年的八九月间，蒋介石眼看“匪区”已大为缩小，自感兵力有富余，便在坚持“堡垒推进”的同时，命令他的嫡系薛岳、吴奇伟、周浑元诸部，在中央苏区来回穿插，迫使红军分兵把口，又疲于奔命，应付多路进攻之敌，兵力无法集中，处处被动挨打。蒋介石连连得手，占城夺地，最后把红军十几万部队挤压在瑞金、兴国、于都一小块狭小地区，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满怀必胜信心的蒋介石不满足于充当一个战场的指挥官了，他也不想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味地在对付共产党。蔡廷锴们正在指责他“还攘内不攘外？”为“洗”人耳目，“正”人视听，这年10月中旬，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行辕秘书长杨永泰、侍从室主任宴道刚等，离开“南昌行辕”，前往西北视察去了……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蒋介石哪里知道“共匪”里也有个德国人，一个低劣的“堡垒战专家”。行程在即，蒋介石仍不失其为头脑机敏的军事家，他给行辕的将领们交待说：“削萝卜这一着高，把大萝卜变成小萝卜这一着更高！但还是不可大意，狗急会跳墙。因此，命令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赣南、湘南、桂北搞他3至4道封锁线！萝卜只剩下那么一点红心了，务必给我削干净！”

“胜利”来之不易。当蒋介石在西北各地大讲了一通“攘外必先安内”之后，在回程转赴华北路经洛阳停脚时，他突然接到南昌行辕的急电：“朱、毛赣匪突围西窜！”蒋介石好不惊恐！他坐立不安，彻夜不眠。“娘希屁，果然有此不测！”他立马改变行程。为应付新闻界和社会舆论，决定由夫人宋美龄和端纳、宋子文等，继续前往华北，他则率几个要员赶回南昌。

11月8日至15日，中央红军全部从郴（县）宜（章）间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3道封锁线。当蒋介石于11月12日回到行辕大厅时，陈诚向他报告说：“共匪冒险突围已是几天前的情况了，现在有可能已经突破了第3道封锁线，将临近第4道封锁线……”委座一腔怒火发作了，差点把手中的文明杖一折两截。他厉声喝道：“都是吃干饭的吗！娘希屁，临行前我说过，要小心狗急跳墙，所以要搞几道封锁线！这几道封锁线也不济事么？是不是因为有了几道封锁线，就放松就地聚歼了？地图！”当他走向地图时，冷丁想起广东的陈济棠曾经同共党有勾结的事，也想起了5年前同桂系的战争，又骂道：“娘希屁，定是封而不锁，堵而不剿，心有不轨！”陈布雷连忙上前宽慰委座：“共匪突围，原也是委座意料中的事。而且，即使匪已突破3道封锁线，也还有第4道封锁线。就请委座在第4道封锁线作文章吧。”蒋介石看了看地图，问道：“何键、薛岳在什么位置？”作战部次长林蔚陈述了各部队的位置和开进路线，蒋介石说：“传我的命令！刘建绪的28军4个师急赴全州沿湘江布防堵截；周浑元的3个师抢占道县，防敌南下；李云杰的27军和王东源师取道桂阳，侧击敌之右翼；李韞珩的16军和53师取道临武，侧击敌之左翼；薛岳和吴奇伟的两个军和直属4个师沿湘桂路前进，尾敌追击。娘希屁，时机不可再失！共匪已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

山猛虎，不难就擒。并电何键、李宗仁、白崇禧，嘱其务必在湘江以东地区全歼突围之敌，不得再误！”

这时，蒋介石寄希望于何键的“追剿军”与粤桂军相互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4道封锁线，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何键在蒋介石西北之行前被任命为“追剿”总司令，“率5省之师，系万民之政”，积极性很高。此前同薛岳在衡阳召开了作战会议，部署了湘江之战。只因他们都知道委座已经去了西北，行踪不定，也就没有事事都向行辕报告，使得行辕这些天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况。

1月28日，刘建绪致电行辕，谓“匪之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屏山渡等处渡过湘江，出没于沙子包、界首一带……”蒋介石气得半天不曾说出话来。刘建绪的电报只是他那个正面的情况，并非湘江之战的全貌，使得委座又白气了一场，空劳大神了。

此后两天两夜，蒋介石竟得不到前线的情况，似乎前线并无战事一般。1月29日上午，蒋介石正一筹莫展，踱步在行辕大厅的时候，陈诚和顾祝同突然奔了进来，大声呈报：“委座，好消息！何键报捷电报：各路大军在全州以南界首之湘江一线，击敌半渡，激战3日，重创共匪，歼敌5万余众，敌之34师窜渡不成，现正在南岸被我全歼中。”蒋介石哑了一般，怔了好久才闷声道：“情况属实么？”杨永泰、宴道刚相继走来，呈上才收到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上报战绩的电报，蒋介石匆匆看着，骤然间虚脱一般地倒在椅子上，两只眼睛也阖上了。

一时间，行辕的将校们都慌了神，连忙叫来侍从医官和护士小姐。医官和护士小姐见委座神色并无异样，像是睡着了一般，便不敢声张，只好侍立一旁注目龙颜。蒋介石养息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他微启双目，见几个白挂男女立在周围，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医官说：“请委座量量血压吧？”蒋介石坐直身子，挥挥手说：“人好好的，量血压干什么，去去去！”他随即站了起来，一抖精神，嗓门是那么响亮：“辞修，墨三，3天内不许给部队发作战命令，只发嘉奖令。同时，给在上海治病的冯·赛克特将军发一个致敬电。没有他的‘堡垒推进’，便没有共匪的仓皇窜逃，也就不会有湘江之战的胜利！”他随即口述了给何键、薛岳的通令嘉奖电和给冯·赛克特的致敬电。

打胜仗的消息传得快，反响也快。蒋介石才签署了两纸电文，各地的贺电便雪片似的到了。湖南省党部的贺电说：“委座神威，督剿有方，熟筹伟略，运稳扎稳打之方策，以制出没无常之流寇……”浙江省保安处的电文说：“捷报传来，举国欢庆，从此犁庭扫穴之功既成，天日之光重见，企仰丰功，益深感戴，尚祈再励士气，歼彼丑虏，措党国如盘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蒋介石挑着看了几篇，千篇一律的文字，读来索然。两天来，经历了惊恐、恼怒、尴尬和胜利带来的激动和兴奋，蒋介石也委实有些疲惫了。他举目望着陈布雷说：“布雷呀，我们为什么不能轻松轻松一下呀？”陈布雷喜出望外，道：“委座！委座是该放松放松了。去哪里好呀？”蒋介石说：“逛逛滕王阁去吧。来江西多少次了，还不曾去过滕王阁呐。”

整个行辕欢欣鼓舞起来。不出一个小时，行辕的将校们，便簇拥着他们的委座驱车来到了南昌沿江路赣江边的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今天的滕王阁，游人已去，石道旁，树荫下，影影绰绰是康泽的行辕别动大队的队员。蒋介石下得车来，健步走上石阶，来到

阁楼，他没有落座，径直走到回廊处，一抬双臂，侍从接过那件黑披风，他一连做了十几个伸臂扩胸的动作。蒋介石这年48岁，身材瘦削，伸臂扩胸的动作做得堪称潇洒，随行的将校们竟不住地啧啧赞叹：“外间只知委座神威，委座亦虎威也！”“只有虎威，才能神威啦！”蒋介石权当没听见，他举目远眺，赣江北去，烟波鄱阳，天际处，白帆翩翩，庐山飘缈。他禁不住在心里道：“好地方，江西原是个好地方咯！”他转身回到阁楼，近旁有碑刻的《滕王阁序》，他默读了一遍，连声赞道：“好文章！好文章！”文墨官陈布雷一旁帮腔：“神童妙笔，千古佳作！”蒋介石不谙“神童”之说，有心驳之，又怕陈布雷语出有据，便没有吭声。他转过身来，缓缓地坐在侍从端上的一把藤椅上说：“都坐下歇歇吧。”一帮将校便都落座在阁楼的四周。蒋介石显然是放松了，说道：“王勃是不是神童，本人不敢妄讲；但他写这文章才二十几岁，是大体不错的。二十几岁呀，写得多好！‘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这都是讲南昌的历史和地理喽。你们说，讲得好不好呀？”众将校答：“讲得好，讲得好。”蒋介石说：“好是好，可惜这种讲法不能用到军事上，打仗要是这样来讲一城一地的位置，那才害死人呐，非打败仗不可！”将校们都乐了。

蒋介石的情绪更高了起来，说：“今天呐，我倒要考考诸位。看这，‘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这龙光是什么光呀？”众将校面面相觑，都难住了。陈布雷自然知道龙光所指，他怕一语道破，扫了委座的雅兴，没有说。蒋介石又道：“都猜猜看。”于是，有的说：“这地方水多，水多龙就多，龙光嘛，自然就是龙身上的光了。”蒋介石摇头。有的又猜道：“不对，龙光就是龙身上的光，委座还要咱们猜么？我猜，那一定是指一种神灵的光芒，也才能射得那么远，牛斗之墟。”有人见委座还是默然，便大声嚷道：“对，王勃神道，多少年前就说中今天了。龙光者，委座之光也！”蒋介石一听，噗哧一声，脸又沉了下来，摇头道：“你们呐，就是书读少了。我告诉你们吧，相传晋朝的时候有个叫张华的，夜观天象，看到牛斗两个星座之间有紫气照射，便认为这豫章一带有宝物，他就派人到南昌这一带地方来当县令，县令很听话，就在这一带地方找啊，找来找去，果然在这地方掘得两把宝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宝剑嘛，物华天宝，就是指这两件东西子。后人以为物华天宝讲的是江西这地方出产不错，那是谬了。宝剑嘛，光亮得很，都照到天上去了，射牛斗之墟呐。”将领们啧啧有声，陈布雷也没想到委座有如此透彻，说：“委座研究精深呐！”蒋介石说：“我这是北伐路过江西时，听那个四川赤佬郭沫若说的，我哪有功夫弄这些东西子。”陈布雷说：“委座单挑这一句让我们猜，想必还有更深远的意思呐？”蒋介石说：“更深远的东西子没有，联想倒是有一点点的，也算是以古解今吧。我们日前不是在广西的湘江打了大胜仗吗？挥剑斩共匪，谁是我的宝剑呀？何键、薛岳、吴奇伟、周浑元诸将，我之宝剑也！”众将校拍手叫好。陈布雷说：“委座解得好，解得好啊！”蒋介石说：“这自然不是郭沫若给我讲的，我也不是瞎解的。你们看这，‘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不是惨败涂地的朱、毛残匪的写照么？”

委座恣情滕王阁，陈布雷也来兴致了，说：“依委座思路，不才也来剥它几句。刚才接到江西省党部的报告，他们今晚要在南昌城里举行火炬游行，庆祝湘江之战的胜利，估计各省都会有类似活动，我们行辕和绥署也将举办一个各界人士参加的舞会，还请委座驾到领舞呐。此情此景，要是改动几个字，不正是王勃之七律前4句所描绘的么？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起歌

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漫卷西山雨……下边的4句也是很有些意思的。朱德、周恩来当年在南昌搞暴动，后来加进了一个毛泽东，在江西闹腾了这么些年，想必他们当中也是有人来过这滕王阁的。于今怎么样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贼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他们一去不复返了。不知有当，请委座教正。”

“勉强，勉强。”蒋介石随意答道。他正在琢磨什么，没有注意到陈布雷把王勃七律中“帝子”改成“贼子”，倒是陈布雷的一句“一去不复返”，又把他内心深处的忧虑挑了起来。他说：“布雷，难道你真以为他们一去不复返了么？”陈布雷见委座神情冷峻，顿觉紧张，不敢谬言，说：“愿听委座教诲。”蒋介石说：“终究是一介书生！此次湘江之战，虽有大胜，却不曾毙俘共党的任何要人，共党首脑尚在，这是一；第二，他们还有3万多人过了湘江。风起青萍之末，当年他们才几个人几条枪？再说，四川刘湘的‘六路围攻’，已经一塌糊涂，徐、张一股已赤化到了嘉陵江边；萧克部也已同湘鄂西的贺龙会合，看来也会嚣张于一时的。朱、毛一股窜过湘江以后，又会怎么样呢？大有可能沿湘黔边北上，同贺、萧会合。要是成气候，还有可能同四川的徐、张联手。这一来，事情还是有麻烦的。所以，当速告各省，不要再发什么子贺电，也不要搞什么火炬游行，庆祝什么胜利；军政首要，更不能因小胜而花天酒地。那样一来，眼力短浅者就会产生误解，以为安内的任务已经完成，该攘外了。不，剿共安内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用得着老先生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陈布雷果然书生气，听了委座这一席话，如雷贯耳，惶然道：“委座高瞻远瞩，忧民之心昭昭。只是，取消各地的庆祝活动，理由怎讲为好？”蒋介石说：“就讲我的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哪里轻松得了！他在阁楼里把玩了一番射牛斗的龙光，便走下阁楼，漫步在林荫道上，左右是陈诚、顾祝同、陈布雷。蒋介石边走边说：“这次湘江之战的胜利，全在掌握中，却也不无突然。已经突过3道封锁线的共匪，怎么会在第4道封锁线遭此灭顶之灾？现在明白了，从缴获中可以看出。共匪吃亏在于拖累太大，速度太慢，他们要是早赶到湘江，这场可悲局面兴许要推迟些时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朱、毛已经江郎才尽，说明共党里面也有蠢家伙。湘江之战，是第五次‘围剿’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它将为整个的剿共安内事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此后，匪党中央的这一部分只是区区残匪了；只要彻底歼灭这一股的残余，其他匪众也就好办了。但是，还是松懈不得，大意失荆州。中央军今后的主要目标还得是这一股。当然，终究可以腾出一些精力来考虑考虑其它地区的问题了。我这次到西北走了一趟，从杨虎城、孙蔚如那里得知，刘湘在川北对徐、张一股的‘六路围攻’，远不是他们说的‘收效甚微，收兵暂息’，简直是一塌糊涂，同我们的湘江之战恰成相反的。”他停了停又道：“自然，这也未必是件坏事，未必是一件坏事……四川的问题，除了匪党匪军的问题，还有一个统一的问题。现在看来，理会一下子四川的事情，时机已经成熟，也很有必要了。我在西安时给刘湘发了个电报，要他到南京来一趟，权且叫会商吧。此事，你们有什么考虑？”

陈诚、顾祝同和陈布雷都为之一怔，停下脚步来。陈诚说：“委座全局在胸，高瞻远瞩，洞察透彻。刘湘‘六路围攻’失利，这正好提供了一个良机。趁此良机，不说一箭双雕，也该说举事于一炉。中央军不能插足四川，

咄咄怪事！年前贺国光参谋团入川，好费周折！现在看来，参谋团要掌握川军方面的情况，都是不无困难的，也就只好跟着说什么‘收兵暂息’。卑职浅见，刘湘如能东来，当令他在中央军入川问题上作出承诺。有此一着，其它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陈布雷说：“四川1926年易帜，川军的改编，实在是徒有虚名，各派军阀沿袭旧有的防区制，内部一直不统一，这是四川地方当局不服从国府军令政令的根本所在。在刘湘来说，也是一大难处。我想，作为省主席的刘湘，利益所在，是不会不同意打破防区制的。中央支持刘湘，在四川打破防区制，当是要务之一。”

蒋介石漫步点着头：“对，一个中央军入川的问题，一个防区制的问题……墨三，你有什么看法？”

顾祝同嘟囔道：“就怕刘湘不敢东来。”

“哦？”蒋介石正要说什么，杨永泰匆匆跑来：“委座，南京来电。”说着便把一纸电报递给蒋介石。蒋介石接报展阅，眉头禁不住一跳：“他真还来了……”

陈诚问杨永泰：“谁？”

杨永泰说：“刘湘到了南京，等候接见。”

蒋介石问杨永泰：“夫人现在在何处？”

杨永泰说：“夫人明日即从青岛返回南京。”

蒋介石说：“回城。明天一早飞南京！”

且说刘湘在接到蒋介石从西安发出的邀请电报后，原本不想东去南京的。“六路围攻”全线崩溃，刘湘的精神也崩溃了，他的“四川王”美梦近乎破灭，正着手“请辞本兼各职”。再者，他也不难想到，老蒋在这种情况下约他“会商”，显然不只是为了把他个人怎么样，而是要把四川来个“彻底蒋化”。他不想背上“葬送四川”的罪名。所以，他迟迟不予复电成行。后来，他的幕后人，时任四川安抚委员会主席的张澜，一再劝说他：“现于今，四川是这么个烂摊子，你就从此一蹶不振，这不是好事。共产党未必能赤化全川。这样拖下去，兴许又拖出个各派混战的局面来。老蒋方面，现在全国抗日浪潮高涨，他也许有些新的考虑。当然，姓蒋的要出些难题是肯定的，但是，你不是也有难题可出么？”一个“难题”之说，提起了刘湘的精神，壮了他的胆量。张澜还说：“川军剿共固然不力，他老蒋在江西的第五次‘围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一次再要搞不好，加上前几次的，败仗不是打得比川军还多么？”刘湘说：“先生说的是，搞得好，也许能获取某种支持；他要是跟我过不去，我就撂挑子，看他怎么来收拾四川这个残局。”就这样，刘湘安排了自己的“后事”，怀揣“请辞本兼各职”的辞职书，带着他的幕僚杨芳毓、张必果、唐华、王蕴滋、傅常等，便一路人马来到了南京。

刘湘是11月20日从重庆乘船赴南京的，他根本不知道湘江之战的事，自然也就想不到未来的“南京会商”将是怎样的一种光景。他和他的幕僚一到南京，便吃了何应钦的当头一棒。当时，何应钦在南京主事，他得知刘湘到了南京，不迎不见，只说了两个字：“等吧！”4天头，刘湘被告知，委座将即刻回到南京，他心里才松活了一下。谁知蒋回南京以后，他又挨了一棒。当何应钦把刘湘参加“会商”的名单呈报给委座的时候，蒋介石说：“什么什么？就说是会商嘛，也不是国家对国家，政府对政府嘛！这是中央对地方，国军总部对部队！我说的会商，就是找他们来谈谈嘛，用不着那么多人嘛。告诉刘湘，就让他和杨芳毓来见我就是了。”当何应钦把委座的“意

思”通报给刘湘的时候，刘湘顿时觉得“完了”，想起了自己不久前在内江要跳河自尽的事，悻悻道：“这里有长江、玄武湖……”幕僚们出主意说：“没得法子，见还是要见的，大不了我们几个也叫他剿了。押是不能随便画的。”只有杨芳毓有些受宠若惊，说：“还是好说好回吧。”

这一天，刘湘便带着杨芳毓来到了蒋介石与之“谈话”地点。

他一踏上台阶，就见蒋介石神采奕奕，左右是何应钦、陈诚、陈布雷、贺国光，心里又顿时悚然，暗自道：“这叫谈谈么？”蒋介石倒还热情，主动伸出手来，亲切地叫他的字号：“甫澄兄，一路行船辛苦了。你也不预告一声，我是昨天才从南昌赶回来的。这位是杨芳毓，贺国光陆大的同窗？”

“委座贵体康健，党国之幸。”刘湘嗫嚅了一句。落座寒暄几句以后，刘湘说：“委座，卑职刘湘请罪来了。”刘湘一看阵势，自然得采取“哀兵政策”，他哭丧着脸，差点没挤出几滴眼泪来。他见蒋介石没有吭声，接着说：“‘六路围攻’的仗没有打好，有负全川父老，有负全国父老，有负委座教诲。”

蒋介石这才接了一句：“打仗嘛，胜败兵家常事。”

刘湘说：“倒也是。四川的仗历来难打，山大水深，道路崎岖，好藏好躲，就是不好搜。不知中央这边如何？想必不至于……”

刘湘的“不至于……”把蒋介石前几次的失败都暗示出来了，委座心头的火被点着了。

“这一回呐，”蒋介石说：“我就不与你甫澄兄相陪了。我们打了个大胜仗！在全州以南湘江两岸，打掉他三分之二，10万之众只跑脱3万。朱、毛在军事上恐怕比四川的徐、张要强得一点吧？”

刘湘惶然。他想表示一点高兴，竟没有高兴起来。他在心里嘀咕：“怪不得你老蒋今天精神这么好！”刘湘陆军学堂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28岁当军长，在新军阀战争中支持过蒋介石，时年才43岁，脑子也还好使。他想到，他此刻面前的蒋介石，不只是大权在握的中央，还是个打了剿共胜仗的大军之帅。没说的，只好软中来点硬的了。他说：“委座，我刚才说了，仗没有打好，有负委座教诲。其实，四川的事情，不只仗不好打，其它的事情也难办，你一块，他一块，明听暗不听，卑职又不才。所以，我还是请辞本兼各职，回成都乡下教书去是了。”说着，从怀里掏出辞职书来，呈给蒋介石。

蒋介石愣了。他没有看刘湘的辞职书，顺手递给了何应钦。刘湘刚才的话，有令他高兴的，也有令他作难的。他真还有点怕刘湘甩手，一走了之。他自己就干过“引退”的事。

何应钦见委座闷着，便帮腔说：“不必灰心啊甫澄兄，第二次‘围剿’，我在江西的仗也没有打好嘛。委座会体谅我们的难处的。”

陈诚：“甫澄兄，请你到南京来，就是要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的。辞职的话就不必再讲了。”

陈布雷说：“‘六路围攻’失利，委座到现在还不曾在公开场合说过川军方面一个不字。当然，委座是很关心四川方面的事情的。诚如甫澄兄刚才所言，你一块我一块，自然就形不成一种合力了。”

刘湘说：“不才无能，当有合适人选主持川政才好。”

鬼才相信“四川王”的谢位之举。蒋介石两眼盯着刘湘说：“你想把现在的烂摊子甩给那个？让我去给你收拾那个烂摊子吗？内乱当头，外患在即，一个军人，能临阵脱逃吗？你手里至少还有个21军嘛，还有那么一片

地方武装嘛。我托张澜先生劝你来趟南京，就是望你把四川的事情好好拿出来，要有舍我其谁的精神嘛，你却要教书去！听说，你在内江渡河时，还有过杀身成仁之念，那是真的有负全国父老了。当然，我是不信的，不信你的杀身成仁，也不信你现在的请辞本兼各职。你要辞职，打报告就是，还须带那么多人到南京来干什么？”

刘湘一看“天机”被蒋介石捉住，又意识到蒋介石还是要用他，他心里的“四川王”又蠕动了起来。他说：“委座，我来南京之前，张澜先生倒是给我说过，就当前四川的局势，我是不该辞职的。但是，困难实在太大了。还得说到‘六路围攻’，为什么仗没打好？就部署来说，应当说是没有啥子问题的，一百几十个团的兵力也是够用的，可就是没打好，问题在哪里？各顾各，都想保存实力。当共匪收缩阵地时，不敢进兵，怕消耗自己；当共匪在万源突破以后，又都不下力堵截，都忙着拉回自己的防区。光我21军，自然力不胜任了。这是一。第二，经费实在短缺，因为是防区制，税收就那么一点点，打点小仗还可以，打大仗就难以为继。现在部队能有几挺机枪就不错了，炮是根本买不起的，部队给养也很困难，生活差，管理、纪律都不太好。由于经费短缺，又带来第三个问题，军事设施也没法搞，修个碉堡都没钱。没有碉堡，守不敢守，攻不敢攻，没有依托。听说江西修了不少碉堡，我们好羡慕，也想效仿，可是……”

蒋介石心里乐了，说：“你这个川军头目也知道碉堡的重要了。我们的这一位，”他指着何应钦说：“跟着共党骂我们在前线修碉堡是造乌龟壳。可见不经一事是不长一智的。甫澄兄，你刚才讲的这几点倒是实情，元靖（贺国光）也曾谈及过这方面的情况。这一来，问题也就清楚了。怎么办呢？我看，第一，打破防区制。怎么打破法？一是你刘湘还是出任省主席，同时是剿匪总司令，中央和军事委员会再下一次命令。为政一家，要真正的统一，不能再搞那个块块。为了搞好四川的统一，也为了小统一服从大统一，元靖的参谋团可以搞大一点，算是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是帮助参谋军事，也为将来必要时中央的军队进出四川方便，不要到时候又扯皮。为了便于工作，杨芳毓和元靖是老同学，也可参加到这个机构里面来。第二呐，四川的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在这点上，同中央的军队是一样的，因此，此后，四川的20军、21军、22军、23军、24军、28军、29军，总共7个军的经费，概由中央负责，不够的，省府有权在本省发行公债。如何，请甫澄兄斟酌。”

刘湘的脸面大红。他既兴奋激动，又感到恐慌不安。他这是大进大出呐，一时竟难置可否。

何应钦说：“甫澄兄，很圆满呐！”

陈诚说：“委座对四川够关心的了。”

刘湘这才说：“卑职非常感谢委座的爱护。只是，诚如委座所指，四川现在还是一块一块的。事关各方，可否待我回川同各方面商榷一下再作定夺？”

陈布雷说：“机不可失呀，甫澄兄！”

杨芳毓这时说了一句：“我想，刘总司令个人是好说的。”

蒋介石指着杨芳毓的鼻子：“你呐？”

杨芳毓一身都抖了，竟出语陈述：“小的好说，小的好说。”

何应钦和陈诚禁不住“哧”地笑了。

蒋介石横了何应钦和陈诚一眼，起身踱着步子，语调更加铿锵起来：“我讲的四川要统一，军队由中央负责，是考虑到党国利益之所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我就不讲了，眼前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令人乐观的，谁也不应陶醉于湘江一战的胜利。朱、毛股匪残部3万余众，过湘江继续西窜，他能往哪里去？他能不看上湘鄂西？不看上四川？这就有些麻烦呐。我要特别提醒一句，共党中央还在。他们一当实现同贺、萧的会合，接着就会图谋同徐、张的会合。会合以后，聚巢何处？在湖南他们未必施展得开，但在贵州，特别是你四川，会不会搞成这之前的江西那种局面？事情总是要做些坏的打算才不致被动。不论匪党中央残部是窜向湘鄂西，还是经贵州直窜四川，长江防线是必须严加守备的。我这不是借共匪以吓唬自己。”

共匪的流窜能力大家是知道的，徐、张一股不是从鄂豫皖流窜到四川的？萧克一部才多少人马，竟从赣南窜出，绕道湘南、贵州，到了湘鄂西！我们以往同共匪作战失利，吃亏就在轻敌。总之，四川，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剿匪任务很重的地区。”

听了蒋介石关于“匪事”前景的描述，刘湘心里直发凉。是啊，北有徐、张一股赤化到了嘉陵江边，南面再有朱、毛一股窜来，南北夹击，我刘湘岂不是只有跳长江了？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一横心说：“委座英明料断，甫澄不能再糊涂，一切就照委座的办。”

“好！”何应钦和陈诚同声叫道。

蒋介石也轻轻地叹了口气，轻松了下来，问道：“甫澄兄在哪里下榻？”

刘湘说：“住在朋友家里。”

蒋介石“嗨”了一声，说：“怎么搞的！道之呐，请甫澄兄一行都住到国府来。关于长江防务问题，我们还要详细谈谈的。”

“我马上安排。”宴道刚应道。

第二回 毛泽东越城鸣钟鼓 白崇禧东电讯委座

话说浴血突破湘江的中央红军，为尽快进入西延山区，摆脱敌人，在集结地域集合队伍清点编制和人员时，活着的人们才发现，许许多多的人不见了，有的整连、整营、整团的不见了，5军团的34师怎么呼叫也联络不上。在渡江战斗进行当中，人们虽也曾看到本部队伤亡惨重，但总还以为别的部队也许不至如此。不曾想别的部队损失更大。到这时，恶梦般的感觉骤然袭上人们的心头，可怕的恶梦，令人难以承受的恶梦！

战争的“恶梦”是战后才能真正感觉到。

大失利，大震动，大困惑，大思索。恶梦中，全军3.5万生灵，无不在问自己，也在问别人：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失败得这么惨？埋怨，牢骚，争吵，骂娘，充塞着全军上下。“前几次的反‘围剿’，打得俘虏都管不过来，打得根据地锣鼓喧天，这回是怎么了，难道就是那条该死的河太宽了吗！”“转移转移，为什么转到了湖南还不够，硬要转移到这广西来？”“还要他娘的往哪里转哪里移？要转光移光吗？”有的直端端地矛头向上：“蒋介石成天说咱们是朱、毛的队伍，咱们还是吗？只怕是叫那个外国人当了家

了，才落了个打了败仗大转移，大逃跑中打大败仗！”“他肯定是个老托，打进来的老托！”有的干脆说：“老子不干了，回江西跟留下的人干去！”

要不是古田会议还在起作用，要不是如蒋介石所说“共党要人一个也没有伤着”，要不是马克思主义还那么有吸引力，要不是2、6军团和红4方面军还在吸引着人们，这支大伤元气的部队要在上百万敌军的围攻中生存战斗下去，是不可想象的。

谁没有牢骚？中央领导层中，军团一级的干部，也在发牢骚。彭德怀在骂娘：“他娘的，我在江西就说，崽卖爷田不心疼。再这样下去，非叫他卖光不可！”刘伯承为人持重，不骂娘，可压在心头的火气不比旁人小。他被贬在5军团当参谋长，这次湘江战役5军团损失最大，他愤然叹道：“打的啥子仗啊，打的啥子仗啊，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

掉进低谷的中央红军，大思索之后该是大觉醒，大转折。然而，一时竟没有人来回答这场恶梦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来引导这种大思索，把握这种大转折……

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博古和李德，被战争的严重失利震懵了。一懵便哑，不吭声。博古掂着一支手枪，时不时地朝自己举了起来，要不是聂荣臻说了他一通，说不定他真的要自杀。李德有时倒也神经质地嘟囔几句，可伍修权在跟前的时候他不嘟囔，伍修权走了以后他才嘟囔，谁也不知道他嘟囔些什么。待到他们稍有镇静，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之后，他们的思路又掉进了自我维护的泥沼，想方设法安慰自己，开脱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权力。

“三人团”的周恩来，他为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他的办法就是成天前后左右忙碌着，好像没工夫说话儿。

毛泽东也不说话。他有话可说，可他不说，“还是免开尊口吧。古人言，不以成败论英雄喽。”他怎么说呀，他一说就是军事路线上的根本错误，说开来就可能涉及人事上的变动，这是非同小可的。大敌当前，上上下下的情绪又都不好，现在来搞这个事情，弄不好剩下的这点人马都带不出这越城岭去。再说，他是个被解除军队指挥权的“政府机关干部”，他一说话，大有可能被人说成是为了要把军队指挥权重新夺到手。不说不行，说也不行，他难住了，只好闷着。

毛泽东不说话，其他人也只好“断肠牢骚”而已。血战后的中央红军，12月上旬进入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属南岭山脉，从云南贵州西来，穿过湘桂边境，直奔江西福建而去。

广西龙胜地区的越城岭，山峦重叠，树林茂密，东西长600里，南北宽200里，山和山之间，有小块农田，有小河穿流，是个短时休息的好地方。恶战之后，总有一个相对平静的间隙。这时的白崇禧，只保持同红军的接触，并不搞大的动作，这也给了中央红军一个喘息的机会。

30万红军，搞得只剩下10万；10万红军突围，现在只剩下3万多……毛泽东不说话，心里却是阵阵的绞痛。这天傍晚，他步出山腰间的小民房，想到小河边去走走，他估计这里的小河流水，也是流进湘江的。他走着，撇开近处血染的湘江，想起了桔子洲头的湘江。他同湘江有着天生的亲情，“……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唔，怎么又想到那上头去了！”他驱走遐想，继续在山间小道上走着。

他走着走着，只听得前面树林里人声嚷嚷。他走上前去，只见一伙人在围着一个战士开斗争会。那个战士被捆在一棵大树上，破烂衣衫，叫绳子一捋，整个胸膛都亮在外头。毛泽东心里发沉，便停下脚来，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透过树缝，他看到战士们情绪激昂，发言者措词尖锐，指骂那个战士是“逃兵”，“叛徒”，“死了那么多，你就怕了是不是？怕死鬼！”“现在要走路，没法关禁闭，干脆枪毙算了！”“枪毙！枪毙！”这几天，毛泽东倒是听说过部队有撂枪不干的，也有拖枪逃跑的。“不行啊，人已经不多了啊！”他暗自想着，走上前去，问是怎么回事？这伙人只听说过“毛委员”，却不认识毛委员。主持会议的，看上去像个连长或是排长，他大嗓说道：“怎么回事？他说他不在这里干了，要回江西去，说那边反正还留下有人。可是，谁知道他是回江西哪里？江西还有个南昌城，南昌城里还有个蒋介石呢！”被捆的战士回嘴说：“你排长胡说！我们是一个村的，我能到蒋介石那里去吗！”毛泽东一听是这么回事，心里倒松了松。他小声问那个战士：“你，真想回江西去？”那个战士恼道：“这打的什么仗嘛！我们一个村十几个人，在一个连，现在就剩我和他了，他还把我捆了……”毛泽东“噢”了一声，又跟那个主持会议的说：“你是排长啊？不管怎样，不该捆人喽，这是违反古田会议精神的。”排长说：“古田会议精神？古田会议是毛委员管的事，他现在不管事了！”毛泽东被呛住，一会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管事了？”排长说：“他要管事，能指挥打出这样的仗吗？”毛泽东本想再问一句“你说怎么办？”但没有问出来。他跟排长说：“我替你把他解了如何？因为俘虏也是不该捆的，你们又是一个村的。我替他说句话，他不回江西了，跟你一起走，行吧？”排长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把那个战士身上的绳索解了。毛泽东一边解绳子一边跟那个战士说：“你一个人要回江西，不好办的。想开点同志哥，我们将来会回江西的。”他把绳子递给那个排长：“拿着，捆个包袱用得着的。都很辛苦了同志们，大家好好休息休息，还有路要赶喽，别这么辛苦了。”排长愕然：“你是哪个？也是老表？担架团的？”毛泽东这才借机冒了一句：“是呀，我就是想弄付担子挑挑，可我肩上没担子，只好成天跟着你们走了。”那个排长还想说什么，毛泽东转身下坡去了。

毛泽东来到河边，脑子里一直翻腾着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连战士都知道这样搞下去不行了……”他感到一阵欣喜。在这之前，他还只是在担架上听王稼祥说过一些很是气恼的话。那是在突破湘江之前，是针对突围前的失利说的：“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经过这场恶战，王稼祥又是怎么想的呢？他的意见可能更加尖锐，也可能不得不考虑眼前更加危急的情况，有所克制？对，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干“泥菩萨过河”的事，你王稼祥就是把我拉出来，我还得看看这只桶能不能箍得拢嘞……毛泽东来到小河边，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他望着一弯清清的流水，望了好一阵，才想起他今天为什么要到河边来，“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来得及表示一点悼念……”时令深冬，山花早已凋谢，他就近摘了一把青草绿叶，抛进河中，随口念了一句古词：“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他的这种情致，也许同他是一个“闲人”有关。说闲便闲，他由刚才的那句古词又想起了辛弃疾。他很喜欢辛弃疾，辛弃疾年轻时也曾带兵打过仗，又是江西人。在江西的这些年，他的书箱里一直放着一本《稼轩词抄》，是先生徐特立不知从哪里找来送给他的。情之所牵，他吟诵了一首：

扑面征尘去路远，香篝渐觉水沉销。山无重数

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

他刚吟完，忽听身后传来说话声：“好啊，我亦奉陪半阙。”来者正是徐特立，中央纵队的3位老者之一。毛泽东起身道：“怎么样啊徐老，休息过来了吗？”徐老不老，五十三四岁，但学生对先生，只得喊“徐老”。徐老不客套，朗朗吟诵起一首词来：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边来。君如无我，问君怀抱向谁开？但放平生丘壑，莫管旁人嘲骂，深蛰要惊雷……

“只记得这半阙了，自然也是稼轩的。”徐特立说。

“先生在上，有么子话你就说吧。”两个湖南人，又是师生之谊，毛泽东乡音乡词。他从先生借用的词里听出了一点意思。大战之后，谁都没有个笑脸。徐特立的脸沉沉地，说：“我说么子！我要你说，我是来听你的。”毛泽东愕然：“我说？要我么子说？”徐特立说：“说么子？仗打成这个样子，你没有么子说的？”毛泽东想了想，又叹了一口气，说：“有，有说的。我刚才见到一件事，颇有点意思，我讲给你听。”接着，他把刚才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挨斗的事说了一遍。徐特立听了说：“是呀，那个战士都有一肚子话嘛，你就没么子讲的？唉，这一路上，我就没听你说几句话，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想听你说点么子，更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该不是还在闹情绪吧？在江西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当然，这是宽心的话，现在我不想说这种宽心话了。现在是，我刚才从辛稼轩那里借来的：深蛰要惊雷！”“老师！”毛泽东神色郑重地：“我这个政府主席可是管着你这个教育委员嘞。党是有纪律的，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惊雷之言，莫讲莫讲。”

徐特立似乎有点来气了，把背着的手移到了腰上，说：“我今天来找你说说话，听听你讲点么子，这犯么子纪律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要依老卖老，不是卖我一个的老，是卖3个的老，董必武和谢觉哉要我来找你的，老家伙为红军忧心，为党的前途忧心！我问你，仗是不是还要这样打下去？是不是还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当然，我一个管文教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革命成功了，也只是在政府里管点小事，是不该操这个心的。可于今是么子时候？不是人人都要考虑战争问题么？我把我要讲的讲在这里，要照现在这样搞下去，剩下的这点子部队，怕是经不起打几回了。要改变军事指挥，布劳恩这个人不行，根本不行！”毛泽东为几个老同志的“忧心忡忡”感到由衷的高兴，可他还是喜不形色，说：“李德这个人，他们在他们那边的仗是怎么打的，我不大清楚，要讲打中国的仗，他是不怎么在行。其实，打中国的仗，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都是里手嘛。问题是不听你的呀，中国人自己把打仗的事都交给人家了。再者嘛，”他说着停了停，把本来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再者，我倒觉得，人家也是不易哩，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图的么子？就是房子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吃得好一点。老先生当年上井冈，不就觉得是很难的了么？我想，这一仗下来，他们总会动些脑子的。”徐特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眨眨深陷带皱的眼睛说：“讲这么半天，你还袒护他？”毛泽东说：“不是袒护那个，革命总还得讲点人情味哩。”他停了停又说：“先生见到子珍了么？”显然，毛泽东想终止这场谈话。他不想再往深里说，深说真是要“惊雷”了。他不想惊雷，他得考虑时机和各方面的因素。徐特立还是不了心愿，说：“润之呀，我刚才那句‘问君怀抱向谁开’，算是多言了。不过，我还是摸到你的底了，你是有话不想说，暂且还不想说，是

不是？润之，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算是一个提醒，别说晚了误事。全军上下，谁不知道你那套打法是对头的？敌人还在四周摆着，仗还有的是打的，不能一败再败。所以，你是不是找洛甫和王稼祥他们谈谈，你还是政治局成员，也可直接找博古和恩来谈嘛，总得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呀。即使吵上一架，也比一个人说了算好啊。我的话完了。”毛泽东说：“好吧，有便我会找他们谈的。徐老，我刚才问你子珍的事，你还没告诉我呢。”徐特立说：“还好，在休养连。只是，越来越出怀了。你就别守着那个礼拜六制度了，有空就去看看她。唔？”毛泽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部队还是休息。上午，王稼祥拄着棍子来到了毛泽东住的小民房。一进门便说：“泽东同志，恭喜呀，你我他，又有帽子戴了。”毛泽东没大听明白，以为是冬天来了，搞后勤的在哪里搞到了一批帽子。说：“有多少？部队能摊上吗？”王稼祥“哧”了一声，说：“对不起，部队轮不上。只一顶帽子，我们3个人合着戴。”毛泽东心头忽地紧了一下，说“怎么回事？”王稼祥说：“我以为他们真是被惨败的这一仗震懵了，脑子麻木了，开不动机器了；原来他们的脑子还在动着哩，动得蛮巧的哩！你和我，还有个张闻天，‘三人团’，中央的‘新三人团’！”毛泽东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28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是那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

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3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题，说重了他们也许受不了。暂且不说，大家冷冷再说。不谈军事指挥，不谈所谓“新三人团”，剩下的便是“身体怎样，注意休息”之类了。临分手时，毛泽东只奉送了一句：“上午王稼祥同志又找我了，他说以后在军事指挥上该多一点民主，我表示有同感。”

周恩来丢下几颗奎宁，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两天后，部队进入越城岭深处，一场大吵大闹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越城岭深处的风雨桥，苗族聚居的一个大村寨，几百户人家，总部和1、3军团军团部都驻在这里，是个吵架的好地方。起因是军委第2纵队奉命讨论两个干部的处分。军委第2纵队是由苏区政府机关和直属单位组成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罗迈（李维汉）高低不同意处分那两个干部，他找到毛泽东，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处分那两个干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处分两个干部的事，反问道：“哪两个干部？他们犯什么错误了？”罗迈愣了好久，说：“你不知道？一个是秘书科长，一个是管理科长，说他们从苏区突围时，没有组织好，带了些不该带的东西，拖拖拉拉，误了转移的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湘江，造成战斗的失利，是严重的……”毛泽东扬手道：“别讲了，我明白了……”罗迈哑然望着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明白了什么，埋下头去说：“怎么能怪他们两个嘛，情况那么紧急，又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转移……”毛泽东又扬了扬手，问道：“是哪个通知你们要讨论他们的处分的？”罗迈说：“既然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直接通知的了。还说要写出文字材料，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当然喽，要

紧的就是通报全军。”罗迈说：“为什么？目前部队情绪这么不好，怨气这么大，再冤枉一些干部，内部的团结怎么办？”毛泽东“哧”地笑了一下，说：“你李维汉也是秀才气多了。他们也是想团结内部嘞。你也不想想，他们真是要处分那两个干部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罗迈愣着，毛泽东脸色发青。前有“新三人团”的舆论，今有这么一种配合，毛泽东觉得不能再沉默。

“走，我们找周恩来同志去。”

原来，湘江大败以后，掉在自我维护泥沼中的博古和李德，这些天一直在诚惶诚恐地寻找维护自己的办法。他们见王稼祥和张闻天常同毛泽东接触，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毛、王、张。两个人一嘀咕，便嘀咕出个“新三人团”来。最先提出“新三人团”的是李德，博古赞同。但是，要博古现在就拿主意在中央领导层中拿掉“新三人团”，一来没那么大的胆量，二来有些不忍心。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李德在提出“新三人团”的问题时也说：“把王稼祥、洛甫拉过来，别让他们受毛泽东的影响，莫斯科回来的人是应该好好团结的”。要是只拿掉毛泽东，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博古也觉得不好办。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基础比谁都坚实，在军团以上干部中也广有人缘，闹不好要弄出大乱子来。李德说：“那也得想办法‘约束’他一下才行。”博古同意“约束约束”，可有什么约束的办法呢？这天行军途中，博古同他的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凯丰（何克全）走在一起，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9军团代表的凯丰，说：“湘江战役后，部队情绪大，要考虑中央的威信，考虑‘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呀！”博古叹息道：“谁说不是呢。我正后悔，没有把毛泽东留在苏区是一个失策。”凯丰说：“我说的就是他！有迹象表明，他是有可能利用目前部队的不满情绪的。其实，哼，他自己就没有错误？没有责任？”博古问：“怎么说？”凯丰说：“李德同志不是说了，湘江一仗没打好，主要是拖累大，误了时间，没有按时赶到江边。毛泽东是管政府的，拖累大主要是政府机关的2纵队嘛！”博古大彻大悟，“对啊，这不是个好法子么！”两个人便叽叽咕咕，嘀咕出一个“处分两个干部”的办法来。耍点心眼，搞点诡计，这一点也许中国人胜过外国人。博古到宿营地给李德一说，李德开初还不大同意，“平白无故就处罚人？”经博古一番解说，日尔曼人才不得不佩服东方人的“精明”。拿到“三人团”上一碰头，周恩来也不同意：“带那么多东西上路，我们是知道的嘛！”博古说：“现在不是有些干部还在轻装问题上顶牛吗？不处分两个干部，解决不了问题。”周恩来忙里忙外，脑子里事多，没有深加考虑，也就同意了。

周恩来和博古几个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阁楼里，当毛泽东和罗迈来到阁楼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正在座。毛泽东一见面便说：“恩来同志，2纵队有两个干部要受处分，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动找上门来，想起3天前的那次不能令人愉快的谈话。他打了个愣说：“泽东同志，请坐。这事我知道，我们中央几个同志碰过头。考虑到目前轻装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给两个干部一点小处分……”毛泽东一听周恩来又知道其事，心里的火气压不住了，说：“这是什么逻辑！？用处分干部的办法来解决部队轻装问题，这逻辑也太混乱了吧？”周恩来神色惶然，老毛近来一直“避开尊口”，为什么为这件事情这么认真啊？他语调委婉地说：“泽东同志，不必动气，人是您管辖的，这件事情事前没有给您打招呼，似有不妥。您要觉得不该处分，那就不处分就是了。”博古说：“不行，有令必行。不仅要处分，而且要

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对，要害就在这里！不通报全军，简直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毛泽东在这里用了“油水”这个词，足见他是成心要吵一架了。博古说：“什么叫捞油水，土腔土调！”毛泽东说：“当然喽，你们是洋腔洋调惯了！不过这一回，你们不是洋腔洋调，倒是鬼腔鬼调！”正吵着，朱德、彭德怀和叶剑英也来了。罗迈给3个刚到的说了为什么吵起来的事，朱德没吭声，彭德怀嘀咕道：“要杀鸡？”下半句“给猴看”他没说。叶剑英是军委1纵队的司令员。听说要处分搞后勤的，心里想，我1纵队是军委机关，也带了不少东西，岂不更该处分几个了？便说：“我们1纵队该受处分的，是不是就从我开始呀？”周恩来和博古面面相觑，不吭声。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实事求是了？不，不是不实事求是，是鬼腔鬼调，里面藏着鬼！你们是想一箭多雕。处分了干部，又通报了全军，多好啊，打败仗的责任就全都推到下边去了，同总部的军事指挥毫无关系了，因为是下边带的东西太多，才拖延了时间，贻误过江的。第二，我毛泽东是管政府机关的，政府机关带的东西最多，所以这次湘江之败，完全是我毛泽东的责任了。机关算尽！”周恩来一听，恍然有悟，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再一想，这可是个有分量的问题啦，怎么办？博古和李德同毛泽东的隔阂，他们对毛泽东的戒备，他是知道的。他自己呢，戒备没有，戒心却是有些的。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是他接替毛泽东的，两个人之间能没有心理障碍？他很担心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进而旁及其他，闹得不可收拾。他神色不安地看了一眼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们‘三人团’再复议一下，事情既然提出来了，就在小范围里有所说明，以后有时间，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好么？”周恩来想暂且和事，博古却觉得触到了痛处，越发不干，说：“想得太多了嘛，干部有错误，给个处分，通报一下，也是为了大家受教育。再说，拖累大，误了渡江时间，使部队遭受损失，这总是事实吧？”罗迈憋不住了，说：“没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可是，突然通知转移，并且说，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算了。下边还以为是转移上三两天，顶多转到边界去，不就把能搬走的都扛上了？再说，部队到底带了些什么东西上路，走在路上，都是有眼珠可以看到的，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赶到湘江边吗？不是瞎指挥吗？”博古一看罗迈也加了进来，火道：“瞎指挥？你说的是瞎指挥？你说这话要负责任！”叶剑英说：“不是瞎指挥，也是指挥瞎了！”彭德怀说：“说得有理！这个处分干部问题，不是个处分干部的问题，而是湘江之战到底败在哪里，该由谁负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讨论讨论！”正说着，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闻声赶来了。张闻天一看阵营不错，说道：“看来，‘新三人团’是藏不住了，是不是一起解决了？”周恩来、朱德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神情茫然。罗迈、彭德怀、叶剑英也不知道什么“新三人团”，便嚷嚷起来：“‘新三人团’？从上海赶来的？”张闻天又补了一句：“为首的是毛泽东！”周恩来茫然问道：“这是谁说的？没有的事情不能乱说。”张闻天指着博古：“他！他说的。”朱德问王稼祥：“是不是有我一个？”王稼祥说：“暂时没有你，有你便是‘四人团’了。”周恩来盯着博古，无可奈何地长长地叹息着。彭德怀火爆，愤然道：“打了这样大的败仗，还要这么整人，还是共产党人吗！”

“老彭！”毛泽东叫道。他一看人越聚越多，他正担心有人捅出个所谓“新三人团”来，把事情闹大，结果真还捅出来了。事情是明摆着的，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一经提了出来，就有可能震动现在的“最高三人团”，就会

是党内的一颗炸弹。而这颗炸弹是不能随便爆炸的。刚才的情况表明，周恩来并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这更使毛泽东感到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他只好又把话接了过来，把话往一边拉一拉。他说：“老彭说的作战指挥问题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说到作战指挥，部队到达湘南郴、宜一线时，我曾提出过，湘南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都不错，地形条件也好，是不是暂时在那里站住脚，再寻找机动？不行，没有人听，非要不停顿地西进不可。后来，我又提出，不应当再向西，要改向湘中，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吴奇伟，湘军何键，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几十万军队都涌向湘桂边了，湘中空虚。由常宁、祁东向宝庆、新化一线，是完全可以穿越过去的；要说同2、6军团会合，这条路也近得多。可是有人怎么说？你毛泽东就是舍不得江西、湖南。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同志，这回又说是要舍得江西、湖南了。当然，去湘中也是要渡湘江的，湘中的湘江比全州的湘江还要宽一些，渡起来可能还要费事一点。可问题是可以摆脱敌人，从容渡江。结果好喽，在没有摆脱敌人的情况下，硬着头皮要在全州地段渡江，那怎么能不吃亏？不吃大亏？把责任推给下边，不只不合适，也推不下去嘛，是小孩子的把戏嘛。我们是共产党，革命的军队，办事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爱护干部，才能团结。同志们，我们需要团结。”他特意把话落到团结上，这是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意思是说，紧张的不要紧张，气大的不要大发，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不是时候。这是突围以来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人说得最长的一段话。他的疟疾还没有全好，身上还有些时冷时热。说完，他转身走了。

毛泽东一走，一场争吵便结束了。周恩来像放下一付重担，特别是毛泽东提到“团结”，叫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同毛泽东按说还是知心的，两个人的私人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宁都会议前后，他们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感情并没有决裂。他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品性和思维方式，他理解毛泽东此刻讲的“团结”是什么意思。他那瘦削的脸上有了光泽，他站起来跟众人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刚才讲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团结。各位还有什么事吗？”

博古意识到要抓“新三人团”问题，反而将提供一个自己下台的机会。他铁青着脸嘟囔了一句：“那两个干部就不要处分了。”

人们似乎都从周恩来的脸上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团结”，也不想说别的了。彭德怀临走时说：“周恩来同志，再一两天就要走出越城岭了，下一步有点什么打算没有？”

周恩来说：“大体方向是湖南，先取通道。”

话分两头。就在共产党中央大吵大闹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蒋介石，在他的营垒中，也不那么太平。蒋介石是在刘湘尚未离开南京的时候就飞回南昌的。他正在为已经突破湘江的“共匪”处心积虑，他要重新组织兵力“围剿”西窜的“共匪”。当他下得飞机，在何应钦、陈诚、陈布雷等的陪同下，步入行辕，正要询问“共匪”在桂北什么位置，白健生采取什么行动，有些什么战果的时候，留在行辕值班的康泽呈上一纸电报，一纸不敢读给委座听的白崇禧的长长的电报。蒋介石当即展开便看，不曾看完，脸便气得发青，“娘希屁，这白健生反了！”

白崇禧是“进剿军”方面的一个“受气包”。还在中央红军越过第2道封锁线时，他就接到南昌行辕的一纸电报，责难他对共匪“围而不击，堵而

不剿”。正当他窝着火的时候，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把他和李宗仁的桂军也划进去统归何键指挥，“小诸葛”的白崇禧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北伐时，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他是参谋长，那时何键才是个师长。这且不说，他同何键还有过一段宿怨。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来是跟他站在一起联合反蒋的，后来却在湖南反戈投蒋，给他和李宗仁背后插了一刀。气还没找到泄处，当中央红军一部突破湘江以后，何键又告了他一状，说是“因为桂军方面堵截不严，才使共匪一部渡过了湘江”。接着又是蒋介石的那个“可谓浩叹”的指摘电。”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一纸1200字的电文打给了蒋介石，他先是历数了桂军在湘南、桂北堵截各节，尔后说：“委座电责各端，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7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5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咸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向抱宁为强敌粉碎之志，决无畏敌苟存之心，尤其对于共匪，向来深恶痛绝。淞沪清党，频年剿共，事实俱在，可以复按…….道程虽远，飞机不难侦察…….究竟何军与匪决战，战斗经过几日，共匪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便明真相矣。”下边就更有些意思了，他像是在指着蒋介石的鼻子：你要我遵照何键、刘建绪的计划行事，好啊，“唯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闽、赣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至于此后追剿，仍当尽全力与匪周旋，功罪毁誉，不暇顾及也。”

就是在签发这份电报之后，白崇禧跟他的幕僚说：“管他娘的，赶出去了事！”说的是把“共匪”赶出广西完事。这便是中央红军得以在越城岭山区休整多日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把电报推给何应钦和陈诚，而后起身在案前踱着。何应钦看完电报说：“健生也太过分了！”陈诚宽委座的心，说：

“也许他是气在何键身上。”

蒋介石说：“看来，剿共军事靠白崇禧、李宗仁是不行了。墨三，朱、毛残部还在越城岭山区？”字墨三的顾祝同说：“据昨日飞机侦察，共匪残部还在越城岭山区运动，似有向湖南的意图。”他说着，展开案上的大地图，又拉开墙上的一张敌我态势图。蒋介石看了看案上的小张地图，又转过身去看了看墙上的大地图，尔后说：“参谋本部有什么打算？”顾祝同说：“共匪窜逃方向无非有三：一是向南去黔桂边；一是向西去贵州；一是沿湘西去湘鄂西。现在看来，向北去湘鄂西的可能性居大。”蒋介石说：“对，在这之前，有萧克的6军团窜湘鄂西，朱、毛也是想奔湘鄂西同贺龙会合。给何键命令：因为桂军靠不大住，进剿军要重新编组一下，可以区分为两个兵团，第1兵团刘建绪，辖陶广第1路，3个师；李云杰第4路，两个师；李韞珩第5路，两个师。第2兵团薛岳、吴奇伟，辖吴奇伟第2路，4个师；周浑元第3路，4个师。一共15个师，全都由现在的位置急驰湘西，南起绥宁，北至芷江，

一定要在湘西之沅江以南、资水以西地区堵住围歼之。”说着，他举起手中的手杖，在背后的大地图上，由北向南划了4条弧形线：“湘江之战的经验就是设置了4道封锁线，层层堵截；教训就是筑堡不够，封而不死。命令何键，部队到达位置，立即筑堡，把4条线搞得坚实可靠。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同贺、萧会合。还有一点，为了不使前线指挥失误，何键的指挥所立即前移到邵阳，薛岳的指挥所立即前移到武冈。不得有误。”

何应钦赞道：“委座谋略，超绝古今！”

陈诚说：“共匪残部这回真成瓮中之鳖了。”

蒋介石说：“我在飞机上就想了想的。”

第三回 方面军掉头向贵州 薛兵团湘西大扑空

话说中央红军走出越城岭之后，进入湖南地界，于12月11日一举攻占了通道县城。

通道县城地处湘桂黔交界处，守敌只一个团的地方武装，先头部队一到，很快便拿下来了。

这一仗虽然规模小，缴获也不多，却在红军干部战士中起到了很好的振作士气的作用。大家都很高兴，笼罩在心头的失败阴影驱散了许多。问题不在胜利的大小，而在它是打了大败仗之后的一个胜仗。有红军战士后来回顾说：“如同直罗镇一仗是个奠基礼一样，通道城一仗也是个小小的奠基礼，它说明中央红军在经过湘江之战的失败以后，还是能打仗的，是能够在万水千山之间驰骋征战的。”

在中央领导层中，周恩来代表“三人团”宣布收回所谓“新三人团”之说，也因为打了一个小胜仗，人们的心情也好多了。心情好，精力也就充沛一些，吵起架来就更加显得思维敏捷，词章丰富，逻辑严密。在通道城，一场关于转移方向的大争吵，都不知道是怎么吵起来的。没有记录，没有主持人，自然也就搞不清它到底是不不是一次会议。仅仅因为它吵出了结果，形成了一个正确的有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决议，后来才史称“会议”。李德把它叫作“飞行会议”，中国人自己把它叫作“领导人紧急会议”。

中央纵队进入通道城的第二天，周恩来“请客”。他把博古、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邀到一起吃当地的糍粑，一来庆祝一下走出越城岭，攻占了通道城；二来，王稼祥给他说了，“要给大家一点军事民主”。他想听听大家对下一步行动的议论。周恩来一向长于在不同意见中斡旋。毛泽东正好有话想同周恩来谈谈，也就慨然赴宴了。闲聊中，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敌情：“会合在湘桂边的何键、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周恩来说：“有两个情况，一是据湘南地下党说，参加湘江之战的敌人已经撤离战场向北；另一个据截获的蒋、何电报，敌人已经在向湘西运动。根据蒋介石的一贯战法，他无非就是要阻止我们沿湘西北上与2、6军团会合。”毛泽东想接着问“三人团”有什么考虑，博古接过话说：“不管敌情怎样，我们也得沿湘黔边北上，同2、6军团会合是个命运攸关的问题。”接着是李德说俄语，伍修权翻译说：“顾问说，一当实现同2、6军团的会合，我们就胜利了，就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问周恩来：“你也是这么想的？”周恩来

对毛泽东今天能赏光参加他的“糍粑宴”是感到快慰的，又见他主动打听敌情，问及他的意见，便高兴地说：“也只好走这条路了。你原来的想法不就是想穿越湘中去湘鄂西么？现在有新的想法吗？”毛泽东把半块糍粑搁进盘中，说道：“不妥，不妥，此案不妥！”

在座听毛泽东连说几个“不妥”，事关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都把糍粑强行吞了下去，愣着要听毛泽东的下文。毛泽东说：“我相信刚才说的敌情，薛岳兵团和湘军完全有可能移师湘西。这一来，不能走这条路了，走不通了。”张闻天说：“如果敌情属实，北去会合确是值得考虑了。”王稼祥说：“那岂不是钻人家的口袋？”博古说：“不往北去往哪去？我们总不能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毛泽东在压着指头数数字，像是在数他吃了几块糍粑。

他数了一阵说：“同志们啦，不成呀。敌人有飞机，他是不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大体位置的。他既然知道，又把部队撤离了原来的战场，往哪里去？自然是想横在我们同2、6军团之间的湘西。刚才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十几个师，加上地方武装，20来万兵力是有的。而且，他很有可能还是搞几层封锁线。我们不能去吃这个亏，吃不起了。”照顾到李德还要听翻译，毛泽东把话停了下來。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说：“不，不能这样做，不能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听了伍修权的中国话，毛泽东说：“出路？明摆着是条死路嘛！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一段孙子快背完了，他才想起这是为难伍修权，不好翻；博古是攻洋学的，也不大懂孙子。他只好又用白话讲：“不能去碰硬的，要拣弱的打，战术上是绝对应该如此的。”李德听了翻译，脸胀红了，说：“不能哪里有敌人就不往哪里去，哪还叫什么革命呀，革命就是消灭敌人，就是进攻。再说，中国这么大，哪里都有军阀，哪里都有敌人，总还得有点主动进攻敌人的精神吧？”“这叫什么话！”王稼祥上火了，他不让伍修权翻译，用俄语驳斥李德：“就你懂得革命要进攻？你连战略与战术都没有在概念上搞清楚，还侈谈什么革命就是进攻！说的是避实就虚，是为了更好的进攻。而你的进攻是什么？大收缩，大转移，大失败！我认为，下一步的转移方向，不能听你的了，收起你那一套吧！”张闻天懂俄语，他转述了几句李德的意思说：“他认为我们是害怕敌人，害怕进攻。这不是可笑吗！”李德一听说不能听他的，嗓门更高了：“我是国际的代表，是顾问！不尊重我可以，不尊重国际是不行的。”于是，尊重不尊重国际的问题，怎么尊重国际的问题，又吵了个闹喳喳的。张闻天说：“你尊重国际，你在中国打败仗也是尊重国际？”李德说：“革命有高潮和低潮，来潮和去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王稼祥说：“把瞎指挥打败仗叫革命低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嘲弄！”李德还要说什么，被博古拉住。朱德嘀咕了一句：“国际！好久都不见国际了。”毛泽东没有参加这一节的争吵，他自得地拈起一块油炸糍粑往嘴里塞。

周恩来让大家别吵，冲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把你的意见说完吧。”

毛泽东轻轻一笑说：“今天啦，就怪你这糍粑。这不，糍粑好呷口难张。”

又是毛泽东，把空气缓和了下来。他把一块糍粑吞了下去，环顾四周说：“你们都吵完了？行啊，喝了你周恩来的茶，也就只好遵命把要讲的话讲了。向北不能去，往哪里去呀？贵州！”满座又都惊了，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接着说：“昨天晚上我找了个老先生谈了谈，说老不老，还不

到50，是呷鸦片烟呷老的。你道此人是干什么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下，经管鸦片烟的，后勤部长一类角色，专管‘第二杆枪’的。这第二杆枪，在座有的恐怕就不大懂了。贵州军阀部队都有两杆枪，一杆汉阳造，一杆烟枪。可别小看这杆烟枪，这是敌情的重要之点。老先生很健谈，我说我现在也搞点军需方面的事情，是同行喽。

他就给我讲了半晚上，直到烟瘾发了才走。贵州的军阀部队怎么样？派系有四：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各霸一方，自行其事，常有内讧。王家烈是头，名为军长，实际调不动各路军阀，他能调动的只有两个师。现在是怎么一个摆法？侯之担在黔北；犹国才在乌江以南的几个县；王家烈的部队因前一段对付我萧克部，现留在铜仁一带，叫作防范2、6军团入侵；临近湖南的黔东南一面，现在只有何知重直属的两个营和周仁芳的两个团，其余是不能打仗的民团之类。这不是个很好的去处么？”

周恩来听得喜形于色：“这个鸦片部长不简单啦！”

毛泽东说：“人家是正正经经管军需的嘛，这些事情不清楚还要得？中国大，什么人都有。这位老先生，称得上是个黔军军阀史家。当然，他讲的，当中不乏民间妄传，但可以去伪存真嘛。妙就妙在他才退出军界，是赶回来过年的。他说他要自己做点烟生意。他还问我，红军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说，很抱歉，我们队伍里倒是有人曾经呷过鸦片，可现在穷了，呷不起了。”

在座除了博古和李德，都乐了。

好久没有听到毛泽东关于军事指挥方面的意见了。周恩来神采奕奕，高兴地说：“博古，李德同志，我们就这么定了好不好，折向贵州？”

博古像是没有听见周恩来的话。他的近视镜片挡住了他的眼神，他正思绪茫然。他既不敢想象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又觉得毛泽东讲的有些道理。他在心里说：“也巧了，单就是他毛泽东碰上了那么个鸦片佬。既然如此，倒是可以考虑绕绕道的。”他正要表示他的态度，李德说：“不，不能轻易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这是我们的一条生机。”

毛泽东对李德有一种近乎厌恶的感情，打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他基本上没有同李德说过什么话，偶尔碰到一起了，也总是避免同李德面对面。他只体谅李德一点：千里迢迢到中国来，也不容易。但是，此时此刻，他不得不回答李德提出的问题。听了伍修权的翻译，他说：“我想，我们是不是不要生路的吧？我们先西进贵州，也不是就完全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到了贵州以后，东可以去湘鄂西，北可以去四川，活动余地是大得很的！”

不等李德有所反应，王稼祥一掌击在桌面上，把几个碟子震得叮当响：“对呀！这个方案把同4方面军的会合都考虑进去了，是个很主动的方案嘛。”

张闻天说：“这才是一条可靠的生机嘞！”

博古差点又要吐出他的“新三人团”来。好久，他才说：

“行啊，反正是湘黔边嘛，先绕一绕看吧。”

朱德很赞成毛泽东去贵州的意见，神情欢快地道：“恩来同志，我是不是下命令呀？”

李德听了翻译后，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的嘴唇蠕动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一会，他摇晃着脑袋，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周恩来说：“命令部队，明天一早出发！”

且说当天傍晚，毛泽东正在房间里同警卫员陈昌奉用一张黄色的草纸包几块糍粑，准备送给在休养连的贺子珍，毛泽东交待说：“告诉你贺大姐，明天就要出发西进，我就不去看她了。”刚说完，就听门口来了一伙有说有笑的。毛泽东迎到门口，只见1军团的林彪、3军团的彭德怀、5军团的李卓然、刘伯承、9军团的罗炳辉，带着一帮子警卫员，笑咧咧的立在门口的阶沿下。毛泽东好久没有见到这种情景了，愕然问道：“你们是找我的？”军团长们不说话，只是“嘿嘿”地傻笑着。毛泽东明白了八九分，说：“才打下一个小小的通道城，就把你们高兴成这样了，这叫没出息！”彭德怀说：“你又说话顶用了嘛，当然高兴喽。”毛泽东摇摇头说：“不，你们不要这样，这是不好的，我现在不是你们的政治委员。”

行军打仗的事，本苏维埃不管，要说话顶用，那只是提了个建议而已。你们有事，还是……”林彪说：“总得让我们进屋坐坐吧？我可是骑了20里的马。”毛泽东说：“不妥不妥，你们都不是小把戏了，难道……”罗炳辉说：“我在右翼，警戒部队已经发现敌人向靖县方向运动，绥宁方向也有敌人在构筑碉堡。改向贵州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哇，你得多提点这方面的建议，可不能……”毛泽东再次不让他们说下去，说：“你们真要有事，找军委朱德同志吧，请吧请吧。”他张开双臂，像吆小鸡似的要把人吆走。刘伯承说：“就是朱德同志要我们来见你的。”毛泽东怔了怔说：“那也不行，你们是带兵打仗的，别再给我添麻烦了。这样吧，你们可以去看看周恩来同志，有什么事情，他会告诉你们的。”军团指挥员们都不大理解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此刻，毛泽东心里的那个“新三人团”并没有完全散去，倒不是怕他个人怎么样，就是怕胡搅蛮缠，把些军团指挥员也裹了进来，将贻误全军的大事。要打心里说，他是多想同这帮老部下好好谈谈的。刘伯承见毛泽东脸呈难色，便说：“好吧。其实，我们也只是想来看看你，顺便把贵州的敌情弄得更清楚一点。既然不欢迎嘛，也就没得啥子说的了，只好走喽。”刘伯承等走出几步，毛泽东又把他们叫住，说：“这样好不好，你们去周恩来同志那里，把警卫员都留在我这里，我还有几颗花生可以招待招待他们。嘿，要是吃不了嘛，我让他们带给你们一点，好不好呀？”罗炳辉想笑没有笑出来，说：“可别哄我们，三颗两颗也行……”毛泽东默默地点了点头。

刘伯承等走了以后，毛泽东把一帮警卫员邀进屋里，像逗娃娃似的，一边掀挑子一边说：“我们啦，有好呷的就是不给他们呷，他们是军团干部，有好呷的。嘿，我这呀，有……噫，不是花生嘛，是黄豆子！嗨，这个陈昌奉，花生和黄豆子都分不清楚。”他掂出一小口袋炒熟的黄豆：“来来来，黄豆子也不错，请吧。”小警卫员们不客气，一个抓一把，便嘻嘻哈哈嘎嘣嘎嘣地嚼了起来。别看小家伙们一个个才十七八岁，知道的事情并不少，又是常跟头头们在一起，胆子也锻练出来了，其中一个便开口问起事来：“毛委员，前一段你不管军队上的事了，你是捅的啥漏子？”毛泽东一下被问住了，不知如何作答。他笑了笑才说：“小同志哥呀，革命是件难事哩。难就难在不晓得么子时候就出点漏子；更难的是，有时候的漏子确实是漏子，有时候呀，漏子原本不是漏子，错把它当漏子了，这叫你不漏我漏，更漏！”小家伙们都乐了。毛泽东留下这几个小革命，原本是想通过他们了解一下当前部队情况的。他刚想提出话题，另一个小警卫员又说：“错把漏子当漏子，就把人撤了？这回，湘江这一仗，可是个大漏子，牺牲了那么多的人，又该把谁撤了呢？”又是一个很不好解答的问题。“这帮小家伙，真还有些心眼哩！”

毛泽东又笑了笑，说：“同志们啦，你们都知道了，我老毛不管那些事了，自然也就不知道该处分谁、该撤谁了。对，既然说到这里来了，同志们呐，我到想问问你们，现在部队怎么样呀？你们都是跟军团首长到处跑的，大家的情绪怎么样啊？”警卫员们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的说：“前些日子，主要是过了湘江以后，没有哪个心里不难受的，有的想回江西，回福建，有的发牢骚，说这回可好了，轮到打前站号房子就简单了，不要那么多房子了。真还是那么回事，一个连队，一间房子就挤了。做饭也简单了，一个伙夫就成。我们军团长也在骂娘：娘卖乖的，我都成了团长了！下了越城岭，大家的心情好像好了一点，但都还在问：这转移转移，到底要转到哪移到哪呀！中国还有比江西更好革命的地方吗？真的，我也搞不懂，我们到底要转到哪里去呀，毛委员？”有的说：“部队的同志，不怕打仗，不怕牺牲，就怕挂花，怕生病，走得越远就越怕。湘江那一仗，牺牲的多，伤的也不少，抬不走，就留下了。可是，要留下一个人，那才难呢，有的班长排长只好给他跪下。倒也是，留下的谁晓得会怎么样呢？”还有的说：“现在是冬天了，好多人还穿着单衣，行军打仗倒还好一点，一到宿营地就想烤火，太冷！”……毛泽东听得不住的点头。说得真好啊，大减员，大冷天，不知道还要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对，应该找个地方停下来，把这些问题解决一下。他说：“同志们啦，我们目前的困难是不少啊，比在根据地的那些年困难多了。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工农红军，我们是不怕困难的，是能够克服困难的。至于到底要转移到哪，这还说不定的，因为这不完全由得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准备走很长很长的路，走更难走的路，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目的地的，对吧？稍等等，我把灯点起来。”毛泽东说着走进了隔壁房间。

这时，陈昌奉从休养连回来，一进门看到一帮子警卫在座，又见那个装黄豆的布口袋在桌子上放着，有的小把戏还在嘎嘣嘎嘣的磕得响，他急了，嚷道：“好啊，你们打土豪打到我这里来了，都给我吐出来！”小警卫员们说：“是毛委员拿出来请我们吃的，你嚷嚷什么事！”陈昌奉不见毛委员在，跺脚道：“人家贺大姐怀着啦，我是给她留的呀！”警卫员们都傻眼了，都“这这这”地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端着油灯走出门来，见陈昌奉回来了，说：“昌奉啦，你怎么连黄豆子跟花生都分不清了，我还真以为那是花生嘞，原来是黄豆子，你给他们解释解释。”陈昌奉说：“我要说是黄豆，你还不得悄悄地吃了？我说是花生，你就会留着的，好给贺大姐送去。这可好了，都叫这帮小红军哥嚼了……”陈昌奉差点掉下泪来。小警卫员们说：“昌奉，你就别伤心了，我们想办法陪你！”

话音刚落，周恩来和朱德领着几个军团干部走进屋来。周恩来边走边耸鼻子：“唔，什么东西这么香呀？”朱德闻出了是炒熟的豆子香，说：“才吃糍粑宴，又尝豆儿香。昌奉，有就再拿点出来！”毛泽东一边让座一边说：“总司令别好吃嘴了，人家正伤心落泪喽。”朱德问：“噢，干啥子了？”陈昌奉嘟囔说：“我留了点黄豆给贺大姐补贴补贴的，他都拿来办了招待了。”罗炳辉说：“我没说错吧，轮到我们就只有皮皮了。”

说着拈了片黄豆皮儿塞嘴里。

毛泽东又说：“我还嫌招待这几位不敬哩。快倒水！”

林彪朝几个警卫员扬着指头：“你们啦，比总司令还好吃嘴！”

几个警卫员都挤对着出门去了。

周恩来坐定，说：“泽东同志，几位军团长告你的状了。”

毛泽东说：“那，想必是一告便准了。”

周恩来说：“当然，其名告你，其实是告我哩，告得好。至少，我是这么去理解的。这方面，以后有机会，我要充分地谈一谈的。正因为他们是告的我，自然就告得更准了，我也就只好听命于诸公，陪他们到你这里来，请你当面给他们交待一下下一步进军贵州的行动。”

毛泽东不禁惶然，说：“什么子意思呀？我的建议已经说了嘛，改向贵州，那里敌人薄弱。别的没有什么。”

罗炳辉粗嗓道：“我们不是要听建议，是要听命令！”

毛泽东这才明白几个军团长为什么又返了回来。他的话哽在嗓子眼里，想说没有说出来。

周恩来催促道：“还是说几句吧。”

毛泽东翻了翻白眼，想起了刚才几个警卫员反映的情况，便说：“好吧，反正有军委主席副主席在。我建议方面军掉头向贵州，此去第一站看来是黎平了。我想，如有可能，当在黎平停上几天，如果湘西之敌是取待敌状态的话。薛岳、吴奇伟要是跟得紧，那还是没办法的，停不下来的。但我估计，敌人也许不会跟得很紧，贵州的军阀对蒋介石也会有些戒备的，蒋的嫡系要进入贵州，也还得打打招呼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取得一个短时间的休整机会。刚才，你们几个的小把戏给我上了一课，说了部队当前的一些情况，概括起来是，大减员，大冷天，大转移。这三大带来一些什么问题，你们一想便知。在越城岭的几天休整不够，还需要一个短时间的停顿。不停顿地进攻不行，不停顿地退却也不行。我就是这么几句，如有不当，请恩来、朱德同志指正。”

周恩来小声叨咕着：“大减员，大冷天，大转移……对，是这么几个问题。我们是很有必要在黎平停上一个短时间的，要采取一些措施。各军团的同志请注意，部队的精简整编，大的变动，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在向贵州转移的途中，总还是有些仗要打的，各军团自己要把部队编组一下，做到形成作战单位投入战斗。根据地的老战士越来越宝贵，要尽量减少伤亡。泽东同志，你刚才说到湘西之敌可能取待敌状态，这一点有多少把握？”

毛泽东说：“蒋介石的意图是要阻止我同2、6军团的会合，这是一；第二，据右翼9军团所反映的情况，薛岳、吴奇伟的部队一到湘西就构筑碉堡。如果这两点可靠的话，敌人显然是取待敌姿态，企图以逸待劳，网住我们，聚而歼之。蒋介石就是那么个战法，我们到哪里，他就在哪里画个圈圈。围追堵截，画圈圈也。往后哇，就看我们拱圈圈的功夫到家不回家了。”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说得好，说得好，我们得有更深的拱圈圈的功夫才是。怎么样各位？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提吧？”

刘伯承说：“没有了。方案对头，问题也就简单了。”

罗炳辉说：“我还有30里路要赶。”

林彪说：“这次黎平一仗，给我们1军团吧。”

周恩来问：“为什么？”

林彪说：“湘江一仗，我们打得不大好。”

周恩来说：“可以，请朱德同志调整一下。”

毛泽东说：“那，我老毛就只好跟彭军团长进贵州喽？”

彭德怀说：“放心，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掉队的。”

且说蒋介石在南昌分兵几路进入湘西之后，便成天盼着“朱、毛赣匪

残部”能进入他的网兜。他要何键及时报告情况，何键一日三报，每报都是“前沿尚未发现匪情”。这期间，蒋介石又一次约见了从上海回到南昌的冯·赛克特。约见是在南昌的一家福音医院进行的。

原来，冯·赛克特在上海接到蒋介石的致敬电，说湘江之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是“堡垒推进”的巨大成功。法西斯的冯·赛克特阅报后竟脸色大白！法西斯有法西斯的深刻性。

冯·赛克特认为湘江之战的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也根本不是“堡垒推进”的什么大成功，而是一个大破产！堡垒政策已经被红军打破和战胜了。已经突破重围的军队是很难再围住的。

在这方面，冯·赛克特不无欧洲历次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知识。加之他当时国内的情况也不妙，希特勒大搞法西斯政策，共产党正在迫使希特勒下台；希特勒真要下台，他将无家可归，成为丧家之犬。他当时甚至想到过自杀。他为此病倒了。蒋介石得知情况后，才又把他接到南昌来，一来继续当顾问，二来防止他自杀。

当蒋介石走进病房时，冯·赛克特只挺了挺脖子，想坐没有坐起来。蒋介石问候请安以后，说：“冯将军，突围共匪残部窜过湘江之后，3万余众现已窜逃至湘桂边境山区，估计是要经湘西北窜与贺、萧会合，我已令何键、薛岳的15个师赶赴湘西，只待他进网，有可能就很快解决这一股。你就……”冯·赛克特瞪着一双灰蓝的眼睛一动不动，像是死过去了似的。蒋介石喊道：“冯将军！冯·赛克特将军……”冯·赛克特淡淡地笑了笑，说：“委座，不可太看重了湘江之战的胜利。这一仗最大的失错是不曾毙伤他们的任何头目；第二，不可低估一支突围的军队东逃西窜的能量。不论欧亚，共产党都是一些视生命如儿戏，而生命力又很强的人组织起来的。委座说过‘狗急跳墙’的话，我要补充一句：跳了墙的狗，要抓住是不容易的。中国，中国太大了，中国太大了……”冯·赛克特显得疲惫不支。蒋介石说：“你就放心吧，冯将军，中国很大，我的军队也是强大的。我们现在又在湘西设置了4道封锁线，4道弧形碉堡封锁线。口袋加碉堡，我们会成功的。就等他们进口袋。”冯·赛克特又是长者一般地笑了笑，盯着蒋介石说：“他要不进你那个口袋呢，阁下？围不住，就谈不上堡垒推进。中国的仗太难打了，山地倒不少，可又没有什么公国式城堡。没有城堡，他就不上钩，围也就不好围了。当然，不好围也得围，这次围不住，下一次再围就是。我祝委座走运。”

这次约见，令蒋介石大为不快，在回行辕的路上，他在车上大骂老日尔曼：“娘希屁！”

要围，你不做口袋怎么围？老家伙糊涂了，竟然说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公国式城堡的话来！”

叫冯·赛克特的德国人也不讨人喜欢了。

蒋介石坚信他的“口袋+碉堡”。回到行辕，他要陈布雷起草电报，催促何键严令各部抓紧筑堡，正要口述要点，便有杨永泰呈上何键的“火急火急”电报：“……5千碉堡，限期完成，各部不得不就地取材，城乡搜括，兵民相暴，徒不堪怨。请拨大洋百万，以利安民清政，达成剿匪军事也。”蒋介石说：“有这么严重的吗？”杨永泰说：“何总司令还发来一篇当地报纸的文章，是讲湘西剿匪见闻的，文字太长，委座是不是……”蒋介石问：“什么子题目？”杨永泰如实相告：“剿匪者匪。”蒋介石问：“这是什么意思？”

杨永泰说：“意思是说，剿匪者也成匪了。”蒋介石说：“这是异党的报纸！”杨永泰说：“显然是了，康泽正在查。不过，既然何总司令电报传了来，想必所说是有些实情的。”“讲！”蒋介石命令道。杨永泰不得不展开报纸，念读起头一段文字来：“今之湘西，古之荆楚边地，山多关隘，河多曲回，历来强人出没，匪患不断。谓此地地有匪气，山有匪鬼匪魂，异乡过客，一到此地，皆有发作匪性者，便视打家劫舍、掳掠良民为快事。昔有曾国藩带兵剿匪，兵勇所至，全皆匪化，草寇山林，不再随曾氏出山为勇。今有大军20万，云集湘西诸县，凡城凡镇，凡村凡寨，皆剿匪大军也。剿匪者，拔房舍以筑堡，拉民夫以作工，劫粮食以果腹，掳民女以劳军，鸡犬不宁，岂不剿匪者亦匪者也？见之所及，计开下例数端。下边是几段记叙文字……”杨永泰停下来望着蒋介石，蒋介石沉思片刻，又苦笑了一下，说：“布雷，你对这段文字有何感想呀？”陈布雷推着眼镜琢磨道：“剿匪者亦匪也……我看，不匪一下还不得行，我们一时拿不出那么一笔钱，就是拿得出来，也不能等到钱到了再修碉堡嘛。人家曾文正公匪得，我们为什么就匪不得？”蒋介石说：“对，发报！就地取材，不惜损耗；5千碉堡，不得有误！”

蒋介石刚说完，宴道刚又匆匆送来一份电报，他一边呈递一边说：“共匪奔贵州方向去了！”

蒋介石愕然，差点没能把电报接住。陈布雷走近前来，慌慌地同蒋介石一起看了薛岳发来的电报：“今日，我一部前出通道作觅匪侦察，方才得知，窜匪已于日前离开通道，西窜贵州，料已到达黎平地区。此事尚祈委座责令贵州王部全力回击，驱匪就范。否者，我将大扑空也。”蒋介石像瘫了似的，颓然坐下道：“冯·赛克特倒是说中了，说中了，他们不进我们的口袋……”一会，蒋介石振作起来，起身道：“给王家烈发电，要他堵住，往湘西这边赶，赶进薛岳、吴奇伟的口袋！”这时，何应钦和陈诚来到委座的办公大厅。何应钦说：“委座，王家烈的那点力量，只怕是堵也堵不住的，别说赶了。”蒋介石说：“那你说怎么办？”何应钦说：“得重新部署一下。”蒋介石气恼得又坐下了。

陈布雷见委座心情难受，又宽慰道：“刚才委座说冯·赛克特说中了，其实这也并非出乎委座的预料，我们前已有令给王家烈，要他‘集结兵力扼要堵剿，以收夹击聚歼之效’，不就已经想到了吗？其实，当委座在南京接见刘湘的时候，就想到了朱、毛窜匪有可能奔贵州，窜四川。这都说明，一切都在委座的掌握之中。再说，在湘西解决这一股，同在贵州解决这一股，不是一样么？也许，在贵州解决这一股，还能有另一方面的效果。”

蒋介石听着，脸上竟现出了一丝笑容，说：“还是你这个读书人脑筋好用。对嘛，共匪西窜贵州，我们也就有理由跟着进去了！”

军情紧急，电报来得快。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名来电，请命出兵追剿入黔的红军。电文说：“计凭隅匪众约5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卵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闽赣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拟即抽调劲旅，编组追剿部队，由宗仁统率，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

竟全功。”

蒋介石看了骂道：“娘希屁，哗众取宠，开空头支票！”

第四回 黎平会党内定大计 贺子珍细语劝郎君

话说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西进，兵分两路，右路为1军团和9军团，经靖县的新厂，由界牌进入贵州的黎平县城；左路为3、5、8军团，分别由青草坪和野洞，经洪州、中潮等地向黎平县城。打从湘江之战之后，全军改变了“抬轿子”的开进办法，中央纵队或随左路跟进，或随右路跟进。这次西进黎平，中央纵队夹在3、5、8军团之间。“抬着你们走，真还不如挟着你们走。”军团的同志跟中央纵队的同志开玩笑。

两路人马在向贵州西进途中，如入无人之境。星星点点，桥头路口，还有苗族、侗族同胞给红军战士送茶递水的：“你们又回来了，这回不走了吧？”开初，许多人都莫名其妙，老百姓递水不接，说话不答，还以为是敌人的探子；后来才明白，原来几个月前，西征的萧克6军团就从这里经过，老百姓对红军有所了解。红军不抢东西不拉夫，还打富济贫。战士们的情绪都高涨了起来，有一种早两年在江西打完仗又回到根据地的感觉。

在从通道到黎平的途中，只有林彪的1军团在黎平的外围潭溪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林彪很扫兴。守敌一个营，碉堡修得倒是不错的，可没有放几枪就弃堡跑了，退到几十里之外的十万坪去了。林彪还没有遇上过这么软蛋的敌人，他飞马进潭溪，要亲眼看看这到底是伙什么敌人？黔军是不是都是这类货？一打听，原来这个营同萧克的6军团打过交道，知道红军的厉害，全是吓跑的。林彪想，好吧，到黎平再打个像样的仗吧。当他率部来到黎平城下，把部队摆开，却半天听不到枪声。他正纳闷，只见先头部队已在城里的山头上挥起了红旗。城里的敌旅长、团长，见潭溪失守，也就弃城而逃，一直退到了五里桥。县政府的国民党官员见旅长团长们都走了，也都携家带口逃到榕江去了。1军团的前卫2师6团穿城而过。

黎平城里的群众见红军又回来了，自动组织了数百男女，赶到东门外10里的地方迎接红军大部队。12月16、17日，左路的3、5、8军团和中央纵队，在锣鼓、鞭炮声中进入了黎平城。好久没有见到这种光景了，军民一片欢腾。进入黎平的红军，立即展开了宣传群众、开仓济贫的活动；总政治部还发出号召，每个红军战士送一件礼物给苗族兄弟。黎平城里城外，一片苏区风。

由于西进，甩开了蒋介石的“围剿”主力和湘军的堵截，当面之敌又软蛋，敌情有些缓和，黎平的群众条件也不错，大转移的中央红军在黎平停下来，作一些休整和补充，便完全有可能了。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我们开个会吧？”毛泽东问：“开个什么会嘞？”周恩来说：“要开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把转移的战略方向再研究一下，通道的议定是临时的，只解决到黎平的问题。”毛泽东说：“说得好，会是该开的，转移方向问题当在政治局形成决议。”

然而，关于会议主持人问题，颇费了一番周折。周恩来说：“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自然还是由负总责的博古同志邀集召开喽。”毛泽东高低不同

意，说：“这个会呀，得由你来召集，你来主持。要让他来主持，那还不如去睡个大觉。”征求王稼祥、张闻天的意见，他们也不同意由博古主持。王稼祥还提出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妥。”

还是要由‘三人团’的同志来干这件事情。”周恩来碍于自己不是负总责的，怕在党内引起麻烦，说：“别又生出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来呀。”毛泽东说：“恩来同志，很显然喽，分歧还会有的。你要他主持，吵个一塌糊涂不讲，到时候又没个像样的结论，岂不是白开了？总不能让个外国人来主持中国党的会议吧？”周恩来一想也是，说：“好吧，我先找他谈谈看。可是，这话怎么说好啊？偏是我来主持会议。”毛泽东说：“世界上好多的事情，本来就是难得说的，不好说的。我们党现在的一些事情，将来的后人说不定会感到莫名其妙的。”

你就随便找个缘由吧，你恩来有这方面的天赋。”

周恩来确有某种“破解难题”的天赋，他跟博古说：“在通道临时议定的事情，需要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再明确一下。考虑到扯到军事行动上的事情多，你又有些劳累，我就代劳邀集一下吧？”博古当即表示同意，说：“这样好，这样好。要我来主持，毛泽东又该说我要抓他的‘新三人团’了。”

转移中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便在一家姓徐的商店里开了起来。

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军团军团长。临开会时，李德因为受了风寒打起“摆子”来，周恩来劝慰他先安心休息，博古会代表他坚持按中央“既定方针”办事的，李德只得听劝没有非要参加会议。周恩来提出议题说：“关于战略转移方向问题，我们在通道争论过，争论结果，就是今天到了黎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一致认识，需要通过政治局的会议加以肯定。据我同一些同志的接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不那么一致，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另寻合适的边区建立我们新的根据地；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到黎平来只是绕道，还是要寻机北上同2、6军团会合；有的恐怕到现在还持有这么一种看法，我们连黎平都不该来。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吧。”会议之前，好些人在个别接触中已经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主张放弃同2、6军团会合，另寻边区建立新根据地，他们认为这个意见好，是上策。于是，纷纷发表意见，认为转移方向应作适时的变动，“放弃东去，另建苏区”。博古听着，不禁心烦意乱，不停地推着眼镜，插空说：“都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到黎平来，说的是绕道，怎么能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这不能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想法。敌人甩脱了，‘围剿’打破了，只有十几二十天的路程了，却要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简直不可思议！”他说着瞥了毛泽东一眼：“我们这里不是有人常说要集中优势兵力，要握紧拳头么？”

毛泽东一看点到他了，便说，“问题在于要集中得了嘛！我的意见，必须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今天的情况同6军团当时的情况不同了，他们当时能窜过去，现在不好办了。”

屁股后头的何键、薛岳、吴奇伟离我们太近；而且，现在湘黔路已经修通，他们要运动到黔东北地区是很容易的。从战术上讲，他在湘西没能兜住我们，他能不把他的兜兜挪到黔东北一线？今天的湘西，就是明天的黔东北。造一点同2、6军团会合的舆论，作一点姿态，那是可以的，实际干却是不行的。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对不起，我又背书

了。这叫着‘你背你的，我背我的’。

第二，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有人好像是说，我们已经打破敌人的‘围剿’了，可以大摇大摆地到贺龙那里去吃酒席了。这不是事实。薛岳、吴奇伟就是从江西跟出来的，眼下就在山那边。这点距离，在欧洲也许显得很遥远，在中国却是很近的。我还是我，你还是你，还是那么一对老冤家。怎么能说‘围剿’已经打破了？”

博古还是不同意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还是主张“折向黔东，靠拢2、6军团”，说：“革命就不能畏敌不前，畏敌不前就不能革命……”彭德怀、罗炳辉、刘伯承、叶剑英都火了。罗炳辉说：“什么叫畏敌不前？我们同强敌硬拼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吗？”刘伯承恼道：“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周恩来说：“问题才说到一半喽。刚才说的是放弃去湘鄂西的会合，那么，新的转移方向问题，到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为好，大家还可以继续谈谈。泽东同志，为便于讨论，是不是先说说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考虑到部队要休整，要补充，要发展，去黔西，滇黔边，不大合适。可以考虑黔北，川黔边，那里只有一个侯之担，人口、出产也还不错。这里，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说的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近而言之，我们到了川黔边，一当出现某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掉头向东，去同2、6军团会合；远而言之，红军终究是要会合的。”

席间，委员和军团长们纷纷表态：“同意，同意。这才叫战略头脑作出的战略考虑。”

周恩来一看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差不多了，便关照了一句博古说：“博古同志，是不是表决一下？”

博古一脸愁容，又来个软同意，说：“在会合问题上不作绝对的放弃，那还是可以考虑的。”

周恩来说：“那就表决吧，过后我们再起草一个决议案，再开次会通过一下文稿。”

第一次会议开完，毛泽东心情不错，总算从组织上解决了“硬碰硬”的同2、6军团会合的问题。他走出开会的店堂，想急着回自己的驻地，才出店门，便有林彪和彭德怀走了上来，两个军团长的情绪一个欢一个闷。毛泽东瞥了林彪一眼，想把林彪的情绪调一调，说：“昔有刘皇叔跃马过檀溪，今有小林彪跃马过潭溪。刘皇叔是落荒而逃，你是打了胜仗嘛，怎么闷闷不乐，在会上没讲几句话啊。”林彪借机耍滑头：“敌人是跑了的，并没有打着，跟刘皇叔过檀溪差不到哪里去。”彭德怀说：“我就想不通，李德既不知中国之敌，也不知中国之我，更不知中国的地理民情，他怎么能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听说蒋介石跟前的那个德国人也不中用了，躺在南昌的一家医院里起不来了。”毛泽东愕然：“真没说错呐，猛张飞粗中有细。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彭德怀说：“从一张报纸上看到的。当然，你还得费一番猜的功夫才行。”毛泽东说：“快，把那张报纸拿给我看看。带在身上没有？”彭德怀摊了摊手。毛泽东说：“我就说嘛，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乌七八糟，无奇不有。中国的内战竟是两个德国人在打。”林彪垫了一句：“是有点滑稽，我也跟着滑稽了一家伙。”毛泽东问：“什么意思？”林彪说：“就是那篇该死的《短促突击》嘛，当时你不在，你要在，我哪能出那个洋相！”毛泽东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回头又叮嘱彭德怀一句：“别忘了，我下午就要看。”

分手以后，毛泽东在小街上张张望望地走着，路过小食店，他停下来

耸耸鼻子；路过小烟摊，他想买一包，一摸口袋，口袋是空的。陈昌奉一会赶了上来，小声道：“快走吧，该吃饭了。”他们来到小街口，只见街口的大榕树下围了上百的男女老少，在听一个江西口音的女同志发表演说。毛泽东不由得挤到人群边，把耳朵竖了起来，只听女红军在说：“……”

我们共产党不光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男女也要平等……”这不是子珍吗！她怎么挺着大肚子上街了？贺子珍接着竟说起了她的大肚子：“不瞒乡亲们说，有大姐大嫂见我肚子大了，问我晓不晓得肚里的货是哪个？怎么不晓得啊乡亲们，是我男人的。一个男人的，不是很多男人的。共产党不共产共妻，是一夫一妻，我是跟我男人一起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来的。我只有一个男人……”

毛泽东听得脸发烧，拉拉陈昌奉说：“我们还是走吧，要不她非得把我们拉出来游街示众不可。”陈昌奉这会儿却不走了，说：“等等，喊贺大姐回去一块吃饭。”毛泽东说：“人家有人家的伙食单位，不管她！”毛泽东不管陈昌奉跟没跟上，独自走了。

毛泽东住在山坡上一家独门独院的民房里。他一边进门一边叨咕：“这个贺子珍啦，肚子都那么高了，还，我就一个男人……”听到脚步声，回头一看，不是陈昌奉，正是贺子珍跟上来了。

贺子珍听到了毛泽东的叨咕，莞尔一笑说：“你怎么也去听我宣传去了？会开完了？”毛泽东说：“宣传什么不可以，怎么宣传开自己的肚子了？”贺子珍噗哧一笑说：“这不是你说的，做群众工作要用通俗的语言，让群众喜见乐闻吗？”毛泽东打了个哈哈说：“这叫喜见乐闻呀？毛某实在不敢恭维！噫，陈昌奉哪去了？”贺子珍说：“见我来了，弄点菜去。”毛泽东说：“好吧，我们歇歇，你也够艰难的了。怎么样，能行吧？”

两口子正要坐下来说话，陈昌奉用一张大荷叶包了一包什么东西走进屋，紧接着又来了一帮子小红军战士。小把戏们一个个叽叽喳喳，手里好像都拿了点什么。毛泽东一看，这不是军团长们的那帮警卫员吗？那天嚼了他一小口袋黄豆子。“唔，他们是跟军团长们进城开会来的。”小家伙们一进屋便招呼陈昌奉：“昌奉，我们那天打了你的土豪，今天咯，开仓济贫喽！”说着，一个个有的掏口袋，有的解包包，全是些花生、核桃、瓜子什么的，堆了一桌子。毛泽东说：“小同志哥呀，你们这是搞么子名堂呀，我可真要成土豪了。”其中一个小家伙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来，一边说：“这些东西子，是给贺大姐补身子的，这个嘛，是彭军团长要我送给毛委员的。”小家伙说着凑近毛泽东的耳朵：“是国民党的，保密。”

毛泽东笑了笑，接过报纸便看了起来，也就顾不上贺子珍跟小家伙们说些什么了。当他看完报纸抬起头来，小家伙们都不见了，只见桌子上摆上了饭菜……

黎平县城座落在山顶上，四周群山环抱，夕阳里，山色秀丽，红旗点点，颇有“风景这边独好”之感。毛泽东和贺子珍吃罢饭来到屋后山坡上的树林里，先是眺望了一会山城景色，尔后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不是忙里偷闲，主要是贺子珍，她有些话很想同“我的男人”谈谈。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一起好好说说话了，有时在行军路上偶尔相遇，也只是几句招呼的话就错身而过。做过秘书工作的贺子珍，还在越城岭的时候，她就意识到“他的日子可能有些变化”；到通道以后，她从徐老那里得知，红军放弃北上，掉头向西，主要是“听了润之的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又说得起话了。

贺子珍为此感到高兴，然而，她又有一种难为人妻的忧虑。她是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品性的，她为这种品性着迷过，却也多少次在梦中为这种品性惊得一身冷汗。她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她自己就曾梦想过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式的女人；然而，他终究是个女人，她又多么希望能同自己所爱的男人天长日久的厮守在一起，享受人间的夫妻恩爱。当她得知黎平会议有可能使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更多人的赞同，特别是看了毛泽东最近的一篇诗作，她觉得她有必要关照两句，尽尽做个妻子的责任。她见毛泽东的目光久久地在她脸上闪动着，说：“你知道我有话想说？”毛泽东“嘿”地一笑说：“当然，我要是像你这样挺着个大肚子，千里迢迢，亲人又不能给些关照，自然要哀其不能，怒其不德了。”贺子珍说：“瞧你说的，纵队里女同志也不只我一个，大肚子也有好几个嘛，罗炳辉的女人还是一双小脚啦。润之，我不怨这个，我没有理由怨这个，我是操心你嘞。”毛泽东问：“操心我？操心我什么？”贺子珍说：“你可是又能在党内说话了，而且好多人都赞同你，支持你……”毛泽东说：“是呀是呀，今天上午的会，只有两票是不赞成的。这是好事嘛，你怎么反倒操起心来了？”贺子珍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你想过吗？”毛泽东说：“唔，不愧夫妻一场。说下去。”贺子珍说：“答应我，说得不对不见怪，行吗？”毛泽东说：“你是孙悟空变蚊子了。说吧。”贺子珍说：“当然，我早就是你肚子里的小蚊子。润之呀，当年你是怎么呼号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现在你是怎么说的？我都看到你那首新作了。”毛泽东愣住了：“什么新作？”贺子珍说：“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别人也许读不大懂，我可是读懂了。”毛泽东的脸上泛起了红光。贺子珍接着说：“润之呀，现在，敌人还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我们剩下的人也就这么多了。我不希望我们党里大乱，我只希望你的正确意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就行。最要紧的是打好仗，不要再吃渡湘江时那样的大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话呀？”毛泽东停了好久才说：“懂啦懂啦，我写的你都懂了，你说的我还能不懂么？”说着，他站了起来，双手习惯地插在腰上，他昂首远处，遥望着西天直插云天的群山，像是要对天呼号他的新诗句。贺子珍紧张了。她知道，他的自尊心是极强的，他有不耻下问的品德，却又有不容许别人想到他前头去的自负，即使在处于困境的时候，他也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他是很不容易向别人低头的。每想到这一点，她就不由得联想起曹操的格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她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在同他同床共寝时多次吓得满头大汗的。此刻，她多想把话收回来。她在责备自己总是不能少些女人气，总是洗刷不掉古老的为人妻室的传统心理。毛泽东真还有些愠怒，他想说说她的这种把女人的温情用于严酷的斗争生活的毛病。他转过身来，但见贺子珍双手吃力地抵在双膝上，脸色是那样的苍白，他的心又软了下来。他蓦然想到，子珍的这种想法我本来就有嘛，也正是这样做的嘛，他找到了一种自我平息的办法，他说：“子珍啦，你是多心了。关于那首诗，你是以贺解毛了。‘刺破青天锷未残’，可以是指个人的坎坷和不屈，也可以是指战争的失利和不屈；‘赖以拄其间’，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我们的党，对不对？你的细言相励，是对的，是同我的想法一致的。我何尝不知道大敌当前该怎样做。湘江失利以后，几位老先生要我说话，我是考虑再三才说的；在越城岭，有人就造出个‘新三人团’来，而且以我为首，我就坚决不理，一理对他们显然是不利的，但宁可失之于彼，不可失之于此，如王稼祥所说，要点民主就算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我还是

这个方针，求得意见能通过就行，我要恩来同志主持会议，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总之，你说得对，主要是反‘围剿’的军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再马虎了，其他的，多少年以后再说都行。你看这样行吗？”

“润之！”要不是在山林野外，又是暮色苍茫，贺子珍真想投进“我的男人”的怀抱……

毛泽东和贺子珍回到半山坡上的住地，才走到门口，只见几个警卫员在门口的小路上来回走动，毛泽东不觉心头一惊，出什么事了？他正要问话，陈昌奉从屋里走出来：“毛委员，来客人了。”毛泽东以为又是几个军团长来串门了，便拉着贺子珍快步朝屋里走，一进屋，却是博古一个人独自坐在堂屋里。“他怎么来了？”毛泽东不禁愕然。打从在中央苏区，博古从来没有主动上过毛泽东的门。博古为人内向，不苟言笑，又是一付高度近视的眼镜，平时的内心情绪就很难叫人洞察到。毛泽东估摸不到来者的来意，权当来者是客，便轻轻地作了个笑脸：“博古同志，有什么指示呀？”

毛泽东和博古之间，关系极为复杂，感情的鸿沟如渊如藪。一个看不起一个，一个不信任一个，一个怨恨一个，一个提防着一个。毛泽东最不满意博古的，是一到苏区便下车伊始，把全部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接连打败仗以后还执迷不悟。在他看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博古在国际的影响下，也看不起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原始粗俗的，是一些历史碎片的组合，根本称不上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要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是胜利遥遥无期，就是胜利了也难怪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然而，人终究是有脑子的。博古对毛泽东，有看不起的一面，也有畏怯的一面。毛泽东比他大十四五岁，带兵打仗已经10来年，在苏区确实创造过大好的局面；他头脑机敏，说古道今，语言尖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有时真还觉得自己不怎么行。他的这种怯人三分的心情，经过最近的几次争吵，是越发发展了。今天的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锐不可当，把他搞得理屈词穷。散会时，他久久地坐在那把木头椅上不曾离去，苦苦地琢磨着他同毛泽东之间还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届时，周恩来和王稼祥走了过来。周恩来说：“博古同志，找毛泽东同志谈谈吧，红军需要毛泽东，党的团结需要毛泽东。”王稼祥说：“你要我们莫斯科回来的人搞好团结，为什么就只是这么个团结法，就不能团结团结毛泽东呢？团结他，就团结了许多！”

博古是来找毛泽东“要”团结的。

“泽东同志，想不到吧？”博古不冷不热地说。

毛泽东说：“上午还在一起开会了嘛。”

贺子珍对博古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一边倒水一边说：“开会是开会，个别聊聊是个别聊聊嘛。对吧博古同志？”

博古说：“恩来同志要我来看看你们。”

毛泽东说：“多谢了。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博古说：“请允许我再次表白一句，那个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的确是我跟李德闲聊的一句开心话，外国人性格开朗，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对与不对，少有斟酌的，请你别再往心里去。关于军事指挥问题，我同恩来同志讲了，希望你今后多提出你的意见。至于你的军中职务问题，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的。其实，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大政方针，不论军队、政府，你有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只是，我有一点希望，你的有些意见，若

是在会前便有了，最好能事前通个气，给我一点方便。当然，临时在会上形成的意见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一段也好，将来也好，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之间，即使出现分歧，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你我还是懂得的。你在通道的那次聚会上说得好啊，我们要团结。大敌当前，我们要团结。如何？”

毛泽东说：“不是大敌当前，你说得不对。”

博古又紧张了：“噢？”

毛泽东说：“大敌不当前，当前非大敌。大敌在我们的后头，在我们的右边，是不是？”

博古“嘿嘿”乐了。

毛泽东听出了博古的来意，他是打着“团结”的旗号，“安民告示”来了：你毛泽东只许说话，可不许搞别的。毛泽东心里上来了一股火，莫非不团结在我毛泽东么？他真想发作一下，想起刚才山坡上贺子珍的话，他又克制住了，便来了个文字游戏。

博古竟没有察觉到毛泽东的不满，他乐完说：“泽东同志，你不只是经验比我丰富，学识也比我渊博。最近有什么诗作吗？”

毛泽东说：“好呀，我送你一首诗吧。”

说着，他随即拖过桌上一片纸，在上面写道：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

村。潇湘逢故人。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

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没有在纸上题名落款，那时还没有这个习惯。他把纸片推给博古：“诗想不起来了，是首词，辛稼轩的。”

博古拿起来看了，笑道：“我的古文底子虽差，但这一首我还是能读懂的。谢谢，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说：“嗨，你怎么只看到那一句啊，还有嘛，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这都是赞诸葛亮的文句嘞。当然，你在这方面有些自知之明，不把自己看成是诸葛亮，也还是不错的。”

博古没再说什么，起身告辞走了。

第二天，如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同时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另外两项提案：一是刘伯承回总部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二是撤销8军团，并入5军团，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根据通过的两项提案，会议任命刘伯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

会议后，周恩来去向李德“汇报”实际上只是去通报会议情况及其结果时，他们间竟第一次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舌战”。李德没想到周恩来带给他的那份会议《决定》，只是让他知道一下，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中央和军委所有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审定批准，这次却是在他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并且发给了全军，这完全是无视他作为“国际顾问”的存在。

李德一边听着周恩来的“汇报”，一边看着伍修权用俄文赶译出的《决定》文本，他越听越看越生气，对周恩来大声吼道：

“你们的会议决定是错误的，这个文件是无效的，不能发出更不准实行。这是违反国际指示和中央方针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要为此承担责任……”

周恩来道：“李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李德继续发火道：“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

周恩来也生了气，把桌子一拍说：“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

李德道：“我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我代表国际……”

周恩来大喊道：“不，你没有权利代表国际，更没有权利代表我们中央，你仅仅是个军事顾问，你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这是国际执委明确指示的，是你自己违背了国际指示，超越了职权，你要对此承担责任！”说完指着《决定》译稿郑重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决议，任何人都只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你是军事顾问，也是共产党员，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不能干扰执行，这是党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你好好考虑吧！”

这次“交锋”以后，周恩来好多天没再同李德说什么，中央和军委的许多工作，也不再向李德请示报告了。

第五回 “四川王”权重再抓权 王家烈越急越糊涂

话说蒋、刘“南京会商”以后，刘湘于1934年12月上旬启程返回重庆。在南京港一登船，只见满船中央军的校级军官，还有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他心里禁不住一阵悚然：“我这是载誉归去，还是被押解回乡？”他把杨芳毓喊到一旁问：“这是怎么回事？”杨芳毓说：“这是加强我们参谋团的，同总司令一道进川。”杨芳毓已经是贺国光参谋团的副手，说话口气也变了。刘湘这才稍微放下心来。船离南京港，风大浪急，船体颠簸，刘湘心里也不平静起来。他对“南京会商”一方面是满意的，他被重新任命为省主席和川军总司令，又有一笔像样的军费，要东山再起，扭转同红4方面军作战一再失败造成的危急局面，他自信没有多大问题。他很感激蒋委员长在危难时刻又帮了他一把。另一方面，他还是有些惶恐不安。南京会商，终究是一场“大进大出”。开放门户这一条，他倒是想通了，“关死夔门，已非长策”。他最犯愁的是打破防区制，他深知防区制是各路军阀的命根子。他不知道怎样向各路军阀作出交待，并付诸实现。要是为此再混战一场，岂不一切又是枉然？从南京到重庆7天7夜，他一直睡不好，吃不香……

船进重庆港，刘湘神色不安地立在船头。但见朝天门码头上，拥挤着数百手执小旗的军民，山崖上挂着巨幅标语：“欢迎刘总司令载誉归来！”“拥护刘主席主持川政！”刘湘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连说了几个“好，好，好！”下得船来，他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谢谢，谢谢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他想停下来发表一点什么，接驾的副官处的人连忙走上在他耳边说：“这是张澜先生打的招呼。”刘湘愣了愣，问道：“张澜先生好吗？”副官说：“张先生叫人骂得不敢出门，所以今天没到码头上来。”刘湘愣道：“为什么？”副官说：“骂他糊涂，说他不该劝你去南京。”刘湘这才“哦”了一声，匆匆地钻进了他的黑色小轿车。

第二天，刘湘硬着头皮在省府官邸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撤销一切辞呈，就任省主席和“剿总”司令。果然，消息传开，各路军阀便纷纷致电

指责。首先是刘文辉、邓锡侯，指骂刘湘的南京之行，是“卖川求荣”，“招引外兵入川，势将亡省”。接着是杨森、田颂尧、范绍增、李家钰等，也都指责他“做了赔本买卖”，说“军费之说，徒有其名。吃哪个的穿哪个的，就得听哪个的。此举是把川军军权全交给南京了。”在众多的指责声中，只有潘文华表现不错，他私下里托人捎话给刘湘说：“川之统一，国之统一，势所然也。总司令南京之行，将挽全川之危局，揭全川之新纪元。”就凭这几句话，潘文华后来成了刘湘的接班人。这是后话。

由于各路军阀“多微词”，刘湘回到重庆半月之久，连个会都不敢开。贺国光一再催促，他才到他的21军军官教育团作了一次讲演，为他的南京之行作了一番表白和解释。他说：“四川的剿共军事本来就不大好，而今眼下，江西的共匪又窜出来了，这股共匪在桂北遭到沉重打击后，势必乱逃乱窜，能否窜经贵州，再行窜川与徐、张一股会合，是难得说的。如此南北夹击，川军将何以应付？是让共党赤化全川，进而赤化全国呢，还是国人自己协力起来剿灭共党好？川人当有识时务之选择。而要剿灭共党，我们的教训就是要更好地统一起来，更多地依靠外援。孤军作战，又总是各自为政，是不得行的。当然，川军各路也大可放心，经本人再三考虑，即使发生两面作战之情况，我们定取北守南攻的方针。过去我们在川北对徐、张匪部的作战太被动，今后对西进共匪的作战，一定要采取攻势，在他们入川之前，就把他们堵住，一定要把南线的作战推到外省去打。总之，我们要眼光远大些，要统一，要依靠外援，要全力剿灭共党。”

刘湘的这次讲话，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各路军阀们说：“朱、毛共匪还远在湘桂边，管我们什么事，跟前的共匪还剿不胜剿，防不胜防哩！”“刘总司令是不是想弃川图黔呀？”冷嘲热讽中，这一天，杨芳毓突然来到刘公馆，给刘湘通报了最新“匪情”：“朱、毛共匪残部已于日前窜至黔东南，中央军在湘西的布防全部落空。该匪部是折向湘鄂西，还是直下四川，尚难料定。委座的意思，不论朱、毛残部窜逃哪个方向，川军都有堵剿共匪之责。”刘湘一听，哑了好久，不知是凶是吉，待到接过《匪情通报》看了个仔细，才眼睛一亮道：“英明啊，委座英明啊！说实在的，在南京的时候，当委座说到朱、毛共匪还有可能经贵州窜逃四川时，我还不信哩，心想朱、毛一股在湘桂边已经损失大半，他哪还有可能窜经贵州到四川来？我只想着怎样重整军备，再战川北徐、张一股。委座算计精明！”听刘湘这么一说，杨芳毓倒糊涂了，说：“总座，如此一来……”刘湘说：“如此一来，有些事情就好办了。请注意，这个情况暂不向下转达。”杨芳毓说：“总座的意思是……”刘湘说：“开会！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贵州王家烈的25军我是知道的，名为一个军，实际也就那么一两个师用得上，他是无能为力堵住朱、毛一股的。这一来，川军的两面作战，是躲不脱了。请转告贺主任，关于7个军的军费和装备，希望中央方面能作出保证。”杨芳毓这才“噢”了一声道：“总座也英明啊……”

“四川王”权重再抓权。在有各路军阀头目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刘湘开头的讲话，还是故意不说南线“共匪”入黔一节，他只是说：“眼下军情紧迫，我们必须在全川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财政，统一法制。各军各地统一于‘剿总’和省府，全省统一于中央。”他的话刚一打住，各路军阀便嚷了起来。最先发难的还是刘文辉，24军军长，刘湘的本家堂叔，二刘之战的对手。他说：“不是紧急剿共军事会议吗？怎么说起这么多的统一

来了？要我们来了？也好，讲统一就讲统一，我倒想问问，到底是统一，还是拍卖？是不是这两件事是一码事，统一就是拍卖，拍卖了也就统一了？既然这样，那也没有啥子可说的了嘛，早就都是国民革命军了嘛，早就统一了嘛！”28军军长邓锡侯说：“讲统一就得说个章程，讲拍卖就得说个价码。我们到底卖了个啥子价啊？”20军军长杨森说：“啥子价？卖得便宜也罢，卖个大价钱也罢，还不是空头支票！川军易帜是哪年的事？刚才自乾兄说，早就都是国民革命军了，可我们拿到什么了？拿到银子了？拿到枪械了？拿到了一块布（旗帜）！”29军军长田颂尧说：“说统一为剿共，剿共要统一，前回的‘六路围攻’不是统一干的么？我可是叫川北红军弄惨了，自顾不暇了。”……刘湘不插嘴，硬着头皮听。于是，指责不是的，叫唤困难的，嚷成一片。王陵基不久前才被刘湘撤了5路军总指挥的职，眼下尚无军职，他本不想说话，见大家说得热闹，也想泄泄肚里的火，说：“上次在军官教育团听总司令说，好像川军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作战，是不是要再来一次驱逐黔军的战争，以便川北红军压过来，往南边也好有个去处呀？要不，岂不是吓唬人么？”

刘湘这时站起来了。他有意不说“共匪”入黔的事，就是要打各路军阀的闷棍，压他们就范。他在寻找说话的机会。此刻他抓住了王陵基。王陵基虽说比他年长四五岁，却是他手下的一个师长。他逮住王陵基说：“方舟兄这话太放肆了吧？什么来一次驱逐黔军的战争，你就不怕扰乱军心，制造混乱么？没有错，我是说过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作战，说的是同共匪作战。听清楚了，是同共匪作战。诸位，我不怪你们刚才的一些无礼之词，但也请你们听明白了：朱、毛共匪已经窜入贵州，现正活动在黔东南地区！”他说着把话打住，两眼扫着席间众军阀。众军阀有的茫然，有的面面相觑。刘湘接着说：“进入黔东南地区的共匪，是他们的中央部分，朱、毛直接指挥的。他们未来的方向，是向湘鄂西同贺、萧一股会合，还是直下四川来同徐、张一股会合，目前尚难料定。委座有令，不论朱、毛股匪窜逃哪个方向，川军都有堵截守土之责任。在座都是带兵打仗的，当不难晓得，他们就是先奔湘鄂西，湘鄂西也是连着我们的西、秀、黔、彭！他们要是由黔北进入四川，那就更方便了。请问，出现这样的形势，我们身处南北夹击当中，是不是要在两个方向上作战？为什么又说起统一来？从江西窜出来的朱、毛股匪，没有根据地，他们是东逃西窜的，适应这种敌情，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我们的部队也要实行机动作战，不能总是守着各自的防区。这不就有个统一指挥的问题么？要达到指挥统一，就得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财政，统一法制，要打破防区制呢！本人此次赴南京会商，商得蒋委员长同意负担7个军的军费，不论军械装备，不论官长士兵的薪饷，一律同中央军取齐，这有什么不好？光靠在川西北种点鸦片烟能行吗？对付流动的共匪，光堵是不行的，得围追堵截，现在湘军的何键、刘建绪、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二十几个师正在追剿，到时候，不论贵州还是四川，能把追剿部队堵在门外，而让几股共匪在四川会合起来，赤化全川、乃至全国么？”

刘湘的这一闷棍，果然把到会的军长们打懵了。会场一片清风鸦静。只有刘文辉还想顾一下为叔的面子，问道：“共匪入黔，情况属实么？”

“军中无戏言！”刘湘说。他环顾左右，见无人再说话，心里已有了几分得意。他接着说：“关于统一全川军政问题，本座起草了一个条款，各位要是认为可行，都画个押，以示郑重。在军队方面，主要是统一编制，统一号

令，统一供给，统一指挥；在政务方面，主要是统一保甲，统一政府，统一税收。总之，全川统一于省府，川军统一于本总司令。全省全军统一于中央，统一于剿共。说到这，我再补充几句。此次朱、毛赣匪窜黔，意在与其同党会合，这是肯定无疑的。他到底先奔哪一伙，固然还要看战事的发展，但有一点我倒要提醒提醒诸位，朱德、刘伯承是四川人，还有聂荣臻、邓小平好几个，他们都是共党的要紧人物，他们会不会看上出生地的风土人情熟，是难得说的。我们不就是老是舍不得自己的那个老窝么？”他停了停又道：“回到作战问题上来吧。南线的问题要及早作出部署，主要之点有二：一是把仗推到外省打；二是长江江防问题。这方面你们有什么说的可以说一说。”

各路军阀还在懵着。

杨芳毓见冷场，便说：“关于全川统一问题，总座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各军长当照办不误的。关于部署问题，本参谋团贺主任也是这个意思，希望能尽快明确起来，是不是请总座……”

潘文华说：“是呀是呀，南线方面我们还毫无处置，就请总司令下命令好了。”

刘湘说：“本座有这样的考虑：鉴于目前南边的窜匪方向尚不甚明朗，北边的徐、张匪部也还嚣张，不能顾此失彼，乱了手脚。本总司令商得参谋团的同意，任命唐式遵为北线总指挥，专事防堵北线之敌，各部队筑堡扼守，不能让‘徐匪’过了嘉陵江。南线的任务，目前主要动用21军和直属各旅，先组建一个‘川南剿总’，由潘文华任总指挥。其他各军可在原地待命，听候机动。关于南线的详尽部署，由‘川南剿总’尽快作出。”

事不关各军，还是没人说话。散会时，只听邓锡侯边走边骂道：“他娘的有官当，当然积极喽……”

刘湘的“重庆军事会议”当说是成功的。在贺国光和杨芳毓的斡旋下，到会7个军的首要都在那份后来叫作“协议通告”的文书上画了押，赞同“打破防区制，实行门户开放”。

不久，“川南剿总”在川南泸县宣布成立，总指挥潘文华连日召开作战会议，分析判断入黔红军的方向。会上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入黔红军可能由黔东北入川，出綦江，威胁重庆，由重庆附近渡长江，与川北红4方面军会合。另一种意见认为，入黔红军孤军作战，不会攻坚，后有中央军的追击，不可能到长江边上来腹背受敌，即使有可能入川，也会走川黔滇边进入四川之叙永、古蔺一带，而后沿雪山北上，绕道实现同红4方面军的会合。

根据讨论，经刘湘批准，作出了如下部署：左翼以21军几个师为主力，防守重庆外围；右翼兵分三路，范子英为第1路，率5个团由泸县进至叙、古一线；陈万仞为第2路，率两个旅由合江进至黔北赤水；郭勋祺旅为第3路，由江津进入黔北温水。另有廖泽、穆肃中、章安平、刘兆黎等5个旅全都开往川南沿长江布防，实施机动作战。

一时间，由重庆外围上接江津、合江、泸县、江安、宜宾、叙永、古蔺一线，川军云集，战云密布。时有民谣说：

巴山才瞎火，
江边又起云。
是火扑不灭，
是云雨淋淋。

且说贵州王家烈，字绍武，黔省主席，25军军长。他在得知中央红

军进入黔境并攻占黎平后，急如星火，立即在贵阳召开师、旅长紧急会议。贵阳的会议没有重庆的会议那么有场面，有的是更多的土气和没有头脑。“他娘的，共产党怎么就看上贵州了？才过去了个‘萧老二’，又来了朱、毛老大，这回是路过还是要扎下来？”正吵吵着，何键转来蒋介石的电报：“赶！往湘西这边赶！”王家烈说：“赶？我拿什么赶？我拿吹火筒赶？”吵来吵去，竟拿不出任何对策。黔军摆在各地的部队都无法挪动。侯之担不能不坚守黔北；犹国才不得不守着乌江以南的几个县；王家烈自己的两个师正在铜仁地区担任东线作战，防着他们的所谓‘萧老二’、‘贺老六’。剩下的几个旅十几个团，都散在黔南黔西各县，哪里走了哪里空。王家烈说：“是不是把民团组织起来，编成正规军？”幕僚说：“编成正规军就得给吃给穿给枪弹，我们哪里有？再说，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啊。”王家烈呼号道：“那怎么办啊诸位？读书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兵到用时方恨寡啦！”师、旅长中有献计者说：“军座，剿共不是哪一个省的事，听说四川刘湘最近在南京捞了一大笔，我们何不也张张嘴？”王家烈一听也是，说：“是啊，你把江西的共匪剿到我这里来了，你总不能不管吧？”当即便要副官起草朝南京要钱的电报。侯之担说：“现在要钱还来得及么，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了！再说，人家在前面饱餐了一顿，你跟着去要，只怕是要挨白眼。”王家烈说：“我们要点兵，要点兵总是可以的吧？”犹国才说：“要兵？要来了你能把他们送得走么？”王家烈一听又怔住了。作为一省的军阀头目，他自然知道蒋介石已经觊觎贵州多年了。但是，邻省刘湘的“开放门户”又在引导着他，宽慰着他。他说：“他娘的，四川是扇金门，人家也开了；我们这，顶多是扇木门，也打开算了！”众师、旅长说：“也只好这样了。”当即便起草了一份请兵电报。为防日后“送兵”难，王家烈动了个心眼，电报只发给各“友军”。报文在说了“朱、毛赣匪”攻占黎平的情况后说：“惟是该匪乘虚突窜，事实不免百密一疏。

特电请各友军不分畛域进剿，俾便联合将该匪扑灭之。”第二天，12月28日，黔军驻桐梓的部队传来情报，说刘湘已在川黔边境大力调动部队，其先头已到达黔境之赤水和温水。王家烈一想不对，这不是应邀前来支黔的，给“友军”的电报昨天才发出嘛。“刘湘为什么不请自来？来得这么快？”王家烈想起了当年的川黔之战，一股心火窜上胸口，说：“老子宁可要中央军入黔，也不让你川军来打家劫舍！”他一急之下，便令副官又起草了一份“请军”电，直发南京政府，台头是“国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委员长蒋钧鉴”。电文说：“……查该匪号称10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禱。”这份电报，王家烈就是一字不提川军。

王家烈越急越糊涂。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请军电”给自己闯了个大祸。蒋介石在得悉王家烈的电报后，喜出望外，说：“娘希屁，我看王家烈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陈布雷说：“这就好办了，用不着再来一个‘蒋王南京会商’了。”当日，蒋介石即密电薛岳：“黔军力弱，恐难防堵，希督励所属，克日迅由晃县、玉屏直趋镇远截击，并据贵阳，以期一举聚歼。”薛岳接电后，心领神会，立即将所部8个师编成两个纵队，由吴奇伟、周浑元分任总指挥，不管王家烈的“请军”是真是假，以急行军速度长驱直入贵州，进占了省城贵阳。

从此，王家烈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红军把他当“弱敌”打，蒋介石把他当“软蛋”欺，最后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权，弄到哪个军校闲挂了起来。这是后话。

第六回 洋教头再度起风波 猴场会重申向黔北

话说中央红军在黎平停留了5天，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进军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于12月20日，兵分左右两个纵队，1、9军团为右纵队，3、5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分别由黎平地区出发，经剑河、台江、镇远，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由黎平到遵义，1400里，中间要穿过湘黔公路，渡过乌江天险，征途险阻。为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中央致电4方面军和2、6军团，令他们在各自地区寻机打几仗，以牵制川军和湘军。

离开黎平的头几天，进展顺利，左路纵队很快便攻占了剑河、台江两座县城，右路纵队也进入了镇远县境。在继续向北发展中，这一天突然侦察得知，薛岳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经从湘西撤出，正由新晃、玉屏方向沿湘黔路西进，大有可能在湘黔路沿线堵住北进的红军。

情况严重，周恩来为此很感焦虑。他知道自己“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想找毛泽东“商量商量”。在军事上，他自感比毛泽东要弱一点；他也意识到，他不能再听李德的了。

红军在转移开进途中，中央负责人白天通常是分散走的，只有到晚上宿营的时候，总部管理人员才就近安排他们的宿营地，让他们碰碰头。情况紧急，等不到宿营时刻，周恩来便飞马前后找人，跑了两个来回，也没有把毛泽东找到。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平时不是跟1军团行进，就是跟3军团行进，很少走在中央纵队本部。从黎平出发，情况却有些变化，毛泽东更多的是随军委纵队前进。刘伯承回到总部任总参谋长了，又是军委纵队的司令员。

毛泽东很赏识刘伯承的军事才干，两个人又都有说古道今的癖好。毛泽东说：“不善换舟而恶河之曲，非艸公之才也。”刘伯承便陪上一句：

“不善使船嫌溪曲者，中外皆有之。”

周恩来是在一处山凹上的小草房里找到毛泽东的。毛泽东正叉开双腿坐在一张小木桌旁，同刘伯承一起喝着热气腾腾的茶。打了句招呼后，周恩来气喘嘘嘘地说：“泽东同志，情况紧急。你曾说过，今日之湘西，便是明日之黔东北。言中了。薛岳的吴奇伟和周浑元两个纵队正沿湘黔路西进。这一来，岂不是要撞到一起了？”毛泽东见周恩来满头是汗，气喘难定，说：“莫慌莫慌，你先歇歇喽。这贵州，人无三分银，倒有一口好茶嘞。”刘伯承立即要警卫员给周恩来倒了一杯热茶，又连忙摸着自己的包包。周恩来见毛泽东和刘伯承都挺沉着，接过茶碗说：“敌情是准确的。相距也就一两天的路程，该如何处置好？”毛泽东还是没大动声色，说：“各走各的好喽，他不撞我，我也不撞他就是。”周恩来茫然，说：“走了个直角，哪有不撞上的啊？”刘伯承这才把手里攥着的一张纸片递给周恩来：“这是薛岳给王家

烈的电报，刚才才破译出来，正要给你送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哩。”周恩来接过电报看过，笑道，“嚯，怪不得二位这么稳坐钓鱼台！愿闻其详，泽东同志。”

毛泽东说：“总参谋长在上，你还是听听他的吧。”

刘伯承说：“还是请我们的前任政治委员说吧。”“我说？我这一段说的话还少么？”毛泽东喝了一口热茶，见周恩来一直在盯着他，便站了起来。他有一种习惯，要是话多，就得站着说，一只手还得插到腰上去。他说：“好吧，我现在真成了诸葛亮了。挥羽扇，整纶巾。既然如此，不摇摇扇子，刘皇叔是会不高兴的。就说薛岳的这份电报，有意思得很嘞。”

他指点王家烈说，红军进贵州是要占领中心城市！贵州的中心城市是贵阳吧，他从哪里得出结论说我们要占贵阳？他薛岳把我们江西赶出来，经湖南、广西，把我们赶到贵州，他能不知道现在的红军已经无能为力固守中心城市？他这是欺骗宣传，哄王家烈的！就说他真的是这么判断的，红军要占领中心城市，他为什么又要王家烈移兵防守贵阳东北方向，而不是固守城垣？这不是一哄再哄么？有趣的是，这是一个‘不得向友军宣泄’的电报。这明明是在说，你王家烈给我腾地方吧，我中央军来了！这当然不是薛岳一时头脑发热，这是蒋介石一向对地方势力鬼主意，老鬼主意！显然的，没有蒋介石的命令，薛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口气，王家烈好赖也是一省的首脑；从军事行动上讲，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他薛岳也不敢实施这么大的机动。因此，可以肯定，薛兵团此行西进，直接目的是贵阳，是针对王家烈的。他要搞掉异己，把贵州抓到手。对四川，蒋介石是先礼后兵，把刘湘找到南京去‘会商会商’，那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兵，也还不那么紧迫；对贵州，对不起，兵临城下，直捣你的老巢！别看电报中‘绍武兄’叫得那么甜，鬼胎多的是。这就是中国式的反动营垒，何其庞大，却是勾心斗角，不可调和。所以呀，我看我们还是迈开大步向前走，就当是走一步险棋。险棋者，正如你之所言，直角也。怎么走法？你找我的缝缝钻，我找你的缝缝钻。两妯娌闹完架走娘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理谁。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作了个深呼吸，松弛了下来，说：“对，说得对。”

一封电报泄露了他们的天机。”

刘伯承说：“右纵队！军团侦得的情况，同这份电报说的完全一致，薛岳把部队到达贵阳的时间都是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我很同意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分析和判断，继续前进，争取在他的先头部队的隙缝中穿过去。”

周恩来说：“好。这一来，我们就不应恋战，顶多小部队打打阻击，争取尽快进入黔北。”

毛泽东见周恩来认可他的分析和判断，心里很高兴，说：“恩来同志呀，我刚才说我是诸葛亮，是夸海口喽，你可别给我传了出去；要是传了出去，毛泽东自称诸葛亮，又要生出麻烦来。伯承同志是参谋，我算个参谋的参谋。”

周恩来说：“你是政治局委员，红军的老政委，就说是诸葛亮，也是不为过的。”

就这样吧，伯承同志，请你从速把泽东同志和我刚才说的意思通报朱德同志，并告各军团长，北进黔北的决心不能动摇。最要紧的是刚才泽东同志讲的，找缝子钻过去。”

刘伯承说：“我马上去给总司令汇报。”

果然，如同舞台上的两队舞蹈演员变换队形一般，中央红军从敌人的

隙缝中钻了过去，越过了湘黔公路。一越过湘黔公路，两路纵队连克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数县，于12月31日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猴场地区。

中央红军从进入贵州以来，从黎平算起，长驱数百里，连克十几城，部队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军心大振，情绪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和李德的头脑又热起来了。转移行军中，博古和李德是经常走在一起的，宿营住房子，大都住在一间房子里，两个人又都精通俄语，嘀咕事情很方便。这天，部队一到猴场宿营地，李德看了看地图，便高兴地跳了起来，跟博古说：“太好了，太好了！博古同志，不必去黔北了，完全不必去黔北了。大好机会，应该向东折向湘鄂西，同2、6军团会合。利用现成的根据地，是可以打些好仗的，可以推进整个中国革命的事业！”博古也动心了，说：“有道理，这里离2、6军团越来越近了，部队拉到川黔边，等于到了湘鄂西。”李德还说：“就是照毛泽东避实就虚的理论，我们也该去湘鄂西。薛岳兵团已西进贵阳，黔东北正好空虚。还有，中央红军即使到了川黔边，到时候还不是有个会合的问题？你们中国同志总是批评‘毕其功于一役’，我就不理解，毕其功于一役有什么不好，难道非得毕其功于两役，三役，四役？”伍修权在一旁听了直发笑。

李德问：“你笑什么？”伍修权说：“一役不行，当然得两役，三役，乃至四役啦。”李德说：“那你说，这去黔北和去湘鄂西的问题，是一役好呢，还是分作两役好呢？”伍修权看了博古一眼，有话没敢说。博古说：“有话说明嘛！”伍修权说：“去川黔边是黎平会议定了的呀。”博古说：“我们再开个会改过来嘛！本来，从黎平出发，我们就电告过2、6军团，要他们给予配合。其实，战争情况下，也不必事事都开会做决定，指挥员有权变更某些作战方案。”李德说：“对，我找朱德下命令，部队暂停过乌江。”

一场风波就这么挑起来了。李德找到朱德说：“部队不要过乌江了，该向东北折向湘鄂西。此事我同博古商量过，他同意的。”朱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愣了好一阵，只跟伍修权说：“不过乌江了？‘三人团’开会了？”伍修权说：“是他们两个人嘀咕的。”朱德又问：“黎平的决定不作数了？”伍修权说：“我也这么说呢。你快去找找周恩来同志吧。”李德见朱德只跟伍修权在对话，说：“他怎么样啊？他好像不大想执行？”伍修权只好跟朱德说：“他想知道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朱德说：“你告诉他，我是军委主席，这样大的变动，我得听中央的！”说着，他扭头走了。

朱德想，黎平会议后，李德不可能再那么享受特权，有什么事情，周恩来会直接给他说的。他连忙找到周恩来，问道：“部队不过乌江了，你知道吗？”周恩来一怔说：“谁说的？”朱德说：“德国的那个小老德说的，说博古也同意了。”周恩来这才想起来，昨天李德真还在他面前嘀咕过一句：“部队是不是还有必要在这里过乌江？”当时他没在意，以为李德说的是渡江位置问题。此刻周恩来有点火了，说：“不行，作这样的变动，就是‘三人团’议决了也不合适。去黔北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我找毛泽东。”周恩来转身便去找毛泽东。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好王稼祥和张闻天也在，他便转述了朱德说的李德和博古提出的问题，说：“部队正在做抢渡乌江的准备，你们的意见怎样？”王稼祥叹道：“我没说错吧？我说这个东西子，这样下去不行。”他没有明说“组织”问题，他怕刺激了周恩来。张闻天也阴阴阳阳地说：“看来，明天的元旦也过不好了。”毛泽东说：“恩来啊，才开会定下来的东西，就这么变了不好吧？”周恩来说：“只好再开一次会

了？”王稼祥说：“开，开！要不这双脚对这张嘴有意见哩，说是我累着你倒闲着。”张闻天恼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老毛，你脑子好，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说：“要我说呀，”他点着自己的脑袋：“基本思路错了，就是比较难办，改起来挺费事的。我们最近这一段的形势不是还不错吗？恐怕是脑子里的那根虫又动起来了。别看李立三去苏联了，批评李立三的调子也挺高的，但那个李立三还在自己的脑子里：到湘鄂西去吧，贺龙办了酒席在等着我们喽，那里离长沙很近喽！要不，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别的理由找不到嘛。嘿，你别说，我还真想过一下子，要是到湘鄂西去，一个短时期里，可能比较去黔北要轻松一点。但是，同志们呐，长远考虑，不行。在那里，向北向西是长江，那里的长江我们过得去吗？向东向南，还是湖南、江西。所以，还是要作长期打算才行，苦一点也没法子。说来也真费思量啊，一个外国人，耐不住性子，倒也罢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是要把中国革命的日程表放长一点才好，是不是？不说了，开个会再谈谈吧。”

在猴场，1935年的元旦，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转移方向问题。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提议召开的，由博古主持。由于有黎平会议的基础，阵线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事前又跟王稼祥和张闻天打了招呼，说是看在部队正在积极作渡江准备的份上，不要提组织问题，争取开个短会。因此，尽管会议来得突然，却没有黎平会议上的那种大吵大闹。会议一开始，博古便陈述了他和李德关于改变去川黔边的决心的理由，接着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三言两语，除了何克全没吭声，没有一个赞同改变去黔北的决心的，都认为，“扩大会议的决议是不能随便改变的，目前的敌情也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原来的决心。”博古感到很恼火，说：“折向湘鄂西，怎么能说是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在黎平决定北进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同2、6军团会合的问题。现在不过是付诸实施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倒不能这么说，黎平决议的主要之点是去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我看，还是请泽东同志谈谈吧，他的意见也许能充分一点。”博古说：“请吧。”王稼祥又在一旁递了一句：“抓紧点，我还要过年哩。”

毛泽东说：“中国的事情挺复杂的，知其一好办，知其二就不那么好办，要知其三知其四，恐怕就更难了。为什么要念念不忘同2、6军团的会合呀？我们同2、6军团会合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发展自己，打几个好仗，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么？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去川黔边？那里不正是可以搞那么一块根据地，发展自己，争取打几个好仗么？现在来个否定之否定，折向湘鄂西，不妥。第一，我们已经要2、6军团向常德方向打几仗，他们现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们还不得而知，再要像6军团那样找来找去，天老爷恐怕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就说我们去了，同他们会合了，要在那里长久下去，也是不行的，那里的地理位置不合适，这一点我已经同一些同志谈过。第二，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眼前敌情的变化还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去黔北的决心。薛岳兵团西进贵阳只是他的直接目的，他的进占贵阳是针对王家烈的，他的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他还会掉过头来尾追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他已经放弃了阻拦我同2、6军团会合的打算。因为，他沿湘黔路再向东机动，是很方便的。第三，要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个敌人主要是薛岳、吴奇伟、周浑元，而要同蒋介石的这个嫡系打几个好仗，在黔东北地区是有困难的，那边还有个刘建绪，他是专事

等着我们去同 2、6 军团会合的，他可以同薛岳取得密切的协同；另外，在川鄂边还有个徐源泉，此人不可小看，湖北黄冈人，科班出身，南洋讲武堂的，手头有好几个师。我们要往那边去，弄不好还是钻口袋。这里，我顺便说说钻口袋的问题。这个钻口袋的问题，我们要完全避免是很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到哪里，蒋介石就在哪里画个圈圈，一个圈圈就是一个口袋。但是，口袋与口袋不一样，有的是纸口袋，有的是布口袋，有的口袋是裹了铁皮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选好口袋；二是要学会从口袋里钻出来，而不是钻进去。我们不沿湘西那条路去同 2、6 军团会合，就是不去钻那个铁皮做的口袋。第四，有人说了，到川黔边，不是同样要惊动刘湘么？刘湘和薛岳、王家烈南北夹击我们怎么办？我说，刘湘到底能深入黔境多少，还难得说。他背后还有个红 4 方面军，刘湘在红 4 方面军面前是败军之将，他不怕徐向前过了嘉陵江？当然，到黔北遵义地区也不是没有困难的，问题在于那方面的困难少一点，好对付一点。没法子啊，在现在的中国，要想找一块对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困难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说来说去我是一句话，就是想到黔北去发展一下，寻机打几个好仗。湘江一仗没有打好，我是一直不服这口气的！”

毛泽东的话不算短，可似乎在不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他好像应该讲到某些人头脑中的那条“虫”，但他没有讲，连边都没有挨一下。他拿住一条，只讲军事，不涉及其他。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李德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句没吭。在听了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翻译后，李德竟掏出一张小手帕来擦拭着自己的眼睛，完了跟伍修权小声道：“我这是到中国来，从他嘴里听到的最有人情味的一句话……”

周恩来望着博古，想知道博古是不是有作结论的话。等了片刻，博古没有话。周恩来说：“既然又开了一个会，自然应该有点记录才好，又考虑到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我这里写了几条，是不是再通过一下？”

周恩来的这一手也是很厉害的。他接着读了一个题目叫作《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的草稿。读完后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当中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会议上没吵架，会外头吵起来了。政治局委员们还不曾走出那个小院的后排横屋，骂娘、吵架的便来了，他们是彭德怀、林彪、罗炳辉和叶剑英。他们一跨进总部院内，叮叮当当，就听彭德怀在骂娘：“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侯之担在对岸修工事，我们倒在这里停下不走了，是忙着吃大菜吗？”罗炳辉也是个火爆性子，吼道：“是要等人家修好了工事，再来个湘江之战吗！”刘伯承把他们堵在院子里，要他们“别吵别吵”。叶剑英说：“就是嘛，要不停下这一天多，部队都过江了！”林彪也说：“我 1 军团都堆在南岸山这边，敌人要是过了江怎么办？”

正嚷嚷着，政治局委员们走出门来。彭德怀一看阵势，跟刘伯承说：“准又是他们吵架在前，我们骂娘在后。”刘伯承眨了眨镜片后的眼睛说：“没那回事，一年之初，吵架不吉利。”一句话，又把彭德怀逗乐了：“娘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讨个吉利喽？”林彪在一旁说：“说半天今天是元旦啦，我看你总参谋长怎么招待我们！”

说着，周恩来走近前来：“各位军团长来得正好。伯承啦，快请朱德同志，我们开个简短的军事会议。”

彭德怀问道：“到底过不过乌江啊？”

周恩来说：“当然过，明天就过！”

第七回 军中二杨首战乌江 “猴兵猴将”遍地烟枪

话说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警卫员们在送毛泽东回驻地的路上，天空中忽然飘起了雪花。

毛泽东停下脚步，伸手接了几朵雪花：“啊，好几年没有见到雪了……”陈昌奉见毛泽东情绪不错，问道：“今天是元旦，见雪是好呢还是不好？”毛泽东斜了陈昌奉一眼，说：“当然是好事喽，瑞雪兆丰年。不过……”他边走边自语了一句：“唔，莫非1935年是个雪年么？”陈昌奉没有听见这句话，说：“毛委员，今天过年啦，我们准备了好吃的，还有你喜欢呷的甜酒，这地方叫醪糟。”毛泽东扭过头来，说：“你们搞了好呷的，刚才几个军团长都在叫要呷的，你怎么不留留他们啊？”陈昌奉说：“我敢留他们呀，都是些饿牢鬼，多少好呷的也得叫他们打扫光了。”毛泽东笑了笑，没再吭声。当他走进屋里，屋里已经点起油灯。陈昌奉说：“你们开会的时候，我去找过贺大姐，想请她来过年，她说她不来了，怕晚了回去天太黑。”毛泽东说：“不来就不来吧，我们过我们的年。”便坐下来端起一碗甜酒：“对头，有了甜酒，就有点过年的样子了。不过，昌奉啦，我们不能叫它醪糟。”陈昌奉问：“为什么？”毛泽东说道：“醪糟醪糟，捞了个糟！”陈昌奉哈哈一笑说：“对头对头，我们呷的是甜酒。

甜酒甜酒，又甜又久！”

晚上，毛泽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老在琢磨手心里那几朵雪花……琢磨一阵，觉得无聊，又抓起一本才搞来的县志看。看了一阵，睡着了。睡了个把小时，清晨4点，天还没有亮，便有参谋来报告，说先头部队已经到了乌江边。毛泽东不想睡了，翻身起床，叫陈昌奉喊上刘伯承，便一路七八个人的小队，直奔乌江边而去。

他们来到乌江南岸的山脚，天已毛毛发亮，只见一伙人光着膀子在断竹劈篾，扎制竹筏。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这是在准备渡江器材。一会，林彪、聂荣臻和张云逸走了过来，毛泽东问：“这家伙能行么？”林彪说：“什么也搞不到了，只好扎这家伙。我看是行的，我在家里划过竹排子。”毛泽东说：“一年伊始，你可得让我们开张大吉才是！”聂荣臻说：“要紧的是连成桥，这是要麻烦一点的。”张云逸是副总参谋长，他是带工兵营来架设浮桥的。他说：“连成桥也不会有什么問題，问题是敌前架设，火力掩护很要紧。”毛泽东又问：“对岸的敌情搞清楚了吗？”林彪说：“我要梁兴初几个人昨天就过去了。对岸只有侯之担的一个旅，旅长兼江防司令，我的家门，林秀生。”毛泽东说：“梁兴初？他可是回到老家了喽。”林彪说：“不，他不是这地方的人，他是吉安人。”毛泽东笑道：“你说的梁兴初，不就是那个瘦得像猴子也精得像猴子的梁兴初吗？”林彪说：“就是就是。”毛泽东说：“这地方不叫猴场吗？”一伙人全乐了，扎竹筏的工兵们也都乐了。毛泽东说：“你们刚才想到的几点都不错，一个是架成浮桥，一个是敌前作业。走，到山头上看看去！”

毛泽东、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张云逸，在一帮警卫的前导后拥下，登上了乌江南岸的山头。举目望去，高山深谷，一条乌龙在脚底穿山而过。人们不免有点悚然。红军辗转江西、福建，经湖南、广西到贵州，还不曾遇到过这么一条险峻的江河。不知谁嘀咕了一句：“真天险也！”

乌江，发源于滇黔交界的山区，流经贵阳和遵义之间，东而向北，流入四川，会入长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也叫乌龙江。毛泽东的天性里有一种对大江大河的酷爱和战而胜之的强烈愿望，他久久地望着峡谷中的乌江，叹道：“乌龙者，藐其水深流急，状其乌龙奔腾也。这是余庆县志上说的。没什么，险有险的好处。”无人相语，他扭头问林彪：“渡口选定了没有？”林彪说：“选好了，上游的江界，4团负责；下游的龙溪，1团负责。”毛泽东说：“唔，4团有个杨成武，1团有个杨得志，这叫二杨战乌龙。什么时候开始架桥？”林彪说：“等中午敌人烟瘾发了就干。”毛泽东笑了笑，伸出指头在林彪的鼻子前点了点：“你还真把我那句话听进去了。说的对，对黔军战斗力的估计，不要忽略了那杆烟枪。走吧，我想找个地方补补觉去，要不，过桥的时候，会闪到江里骑乌龙遨游去了。”

且说在上游江界渡口担负先头强渡任务的1军团2师4团，团长耿飙，时年25岁；政委杨成武，时年19岁。两个都是大个子，平时跟战士说话都得猫着腰，背都有点驼了。此刻，他们刚从江边化装侦察回到山这边的隐蔽集结地，争强好胜的杨成武给团侦察队的两个侦察员说：“你们到下游龙溪去，看看那个湖南蛮子是怎么搞法的，一个钟头回来报告一次，两个倒着班跑，还不要暴露。明白我的意思吗？”侦察员都是些精灵鬼，说：“政委，我们落不了后，工兵营离我们近，家伙上来得快，准比他们……”杨成武叫道：“说去就去，看看他们的先头分队是怎么过法的！”两个侦察员飞快走了。杨成武跟耿飙说：“杨得志河边长大的，过湘江的时候小子就有过高招，我们这回不能落在他后头。”耿飙笑笑说：“走吧，再高的高招也离不开竹筏子。”两个人便钻进竹林，同战士们一起做起竹排来。

杨成武，福建长汀人，当地出竹子，会做竹排。他把砍下的新竹，去枝削节，打眼加闷，5根拼在一起，再烧上一堆火，把竹尖一端在火上烤上一烤，用力一弯，便弯出一个高翘的船头来，煞是好看，战士们都说：“政委真有两下子！”他正忙着，去龙溪的侦察员跑回来一个说：“报告政委，杨矮子团长还没法儿，正在江边打转转！”杨成武先是一乐，一会又沉下脸来，还伸手抓了抓脑袋，说：“他还有工夫打转转？去，把这根竹子从山这边丢到江里去！”侦察员不明白，问道：

“这是为什么？”杨成武说：“要你丢你就丢！”

龙溪渡口的杨得志和黎林，果然急得团团转。要什么没什么，连老百姓的门板都让敌人撬走了。杨得志，湖南株州人，15岁参加湘南起义，矮墩墩的，人称杨矮子，平时有不顺心的事，也爱骂个娘。此刻，他和黎林在江边小树林里打转转，又骂开了：“他娘的，这如何搞呀！”黎林说：“别急，我已经摸了底了，总部工兵营扎的竹筏子，两个渡口一家一半。”杨得志说：“那是做浮桥用的，问题是突击队怎么过去……”正说着，杨得志看到江里漂来一根大南竹，叫人打捞上来一看，竹子的一头打了个弯，新烤的。杨得志明白了，跺脚道：“他娘的杨长子够意思！他是在给我们介绍经验哩。对，我们也扎竹排，突击队使竹排！”可抬头一看，附近没有竹山，他又急了，说：“娘的，竹子都长到杨长子那边去了！”

肖参谋，从1营调个排，到工兵营偷些竹子来！”黎林说：“来回好几里呢，砍树行不行？”杨得志说：“要不得。湿家伙太沉，也划不快。”正说着，派到村里找老乡请教办法的人回来了，向团长、政委报告说：“老乡说，要渡乌江得有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好水手。”杨得志一听便火了：“那是他娘的走亲戚哩，我这是打仗！”他的话刚落音，团里的另一个参谋跑来报告说：“团长，山那边的沟里有一小片竹林，老乡家里还有一堆干竹子！”杨得志又气又高兴，说：“嘿，你们这些人啦！怪不得我这个团长不长个，都叫你们气的！还不快叫人去砍，去搬！听着，10块大洋一根也得给我弄来！”

上下两个渡口都在忙着扎竹排竹筏。突击队使竹排强渡，大部队过浮桥。

正午，上下两个渡口的先头部队同时发起强渡，抢占对岸阵地，以掩护工兵营架设浮桥。江界，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十几个红军战士，冒着严寒，赤膊上竹排，几只竹排飞过了江面，向敌人的江岸阵地发起了冲击。在由下而上的冲击中，军委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身手不凡，4发迫击炮弹全都命中对岸山头上的敌碉堡，敌人溃退了，部队完全控制了江对岸。

号声响起，工兵营抬着几十个竹筏，斜刺里窜了出来，涌向江边，把竹筏抛入江中，拉绳的拉绳，撑篙的撑篙，叮叮当当，哗哗啦啦，很快地，一座竹筏浮桥在向江中延伸……杨成武回头看到赵章成还坐在炮阵地上，眼睛里像是淌出泪来，便问道：“怎么啦，你负伤了吗？”赵章成悲悲切切，说道：“我从江西扛出来5发炮弹，打了4发，只剩1发了……”杨成武先是哈哈大笑，尔后沉下脸来，郑重地道：“老赵，往后要是碰上敌人的炮兵，那怕一个战士换一发炮弹，我也得捞回来给你赔起。我杨成武说话算话。”赵章成一抹脸说：“得了吧政委同志，即使一发炮弹换一个红军战士，我这发炮弹也给你打出去！”

在尤溪，杨得志冒雨指挥的强渡，第一次不太成功，只过去几个人。眼看天色将晚，雨也下个不停，杨得志叫来了1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啊孙继先，你都看到了。我是红军1团团团长，你是1营营长，天字第一号哩，你看怎么办啦？”孙继先说：“一定要渡过去！”杨得志说：“对，一定要渡过去！刚才呀，竹排小了，经不起浪头，就使那个大家伙吧。”孙继先说：“出发位置也选得不好。”说着，孙继先率领十几个战士，登上了那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他选了一个水流较缓的地段，一声“前进！”竹排便消失在江面的暴雨中。杨得志和黎林在江边的山崖下等着，等得好焦急，等了好一阵，才听到江对岸的枪声密集起来，还有手榴弹爆炸的闪光和轰隆声，枪声雨声中，还夹杂着喊杀声。杨得志跳了起来：“他娘的，成功了！”黎林也叫了起来：“成功了！成功了！”雨还在下着，只见半个工兵营从雨帘中窜了出来，涌向江边，也是拉绳的拉绳，撑篙的撑篙，竹筏下水，展开了架桥作业。

杨得志在夜色中看了看表，有点儿情绪：“这一回呀，我们1团是输给4团了，输给那两个长子了。”

先头部队陆续过江以后，一气追出40里，才在一个叫猪场的地方停下来。这一路上，战场光景颇叫红军战士们感到希奇，凡有敌人守点的地方，遍地是烟枪、步枪。江防司令林秀生连电报稿和机要文件都不要了，带着他的团队仓皇逃向遵义，有的战士不知道烟枪是啥家伙，拣起来当笛子吹，吹

着吹着，把剩下的烟土吸进肚里，只觉得天昏地转，倒路旁起不来了。

且说毛泽东一早赶到江边，查看了部队的渡江准备工作，又询问了昨晚的军事会议关于大部队渡江的序列，便在林彪的关照下，到附近的一家民房里睡觉去了。上床已近中午，一觉醒来，天已黑尽。心里着急，便下床来到相邻的堂屋，只见刘伯承和聂荣臻在掌灯说话。

毛泽东一边往袖筒里伸胳膊一边问道：“二位，怎么样了？天都黑了，怎么听不到枪响呀？”刘伯承说：“先是4团，后是1团，已经把对岸的阵地拿下来了。”毛泽东一听高兴了，说：“这个陈昌奉，怎么不早叫醒我。走，过江去！”这时，林彪从黑地里走进屋来，说：“浮桥还没有全好，等明天随大队一起过吧。”毛泽东说：“你们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焦虑这个过江的问题呀，这是我老毛力主的。”刘伯承说：“不不，太靠前了，先头团也才过去一部分。还是明天随大队一起过吧。”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说：“对岸不就是个侯之担吗？早过去跟他要口烟呷去！”好说歹说，毛泽东才放弃当晚过江，留下来跟刘伯承等说了其他一些事情。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开始过乌江。毛泽东因离江边近，早早地就和刘伯承、林彪、聂荣臻等到了江边。一道绿幽幽的竹筏浮桥，横在蓝幽幽的江面上，在晨光中闪着耀眼的金光。毛泽东急着过江去，他踏上竹筏浮桥，跳起双脚蹦了蹦，竹筏掀动江水，发出哗哗的响声，“哼，谁说贵州不好，这竹子不是好家伙么？伯承啦，有关于竹子的诗句吗？”刘伯承说：“诗句没有，老话倒是有一句。”毛泽东问：“什么老话呀？”刘伯承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不合拍，不合拍。”他停了停又道：“噫，你这不合拍处倒有合拍处，用了这么多竹子，居有竹的老百姓居无竹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还给老百姓？”刘伯承说：“竹子倒是花钱买的，不犯群众纪律，问题是用了也不能还给老百姓，只能烧。”毛泽东说：“对对对，那些家伙抢老百姓的东西比我们要能干得多。这浮桥不是花轿，不能我们坐了，敌人也来坐。”林彪耐不住性子听这些闲话，说：“要过就快走吧，部队要上来了。”毛泽东说：“对，听军团长的。”他边走边说：“伯承啊，部队要争取在两天之内全部渡过乌江。别看前头是条狗，屁股后头可是条狼啊。”刘伯承说：“后面的狼估计还得3至4天才能赶得上来。”毛泽东说：“对，薛岳呷王家烈的酒席还得花点时间喽。”

毛泽东正在浮桥上走着，邓小平（注）从人群中挤了上来，毛泽东见了愕然道：“你这个小平同志呀，怎么总也见不到你呀？”邓小平说：“错误在身，处分在腰，怕给你添麻烦。”毛泽东关切道：“王稼祥说你在管《红星报》？”邓小平一边在口袋里掏着才印出来的报纸一边说：“不是管报，是办报，确切地说，是刻报。我正给你送报来。”说着把一张油印小报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一看，头版大字标题《乌江战斗中的英雄》，下面是一串名单：

领导此次战斗的主要干部：1营长罗有保，3连长毛振华，机枪连长林玉，2连政治指导员王德云，2连青干钟锦友，2连2班长江大标，2连长杨尚坤等8同志。

涉水及撑排的：西市（注）机连孙明，山西王家福，西城王友才、林玉，西城3连5班长唐占钦，西市赖采份等6同志。

毛泽东看了小报，很高兴，说：“快手啊小平同志，我们还没有过江，你的小报就出来了！为什么不写篇文章，光是个名单啊？”邓小平说：“就

是图个快，文章就来不及了。不过，名单里面是有文章的。”毛泽东“嗯？”了一声，邓小平说：“为我们的英雄们向军委请奖嘛。”毛泽东笑笑说：“你这个邓小平呀，总是棉里有针，行方思圆。”邓小平说：“针也罢，方也罢，这一针首先是刺你的。”毛泽东说：“刺我的？刺我什么？”邓小平说：“你那么主张过乌江，英雄的红军战士突破了乌江，该不该为他们说句话？”毛泽东说：“对对对，一个奖一套军衣怎么样？”邓小平说一声“要得”，便停在江岸边等周恩来去毛泽东一行人马爬上对岸的山头，看了看目之所及的地形，刘伯承和聂荣臻留下了，他们要关照大队人马过江，毛泽东和林彪便带着警卫队伍继续向山下走去，走上了一条通往遵义的乡间大道。走了三五里，便拐向路边的一家小店停了下来。毛泽东昨天睡了个好觉，今天精神很好，他一坐下来，便要警卫员们弄水，拿地图。林彪也在一旁坐下来，想同他谈谈此去遵义的问题。正要说话，隔壁的几个警卫员蹦出门口：“‘有猴兵’！准备战斗！”门外的几个警卫员连忙围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周围，枪机拉得哗哗响。只听隔壁有人在说：“‘猴兵’？什么‘猴兵’？你骂老子是‘猴兵’？”警卫员大声吼道：“不许动！你个‘猴兵’，你的部队都打垮了，投降吧！”屋里的人还在说：“什么什么？我的部队打垮了？胡说八道老子揍你！你，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听口音是江西人，林彪跨近那个门槛，朝屋里一看，他娘的，这不是梁兴初吗？梁兴初一身黔军穿着，加上瘦猴般的长相，真是“猴兵”了。林彪禁不住乐了，连忙朝毛泽东这边扬了扬手，意思是自己人。林彪给对峙着的警卫员们说：“他是我们2师的侦察科长梁兴初。”接着问梁兴初：“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梁兴初是在睡梦中被吵醒的，眼睛还红着，定睛一看，才看清是自己的军团长林彪，说：“是你们啊，军团长！”林彪又问：“怎么回事？你们没到前面去？”梁兴初干抹了一把脸说：“我们到遵义城里转了一趟回来了，走累了，就在这楼上睡了一觉。不曾想你们这么快就过乌江了。”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楼上的两个“黔兵”也走下楼来。梁兴初一看是毛泽东，连忙抓下头上的敌军军帽，打了个立正说：“毛委员，你不记得我了吧，过于都河的时候，我们还说过话的。”毛泽东说：“你一直追问我到底往哪里转移，我硬是没有答上来。

你那嘴就噘起来了，活像一只小猴子！”一屋子人都乐了。毛泽东笑完又说：“你刚才说，你们进了遵义城了？”梁兴初说：“进了，在城里混了两天。城市还不小，我们什么东西都吃到了，就一样东西没敢吃。”毛泽东问是什么东西不敢吃，梁兴初说：“鸦片。我怕吃了更要瘦得像猴子。”大伙又乐了，毛泽东和林彪也哈哈大笑起来。

林彪招呼警卫员们说：“你们去弄点吃的吧，我们在这里同梁兴初他们谈谈。”

梁兴初20岁，除了干瘦像猴，还长了几颗大门牙，雅号“梁大牙”。毛泽东不知道他的这个雅号，说：“梁猴子，我还得叫你猴子。叫猴子好啊，猴子多精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大闹天宫，就是只猴子。怎么样，全军就你们几个逛了遵义城了。说说吧。”

侦察科长梁兴初，当部队在乌江南岸停下来时，他带着一个侦察小组，没有停脚，趁敌人还没有“清理”渡口，便在江界乘渡船过江了。他们扮装成“卖碎盐”的小商人，在对岸敌人的据点窜了几个来回，搞清了敌人的江防情况，留下一个返回南岸送情报的，3个人便摇身一变，成了3个“黔兵”，奔了遵义城。军阀部队，杂七杂八，扮匪兵是最易得手的。3个

“黔兵”在遵义城里窜了两天，就剩侯之担召开军事会议的那个衙门没有进去了。

“遵义城里的守敌是侯之担。”梁兴初接着说：“他是王家烈25军的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又是川南边防军司令，说是整个黔北地区都是他管。整个部队有多少，老百姓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只有八九个团，有的说黔北所有民团地方武装都是他的，加起来有十好几万。

估计一下，能打仗的大概也就一两个师吧。人多人少看下米，兵多兵少看当官的。那天参加他的军事会议的旅、团长在一家馆子里吃包席，凑巧我们几个也在那里改善生活，一数，也就十五六个像模像样的。遵义城分南城北城，也叫老城新城，中间有条小河。守城的敌人总共3个团，城郊两个营，一个营在城南团溪镇，一个营在城北去桐梓的路口。这些，我们标了图了。这个侯之担，土佬，昨天他还在会上说：“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疲劳死了，岂能过得了乌江？红军或是不敢来乌江，可能往别处去了。”他现在是不是知道我们已经过了乌江，还难得说。溃退下去的林秀生旅敢不敢进遵义城，也还成问题。侯之担在军事会议上拍过胸脯：“我们教导师务必防守好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玩忽职守，军法从事。”听老百姓说，姓侯的挺军阀，部下犯了什么事，大都逃之夭夭，不敢再见他。所以有‘侯之担，没心肝’的话。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真是巧了，姓林的碰上了姓林的，你梁猴子碰上了姓侯的，这叫不是家门不相见，不是冤家不聚头。姓林的，你看怎么样啊？看来，这拿下遵义城的任务又得落到你1军团身上了。”

林彪说：“当然。我就想拿下个像样的城市歇歇脚。”

毛泽东说：“对，这是我们的方针。呃，梁猴子，这里到遵义城大概有几天的路程？”

梁兴初说：“部队行动，得两天。我们是一个晚上加一个早晨跑到这里的。”

这时，警卫员们弄来了一些吃的。毛泽东、林彪和侦察员们一圈，警卫员们一圈，边吃边说说道道。

正吃着唠着，大部队已经开过来了。队伍精神抖擞，步伐急速。过了好一阵，军委纵队也上来了。远远地，毛泽东看到贺子珍坐在一副担架上，他连忙上前跟着担架走了几步，同她说了几句话。贺子珍心情不错，只是脸色有些苍白。“真不好意思，我也坐开担架了。”毛泽东说：“不要逞强，你是两个人嘞，该坐担架就坐。”毛泽东说完转过身来，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3个“老者”拄着棍子上来了。董必武一见毛泽东便说：“润之呀，你还是我们苏维埃的主席呀，你怎么就不管我们了？”毛泽东拱拱手说：“3位先生在上，学生久违失礼了。今天晚上，一定到先生的‘征府’上看望聚谈。”谢觉哉展脸一笑说：“瞧你说的多受听呀，行军打仗，还尊府哩！”毛泽东说：“‘征府’者，征途之府也。”谢觉哉“哦”了一声，又笑了笑，说：“你说的是宿营地呀！对对，‘征府’，征途之府，是尤其尊府的。你可得来啊！”毛泽东笑着点头。徐特立在他的耳边说：“一定来，老家伙有话要跟你说。”

当晚，军委纵队驻在一个大村子里，村子里有个地主大院，年纪大的和女同志都住在这个大院里。毛泽东打听到他们的驻地，没有去看望贺子珍，便去奔3份“老者”的住地。一进门，3位老者已歇息停当，正在闲聊候见，

见毛泽东到，欲施上下级之礼，毛泽东连忙说：“都请坐请坐。董老，谢老，徐老，这里离遵义城只有一天多路了，军委纵队可以在这里多休息一两天，等部队拿下遵义城，我们再行前进不迟。怎么样，身体都还吃得消吗？”徐特立说：“润之，你也坐啊，我们聊聊。”

毛泽东坐下，说：“实在对不起，我们还是在越城岭见过面的，忙着吵架去了。”毛泽东的“吵架”是随口说出的，意在表示一个谦意。岂料董必武逮住便问道：“润之呀，你们的架吵完了没有呢？”毛泽东竟一时惶然，不知如何作答为好，虽说3位老者都是党内相当负责的人，但吵架的事终究是中央领导的事，深说不一定适当，浅说又似乎对几位老者不尊重。他只好“嘿嘿”地笑了笑，说：“都是军事方面的事，而且主要是转移方向问题，吵一阵，少数服从多数，也就完了。我还是政治局委员，不得不参加吵喽。”董必武说：“我们今天就是想就党内的吵架问题说说心里想说的，算是给你主席汇报汇报思想。你说你们吵架，我们3个老家伙也在一起没少吵。”毛泽东不禁愕然，问道：“你们也吵架了？”董必武说：“我们吵是吵，只是不像你们那么对着吵，而是越吵越是一个鼻孔出气。”毛泽东笑了，说：“那就不叫吵架了。”谢觉哉说：“怎么不叫吵啊，党内的意见分歧嘛，就朝着不妥的意见吵嘛。下边还是请董老说说吧，他的话能代表我们3个人的意见。”

董必武接着说了一篇不短的话，要是拿来作为一个会议的发言稿，也是足够足够的。他说：“我看，你们的架还没有吵完，还得要吵下去。不过，像现在这个吵法：一件事情来了，吵一阵；另一件事情来了，又吵一阵。恐怕不行。吵出个好的结果倒也罢了，万一又吵到邪路上去怎么办？我们现在还是困难重重啦，前头的困难也不会少了，没有一个正确的较为稳妥的中央领导，是不行的。一个过湘江，一个过乌江，两相比较，不是很清楚吗？这当然可以说，这要归功于你们的吵架，吵比不吵好，吵一吵，总会多少明辨一些是非，一些对与错。但是，为什么非要通过吵架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呢？这就又有可琢磨的了。我们3个觉得，要吵，就把问题吵透。到底错，错在哪；对，对在哪。话说白了，就是说，那个叫李德的不行，不能再让他胡来了。当然，说句良心话，也不能全怪他，人家一个外国人，他能知道中国多少事情呀？我到过欧洲，那里的一些国家，就那么一两条河，一两道山，那么几个平原。中国太大了嘛！他知道中国的湘江是怎么流的，乌江又是怎么流的？江西、湖南是那个样子，贵州、四川又是个什么样子？他心里有数？不可能有数。怪人家纸上用兵，他就那么一张纸，他不纸上用兵怎么用兵？问题是我们自己人。有的人太年轻，又不大懂军事这一套。我不懂打仗，我就不敢去当什么师长团长，连个营团的党代表我都不敢去当。说这么多，就是这么一个建议，中央有工夫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把问题再吵透一点，解决得好一点。说完了，牢骚话不少，冒昧之处，请政治局毛委员见谅。”

董必武的这一席话，在毛泽东心里涌起了阵阵热浪，脸也觉得烧呼呼的。他深深感觉到了“三老”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他刚想说点什么，谢觉哉又补了几句：“润之呀，我们的话不能说不是大胆的吧，要搁到前朝，是要触怒龙颜的。有什么法子呢，情况是这么紧急。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了，便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反正，我们几个，都是50好几快60的人了，能不能走完前面的路，还难得说。但是，我们几个人走不完这条路是小事，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革命，得走到头呀！”

毛泽东的眼泪都要淌出来了，说：“董老，谢老，徐老，我谢谢你们对

我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护，你们是我们党里可敬可幸的老同志，你们永远是我的长者，我的老师……说到当前的中央领导，你们说得对，是还有些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军事问题，目前的争论还只是停留在一些情况的处置方法上。其实，分歧不只是方法上的，战术上的，而是有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我所以强调要在军事问题上，在作战指挥上，弄清是非，是因为这是我党当前最迫切的问题，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于什么时候坐下来再深加讨论，黎平会议已有议案，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转移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我想，到遵义以后也许会有这么一个机会，这当然还要看中央其他同志的意见怎么样。总而言之，天地玄黄，事物变化中的转机总会有的。一个人可能一直糊涂下去，一个集体，一个党，特别是我们这个经过近10年战争考验的党，不可能一直糊涂下去。举头西北望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征途漫漫，还望3位师长常提醒……”

董必武扬了扬手，不让毛泽东再说下去。3位老者都很高兴，毛泽东明晰的思想和宽广的襟怀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董必武说：“有你这几句话我们也就心安了。好了，我们也不跟你和诗对句了，时间不早，你去看子珍吧。”

毛泽东告别时说：“董老，谢老，徐老，行军中有什么难处，可要找叶剑英同志呀，别不好意思。”

徐特立把毛泽东推出门：“走走走，看看子珍去。”

注 邓小平在江西被诬为“右倾”、“罗明路线”的代表，撤销一切军政职务，长征时只是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承办《红星报》，遵义会议时任党中央秘书长。

注 西市、山西、西城，均为当时部队代号。

第八回 红六团智取遵义城 侯之担委过入牢笼

据说德国、奥地利人当中，有两种人喜欢歌德：一种是热情如火的人，一种是孤傲成癖的人。李德大概是这两种人的混合物，他的投奔苏联红军，后来又回到东方来“顾问”中国革命战争，该是个革命的热血人物。然而，当他的军事才能一再受挫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固执己见的孤傲者。猴场会议，他的“折向湘鄂西”的意见再次被否决，他的情绪糟极了。在过乌江的时候，为了表明他的自命不凡，他要一个人划着一只小竹筏过江，伍修权和警卫人员拉他都拉不住。最后还是博古的一句话把他镇住了：“这条河是流向长江，流向太平洋的，离波罗的海远得很喽！”

由于李德的孤傲和沉默，也由于党内的问题还“吵”得不透，一段时间里，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处于一种奇妙的别扭状态。过乌江以后怎么办，打下遵义是确定的，到底怎么打法，总得有人拿主意呀。在人们的心目中，遵义是相当于吉安、赣州一类的中等城市；而在江西，红军对这类城市是不随便问津的。周恩来是很守纪律的，在组织问题没有“明确”之前，在军事指挥上，他还是要走走李德的“过场”。他问李德打遵义有什么想法，李德

闭口不言。问急了，他说：“问毛泽东吧，你们现在都听他的了！”周恩来乐得他有这么一句话，便转身找毛泽东。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征询遵义的打法，同时说了说李德的情绪，毛泽东好久没吭声，他想起了3位老者的那一席话，令人费解地笑了笑。周恩来说：“当然，我也只是征求征求他的意见，并不就是要按他的办。我估计了，拿下遵义这样的城市，他也许又要搬出他的堡垒战法了。泽东同志，我想了一下，遵义城里只有侯之担3个团，战斗力也不怎么样，但终究是个不小的城市，是不是把1、3军团都用上去，围而歼之。”毛泽东说：“不妥不妥，遵义的敌人不能就地围而歼之。”周恩来敏捷地反映过来，问道：“那个地方打这一仗？”毛泽东说：“对头！我们不是说要以遵义为中心搞块根据地吗？即使长久不了，停一段时间总是有可能的，把个城市打烂了不好。此事是不是找朱德、伯承同志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既把遵义拿下来，又能把侯之担的3个团赶出来，那个地方消灭它。”周恩来说：“好，好，我马上找他们谈。”

其实，在周恩来找到朱德和刘伯承之前，毛泽东已经同他们谈过一次。朱德正在草拟作战文书，准备送周恩来签字发出。听周恩来说起打遵义的方针，朱德和刘伯承当即表示同意。周恩来说：“如果一个团的兵力实在单薄了，4团是不是作为第2梯队，在6团后面跟一下，看时机再加入下一步的行动。”朱德和刘伯承表示赞同。

就在周恩来和朱德、刘伯承最后敲定第一次遵义战役的作战方针时，兵分两路的中央红军已经离遵义不远了。右路1军团的先头团已经到达了团溪镇。这里，距遵义只有90里。

1军团在向遵义的前进途中，考虑到1团和4团在乌江边已经辛苦了几天，便调整了行军序列，以红6团为先头团。红6团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他们在向团溪的疾进中，眼见其他部队走着走着改变了方向，朝正北方向去了，意识到自己的团有可能要担当打遵义的任务，心里又高兴又着急。团长朱水秋参加过北伐战争，又同林彪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又参加湘南暴动，在同级指挥员中是个老资格，胆子大，也是湖南蛮子，平时也是个“娘”字号。此刻他正在发牢骚：“他娘的，怎么就叫我们一个团在这个方向上啊？城里头有侯之担的3个团哩！这冒险的事莫非冒不完了？”王集成说：“别急啊伙计，作战命令还没有下来呢。”朱水秋说：“还等什么作战命令呀，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别的部队都不往这边来了，总不会不打遵义了吧？”王集成想想也是，说：“是呀，打遵义是定了的。我看，我们还是研究一下怎么打法吧。别人为难我们，自己可别为难自己。”

“哪个为难你们了？”两个人正嘀咕着怎么用兵，只听身后有人说一口四川话，扭头一看，是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刚从总部飞马而来，头上还在冒着热汗。他一边摘下眼镜擦擦汗，一边说：“怎么样啊，团长、政委同志，拿下遵义有把握没有？”王集成和朱水秋对视了一眼，他怕朱水秋当着总参谋长的面骂娘，抢先说：“总参谋长同志，全歼守敌不敢说，拿下遵义城是有把握的。”刘伯承说：“这就行了嘛，没有叫你们全歼城里的守敌嘛。”朱水秋说：“这又是哪家的打法，让我们赶鸭子呀？”刘伯承说：“不是赶鸭子，是要你们动脑子。”朱水秋和王集成眼睁睁地望着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敌人这几个团当然是要消灭的，但不能放在城里消灭。我们要在遵义城里呆下去不是？打烂了不好，我们现在很困难的，没有那么多钱来给老百姓修房子。你们嘛，就这样，打进去以后，能歼灭多少敌人就歼灭多少敌人，主

要是拿下遵义城。消灭不了的敌人嘛，他爱往哪跑就让他往哪里跑。

1 军团的其他部队和 3 军团正在适当位置等着他们哩。”朱水秋和王集成眨巴了一下眼睛，双脚一并，答道：“明白了。”接着，他们汇报了刚才嘀咕的兵力部署：1、2 营从东、南两个方向攻城，3 营为预备队。刘伯承点点头说：“先这么考虑吧，到前面再机动灵活。注意，要尽量减少伤亡，多用点计谋。”

师侦察科长梁兴初的侦察是准确的。这天上午，红 6 团由团溪经龙坪向遵义挺进，果然在离遵义城 15 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一个营。朱水秋请示随团跟进的刘伯承说：“总参谋长同志，是吃掉，还是把他轰跑呀？”刘伯承说：“不。这个营不能当着鸭子赶，要全歼，一个也不能让他跑掉。当然，也别全往死里打，还得留些活的才好。”朱水秋和王集成以为总参谋长是在说俘虏政策，说：“好吧，既然要全歼，是不是等晚上把握更大一点？”刘伯承说：“等晚上干什么？现在大雨，黑白兼有。”

朱水秋和王集成当即兵分两路，冒雨前进，从左右把敌人驻扎的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尔后几个连队突了进去，一个穿插，不到一个小时，把一个多营的敌人全解决了，敌营长被击毙，官兵死伤过半，活的全被俘获。

刘伯承很高兴，说：“挑一挑，把那些能走的都带上，你们也都换换装，穿上他们的衣服，干啥子呢？我忘了跟你们说了，遵义城是有城墙的，门有这么厚。到了城门前，让俘虏喊话，就说你们在前边叫红军打垮了，要守城门的打开大门放你们进去。”

“诈城啊？”朱水秋叫道。

刘伯承说：“要做些啥子准备，你们自己做去吧，我要补补瞌睡去了。”

刘伯承上马走了。朱水秋跟王集成说：“是啊伙计，我们想了那么多，却没有想到遵义是有城墙城门的啦！”王集成说：“我倒是听说过，总参谋长这个诈城计当年在四川泸州就用过。”

就在那个村子里，王集成从俘虏中挑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小院里，让他们觉悟觉悟。他给他们讲话说：“……红军是干什么的？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活不下去了嘛！你们贵州老乡，人无三分银。银子哪去了，都到王家烈、侯之担包包里去了，到大地主、大老板的口袋里去了。他们还骗你们来当兵，给你们一人发杆烟枪，让你们昏头昏脑地为他们卖命。不能再糊涂了，弟兄们。现在，红军要打遵义，要解放贵州受穷受苦的乡亲们。遵义城里有些什么情况，你们知道的都说说，说得对的有赏！”俘虏们骚动起来，那个连长、排长带头讲城里的敌情，一边讲一边还在门板上画出图来。王集成当即给讲了敌情的几个人发了光洋。他发着发着，说：“得了得了，反正今晚上还得请你们辛苦一趟，跟我们进趟城，干脆每个人都给 3 块吧。”俘虏们拿了光洋，一个个全傻了似的。王集成又交待说：“今晚上呀，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

明说了，就是要骗骗那些在城墙上守城门的弟兄们，让他们给我们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去。

免得动枪动炮的，又要死伤好多。怎么个骗法呢？城墙上的人要是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就说是在前面打仗没有打好，顶不住了，撤回来了。明白吗？”那个连长有点懂行，说：“红军长官，要这样，是不是再抬上两个伤号，扛上几杆枪？要装得像一点才好。”王集成点头说：“要得要得，不

过，不能抬多了，抬多了走起来就慢了。天下雨，路又滑。我们天亮前一定要进到城里。”俘虏中有的士兵不同意抬伤号，说：“还抬他们干啥子，弄几个能拄着棍棍走的就行了。”王集成一听也是，说：“好，这个主意更好。拄棍棍走这一趟的伤号，多给一块光洋，怎么样？”俘虏中又是一阵骚动，有的在骂侯之担：“他娘的侯之担，还说红军抓到活的要剥了呢！”

王集成回头与朱水秋商量，改变原来的部署。1营和团侦察排，全都换穿黔军的服装，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负责诈开城门；2、3营在后面跟进。一切准备停当，已经晚上9点多了。一声令下，红6团冒雨奔袭遵义城。王集成也成了“黔军”，亲自和1营营长曾宝堂在前头率领“被击溃的黔军”，直奔遵义南城门。两个小时后，他们来到城南城门前。这时，大雨停了，整座遵义城静悄悄的，只见夜幕下的半空中一只马灯在夜风中悠悠荡荡。俘虏兵连长说：“到了。他们是16团的。”王集成说：“喊话，叫他们开城门！”响声惊动了城墙上的守兵，高高的城墙上有人厉声喊道：“干什么的？”俘虏兵连长说：“红军打过来了，兄弟们在前边顶不住，只好撤回来了。”城墙上的守兵看到城墙下黑乎乎的一大片人，不相信，说：“顶不住？还有这么多人在，还顶不住？到底是哪部分的？”俘虏兵连长说：“老子是一个营，你知道吗，这才剩几个？都叫红军打光吗？”城墙上的守兵说：“是不是深溪水的呀？”俘虏兵连长说：“你给老子开城门，上来跟你细说！”守兵说：“好吧好吧，你们等着！”一会，城门“嘎”地洞开了。说时迟那时快，王集成的“诈城队”蜂似的涌进城门洞，拄棍子的俘虏兵伤号不想白白多拿那块光洋，还在喊着“哎哟哎哟”地配合。那个开城门的敌兵说：“对不起啊，弟兄们，今天上午还传下侯司令的话来，说红军已经过了乌江，大家都得提防着点。你们是在……”他的话没先，手里的枪就被缴了。

进得城门，王集成叫住1连3排长，把他拉到带路的十几个俘虏跟前，吩咐说：“你，把他们也带上，对付城墙上的守敌。弟兄们，你们啦，从此刻起，就不再是俘虏了，跟1排长上城墙夺枪当红军去吧。”说罢，他举枪朝天三响。按照事先的约定，南门外的山头上，响起了全团八九个号兵的冲锋号。号声中，红6团的2、3营都拥进了遵义城，由南城打向北城。霎时，遵义城里，军号声，枪声，呼喊声，敌人的号叫声，响成一片。许多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当作了俘虏，能逃脱的敌人全都从北门逃向了娄山关。

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了遵义城。天亮时刻，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城区。他们看到刚跟进的红4团正在准备宿营，刘伯承给聂荣臻说：“不成啊，聂政委同志，4团不能停下来，逃敌几个团正在去娄山关的路上，机会不错，也正符合我们原来的设想，要让4团追击上去，歼灭逃敌。”聂荣臻说：“完全正确。只有消灭这股敌人，控制娄山关，才能保障遵义的安全。”聂荣臻当即找到耿飏和杨成武，说：“你们啦，强渡乌江立了大功，打这遵义，6团搞得也不错。但昨天晚上，最辛苦的还是6团。这一来，下面的辛苦又轮到你们了。你们不能在这里停下来，连早饭也不要在这里吃了，到路上吃干粮去吧。继续前进，向娄山关追击逃敌！”

耿飏和杨成武当即承命。4团立即吹响了集合号，不到一刻钟，全团便跑步上了去娄山关的大路。

林彪指挥的1军团和3军团的一部，直上娄山关，第二天便歼敌两个团；接着前出打下了桐梓和松坎两座县城，又歼敌两个团。侯之担的部队基本上就这么解决了。

1月9日下午，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遵义城里，党的地下工作很活跃。这天，山城阳光灿烂，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挥着彩旗，燃放鞭炮，欢迎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入城。一时间，只见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骑着大马踏上了丰乐桥，群众顿时一片欢腾……

周恩来在马上说：“这比老根据地还热闹嘛！”

毛泽东随口念了句旧作：“风景这边独好。”

且说侯之担得知林秀生丢了乌江江防，使红军渡过了乌江，气得不行，正在大骂林秀生：“无能！在别处倒也罢了，有那么一条江都守不住，一两个团不见了，还有脸进遵义城么？我要军法……”正骂着，副官报告，红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团溪镇。侯之担顿时脸色发白，再要骂林秀生骂不下去了。自个在心里说自己：“你说林秀生不该逃回遵义，红军兵临遵义城下，你走不走呀？”军阀几十年的侯之担，自然知道遵义是红军的主要目标，料难守住。他斥退林秀生：“从速收集残部，待命再战！”林秀生走后，他把一帮亲信随从叫到跟前，说：“情况这个样子，本指挥部也该后移才是，你们看，移到哪里为好？”军阀部队中的副官也不无明智者，有的说：“司令，共匪胆敢攻占遵义，足见其野心不小，他们是看上整个黔北，看上整个川黔边了。共匪历来喜欢这个边那个边的。所以，侯指后撤的问题，还得有长远考虑才是。”侯之担说：“到娄山关行了吧？”副官说：“不行，娄山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共匪要盘据遵义，不可能不要娄山关。”侯之担说：“照你说，该后撤到哪里为好？”副官说：“要我说，整个黔北地区都不保险，难以久留。”侯之担一听火了，叫道：“你，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照你这样说，我们全完了？只好到四川去讨口子了？”副官说：“司令，你先别动这么大的火。我们当副官的，全是为司令着想的。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再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我看，第一步还是先回老家桐梓，下一步嘛，借四川一块地盘落个脚，也不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可以的。”侯之担像瘫了似的，戎马一生，他还没有作过这么大的难。他说：“好吧，今晚就动身，回桐梓。听着，不是告老还乡，是把我的指挥部转移到桐梓去！”

侯之担撇下他在遵义、娄山关的5个团，连怎么防、怎么守、怎么逃都没有交待，便私自连夜逃往桐梓。到桐梓的第二天，便得悉遵义失守的消息。“看来，桐梓也不保险了……”他再次同他的亲信随从密商“怎么办”的问题。他说：“两个办法：一个是绕道去贵阳，阶前请罪；一个是去四川，避过风头，来日再起。去四川是不是为时尚早呀？”还是那个较为明智的副官，说：“去贵阳已经不是办法了。王军长能饶过我们吗？即使他一个军长不能对副军座‘军法从事’，可中央军薛岳在贵阳，他能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说，王家烈多年就是想吃掉我们的。这次堵剿共匪，从乌江到遵义，他按兵不动，追兵都不见一个，这是为什么？他是要借共党之手搞掉我们！总之，去贵阳，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我们的出头之日。”正说着，又有人报告：“共匪正向娄山关前进，我两个团已被包围……”侯之担两眼直了，一会说：“看，看来，只有去重庆了……”另一个副官说：“司令好主意！王家烈一再电请中央军入黔，还不是要投靠老蒋？他投得，我们为什么投不得？他在贵阳投，我们到重庆投。重庆有老蒋的一个参谋团。副军座，本省局势已经明摆着，没有靠山，靠山不硬，往后是很难对付王家烈的。”侯之担频频点头，说：“对，就这么定了。不过，我们总不能这么一付落荒而逃的样

子跑到重庆去吧？我们也是辛辛苦苦地打了些仗的，也得有个说法，有个交待。对，秦副官，起草一个电报，通电式的，布告各方军界，我侯之担也是浴血奋战，积极剿共的！”

于是，经一番斟酌，便有侯之担的如下一篇奇文：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300余里扼防，构筑堰固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战，防制该匪于南岸，俾追剿各部易于成功，该匪竟猛攻3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均经击退，毙匪、溺匪约三四千名，浮溺满江。

冬午，匪忽增至二万三万之众，拼命强渡。担仰体钧座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抗，务祈追剿各

军一致备击。无如众寡不敌，我林旅守老渡口、岩门之15团，被该匪机炮灭净。匪于冬日午后5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

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匪以大部攻城，卒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北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线待援。现

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

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圈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果然通电一般，侯之担把这份颠倒黑白、假报军情、邀功委过的电报，加急发给了南京的林森、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以及各地军事首要张学良、何成浚、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王家烈等，其中“特急”的一份是拍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的。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侯之担便带随从奔了重庆。

侯之担到重庆一见贺国光，便照“通电”的调子诉说了一番。贺国光说：“老兄既然来了，也就不必走了。”侯之担开初还以为是对他的宽慰和关照，待到把他送进一家独门独院，并有一个班在门口看守，第二天又看到了贺国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侯之担才知道自己已经入了牢笼。

消息传到桐梓，桐梓便有民谣说：

侯之担，侯之担，

飞了鸡，打了蛋。

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义会 周恩来举荐成大功

话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区以后，全军上下，欢欢腾腾。红军从诞生的那天起，还不曾在遵义这样的中等城市落过脚。战士们纷纷走上街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红军总部还在城南广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朱德、

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连日里，成立了遵义革命委员会，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工人武装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遵义城里，一派“瑞金景象”。

其时，敌情也有了很大的缓和。驻湖南邵阳的何键，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20个团到常德地区同2、6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在川南长江一线，一时搞不清虚实，不敢轻易入黔。广西的桂军调了一个师进驻黔南都匀地区，不再北进。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舞会上，私下里对人说：“有薛兵团10万大军入黔对付共匪3万之众，料必足矣，桂军只须敲敲边鼓可也。”就是这个薛兵团，红军当面主要之敌，此时也驻扎贵阳地区，不敢轻进。1月5日，薛岳致电蒋介石，请求在贵阳整饬军备，说是“共匪窜集黔北，即就桐梓、遵义地区暂事喘息，抑或转窜川南，尚须待证。谨就管见所及，窃为嗣后进剿策划，有待川、滇、黔军协力之需求，尤以重庆、桐梓、遵义、贵阳交通之掌握，与本路军所依托贵阳策源地之整備实力为急务；否则大军再事远涉，后方联络线日益伸展，恐功亏一篑，遗无穷忧虑……”云云。

由于敌情的缓和，又有前几次会议（通道、黎平、猴场）的基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审查黎平会议决议是否有当，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议案一提出，便有着开与不开的斗争。开会的议案最早是王稼祥提出来的。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说：“该开会解决问题了，不能再拖了。”张闻天满口赞成，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是个时机。”王稼祥回头又找毛泽东，说：“既然要开会，你就得把你的主张都端出来啊？”毛泽东说：

“我嘛，老一套而已。不过，讲还是要讲一讲的。”

王稼祥虽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军内都是有说话的地位和条件的。他把问题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连说“好，好，好”。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实际上他比谁都深刻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央“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上，策略水平上，领导能力上，还是在组成方式上，都不足以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宁都会议以后，完全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尽快召开一个有规模的会议，充分深入地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及早克服当前中央领导的某种怪异状态，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赞同尽快开会，也还有他个人的一个直接因素：他这个“三人团”成员，目前处境艰难，博古、李德不吭声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又不能最后决策，他唱了个什么角色？说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开会，还得征得博古的同意。周恩来估计，博古是不一定赞成开这个会的。他找到博古说：“博古同志，根据黎平会议决议，我们还要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有时间了，其他同志也有这个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紧开了，再拖下去不好，于今后的事情不好办。”果然，博古说：“还要开什么会呀，不是接连开了好几个会，问题都解决了么？列宁同志是反对‘开会迷’的。”周恩来再次斡旋，说：“会是开过几次了，但都比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点，充分地总结一下，求得认识上更加明晰一些。”博古说：“什么零碎呀，一桩桩，一件件，不是都照他们说的办了么？他们说不去湘鄂西，我们就不去湘鄂西；他们说要过乌江，我们就过乌江；他们说到黔北来搞根据地，我们也就到这边来了。很好了嘛。”周恩来说：“像你这样的说法，正好说明

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分歧始于江西呀，博古同志，我们需要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这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周恩来的后一句话比较重了。他本来还想重一点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变了变口气说：“当然，我说的负责，指的是我们‘三人团’。”博古沉默了片刻，说：“恩来同志，关于‘三人团’，我看，我们就不必自作多情了。你恐怕不会不知道吧，已经有人在说，要开个会，把我们轰下台。如果是这样，我倒是赞同开这个会的。因为，恩来同志，我是怎么上台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自己要上台的，我知道我的经验不足。”周恩来说：“个人的得失就放到后面去吧。要说起责任来，我的责任还小么？”就这样，博古勉强同意开会。

应当说，把会议提到日程上来，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的，是周恩来的事。周恩来回头又找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交谈，征求怎样把会开好的意见。他在找毛泽东交谈时，在说了他对会议的一些想法之后，说到了博古对开会的勉强态度，也说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情。他说：“泽东同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准备通过会议的总结，请求中央解除我在党内军内的职务。”毛泽东好久没吭声，只是轻轻地笑了笑。周恩来说：“这并非戏言。”毛泽东这才说：“恩来同志呀，你赞成开这个会，操心这个会，是很好的。这个会当然是应该开的，非开不可的。但是，你们是这么一种情绪，这么一个精神状态，这个会还怎么开呀？倒好像是他博古的气比我们的气还大了，这不合适吧？你们这些读洋书的，真还有点特别。一会是一省数省的胜利，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会又是不干了，撂挑子。唔，你讲的这些，倒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会到底怎么个开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是得有所考虑才是。”周恩来说：“你说的对，包括我在内，确有这么一种心情，有些患得患失。但是，泽东同志，请相信我，我能够做到把个人的得失放到后边去。革命为重，错了就改。”他停了停又道：“泽东同志，你刚才说的会议到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倒是抓住了我心目中还没有怎么成形的主题。怎么样，谈谈你的想法吧。”毛泽东说：“你刚才讲的会议的主题，我听了还不怎么明确，似乎不够集中，请再说说看。”周恩来说：“主要是军事问题，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但也不能不涉及其他问题，比如政治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以及一些干部处理不当的问题，等等。”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我的意见，大敌当前，现炒现卖，只谈军事问题，就是你说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不谈其他，或者叫作基本上不谈其他。至于会议的开法嘛，当然还是要请博古同志主持。同时，为使大家发言有个中心，博古和你得起个头喽，是不是？”听了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周恩来的眼睛里有了闪光，说：“泽东同志，有你这几句话，我对开好这次会议也就有信心了。好吧，我再去给其他的同志通通气，作一点开会的准备。”

就在周恩来找人预告会议内容和开法的时候，凯丰（何克全）得知消息，也活跃起来了。他首先找到博古说：“现在不宜开这个会呀同志！他们是趁着进贵州、过乌江、占遵义这么一个形势，朝中央要民主，要权力的！他们到底会要开到什么程度，是难得说的。什么只谈军事问题，不可能。你要振作一些才好。”凯丰同博古同岁，一路去的莫斯科，又一路从莫斯科回国的。在28个布尔什维克当中，他是又一种类型的布尔什维克。理论上浅薄，又心术不正。打从回国进到中央苏区，他就没少琢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和权力。王明当初安排他做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共青团中央的工作，他为此还闹过一阵情绪。此后，他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博古联在一起，热衷于宗派。说到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害怕的不是什么军事上的成败是非问题，他害怕的是博古被轰下台。博古一下台，他的团中央书记也就到顶了，甚至不保险了。他接着进一步提醒博古：“问题还不在于毛泽东几个人，王稼祥、张闻天也在跟着他们跑。斯大林同志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博古的心情早已有些颓唐，他已无心阻止开会，他扬扬手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什么堡垒了，四中全会就有人在讲教条宗派；也不要讲不要开这个会，已经挡不住了。现在，需要有所准备的是，到底怎样看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到底是敌人的强大，还是指挥上的问题？巴黎公社失败了，德国革命失败了，马克思是怎么评价的？列宁同志又是怎么说的？不能说是失败了就是错误，何况我们并没有失败。我相信，总会有几个懂一点真正的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凯丰一听，茫然好久，说：“说的对，他们连胜败乃兵家常事都不懂的。我也找人交谈交谈。”

凯丰压着指头数，结果找到了聂荣臻，也许是看上聂荣臻当年也在莫斯科上过东方大学。他三番两次找聂荣臻，一谈就是半天，聂荣臻给他讲了不少“中国的仗不能像外国那么打法”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坚持要聂荣臻在会议期间支持博古。聂荣臻火了，说：“你听不进我的，我也听不进你的。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博古把什么都交给李德，我是支持毛泽东的！”

经过连夜的交谈和准备，政治局扩大会议终于开始了。

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人都住在城中心柏辉章（黔军师长）的公馆里，这里是红军的总司令部，会议就在公馆的二楼上开。有趣的是，博古和李德已经不住在总部，他们住在城边的一家地主大院里。周恩来曾经过问此事，总部管总务的同志回答说：“他们一路都喜欢在一起，就让他们在一起吧。”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议，后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列席会议，伍修权到会作翻译。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天的会议，博古作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周恩来作副报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博古的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就根本谈不上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来。

第一次会议开得懒洋洋的，第二次会议进入大会发言，气氛一下子便绷紧了。彭德怀打头炮，矛头直指博古的主报告。他说：“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还不错，恐怕也就是这一点不错。但是，不是叫作总结吗？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失败了？主报告说是敌人太强大，根据地太落后。请问，哪里的革命不是有强大的敌人？哪里不是穷得太落后才革命的？没有说到点子上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指挥上的错误，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短促突击，不能集中兵力，哪有不打败仗的！西进突围，搬家逃跑，行动迟缓，在湘江受到那样大的损失，这个责任完全要由中央来负，由‘三人团’来负！”

李德单独坐在靠门口的木椅上，前一天听了博古的主报告，就曾想，只要博古的报告能够通过，他也就不再吭声，完全做个旁听的列席者。此刻

听伍修权译说了彭德怀的发言，急性子的日耳曼人坐不住了。在红军指挥员中，李德最不满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伯承，一个就是这个彭德怀。在江西时，刘伯承曾经骂过他是“帝国主义分子作风！”他把刘伯承的总参谋长撤了。彭德怀说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他把彭德怀的军委副主席勾了。此刻见彭德怀把矛头指向了他，他叽里呱啦反驳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在于敌人过于强大；短促突击的战术之所以没有取胜，完全是由于前方指挥员执行上发生偏差！”

这可是火上加油了。洛甫发言，据理凭实，尖锐地批评了主报告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教训。朱德、王稼祥、聂荣臻、陈云、李卓然，全都开了火。朱德说：“华夫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结果丢掉了苏区，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转移时又是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当然是指挥上的责任，中央的责任！再要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聂荣臻说：“想起湘江战役，简直是一场恶梦！我很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失败的原因不能找到蒋介石那里去，要在自己身上找！”王稼祥说：“我很同意上边几位同志的意见。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要重新考虑。”陈云说：“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三人团’无疑要作些改变。”

刘少奇到苏区以后还是主管白区工作。会前洛甫给他打过招呼，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他本不想说话的。但此刻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的丢失，同白区工作这几年损失十之有九，在路线上完全是一回事嘛！他也激动和气愤起来，说：“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也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导致职工运动和党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以后，白区和苏区的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

博古开始还能坐得住。不管怎么说，牺牲了那么多的人，是令人痛心的。但此刻听刘少奇把白区工作的损失也拉了上来，并提出了整个路线的是非问题，他觉得这有些太过分了。

他脑子里有个“整个路线是同国际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他推推眼镜，侃侃说道：“我不能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在国际的帮助和历次重要指示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的危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建立了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有了30万铁的红军……如此等等，怎么能说是整个路线有问题？怎么能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就抹杀全党奋斗的功绩？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的言论有何区别？”

凯丰跟着吼道：“否定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能是机会主义！”

“这是拿别人的胭脂往自己脸上擦！”刘少奇起身反驳道：“井冈山的斗争，到第四次反‘围剿’，是取得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临时中央还在上海！”刘少奇的嗓音因气愤而有些发颤：“白区工作却是由于有临时中央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已经到了两手空空的地步……”

王稼祥补了一句，“苏区工作要好一点，只空了一只手。”

会议陷入僵局。毛泽东见势不妙，插进来作了近一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他说：“我是赞成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军事问题的，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别讲空了一只手，两只手，你就是七只手八只手，也得空！军事上为什么空了一只手？主报告强调的是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战胜敌人。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不强大？当然是强

大的，这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特点。问题在于引出一个什么结论来。是引出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来呢，还是引出革命的失败论来？在我们党内，有的人在理论上就是不那么一以贯之，他们时而看不见敌人的强大，进攻时打阵地战，攻坚战，同敌人拼消耗，冒险主义，说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就如何如何；时而呢，又是敌人太过于强大，不可战胜。他们在这两方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从主观上来找找原因，还以巴黎公社为据，说失败了也是正确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但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人内部不统一，有一些空子可钻，有许多的薄弱环节，这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又一个特点。有的同志也看不到这一点，于是便有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指挥上的平均主义，即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没法子，只好来个匆忙大搬家，逃跑主义。不要以为冒险主义同保守主义是不相容的，也不要以为保守主义同逃跑主义是不相容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解决这个战略问题，我们是什么错误都可能犯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加上不了解中国的其他一些国情，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是一定要犯错误的。博古同志的报告避而不讲主观指挥上的错误，我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掩盖错误，还叫什么总结呀，是不是还要继续去发展已经犯过的错误呀？我还想讲一点，我在行军途中同稼祥同志谈过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岂不就不是百分之百了，参了中国的东西了。是呀，你是在中国干这个事情，要求马克思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条一款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自己完全用不着去研究中国的实际，完全不需要提供中国的一点东西，这可能吗？列宁是这样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吗？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所以讲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密切相关的……”

王稼祥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战略思想不对头，战术思想更是一团糟。我只觉得，毛泽东同志说的，对在座有的同志也许生疏了一点。要是觉得生疏，是不是就不要管那么多的事了，下去好好读点书，挑子里好像还有几本A B C。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好好思考，眼睛里要有中国。”

周恩来接着发言。他说：“同志们，对于博古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的认识一样，也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不能同敌人相比，这是事实。由于中央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

我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我认为，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的进攻，使苏区有过很大发展的同志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我这里建议，毛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和指挥岗位上来！”

会议顿时骚动起来。朱德、刘伯承和各军团指挥员连声表示赞同。洛甫说：“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一定要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政治局的分工也应作出相应的安排。”

骚动中，博古似乎有些思想准备，他表现得颇为镇静，凯丰却是坐立不安，他脸色发白，眼睛发红，一会看看博古，一会又看看坐在门口闷头抽

烟的李德。

经过第三次会议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几项重要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党内决定军事问题的帮助者；洛甫负责起草会议决议，主要是归纳整理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毛泽东阐明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以及重组党的领导核心问题。

凯丰一直不服，他不仅在会上表示“保留意见”，会后还对博古说：“对所谓错误路线的批判，我是接受不了的，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当博古表示“局势已定，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以后，他还当着毛泽东的面斥责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呀？你顶多就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以一种“不与小人论道”的口气说：“你要是连《孙子兵法》都没有读过的，就自己去读吧，我是不会再给你讲孙子兵法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三次会议都是在晚上召开的，当时娄山关那边的战斗还在进行，白天有很多的军务要处理。李卓然是在会议中途从部队赶来开会的，彭德怀没等开完会，就飞马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关于新根据地的选择，根据已经发生的敌情变化，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是不是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寻找立足之地，他们的理由是：四川的人口、地理条件比贵州好，只要站稳脚跟，同4方面军取得协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大量调兵入川是不容易的。

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会议的口头赞成。

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在楼下的院落里透了透气，尔后想回到他的房间，放松下来好好睡一觉。他一脚踏进屋，却见王稼祥和刘少奇正在房间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什么，毛泽东问：“有紧急情况？”王稼祥说：“泽东同志，我和少奇同志对会议不满意哩。”毛泽东一听，心里禁不住格登一下，一时没有回上话来。王稼祥接着说：“我怎么觉得，像个半截子会议。”刘少奇说：“我也是这个感觉，深度不够，问题解决得不够彻底。”毛泽东说：“愿闻其详。”刘少奇说：“着重解决军事指挥问题，我能理解，可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政治路线上，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且不说军事路线将来还会发生偏差，白区的工作怎么办？”王稼祥说：“应当明确无误地撤消他们的职务，现在只说取消最高‘三人团’，这是不是说负总责的还是负总责，当顾问的还是当顾问？我们的意思是你要出来负总责，可你一再说，你做常委就行了，在军事上帮周恩来的忙就行了，这还是含含糊糊的，中央的核心领导还不是一目了然的。”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么说，二位还是不怎么信得过我老毛啦。”王稼祥说：“嗨，就是信得过你老毛，我才嚷着要抓紧开这么一次会嘛，这也算是在党内搞了一次冒险主义。”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不行，太全面了不行，太深了也不行，太断然了也不行。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了，既解决了大问题，又不致震动太大。我们正面临着多路敌人，内部的事情不能占用我们太多的精力。政治局扩大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全面解决党和军队的问题，至少要开一次中央全会，可现在做不到不是吗？至于是不是要宣布撤消几个人的职务？就说李德吧，人家本来就是个顾问，你撤了还不是个顾问？人家是国际派来的，连个顾问都不让当，中国同志是不是太小气了？蒋介石还用德国顾问哩。至于博古，你把最高‘三人团’取消了，他也就无权让李德指挥一切了，这就行了嘛。至于他在党内还

有多大的权力，还能说些什么话，他自己不会不知道吧？主要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其他的事情，让他们说说话也没有什么坏处。少奇同志说到白区工作路线问题似乎没有解决，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但是，由军事路线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是可以折射出白区工作上的问题的。我赞成你在会上说的，白区工作主要是‘左’倾冒险主义。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暂时不要在决议上写，你写了，军事的，政治的，都有了，组织上也动了这么个手术，人家就会说啦，你怎么背着国际干这么大的事呀，你这些事情合法不合法呀，何必去找那些麻烦！王熙凤协理荣国府，弄权铁槛寺，不是还要讲点王法么？怎么样，想得通想不通呀？”王稼祥说：“你老毛的脑子就是要全面一点。只是，那个凯丰是不是就不要到9军团去搅和了？罗炳辉很烦他。”毛泽东说：“凯丰这个人要不给你添麻烦，恐怕是很难的。他可以不去9军团做党代表，你总政治部主任可以提出这样的意见。但是，还是不要宣布撤职，你撤了他，他又会说，你怎么只撤了我呀？我是不理会打仗的事的，怎么挨撤的是我呀？弄得你倒像输了理给他似的。”刘少奇频频点头，说：“说得对，说得对，这些事情你都考虑得很周到。”

我没什么讲的了，休息吧。”

王稼祥和刘少奇正要出门，贺子珍挺着大肚子出现在门口。

刘少奇说：“子珍同志，这么晚了——”

贺子珍说：“我就知道，你们也早不了。”

王稼祥说：“我们就别打搅了吧。走。”

王稼祥和刘少奇出门，贺子珍走进屋，毛泽东说：“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警卫员也跟你休息不好。”说着，觉得不够情份，又连忙改了口气说：“对对，既然来了嘛，就请坐吧。子珍啦，现在会开完了，我可以告诉你了。这个会开得不错，大家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要我进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军事指挥问题。请注意，就是这么个角色。”

可以了，军事问题算是解决了。在这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不错，明智通达，转变得快，得到大家的谅解。洛甫、稼祥也很支持我。刚才我还在跟稼祥和少奇同志说，只解决军事问题，其他的事情基本不谈。这样，主动一些，少一些麻烦事。看来，原来同志是很赞成这样做的。子珍啦，以后的担子更重了，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生孩子的事情，请傅连璋多帮忙。”他说着，见贺子珍站了起来，问道：“你怎么了？”贺子珍说：“我走了。”毛泽东说：“既然来了，怎么又走啊，几个钟头天就亮了。”贺子珍说：“有你刚才的这几句话，我就能睡着了。你休息吧，我回我们的驻地。”毛泽东又想起了贺子珍在黎平山上的那次细言相劝，说：“别以为我这是叫你的枕边风刮的，就高兴得都不想在这里住了。不，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走，我得在你跟前睡个好觉，我已经好几晚上没有睡好觉了。”

贺子珍一腔情怀，莞尔一笑说：“好吧，我把警卫打发走。”她把手放在隆起的腹部：“让我们3个人好好休息一下……”

第十回 蒋介石山城起战云 毛泽东饮马赤水河

话说蒋介石正得意于薛兵团进驻贵阳，即可在黔东南形成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圈时，忽闻“共匪”越湘黔路，过乌江，占领了遵义，有如惊梦一般，他一口气憋在胸口，好久没能吐出来。

“这个薛岳是怎么搞的嘛！是怎么搞的嘛！”见在座将领都闷头不吭声，蒋介石才彻悟到：娘希屁，还不是自己急于“图黔”，令薛岳的8个师星夜驰赴贵阳，无暇顾及匪之北窜而造成的么？他坐下，把头靠在高靠背上，小眼睛扫着在座将领：“你们说，这件事情会对各方面有些什么子影响吧？”陈诚自然理解委座说的影响指的是什么，嗫嚅道：“影响也许多少会有一些的。”蒋介石轻轻一笑，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喝道：“明摆着，朱、毛残匪所以能越过湘黔路，完全是黔军下层的昏庸无能！当然，薛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薛岳发个报，并通电‘围剿军’各路首要：薛岳匆忙进贵，放松湘黔要道，致使共匪越过湘黔路，北渡乌江，又陷遵义。为将者当予军中自责……”在座将领都明白委座的意图，也都赞成如此勾当，唯其如此，才能掩人耳目，推卸责任，安抚川、滇、黔地方势力。

在各路“围剿军”首要中，最先识破机关的是广西的李宗仁。李宗仁在南宁阅通电后哈哈一笑说：“贺国光在重庆宰鸡（处置侯之担），蒋先生在南昌杀猴；猴者看鸡，鸡者看猴；属鸡属猴，还是好自为之为妙。”有见于蒋介石的明枪暗箭，作为对蒋介石“通电”的回复，李宗仁相邀白崇禧和陈济棠，共同向蒋表示：“愿以北伐精神，积极策进剿共，贡献委座，拥护中央，决不含糊推诿。”事有蹊跷的是，李、白、陈的“表示”是通过薛岳赴南宁联络团团团长萧文翥转告薛岳，又由薛岳电告蒋介石的。

情况是严重的。对于滞留遵、桐地区的中央红军，蒋介石作了4种可能的判断：一是东向湘鄂西与贺、萧会合；二是西窜进入金沙江以西地区；三是北上入川同徐、张合股；四是盘据黔北地区，向东策应贺、萧股，向北策应徐、张股，企图在川湘黔联成一片。“现在看来，朱、毛窜匪再图东向湘鄂西只是一种可能性了。”蒋介石在他的最高军事决策会议上说：“而且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了，朱、毛要是决心东向湘鄂西，就无需渡乌江，贺、萧一股也就不会东向常德地区，而应向黔东北策应。他们也不大可能西窜进入金沙江以西地区，那是石达开走过的一条全军覆灭的路。从他们目前向北伸向桐梓、松坎的触角看，大有可能是企图北进入川，在川南渡江，奔徐、张的大头。因此，诸线皆防，亦防亦围，但重点似应放在川南长江一线，把他们限制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然后实施大军合围，聚而歼之。”何应钦、陈诚等都很“赞成”委座的判断和决心。何应钦说：“川北徐、张一股，是目前共匪中最为人多势众的；刘湘的‘六路围攻’又一塌糊涂，徐、张正得势于一时。委座决断英明，朱、毛是要奔他们的大头，这一点，我们以往似乎估计不足。然而这一来，局势便有些严重了。一则蜀道维艰，易守难攻，便于他们立足，川军屡战失利，当中就有个战场地形问题；再则，川军内讧久治难愈，中央军进川虽有‘南京会商’的协议，但真要付诸实施，仍难免有所碍难的，而光靠川军，对徐、张一股他们就已经无可奈何。因之，在黔北、川南解决朱、毛一股，当为上策，不能再失良机。”陈诚说：“在黔北地区解决问题，尽管黔军王家烈部不大得力，但总起来看，我方条件比在江西、湖南要好得多。以往在这边，南边的粤、桂方面漏洞太多；在黔北，这种状况有可能完全改变过来。川、滇、湘、黔各路大军，加上薛岳兵团，是可以形成坚实的合围的，兵力也可大大超过以往，更不用说还有长江天险

了。”陈布雷更从政治上论证了委座的决心，他说：“让他们联成一片，害莫大焉！一当他们联成一片，川省联着大西北，他们就有可能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俄，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不知道薛岳的进驻贵阳，到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

且说1935年1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突发号令，率领一帮将领，由南昌直飞重庆。

宋美龄从南京赶到南昌，竟没有赶上“大令”的座机，气得她在机场上抹泪直骂：“他心里头只有共匪，没有我了……”

蒋介石在重庆菜园坝机场走下飞机，川军各路要员都来不及赶到机场接驾。贺国光解释说：“委座，时间太紧迫了，刘湘及各军长想在黄山会合后再往这里来。”蒋介石来了一点小幽默：“等他们会合了，朱、毛同徐、张已经在四川握手言欢了。”

第二天，蒋介石便在黄山召见川军各路首要。到会的除刘湘、贺国光，还有潘文华、杨森、唐式遵、范绍增、孙震、李家钰、王陵基、罗泽洲等，成都的刘文辉、邓锡侯也连夜赶到了。蒋介石一看川将阵势，心里倒有几分高兴。川军的7个军都还在，“这不是又一道长江防线么！”

说是召见，其实是一次作战会议。这天，山城浓雾笼罩，蒋介石在会上，掀得战云滚滚。他说：“现在看来，朱、毛赣匪北窜四川的图谋是明显的了。非同小可呐，诸位。朱、毛赣匪并非普通的一股匪众，而是他们的中央，他们的首脑！一当他们窜犯四川同徐、张一股会合，这四川还是你们的四川吗？这个话我在南京的时候同甫澄兄讲过的。甫澄呐，你能证明我讲过这个话吗？”刘湘起身答道：“讲过的，讲过的。”蒋介石接着说：“能证明就好。本人在南京同甫澄兄会商，据说在川各军尚有微词，现在怎么样，该领会中央的诚意了吧？当然，我们当时也还不能完全肯定窜黔的朱、毛赣匪就要北窜四川，估计他还有可能东向湘鄂西。可是，他们就是迟迟不东向湘鄂西，而要北窜四川，足见他们是早就看上你们四川了。这一仗怎么打？本委座的意思是，要在川南、黔北解决问题，最好在黔北解决问题。

这就需要各路大军的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聚而歼之。各守地盘，自己不敢打出去，也不让别人打进来，那是不行的。到底怎么打法？中央明天将要制订出一个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的围歼计划。主要部署，请何应钦给你们讲个大概。”何应钦起身道：“此事由于委座在南京便有预见，刘总司令回川后便作了些部署，主要思路是很好的；只因当时敌情还不甚明朗，使用的兵力还不够。”他说着提鞭指着地图：“遵照委座意图，潘文华‘川南剿总’驻泸县，以21军主力及所属各旅，在赤水、古蔺、叙永一线布防堵截；龙云部以孙渡为前敌指挥，率部由滇入黔，封锁横江一线；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追击；上官云相由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一带；薛岳的周浑元部渡乌江至黔西、大定侧击；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机动。总共各路大军150余团，50万部队。这是委座决心之要点。”

川军将领们都目瞪口呆了。有人在啧啧感叹：“这是一次大会战啦！”只有王陵基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的‘六路围攻’也是浩浩荡荡的一百几十个团。”

蒋介石见众将领雀跃了片刻又沉静了下来，说：“甫澄兄，这回你们是要辛苦一下了。”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湖南的何键、刘建绪，因为还有个贺、萧一股的问题，暂时还不能动他们。你们这边呢，还有徐、张一股，是几股中最大的一股。甫澄兄的意思是，除 2 1 军和直属各旅外，在川其他各军目前主要任务是堵剿徐、张一股，这样的部署，我看是可以的。但要补上一句，各军都要有候命加入南线作战的准备。另外，考虑到甫澄兄要腾出手来重点对付南线，北线各军的行动可以由唐式遵来协调。这样一来，诸位，便有这么一个问题了：你们似乎处在南北夹击当中了。是这么一个形势呐。要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形势，本委座也就不必这么匆忙来麻烦大家了。我希望大家都以党国利益为重，同心协力，捐弃前嫌，一致对敌。本委座将在重庆就近指挥军事，希望你们当中，不要有像侯之担那样的软弱货。都听明白了吗？”

众回答道：“听明白了！”

贺国光宣布召见结束：“各军具体行动请照围歼计划执行……”

重庆黄山公馆，座落在长江南岸高达 1 5 0 0 米的黄山之巅，向后看，丘林山色，田野农家，倒也平常；向前看，却是深沟巨壑，整个山城尽收眼底。这天傍晚，天气转晴，蒋介石独自走出公馆，向右沿着一条小路走出 5 0 多米，便来到了一处阁楼式的观景台，他坐在那里，尽情地观赏着山城景色。他还是头一次来重庆，想不到人称山城也叫雾城的重庆，竟是这样的险峻、隐蔽而又水陆通达，怪不得川军总是那么自傲自负，难以驯服了。他此刻是不是想到了几年之后他将在这里运作半壁河山？不得而知。他只觉得这地方不错，公馆该叫贺国光重修一下……他从眼前的黄山，想起了江西的庐山，想起了军官训练团，想起了冯·赛克特，想起了冯·赛克特的堡垒推进，“在黔北，是不是也……”他正这么想着，贺国光匆匆走上前来，报告说：“委座，刚才接到情报，共党最近在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重新上台指挥军事。”蒋介石像是没有听清贺国光的话，茫然道：“什么子，毛泽东重新上台？”不等贺国光答话，何应钦和陈诚走了过来。何应钦说：“委座，看得出来，共党内部很不太平呐。我们第五次‘围剿’的得手，似乎是……”蒋介石这才恍然有悟，嗫嚅道：“毛泽东重新上台……怪不得赣匪前一段乱了手脚，我还以为是朱、毛江郎才尽了，原来他也搞了一段下野……此事，你们作何评价？”何应钦说：“我们也是刚才听国光兄说起。情报看来是准确的。朱毛朱毛，前一段其实是有朱无毛；我们不能低估毛泽东的复出。”陈诚说：“毛泽东的复出，当与湘江之战有关，他们有可能吸取了湘江惨败的教训。败军的再起就在于总结失败的教训呐。”蒋介石问贺国光：“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下野的，搞清楚没有？”贺国光说：“共党的上层活动，一向严守秘密，连他们自己也是不轻易泄露的。要是可以猜测一下的话，我想，毛泽东的下野很可能发生在一年前。”蒋介石又问：“何以见得？”贺国光说：“委座的‘朱、毛江郎才尽’不是在一年之前感觉到的么？所谓‘朱、毛江郎才尽’者，就是毛泽东不在其位，在匪党中说不起话了。委座也许记不到了，我是记得的，一年前委座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训话，就有过‘朱、毛江郎才尽，赣匪穷途末路’的妙语珠言。”蒋介石“哧”了一声，说，“你贺国光搞我的情报倒还可以，搞共党的情报，恐怕就不怎么行了。但是，你刚才的猜测倒是不无道理。我也想起来，一年前我是讲过这个话。只是，感觉总是迟后的。因此应当说，毛泽东的下野似乎还要早一点，也许是前年的下半年？既然如此，我们也该总结一下，把决心下狠一点了。敬之，辞修，是不是把冯·赛克特将军接来重庆一趟？”何应钦问：“委座的意思是……”蒋

介石无言地踱着慢步，他在反复地掂量着毛泽东复出的份量，回味着他在战场上所体验过的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他想来想去，找不到对策，思路还是回到了冯·赛克特。他说：“毛泽东是搞运动战的，讲究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针对这个东西子，趁他们现在还滞留在遵、桐地区，冯·赛克特将军的堡垒推进，还是用得着的。就是不能让他们运动起来，不能让他们运动起来……”何应钦说：“委座，恕我直言，堡垒推进对付运动战，不无它的长处。但现在恐怕来不及了。黔北共匪既然决心北窜，他就不可能等到我们修好碉堡再付诸实施。再说，即使要搞堡垒推进，也得围而后筑，一当他们窜离遵、桐地区，就有可能造成围而不严的状况。”

因此，卑职意见，马上下达作战命令，把他们先围起来再说。”蒋介石思虑片刻，一个“围”字，又对了他的思路。他说：“敬之说得对，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围而后筑，边围边筑，再聚而歼之。”

何应钦和陈诚匆匆离去。蒋介石还留在观景台上背手踱步。毛泽东的复出令他愁绪万千，他又想起了前几年有人逼他下野的把戏，不由得独自吟哦：“娘希屁，毛泽东也下野又复出，毛泽东也下野又复出……”

且说中国共产党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因避开了政治路线问题，在组织处理上只是取消了最高“三人团”（有文字说撤销了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那其实是不确的。李德只是不再参与军事指挥，会后他自己要求到1军团去体验部队生活），既解决了领导核心问题，结束了“左”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又震动不大，中央领导集体是稳定的。因此，当得知蒋介石即将调动150多个团大举向黔北地区围歼而来的情报后，几个常委讨论是否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的时候，包括博古在内，一致同意改变原决心，迅速北上，渡赤水，过长江，去四川。

中央红军1月19日撤出遵义，兵分三路北上。1军团由桐梓集结地西进，3军团经仁怀向北，5、9军团和军委纵队随后跟进。第二天，中央军委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同一天，又分别致电4方面军和2、6军团，令4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南下，威逼重庆，牵制川敌；令2、6军团积极向东出击，威胁长江交通，牵制湘鄂之敌。

就这样，一个要大举合围聚歼，一个要大踏步地前进；一个气壮如牛，一个用兵如神。

于是，在黔北的山山水水之间，便演出了中国近代内战史上的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四渡赤水之战。

1月20日，林彪的1军团由桐梓、松坎出发西进，经石壕、温水、良村，途中只有两次小的战斗，24日便顺利地抵达土城。尔后，在由土城向赤水县城挺进时，在距赤水县城15公里的黄陂洞，突与川敌章安平旅遭遇受阻，经激烈战斗，竟不能打开前进的通路。林彪连夜向毛泽东报告失利的消息。毛泽东没大重视先头部队的失利，他不相信林彪对付不了一小股川军，仍命令1军团继续向赤水县城前进。

军委纵队在由习水向土城开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来到距土城数里的黄金湾。毛泽东举目附近的地形，看到两侧有高地，中间一条大路通过一片浅丘，遂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说：“地形不错，打一仗怎么样？”朱德说：“据现在掌握的情况，尾追之敌是川军的两个旅4个团，距我们一天的路程。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我看可以打一仗，试试川军的战斗力也好。”毛泽东问：“川军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呢？”刘伯承说：

“徐向前在川北一举破了刘湘的‘六路围攻’，川军的许多部队都是重新组建起来的，估计战斗力好不到哪里去。”毛泽东说：“我也正是这么想的。怎么样，我们就来打一次狗吧。”当即决定，以彭德怀3军团的3个师和董振堂5军团的两个师，在土城以东屋基坝、黄金湾两侧占领有利地形，由彭德怀统一指挥，待机夹击尾追之敌，给刘湘一个迎头痛击。

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到3军团，刘伯承到5军团。毛泽东和周恩来继续前进到土城，在土城西北侧的白马山半坡上设立总部指挥所。

果然，28日早晨，尾追之敌4个团进入红军的预设地段，战斗当即打响。然而，经半天激战，发展不顺，战果不能扩大，敌人越打越多，两侧的高地还有的被敌人夺了去。毛泽东正焦急着。他是很想打好这一仗的，这是他重新指挥军事的第一仗。这时，朱德回到总部指挥所：“老毛，敌情判断不确啦，不是4个团，而是8个团，上万的敌人！”毛泽东一听，脸上更显焦急，问朱德道：“是不是郭勋祺上来了？”朱德说：“正是，模范师，装备不错，连有机枪，团有迫击炮。”毛泽东沉思片刻，给身边的参谋人员说：“命令1军团停止北上，立即返回增援！要陈赓、宋任穷的干部团投入战斗！”参谋应声去传达命令。毛泽东跟朱德说：“朱德同志啦，这一仗打不胜，也不能打败呀，山那边就是赤水河，我们是背水一战嘞！”朱德说：“说的正是，这一仗是不能打糟的。我到前边去吧？”毛泽东猛抽着烟，不置可否。朱德明白，“老伙计”不让他再到前边去，便一摘帽子说：“得喽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这是遵义会议后的头一仗，打好很要紧的。”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等听说朱德要披甲亲征，都走出屋来。朱德说：“送我老朱上前线吗？礼重了，礼重了。”毛泽东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朱德走后不久，远处传来一阵急骤的枪声和手榴弹声，稍后，一个骑兵通信员飞马来到总部指挥所，向毛泽东报告：“首长，总司令要我向毛委员报告，干部团好样的，一个反冲锋，把敌人打退了，夺回了原来的阵地，又继续往前打过去了。你能转告毛委员吗？”毛泽东这才松了一口气，说：“谢谢，谢谢总司令。恩来同志，总算不会太糟了。”骑兵通信员接过周恩来递上的一碗水，道了声“谢谢”，又说，“瞧你说的，有毛委员指挥，能糟到哪里去！”毛泽东说：“我就是毛泽东呀。小鬼，你是哪个团的呀？”小家伙怔了半天，说：“那正好，不要转告了。我是我们陈团长陈赓的警卫员，小名陈天柱。”毛泽东“哦”了一声，笑道：“你这名字还小呀，天柱，天塌下来你是根柱子嘞！”小家伙“嘿嘿”笑了笑，想走又舍不得走，说：“其实，这是陈团长跟我闹着玩哩，名字是他给改的，原名叫狗儿，陈小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乐了。通信员飞马而去。毛泽东说：“好样的陈赓，可以当军长！”周恩来说：“将来会有他军长当的。”战斗相持到下午两点，跑步回援的1军团2师赶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方才击退尾追之敌，郭勋祺的模范师才不得不退守平川地带。

这一仗，3军团和5军团损失较大，3军团团长欧阳鑫、1军团团政委赵云龙牺牲。川军方面“伤亡官长百余员，士兵约3000名，为川军剿匪以来未有之激战”。

土城一仗，揭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序幕。

就在白马山总部指挥所，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开会。毛泽东说：“既然郭勋祺上来了，川军的其他各部也不会远了；他既然深入黔境作战，长江江防更会预有准备；川军的战斗力也还是不可轻视的。根据

这个情况，由赤水方向前进，在宜宾、泸州之间渡江似有不宜。有必要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这样，也不宜在这里同郭勋祺恋战，恋战必有祸事。我的意见，渡赤水河西进，第一步向叙、古方向，能否在那边寻机渡江，到时再议。”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道西进。会后，周恩来亲赴赤水河指挥架桥，陈云带领卫生、供给部门人员，安置伤员，处理笨重物资。一夜之间，赤水河上的浮桥便架通了，部队也轻装了许多。第二天，天未过午，除9军团在青杠坡方向打阻击外，1、3、5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都渡过了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前进。

毛泽东饮马赤水河。他找到林彪说：“林彪啦，你留下个把团在这边跟敌人兜兜圈子怎么样？南北东西由他们，跟主力保持三两天路程的距离就可。”林彪问：“迷惑敌人，隐蔽主力意图？”毛泽东点了点头。林彪说：“好吧，我就要3团来干这个事，他们就是喜欢东钻西窜，偷鸡摸狗的。”毛泽东瞥了林彪一眼，飞身上马说：“我告诉你林彪，可不要把你的部队惯坏了。”

林彪这里说的红3团，曾8次渡过赤水河，走的路，打的仗，比哪个部队都多。这是后话。

第十一回 扎西道上贺姐遗幼女 贵阳城里众将怀鬼胎

话说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再向北进入古蔺县境时，川军方面的敌情更加明朗了。刘湘的30多个团已全部在赤水、叙永、古蔺一线到位，严密封锁了长江；江津至宜宾的北岸滩头，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都在蒋介石“围而后筑，边围边筑”的严令下，赶筑了堡垒和工事；各县民团和地方武装，也全都动员了起来。一时间，整个川南兵马尘飞，民不堪虐。根据这个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实行机动作战。2月3日，朱德发布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当面之敌，由川南之古、叙隐蔽折向云南扎西地区，一则集结休整，二则待机破敌。

扎西，古老的小城镇，座落在川、黔两省间的偏僻山地里。不熟悉地理的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总是顿生迷雾：红军刚才还在古、叙地区，怎么一下子就跑到云南去了？实者，这里离昆明那边的云南还很远很远，离川南倒是很近的，只有一两天的路程。扎西，地形隐蔽，历来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中国人的习俗，到那边过年去吧！”毛泽东说。周恩来说：

“好主意。贵州打仗，云南过年。”

在向扎西集结途中，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找到毛泽东说：“土城一仗没打好，北渡长江又发生了困难，有的人未必有正确的看法啦。他们会说，你们说我们不行，你们的又怎么样呀？要是东向湘鄂西，说不定现在已经在开会师大会了。”毛泽东问：“果然有此说法么？”张闻天说：“李德不是又回到军委纵队了？他是有此议论的。其他人会不会有反复，难得说。反复倒不怕，就怕吵起来耽误事情。而且，我总觉得，遵义会议上组织问题解决得不透。名不正，则言不顺，办起事来还是疙疙瘩瘩的。事实上，博古再领导下去也很困难，已经没人听他的了。”毛泽东一想也对。本来，博古至今没有交出中央的那付“挑子”，只是暂时的一个妥协。便说：

“你的意见可以考虑，我再同恩来同志商量商量看。不过，说到他们思想上可能有反复，想算算帐，那也不要紧。人家当初不让我们说话，我们现在不让人家说话，不好。不管怎么说，他们总不会希望我们打败仗吧。要是那样，机会主义前头的那个‘左’字就该换成另一个字了。”张闻天说：“是呀，左，总是有可爱的一面的。”当天，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说：“洛甫要求变换领导，你看怎么办啦？”周恩来说：“说的是博古不该再负总的责任是不是？这是势所必然的。你看，谁来负总的责任好？是不是就是……”毛泽东没让周恩来说下去，接上说：“我看，我们几个都有个军事指挥问题，事情够多的了；全面工作，是不是碰个头，就让洛甫来做。”周恩来原本的意思是让毛泽东“一肩挑”，从组织上彻底解决领导核心问题，听毛泽东这一说，他也同意了。

2月5日，政治局常委碰头分工，洛甫正式接过了博古的那付专门装中央印章和文件的“挑子”。博古说不上痛快，也说不上不痛快，他只说了一句：“我正想轻装哩。”洛甫倒是有些惶惶然：“我可不是要来当这个挑夫的呀……”

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完毕，中央军委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教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敌变我变的指导原则。他说：“黄陂洞一小仗，土城一中仗，打的是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以为是4个团，实际是8个团；红军说是5个师投入战斗，实际是5个团，当然就力不从心了。二是轻敌了，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三是不该让1军团继续北上，分散了兵力。总起来是判断有误，指挥有误，都是我的责任，今后要力戒之。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来到这扎西，一方面摆脱了一些敌人，川军和黔军有所收缩；同时也会吸引过来一些敌人。敌人收缩，有个地域问题，还有个年关问题。何时能把敌人吸引过来，也同这个时值年关有关；蒋介石也还需要一个间隙来想一想的。但不管怎样，收缩也好，再围上来也好，长江防线他们是不会放松的。因此，要在当面渡过长江，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了。所以，我们还得准备走长路，准备走更难走的路，准备在川、滇、黔打更多的仗。为此，我们要抓紧办两件事：一是部队要整编，各军团能编师的编师，不能编师的编成团；要说服干部，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干部要当兵。实兵实将，打起仗来才好指挥，才能如实估计自己的战斗力。第二，军委纵队和各军团要进一步轻装，该用的还要狠心甩掉。要更加便于机动。时间会来得及的，刚才讲了，年关嘛。怎么样，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分工抓一抓，有关同志是不是明天就拟出个细则来？”

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和刘伯承说：“我们马上拟出细则来，今晚就定下来。”毛泽东轻轻地不太自然地笑了笑，说：“这个整编、轻装的问题，我那个贺子珍倒还抓得紧，做得也还不错，前天晚上在半路上轻装了。”在座都愣了愣，周恩来问道：“生啦？”毛泽东说：“生了，托付给老乡了。”

开完会，已是半夜。高寒山区，冬季大雪。这天晚上，扎西城里又是一个飞雪之夜。春节已过去3天，但这天晚上，古镇却像年卅似的，满街热热闹闹，红军战士在给老乡挂灯笼，打扫卫生，清理积雪，人来人往地在分粮食，分盐巴，分浮财。热闹中，周恩来穿过小街，他兜里揣着4个鸡蛋，

他挤空儿要去军委纵队休养连驻地看望看望贺子珍。他在街心停下脚来，又向街沿跨了一步，问正在挂灯笼的战士：“你们也糊了红灯啊？”红军战士说：“我们哪有钱买这红绸红纸啊！前两天，不是在这里打了个小仗吗，老乡没有过好年，现在给他们补起。”周恩来连连点头，说：“好，好，应该这样。”战士不认识周恩来，说：“你别光说好好好呀老表，把梯子给我搬过来。”周恩来扭头往墙根瞧，灰暗处果然有块像梯子一般的大木头靠在墙上，上面锯着一个个的缺口。那家伙看上去重不说，他怕打了兜里的4个鸡蛋，一犹豫，那战士吼道：“你倒快点啦，手都举累了。嗨，瞧你那一脸胡子，一看就知道你们的连长指导员不怎么样。”周恩来没回嘴，一边护着衣兜，一边手肩并用，把那块大木头砍成的梯子给战士扛了过去。刚放好，警卫员魏国禄追了上来，才悄然把他拉走，边走边说：“半夜了，去哪呀？”周恩来不吭声，只朝前边扬手。那个战士还在后边嚷嚷：“懒虫！连老百姓过年的事都不热心，就悄悄地走了……”

周恩来叫那个战士数落得心里很舒服，走远了才摇着头跟警卫员说：“李富春昨天在禹王宫军民大会上的讲话很有效果啦……”说着，他又停下脚步：“哟，什么时候了，他们都睡觉了吧？”警卫员魏国禄说：“既来了，就走吧，说不定今晚也在过年卅哩。”在警卫员的护送下，周恩来来到休养连的住地，轻脚走进小院，只见院内的雪地里有人影在走动，把地上的雪踩得“嘎吱嘎吱”响。他走近一看，是毛泽东。“泽东同志，是你啊，怎么不进屋？”毛泽东伸了个指头到嘴边：“人家在告状啦！等告完状再去请罪不迟。”周恩来问：“怎么回事？”毛泽东说：“贺子珍轻装的时候我没有去……不，去是去了的，就是没进那扇门。帮不了什么忙嘛，有傅连璋在嘛。错就错在轻装以后也没去看她。这不，找老师告学生，还不一告就准。”周恩来说：“我有办法，给！”连忙从兜里掏出4个鸡蛋来递给毛泽东：“一个鸡蛋消一口气，能消4口气。”

毛泽东喜出望外：“嗨，这可帮了大忙了。走，上朝！”

毛泽东和周恩来“嘎吱”推开门，只见贺子珍同徐特立在油灯下小声说着什么。贺子珍头上缠着一块青布，一脸腊黄，但眼睛却比先前有神多了。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到，她先笑着喊了声“周副主席！”当扭头朝向毛泽东的时候，脸一下便板了：“你来干什么？”周恩来给毛泽东递了个眼神，说：“子珍啦，我今晚是跟泽东同志来看你的呀！”毛泽东连忙掏出4个鸡蛋来，捧在手心说：“一点不假，鸡蛋为证。一个鸡蛋消一口气，4个鸡蛋消4口气。要是还消不了，明天再弄几个来，直到消气为止。”贺子珍噗哧笑了，说：“你们男人啦……要说生孩子该吃鸡蛋倒是的，可要说消气，鸡蛋是硬的，越吃越难消。徐老，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你就评评这个理吧。”徐特立说：“润之啦，子珍也没说别的，就是孩子生下来以后，要留下来，她想听你一句话，你是孩子的爹哩。等了您一天，不见人，她就只好自己下决心，把孩子托给老乡了，可孩子叫人抱走以后，又怕您责难她，这不，就同我说说，要我劝劝您，也想开点。”毛泽东冷丁想起前几个孩子生死不明的命运，生为人父，一阵难过，有话想说竟没有说出来。周恩来说：“我们正在进行艰苦的革命战争，没法子呀，子珍同志做得对。我们刚才开了个军委扩大会，讨论了部队的整编和轻装的问题。泽东同志还在会上表扬了子珍同志，说轻装得好，轻装得彻底。子珍同志完成了一件大事。孩子留下来比带着走好，有朝一日，我们再来接她就是。”贺子珍抹了抹母亲的泪，见男人们都不责难她把孩子

丢下，她心里也轻松多了，说：“周副主席，孩子的事说到这吧，我再提个意见，也是个要求。”周恩来说：“说吧。”贺子珍说：“周副主席，我现在不是个大肚子女人了，不能再当休养员了，我要工作。”周恩来说：“当然，在来的路上我就想了想的，你就做休养连的连长兼支部书记吧。女同志都在休养连，这是一；第二，休养连是半个苏维埃。目前最紧迫的是整编和轻装，你就抓抓这方面的事，你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大家。说服大家准备走长路，走很难走的路，准备打些大仗。泽东同志，你的意见？”毛泽东的嗓门儿还堵着，只是说：“大江看来是过不去了，要准备过很多的小河。”贺子珍见毛泽东不再阻拦她参加工作，脸上掠过一丝笑容，说：“好的。你们就放心吧，我会好好干的。”徐特立脸冲毛泽东：“赶上停了下来，还是坐几天月子吧？”毛泽东挪近贺子珍，伸手把贺子珍头上松下来的青布掖了掖，说：“这是女人的特权，我们不管……”他说着站了起来：“走吧，恩来同志，伯承还在等着我们看他的整编方案嘞。”

毛泽东和周恩来刚要出门，叶剑英匆匆从雪地里走来：“刚截获的敌电，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任命龙云为2路军总司令，统领7路纵队，薛岳为前敌总指挥……”

周恩来说：“重新组合？变化不小啊！”

毛泽东沉思道：“龙云为总司令，龙云……唔，贵阳城里有好戏看了。走，详细谈谈去！”

屋子里只剩下徐特立和贺子珍。徐特立说：“原谅他吧，他现在身上的担子不轻”。

贺子珍匆匆下了床，她赶到门口，伫立在门框旁，望着白茫茫的一片……

且说蒋介石也从重庆回到南京过年了。当他得知朱、毛红军窜到云南扎西去了，心里又高兴又气恼：“娘希屁，流寇！完全是流寇！道之啊，土城一仗打得不错，川江防线守得也好，看得出来，川军比黔军强多了。”侍从室主任宴道刚，黄浦出身的年轻将级军人，见校长“娘希屁”起来，连忙跟上：“这就好办了，东、南方向有我中央大军，北面有长江，西面是大雪山，他还能往哪里窜啊？这完全是校长英明决策的胜利！”蒋介石说：“说的对，成功在此一举，不能再拖延下去。”

叫何应钦、陈诚、陈布雷即刻到我这里来。”

何应钦、陈诚等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大厅，蒋介石说：“打搅你们了。年要过，仗也是要打的。让道之给你们通报一下敌情。”宴道刚说了“敌情”后，蒋介石说：“你们说，这回的时机是不是比哪回都好？集中在一个偏僻狭小的地域，战场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为了更加有效地最终解决问题，需要调整一下部署，重新区分一下任务，以免互相掣肘。我的意见，把投入‘围剿’的部队统编成三路大军：任命何键为第1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专门对付贺龙、萧克的2、6军团；任命龙云为第2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付扎西地区这一股；任命朱绍良为第3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川陕地区的徐、张一股和徐海东的那个25军。龙云指挥的第2路军，为有效地剿灭朱、毛这一股，区分为7路纵队：以吴奇伟部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为第2纵队，孙渡部为第3纵队，王家烈部为第4纵队，李云杰部为第5纵队，郭勋祺部为第6纵队，李韞珩部为第7纵队。这样，7路纵队，二十几个正规师，就可以把朱、毛共匪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地区，聚而歼之。

你们认为怎样？”

何应钦说：“当然，这样就清楚多了，想必薛岳也会高兴的。”蒋介石盯了盯何应钦，说：“你是说，薛岳不做总司令会不高兴？”何应钦欲言却止。陈诚说：“我完全赞同委座的决策。只是，龙云做总司令，同是省主席的王家烈做纵队司令，也许会有些感觉的，是不是下个副总司令兼纵队司令的命令？”何应钦说：“也不好办。王家烈做副总司令，孙渡倒还好说，刘湘怎么办？”蒋介石说：“正是考虑到这些个事情，我想让道之作为我的特使到那贵阳去一趟，协调一下。”何应钦说：“这就好，这就好了。道之老弟同云南的孙渡还是老熟人，是不是？”蒋介石说：“那就下命令吧，道之随后赶到。”

且说蒋介石的部署和任命电报一到贵阳，薛岳看罢便跳了起来，“奶奶的，我薛岳从江西追剿到贵州，哪一时一刻没有卖力气？又是哪一柱香供错神了？我薛某是8个师的司令官，倒要屈从一个地方军阀，老子不干了！”他一掌击在桌子上，气得团团转。薛岳早就有气。湘江之战的功劳，记在何键的头上，这是一；第二，移师湘西，他本来就不太赞成，他是主张“让敌会合，免得画那么多圈圈”的，结果白修了那么多碉堡，搞得他的部队财空人疲不说，还怪他“目标太暴露，使匪避我他去”；更有甚者，他是奉命秘密“图黔”的，结果却落了个“仓促进贵，放松匪众”的罪名，通电令其“军中自责”。现在，他又成了一个地方军阀名下的前线指挥官，能不七窍冒火么？

薛岳正同他的贴身副官发着牢骚，王家烈匆匆走进厅堂。他是来请薛岳去吃春酒的。

“薛司令官，何事如此闷闷不快呀？”薛岳见是王家烈到，一时语塞，只道了声“请坐”。

王家烈对“图黔”司令薛岳，一则深怀戒备，视同冤家；二则又不敢得罪，前有侯之担之鉴。因之，时逢春节，聊备酒席，以尽地主之谊。薛岳呢，时年40，小王家烈4岁，年轻气盛，又是“围剿军”中的显赫人物，平时根本就不把王家烈放在眼里。但此时此刻，薛岳则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想到王家烈一个堂堂省主席做了另一个省主席的部下，一个军不军师不师的纵队司令官，猩猩惜猩猩，心里倒生出几分同情来了。他笑脸道：“王主席呀，你是请春酒呢，还是请喜酒呀？”王家烈说：“春酒，春酒，我没有喜酒可请。”薛岳说：“我看你是请喜酒哩。恭喜了，老兄既是省主席，又是司令官。只是，对不起，往后你得听我的了。”王家烈不摸头脑，还是一脸堆笑说：“当然，你是中央军，我地方军当然得听中央军的。薛司令官，我们今天就不说这个了，年关大节，当尽地主之谊，聊备薄酒，不成敬意，请老弟赏光。”薛岳把案头上的文电掂起来，说：“王主席，你还是看看这个吧。看了这个，就知道你们的茅台还香不香了。”王家烈怯怯地走近案前，拿起文电来看，看着看着，他坐下了，两眼茫然盯着地上。他暗自咀嚼了一番刚才薛岳说的话，想了想刚进屋时薛岳的恼怒神情，他也火了，说：“薛老弟，我王家烈打从共匪窜黔，没做错什么事吧？倒也是，我黔军的战斗力是不怎么样，丢城失地的事是有的。地穷人少，烟毒横行嘛！可我没有把自己裹了起来是不是？没有因小利而忘大义是不是？我一再电请中央军入黔，要求各省军队不分畛域，入黔‘会剿’。这还不行么？让我做个纵队司令，指挥的还是我自己的部队，这也没有什么；总指挥要是你薛老弟，也好说。可我这

里也是一个省嘛。湖南何键，曾经统领5省将士；四川刘湘，打了败仗还稳坐省主席，手下7军之众；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自成系统，桂粤联手，谁敢惹啊？现在云南龙云也风光了，三路大军有其一。我王家烈算个什么东西？啊，算个什么东西……”薛岳沉默片刻，探问道：“老兄，你总不能不干吧？”王家烈站了起来，扫了薛岳一眼，又转了个圈儿，说：“干，怎么能不干呢，我会好好干的！”薛岳禁不住苦笑了一下，他听出了王家烈话中有话，说：“老兄，可别糊涂，剿灭共匪，党国大事。”王家烈不敢太造次，说：“当然，还应当再加一句，首先是我贵州的大事，对不对？”他停了停，又说：“其实，你老弟也不怎么样啊，8师之帅，从江西打到贵州……于今，人家的命令下达给你，你再下达给我，你我都成了战场指挥官了。”薛岳终究有中央军的身份，又怕隔墙有耳，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委座前几年还想交权下野哩。为了剿灭共党，你我都不该计较这些事。”他见王家烈有些惶惶然，又补了一句：“叫你这样一说，倒是有些倒胃口，把茅台酒的香味都赶跑了。”王家烈又提了提精神，说：“不不，老弟，我们牢骚归牢骚，打仗归打仗，喝酒归喝酒。上路吧，一醉解千愁……”一对冤家对头，倒成了难兄难弟一般。

两个人正拉扯着，副官报告：云南孙渡将军到！薛岳“哦”了一声说：“来得真快呀！”话刚落音，孙渡跨进了门槛：“薛总座，王主席，孙渡有礼，给二位拜年了。”握手致意间，薛岳说：“怎么事前不通报一声，有失远迎了。”王家烈说：“年都不好好在家里过了么？”孙渡说：“我是昨天晚上兼程赶来贵地的。奉龙总司令之命，代表他前来协调一下，主要是听听薛总座的打算，以便复命委座。”孙渡俨然代总司令的口气，令薛岳更加不痛快，说：“请龙总司令放心好了，我们会听从龙总座的指挥的，借用匪党的一句话，叫作指到哪打到哪。”

孙渡本来就是“应卯”来的，表面上急如星火，其实并无特别的意思。因此，落座上茶以后，便同王家烈拉起茅台酒来：“王主席，共党窜黔，该不会影响茅台的产量吧？”王家烈说：“还好，土城之战，还不曾波及茅台……”薛岳坐在一旁，私下里琢磨，龙云自己不来贵阳，也不召我这个前敌指挥到昆明去，只是打发他的参谋长来联络一下，听听有什么想法，此事也未必马虎了一点。便打断王家烈的话，问孙渡道：“之舟老弟，西窜的朱、毛共匪，此刻可是在你们云南啦。”孙渡说：“请总座放心，我们会把他们赶出云南的！”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倒把薛岳怔住了。追随蒋介石多年的薛岳，也是深知各地军阀对剿共、对中央军的态度的。他在心里骂道：“娘卖乖的，你们就这么个态度，又风风火火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骂完，又笑了笑，说：“你们云南方面只是把他们赶了出去么！”一句话，又把孙渡问住了。孙渡意识到话有不当，脑子一活动，说道：“薛总座，我说的错不到哪里去吧？试想想，各省要是都能做到把匪党匪军从本省赶了出去，匪党匪军还到哪里立足去？只好跑到爪哇国去了，问题不就解决了？也就用不着中央军这么千辛万苦的东跑西颠了。是不是这个理？”薛岳哈哈一笑，说：“怪不得你孙渡人称小诸葛。”

龙云的参谋长孙渡，时年35岁，手下滇军15个团，也是一方的风云人物。年前，当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境内，薛兵团正大军压黔时，他就向龙云建议：“蒋介石这次追堵共军，实怀一箭双雕之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趁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好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无所借口。如果共军进入云南，中央军势必跟踪而来，那就有使云南政局发生变化

的可能。为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以不使共军入滇为最好。

但是，共军能否入滇，尚难料定。一当他们入滇，为免除麻烦起见，也只能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很赞同孙渡的意见。此次蒋介石任命龙云为2路军总司令，龙云心里有数，孙渡也是那么琢磨的：蒋介石一则为调动龙云出兵贵州的积极性，二则也为将来中央军进入云南推开一扇门。司令其名，实权还在薛岳手里。因此，龙云稳坐昆明，按兵于滇、黔边境，只让孙渡到贵阳来跑一趟。

“你们到底有何打算？”薛岳问道。

孙渡说：“眼下匪军虽说在我云南扎西地区，那其实只是暂避一时而已，稍一动颤，还是要作乱于贵州和四川的。所以，龙总司令要我转告薛总座和王主席，扎西地区的‘围剿’，还是要川、滇、黔三省和中央军共赴重任才好。各省自然要着力本省，但在边界地区，协同起来还是非常必要的。不知总座和王主席意下如何？”薛岳说：“当然要协同，岂止边界地区要协同，在别的地区也是要协同的。只是，眼下的协同……我是前敌指挥，只能奉命打仗啦。”王家烈说：“我是纵队司令官，更是只能听命办事了。”孙渡说：“薛总座，说笑话哩，黔省的剿匪军事，我们各路将领都还得听你的指挥啦。我们龙总司令也正是这样告诫我的。”薛岳说：“不妥吧，我一个前线指挥官，怎么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呀？我的意见，还是请龙总司令尽快拿出作战计划来，年关已过，我们不能让共匪喘息得太久。”孙渡说：“还是请薛总座劳神好了，我明天便回昆明复命。”薛岳起身道：“之舟兄，这要误事的啦！”王家烈见薛岳神色愠怒，连忙说：“别急别急，就着孙参座在，都是贵客，我的一桌酒席都要放凉了。”

王家烈的一桌春酒，也没能解了人们心头的怨愁。

第二天，宴道刚从南京飞到贵阳，带来了蒋介石给薛岳的亲笔信和手订的作战计划，并详尽地解释了委座为什么任命龙云为第2路军总司令，为什么要发那个“令其军中自责”的通电，薛岳才大彻大悟委座的良苦用心。

“我说的，我伯陵追随校长这么多年，那一刻也没有离开委座的指令行事嘛。”宴道刚说：“为委座挑些他不好挑的担子吧，他会记着的。他记不到，我们也会帮他记到的。”

薛岳平和了气息，次日便在贵阳召开了7路纵队司令官参加的作战会议，展开了挥兵扎西地区的“围剿”军事行动。

第十二回 彭德怀大战娄山关 吴奇伟断桥乌江水

话说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停留了近10天，得到了难得的休息和恢复。部队整编也卓有成效，除1军团保留师的编制外，其他军团都取消师一级机构。1军团编两个师6个团；3军团编4个团；5军团和9军团各编3个团。一共16个团。干部层层下放，机关和后勤工作人员，凡能打仗的都去了战斗连队。扎西参军的3000新战士，经过突击训练，也都补充到了部队。这样，作战单位人员充实，干部战士精力充沛，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2月10日前后，侦察得知，敌人在完成总体部署以后，龙云和薛岳根据蒋介石手订的作战计划，出动11个师另4个旅，星夜兼程，向扎西扑来，企图会同川南潘文华的8个旅，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鉴于敌主力大部被吸引过来，黔北空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机立断，避强击弱，决定挥师向东，重入贵州，目标进入遵、桐地区，消灭王家烈部的主力。毛泽东在这里耍了个“小花招”，令5军团的37团向北进入古蔺地区，大造“打过长江去！”的舆论，阻滞川敌南下。主力悄然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尔后兵分三路，以1军团为左纵队，相机占领土城以后，取道东皇殿、温水，奔袭迂回桐梓；以3军团为右纵队，取道回龙场、江场，直奔娄山关；以军委纵队和5、9军团为中央纵队，成三角随后跟进。红军东进，出敌不意，声东击西。滇军孙渡的6个旅经威宁、镇雄扑到扎西时，满城空空，只看到红军留下的一些标语口号，其中有条标语写道：“滇军弟兄们，我们借贵方宝地过了一个热闹年，谢谢了。”孙渡气的直跺脚，云南人说话，红、猴不分，把红军骂成“猴军”：“他们就是猴军咯，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从扎西到桐梓地区，红军开进近10天、如入无人之境。当薛岳的侦探发觉红军东进以后，通报到川军，潘文华还不相信，“鬼话！我这里的共匪还在大刷‘打过长江去’的标语嘛！”当他确知红军主力已经东去贵州，却又不敢挪窝，扼守江防要紧。滇军孙渡得到通报后，本想向东追击，无奈红军已经离开云南，又因与川军发生钱粮冲突，也就“懒得去凑那个热闹”。倍感伤脑筋的是蒋介石和薛岳，他们判断：“朱、毛股匪还是有东去与贺、萧谋取联络之趋势。”因之，便急令王家烈亲率所部前往桐梓、松坎一线堵截。这又给王家烈出了道难题。正当王家烈风风火火调兵布防时，林彪的1军团一举攻占了桐梓，截断了王家烈部的南北联系，王家烈的主力4个团还留在娄山、遵义地区，正好成了红军的打击目标。

红军攻占桐梓县城，完全证实了红军主力之所在，中央军和黔军一时乱了手脚。王家烈慌忙由贵阳赶到遵义，就地指挥他的4个团把守遵义的大门——娄山关，并将驻湄潭、金沙等县的部队，往遵义收缩。薛岳则急令留守贵阳的吴奇伟，亲率59、93两个师，火速北渡乌江，增援黔军；同时令西进扎西的周浑元纵队掉头向遵义靠拢。就在这时，红军主力3军团和1军团的一部已经在娄山关附近地区集结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投入战斗。一时间，黔北一隅，川黔要冲，两军对阵，系千钧于一发。

彭德怀受命指挥遵义战役，首先攻占娄山关，尔后乘胜重占遵义城。这天傍晚，部队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亲临作战部队作动员讲话：“同志们啦，我们到贵州以来，路跑得不少了，但还没有打过一个像样的仗，上次在土城，同志们打得不错，我指挥得不大好。这回呀，我们得打个像样的仗了。前面几个团的敌人，战斗力倒是不怎么样，可这娄山关的地形，倒是很像个样子的。你们看到了吧？就是那边，那道雾茫茫的山，高不高呀？唔，高，山高路陡，蛮险要的，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罗。可是，同志们啦，我们是红军，红军一夫就顶万夫嘛！拿下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据了，我们就能再进遵义城了！”事前打过招呼，为了隐蔽，毛泽东讲话时，部队不要鼓掌，不要喊口号。战士们有办法，当毛泽东讲完话，全都把枪举了起来，黑压压的一片枪林，一上一下地在空中翻腾着，情绪很是激烈高涨。接着，军团政委杨尚昆讲了几句，他说：“上回土城一仗没打好，主要是敌情没摸准，多出

了好几个团，这回可是摸准了，山上关口有一个团，山那边靠山脚有两个团，还有两个团在遵义往这边来的路上。路上的那两个团，往前是增援娄山关的，往后是守遵义的。几个团都是王家烈的部队，都是我们的目标。现在，天快黑了，觉就睡不成了，明天拂晓前得赶到娄山，天亮以后打响，首先夺取关口，尔后向南发展胜利。现在准备出发！”

一阵叮当，部队分头上路。这时，从山坡树林里钻出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汉子来。他头缠青布，身背背篓，手执小锄，打着口消朝毛泽东和彭德怀走来。他一见毛泽东，叫道：“毛委员在啊！”他把头上的青布一抹，是梁兴初。“哦，梁猴子！”毛泽东伸出手来握着梁兴初的手：“好久不见了，别来可好呀？”梁兴初嘿嘿笑着说：“还不错。前些日子，你们在扎西过的年，我们几个是在叙永城里过的年。好酒好菜，可惜就是没有我们江西的那种‘四星伴月’。”毛泽东说：“你们钻到叙永城里去了？嗨，听你说起老表的‘四星伴月’，我都流口水了。”他伸手抹了一把嘴，又道：“我说梁猴子，上回在土城，你们搞情报的可是把我骗了呀，敌人哪里是4个团嘛，整整8个团，也许是9个团！搞得我手忙脚乱的。”梁兴初说：“这事呀，不能全怪我们，要怪得怪郭勋祺那个先头团的参谋长。你道是怎么回事？郭勋祺的几个团原本是奔良村、元厚1军团的，后来那家伙截获了我们的情报，知道我们在土城黄金湾等着他们，小子就跟他的上司说，别去元厚了，奔土城吧！郭勋祺便同意了，改主意了，这是一；第二，那小子还是在前头带路，他不走我们为他们准备的那条路，他从老百姓砍柴火、采山药的一条小路翻过山来，直奔青杠坡。这不就跟彭军团长添麻烦来了。这是那位参谋长亲口给我说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毛泽东叹道，又问：“你后来又见到那位团参座了？”梁兴初说：“难得的一见。要不是因为他，我们还不进叙永城呢。这口气没法出嘛，伤亡那么多人！我们从叙永域里把他弄出来，说是有笔鸦片烟生意同他做，来到叙永域外的山上，对不起，跟他聊了聊，便送他上‘西天’了。”彭德怀听着也懊恼得不行，跺脚道：“他娘的，我还以为你们搞情报的都是些饭桶呢！原来叫个团参谋长给折腾了一番。”毛泽东说：“其实，连那个小参座也是不能怪的，就怪我们自己队伍中有不争气的，丢了性命，又丢了机密。”梁兴初说：“说来也是。不过，你说不怪那个小参座，郭勋祺可怪上了。我们把那小子解决以后，郭勋祺连尸体都不让往城里抬，说是那个团参谋长害得他在土城丢了3000弟兄，是畏罪自杀的。”

彭德怀不想再听故事，说：“梁猴子，你这是打哪里来呀？”梁兴初说：“刚从娄山下来，上山‘采药’去了。”彭德怀又来了情绪：“采了些什么‘药’？快说。”梁兴初说：“这回可是百分之百的搞准了。娄山关口是一个团，制高点是点金山，欲取娄山关，必先攻占点金山，这是一；第二，山那边的黑神庙是他们的旅长杜肇华的指挥所，他已经给半路上的那两个团下达了任务，一当娄山关吃紧，便立即跑步增援娄山；第三，娄山关北侧有两个连哨，具体位子在这呢。”说着，连忙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片来。彭德怀接过纸片，凑到毛泽东跟前一块看。看完，彭德怀说：“你们还有什么好听的故事再接着讲吧，我可要上路了。”他转身拍了拍梁兴初的肩膀：“梁猴子，到我3军团工作怎么样？我给你安个情报部长。”梁兴初说：“得了吧，彭军团长，还情报部长呢，扎西整编，把我的科长给抹了，现在是侦察连的小连长！”彭德怀没再答话，只笑着朝毛泽东那边努了努嘴，便转身上马去了。

梁兴初转身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说：“梁猴子呀，你好像对扎西整

编有点意见嘞？”不等梁兴初答话，又说：“可我不明白喽，你们1军团还保留师的编制，怎么把你的侦察科长撤了呢？”梁兴初笑大了一张嘴，一嘴的大牙，说：“毛委员，我是跟彭军团长闹着玩呢。我的侦察科长，说撤没有撤，说没撤又撤了，算是半撤。我现在是侦察科长兼侦察连连长，说是为了减少一个机关人员。其实，嗨，当科长，当连长，当侦察员，不就是一回事儿？我就怕连侦察员也不让我当。”毛泽东点着头“哦”着，说：“这还差不多。噫，侦察科长兼侦察连长，这个办法好哩！这定是你们林彪的鬼主意对不对？”梁兴初说：“可能，他鬼点子多。他舍不得把你下放了，又不能不放你，就这么既放又不放。”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是个创造。梁猴子呀，你就这么干着吧，将来我们发展了，部队多了，师长军长都有你当的。喂，你什么时候回1军团去呀？”梁兴初又咧着大嘴，笑了好久才说：“我们已经有人去桐梓给林军团长报告情况去了。我听说你在这边，就想来看看你，你不说我们好久不见了吗？”毛泽东心里感到热烘烘的：“谢谢你，梁猴子。往后呀，你得经常来见见我，行吗？我们挺合得来的。”梁兴初说：“一言为定！有什么情况，我就来向你报告。不过，你得跟你的警卫员们打个招呼，别到时候老挡我，盘问个没完。”陈昌奉在一旁听到了，说：“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你倒会告状哩！那回挡你，不是因为你打扮得人鬼不鬼的，就没见你装女人了。”梁兴初正高兴着，手里的青布往头上一搭，扭腰摆手迈着小脚步，活是个老太婆，逗得跟前的一帮人哈哈大笑。

且说2月25日早晨，彭德怀、杨尚昆率3军团按时迫近娄山关关口。上午9时，即以4个团同时投入战斗。谢嵩和钟赤兵的12团，彭雪枫和李干辉的13团，从正面与守敌争夺关口东侧制高点点金山；张宗逊和黄克诚的10团，邓国清和张爱萍的11团，从两侧迂回娄山关。娄山关守敌是黔军刘鸣鹤的第6团，王家烈的精锐，战斗力比较强。红军先锋13团，奋战大半天，肉搏数场，竟没能攻下点金山，打得彭德怀直骂娘：“他娘的，我就不信这点金山真是铁铸的，组织一下，再上！”13团几次猛攻，打到午后，守敌发觉两翼被迂回，方才向关口收缩；13团乘敌慌乱，一个猛冲，拿下了点金山。彭德怀见13团在攻点金山的冲击中伤亡很大，一声大喝：“12团跟我上！”早已候在一旁的12团团长沙谢嵩和政治委员钟赤兵，见军团长要亲自带部队冲击娄山关口，吼道：“你不相信我们团长政委吗！”彭德怀已跨出十几步远，说：“我就怕你们耽误我那一两分钟！”他带着12团的两个营，跑步突击娄山关口。13团的指战员见军团长带着12团上来了，一鼓作气，同12团一起，从两个方向上攻下了娄山关口。真就是那么一两分钟，当彭德怀率队拿下娄山关口，向南坡一看，由南向北的支援之敌一个团，正在南坡向上爬来，距关口只有100多米。彭德怀笑着吐了口粗气：“他娘的，你晚了一步喽。”随即下令道：“打下去！”红军居高临下，一阵急速的射击，加上手榴弹，敌人死伤大片，余者溃退下去。溃退之敌逃到关下的两侧山坡上，仍同驻守那里的一个营掘壕顽抗。向南坡追击的12团和13团，经两小时的激战，终于完全攻占了南坡，控制了整个娄山关。接着，彭德怀命令10团、11团从左、右两翼迂回娄山、遵义之间的板桥，断敌后路。由于有1军团主力从桐梓赶了上来，追击战打得比较顺手，到27日下午，王家烈驻守娄山、板桥一线的4个团，大部被歼，残部逃回遵义城。

毛泽东赶到娄山关，是27日的傍晚。他站在巍巍关口上，举目苍山，如波似浪；西天一抹红霞，如火如荼。他诗兴大发，便顺口吟了起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似海，残阳如血……

他还想再编几句，凑成篇章，忽有总部参谋科的人来报告：“毛委员，吴奇伟两个师正向遵义急进，前锋已在刀把水渡过乌江。”毛泽东从诗境中走了出来，说：“告诉彭德怀，务必先敌占领遵义城，尔后迎战吴奇伟！”

却说遵义城里的王家烈，见几个旅、团长兵败归来报告说：“抵挡不住，损失惨重，无以为战……”差点气绝倒下，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还不快去收罗一下，给我守城！……”几个旅、团长退下，王家烈才捶着胸口号啕起来：“蒋介石拣我软的欺，朱、毛共党也拣我软的欺，都他妈的不仁不义，不是东西……共党拣我软的欺，因为他们是共党，可老蒋呢，姓龙的姓薛的呢，不是7路纵队吗，打起来了，都见死不救，都他妈的不往这边靠，硬是要逼着老子挂白旗么！老子……”参谋长谢汝霖劝道：“军座，这一步使不得，使不得！现在就走这步棋，只怕黔省不是赤化，而是彻底蒋化了。”王家烈说：“那你说怎么办？已经兵临城下了！”谢汝霖说：“呼叫一下吴纵队吧。”谢汝霖拿起电话要通吴奇伟，王家烈接过电话说：“吴老弟，吴军座，我这里只有一个满团了，守不住了！”吴奇伟说：“你们务必坚持到明天晚上，我的两个师正往你那里赶！”王家烈这才提了提精神，正了正衣冠说：

“走，到忠王铺迎迎吴纵队去！”

凑巧，王家烈同吴奇伟的通话叫梁兴初一伙窃听到了。报告彭德怀后，彭德怀当即下令：27日晚务必拿下遵义城！他命令1军团攻新城，3军团攻老城。1军团很快就拿下了新城。3军团在攻老城的时候，因老城有城墙，需要攻坚，在观察敌情、地形时，军团参谋长邓萍中流弹牺牲。邓萍，四川富顺人，1926年入黄浦武汉分校，1928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后任红5军军委代理书记、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5军，转战湘、鄂、赣、粤4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湘鄂赣、湘赣苏区。邓萍的牺牲，彭德怀很是悲痛，抚烈士遗体落泪道：“我的好同志，我的好参谋长，我的左右手啊……”张爱萍战后作诗悼邓萍：“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且说1、3军团重占遵义城以后，28日，遵义城里正在欢庆胜利，彭德怀又挥师遵义城南。他以1、3军团各一个团，分别前进到濠板凳和鸭溪，迎击和诱敌深入；以两个团在城南老鸦山、红花岗、插旗山、碧云峰一线构筑防御阵地，待机歼敌；以3个团从通贵阳的公路以西迂回侧击，断敌退路。当天上午，红军向濠板凳、鸭溪迎敌的两个团，果然在半路上与敌相遇。两个团稍事阻击以后，即敞开大路，转为右翼侧击。吴奇伟的两个师——59师和93师，便浩浩荡荡地向遵义城南扑来了。

吴奇伟纵队4个师，是蒋介石亲自授命长期尾追红军的部队，仗着“追剿”数千里的气焰，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然而，此刻驰援遵义的两个师，却是红军手下的败军，两个师在江西都同红军打过仗，其中的59师，曾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红军全歼过，是后来拼凑起来的。这两个师，一方面凭着优良的武器装备，有些战斗力；另一方面又知道红军的厉害，内中不无恐惧心理。吴奇伟心里有数，他让93师打头阵。当93师一接近红军老鸦山阵地，即以全师投入斗，轮番攻击张宗逊、黄克诚10团的阵地。双方短兵相接，肉搏杀，双方阵地失而复得。战斗到下午3时，敌59师接替93师，继续猛攻老鸦山一线红军阵地，老鸦山主峰一度被敌占领。老鸦山主峰是红军阵地的支撑点。危急时刻，彭德怀命令陈赓、宋任穷的干部团投入战

斗。干部团浴血奋战两小时，方才夺回老鸦山主峰，巩固了原有的阵地。

遵义城南之战，红军付出不小的代价，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伤亡更加惨重，并一直被阻于老鸦山下不得前进。

战斗进行到下午5时左右，彭德怀见敌人已无力再组织进攻，便下令两个军团的部队向进攻之敌发起全面反攻。令两翼迂回的5个团向敌侧击，正面阻击的两个团和干部团同时向敌反击。霎时间，战场形势大变。吴奇伟见势不妙，下令部队向贵阳方向撤退。再次尝到红军滋味的两师敌军，一得到撤退命令，便阵脚大乱，全线溃逃。于是，在遵义到贵阳的公路两侧20里方圆地区内，红军同吴纵队的两师8个团展开了一场浴血大战。山坡山沟，竹林茅舍，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成群结队的俘虏。

“乘胜追击，不得停留！”彭德怀在行进间下达命令。

整整追击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红军先头追击部队已接近乌江边，刚渡过乌江的吴奇伟，怕被红军活捉，下令他的随从警卫：“断桥！”随从警卫说：“军座，还有好多没有过来的！”吴奇伟吼道：“让他们另找渡口！”随从听命，挥起大斧，砍断乌江桥头的绳索，浮桥随水而去，把1800多名士兵丢在乌江北岸。

黄昏时刻，吴奇伟留在北岸的一支部队逃进一个村子，停下来做饭。敌人前脚到，1军团4团的一个连队便追进了村子。几个红军战士冲进敌人的伙房——房角的小树林，见灶头锅里有只正冒着热气的鸡，一天一夜没吃了，饿的不行，便绰起来就吃。嚼得正香，敌人的伙夫走上前来跺脚道：“放下，这是给师长做的！”几个战士见伙夫两手空空，也就懒得喊“缴枪不杀！”只顾嘻嘻哈哈地大嚼，那伙夫自然不依，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红军战士说：“你们师长吃得，我为什么吃不得？”那伙夫说：“你算老几，也配吃鸡么？”红军战士说：“我们算老几？我们是你红军大老伯！”那伙夫哪里敢相信，嚷道：“还敢冒充红军吃我们师长的鸡，我告你们去！”他一转身，几个红军警卫人员窜进树林，堵住了他的去路，接着彭德怀和聂荣臻也走了过来。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自己的那个连队在开伙了，便说：“好香呀！是不是给我们也来一点呀？”几个嘴上挂油的红军战士中有认得彭德怀和聂荣臻的，连忙扭住那个伙夫说：“老实点！这几位红军大老伯也饿了，还有什么快拿出来！”那伙夫这才发起呆来，镗在地上。彭德怀问：“怎么回事？”红军战士说：“首长，他是敌人的伙夫，给他们师长做了只鸡，我们几个正赶上，就用了。他还不让我们吃，真不讲理！”彭德怀和聂荣臻禁不住哈哈大笑。两个红军战士连忙上前拉起那个伙夫，说：“别害怕，红军优待俘虏。你要是再拿只鸡来热热，让这两位红军大伯也香香，就加受优待啦！”那伙夫抬头见树林那边，红军战士押着一队队的俘虏走过，方才确信自己早已当了俘虏，便颤巍巍地说：“长官，我，我，还有鸡。我们从贵阳出发，给师长做了8只熟鸡，吃了几只，还有3只……”说罢，便去翻他的挑子，把3只熟鸡全都掂了出来。

有警卫员上前说：“首长，不能随便吃敌人的东西。”

彭德怀说：“不让我们吃，你们好饱餐一顿是不是？”

彭德怀一边撕着鸡块嚼着，一边跟聂荣臻说：“老聂呀，这一仗不错吧？好久没有打过这样的仗了。”

聂荣臻说：“不错不错。解决了吴奇伟两个师的4个团，可能还有多的。”

正说着，才到3军团接替邓萍任参谋长的叶剑英走进树林，边走边说：“吴奇伟部没有过了乌江的两千人也都解决了，俘虏正在往后押送。”

彭德怀压抑不住打胜仗后的喜悦心情。他故意板着脸，不招呼叶剑英上前啃鸡，只把一块连皮也没有削的红薯甩了过去。他成心要给叶剑英开开玩笑，说：“老叶呀，我看你这个人也不怎么样，也是一副狠心肠啦！”

叶剑英愣了，伸到嘴边的红薯又挪开了：“怎么回事？老彭，你要是觉得我这人真不怎么样，我明天就回总部好了。说真的，你向中央写报告点名要我，我还以为你看上我叶剑英哪点什么呢。”

聂荣臻也不明白彭德怀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眼神儿惶惶的。

彭德怀还是声色不露，说：“你到我3军团来打的这头一仗打的不错吧？可你知道你打的谁呀？主要打的谁呀？”

叶剑英还是没有反应过来，说：“吴奇伟呀？”

聂荣臻明白过来，他笑了一下，又立即打住，一块鸡骨头摔在桌子上，说：“老彭说得对，你老叶就是不怎么样！”叶剑英更紧张了，埋头道：“好吧，你们两位都这么看我，我明天就走。”说着便从小条凳上站了起来。

彭德怀噗哧笑了，聂荣臻哈哈大笑。叶剑英说：“你们这是搞的什么鬼？”

彭德怀说：“吴奇伟什么地方人？广东大浦人也！你们不是老乡吗？你到3军团来的头一仗，就跟自己的老乡过不去，你还是个好人吗！”

叶剑英顿时也乐了，他的嗓门更粗，乐得树叶子直往下掉。警卫员们也在咯咯直笑。

乐了一阵，叶剑英走到另一个方向，才顺风闻到香味儿：

“你们在嚼什么呀？”

彭德怀雅兴未尽，说：“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是几只老母鸡，香倒是香，可也没别的什么滋味。”

叶剑英几步抢了上来，甩掉手中的红薯，抓起盆里的一只整鸡，大嘴一啃，吞下去一块，说：“你老彭的战术真是到家了，用开玩笑来掩护啃鸡！”

彭德怀“嘿嘿”笑着：“暖暖暖，你老兄还是给警卫员留一口，他们都在流口水啦！”

叶剑英冲警卫员们说：“你们流什么口水！军团长说了，这鸡也没什么别的滋味儿，就是有点香味罢了。”

一个警卫员从身后偷袭上来，冷不防把叶剑英手里的半只鸡夺了过去：“也让我们香香吧！”

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好说：“好吧好吧，有半只鸡也够你们闻味道的了。”

正闹着，3军团参谋科的参谋走来报告：“军团长，聂政委，初步统计，这次战役，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人，俘敌3000人，缴枪2000条，子弹10万发。”

彭德怀说：“好！以1军团和3军团的共同名义，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老聂呀，我的意见，电报上是不是附上一句，此报务请李德顾问阁下一阅。”

聂荣臻说：“可以。只是，在正文里还要加一句：感谢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

第十三回 牵“牛鼻”三渡赤水河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话说蒋介石在南京得知遵、桐再度失守，损失王家烈的5个团，吴奇伟两个师的主力，暴跳如雷，“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他大骂了一通前线指挥官的“娘希屁”之后说：“王家烈倒还好说，我早就说过，他是抵挡不了窜匪的；可吴奇伟是怎么搞的，把中央军的脸丢尽了！要惩办，惩办！”何应钦和陈诚力劝委座“息怒”。何应钦说：“江西这股匪众，有朱、毛率领，他们在军事上的诡秘之道，我们都是知道的。常言道，胜败者，兵家常事。再说，薛、吴率部征战数千里，又远在不毛之地，战场失利，当令其总结教训，惩处将士，不可不慎，还望委座体恤前方。”陈诚也说：“敬之兄言之甚是，仓促惩处薛、吴两将，恐有长共匪志气之虞。此次黔北失利，实因扎西地区围堵不严所致，使匪东窜得逞，袭我空虚，诸路纵队又掉头不及，使吴纵队孤军驰援，困难确是不少的。”陈诚打住话，见委座默然，又道：“委座向来爱将如子，此次是不是就体谅他们。他们的立功机会还有的是。”蒋介石叹息了一声，像是吐出了胸中的火气，说：“薛岳是不是还是不理解我的意图，觉得受制于龙云，心有怨气，吴奇伟也受他的影响，因而荒废了军事？那么，宴道刚又是怎么回事，要他专门跑一趟，把我的所思所虑告诉他们，难道连一语即可道破的话都不会讲么？”何应钦说：“我想不会的，委座。薛、吴、周三位，包括道之，我们都是了解的。”

诚如委座刚才所指，问题主要是出在王家烈身上，太昏庸无能，他要是守住娄山关，守住遵义，不就没有这种事了？他哪怕再坚持一两天，周纵队赶了上来，吴纵队也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蒋介石沉默了一会，从他的高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说：“叫你们这样一说，对王家烈也不宜过急了。共匪不是还在贵州吗？就这样，损一将易，成一将难。暂不理睬他们的失职之辱。都准备一下，明天去重庆。”

3月2日，遵义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连忙重返重庆。刘湘没有到机场接驾，他在听到风声以后，连夜带着人马去了泸县“川南剿总”司令部，实则躲风，却说是去“查究”潘文华、郭勋祺，为什么在赤水河方向没有把“共匪”堵住，而让其再度东窜黔北。当杨芳毓在机场为刘湘面陈行踪时，蒋介石说：“算了算了。川军在赤水河方面没有把共匪堵住，是一个失策，但也未必需要查究什么嘛。川军的江防守得不错的，郭勋祺土城一仗也是打得好的，倒是黔军和中央军方面……”下面的话他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

蒋介石进到黄山修饰一新的官邸歇息下来，贺国光便递上从贵州发来的两份电报。原来贺国光在得到委座在南京发火的消息后，他也害怕委座迁怒于他。他是代表委座在临近前线的重庆协调“剿匪”军事的，遵义大败，他不是也该吃家伙么？也就乐得把王家烈拉出来作抵挡。正好，王家烈的两份电报到了。一份是王家烈指使贵州绅商各界和各“民众团体”，向蒋介石和各省军界头目刘湘、龙云、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出的告急求援电。

电文说：“赤匪回窜黔北，桐梓、遵义失陷，黔军连日决战，伤亡甚重，退往鸭溪、新场方面，集中待援。国军亦一部失利，退守乌江南岸。情势紧

张，拟恳令饬剿匪各军，不分畛域，火速就近推进，合围痛剿。”另一份是王家烈自己的请罪电。电文说：“残匪回窜，黔当其冲。烈守土之任既疏，追剿之资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逭。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蒋介石看了电报，喜怒难辨，说：“王家烈倒还有些自知之明。传我的命令！”他当即口述了一纸通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我使命。”贺国光一头大汗抹去，说：“委座亲临前线，剿匪军事定开新的局面，共匪灭期到矣。”

第二天，蒋介石马不停蹄地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会议就黔省“剿匪”军事部署问题，由陈诚根据他的意图提出预案，讨论后，由蒋介石作最后的决定。他在会上说：“朱、毛股匪再度东窜，显然是因为长江过不去，只好把目标再转向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

为此，我们要搞个一揽子计划。请注意！”他一边在图上指划着一边说：“何键的53师，吴奇伟的两个师，徐源泉的一师两旅，加上黔军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阻敌东进。临敌周围，孙渡的6个旅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线，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鲁班场一线，王家烈还有几个团，集结打鼓新场一线，堵敌西进；吴奇伟的另两个师集结于镇西卫、修文、息烽、刀把水、大渡口一线，防敌南出；郭勋祺的3个旅向桐梓、遵义推进，堵敌北上。这就是下一步的计划。东西南北，近50万作战部队，加上各地民团，70万，不少了吧？我们一定要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朱、毛窜匪，不得再误。战法问题，我要再讲一讲。你们，还有部队的各级官长，总是忽略堡垒战法，不晓得筑堡推进，乃至防也不筑堡，挖个小壕沟就算事了。这一回怎么样，王家烈吃亏了吧？娄山关一垮下来，哪里也站不住脚了。我在江西的时候，就很提倡过这东西子，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嘛，本委员长会害你们么？关于筑堡问题，这回要专门下一道命令，不论驻防布防，也不论是追是堵，是围是截，一律就地筑堡；特别是江防隘口，必须筑堡扼守。要把堡垒推进同重点进攻结合起来。”

且说遵义之战，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战果不小，代价也不小。

付出最大牺牲的是3军团。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写的报告中说：“3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战役中，两个团长负伤，6个营长伤亡，10团参谋长钟剑伟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但是，终究是一次大的胜仗，一次很有意义的大胜仗，它证明了离开根据地的、只有3万人马的红军，只要运动开来，避强击弱，还是可以打胜仗的，也证明了遵义会议改变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情绪很高。不高兴的唯有李德。他倒不是因为红军打了胜仗不高兴，而是因为这一来，他的“堡垒主义”、“短促突击”是真的不行了。他为此感到悲哀。重占遵义以后，回到军委纵队的李德，没有再同博古住在一起。这一天，时任5军团副参谋长的伍修权一片好心，想到李德一人独处，要是博古不跟他说话，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便来到李德的住处，想看看他。伍修权一进屋，见桌子上放着一堆核桃，还有个小铁锤，便拿起铁锤来敲了颗核桃吃。正吃着，李德从里屋走出来，伍

修权正要问候致意，李德说：“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我们只有过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把伍修权弄得哭笑不得。想了想，觉得这李德也太不知趣了，好心好意来看看他，他倒是这么一个态度！便说：“李德同志，你在苏军中算是个高级将领，我现在是军团副参谋长，比你低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要高那么一点点，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修养，没有礼貌？我是来看望看望你的嘛！”李德自知失礼，尴尬地笑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心情不大好啦。”伍修权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你倒心情不好了，你的国际主义感情哪去了？”李德说：“你知道吗？我有好久不挨文电的边了，昨天博古却突然给我翻译了一份战报，是这次战役的战果统计。你道这份战报是谁的？彭德怀的，是他特意要送我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明白吗？他是在取笑我！”伍修权哈哈大笑，笑完说：“你呀，不是个德国男人，倒像个德国女人了！”李德也“嘿嘿”地笑了，他笑着笑着，笑脸变成了哭脸：“快别提德国女人了，我刚才正躺在里屋床上想我的德国女人，我的奥尔加·贝拉里奥……”见李德的灰兰色的眼睛里骤然汪起了泪水，伍修权的心里也颤颤的了，说：“我们唱唱歌吧。”他们能一起唱的歌只有国际歌和马赛曲，他们一起唱起了马赛曲……

蒋介石在重庆形成的新的作战部署，是重庆地下党得手后传给4方面军，又由4方面军电报传给中央红军的。情报同现地侦察到的敌情完全一致。毛泽东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再打上一两仗。”为寻机实施机动，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了好几天。这期间，3000俘虏的“新兵师”，经过突击政治思想教育，大都补充到了1、3军团，其他军团也吸收了一批新战士，各部队还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人满装齐，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高。又是春暖花开季节，不冷不热，战士们的求战情绪很高，“遵义是个好地方，来一回有一回的收获！”“再打，王字号的不过瘾，打中央军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和军队的负责人中，有些人的头脑热了起来，忽视对敌情作冷静的分析，战术思想有些不严谨。于是，在高层领导中，又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事情起因是林彪和聂荣臻3月10日致电军委：“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该地之敌。”中央立即开会讨论林、聂的意见。毛泽东因事迟到了一会，他还是中华苏维埃的主席，正忙着同刘伯承（曾任遵义警备司令）一起接见地方上的一些同志，交谈红军第一次进遵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再恢复的问题。当他来到会上，会议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赞同林、聂的建议，打打鼓新场。作战命令都拟好了，只等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听说要打打鼓新场，怔了怔，说：“打打鼓新场？”他抓过地图看了看，说：“打不得，打不得！”他的“打不得”把到会的人打了个莫名其妙。都说：“怎么打不得呀？该敌主要是王家烈的几个团，在众敌中是个薄弱环节。再搞掉他这几个团，王家烈的问题就算解决了。”毛泽东说：“不，打鼓新场的王家烈，不是娄山关的王家烈，是不好打的，我们要冷静一点才好。”说到冷静不冷静，有的人真还有点不冷静了，说：“这有什么不冷静的！打鼓新场的王家烈，只有比娄山关的王家烈更好打的。”“老毛同志，你的兴趣是不是不在王家烈，而在吴奇伟和周浑元，最好是周浑元啊？这恐怕更需要冷静一点才好啊！”毛泽东也有点火了，起身道：“讲得对，我的兴趣的确不在王家烈，而在吴奇伟和周浑元。如果你们认为我这是更不冷静，你们打好了，我不参加。”周恩来

连忙招呼道：“暖暖，坐下坐下，大家再商量商量。泽东同志，我也不大明白啦，你常说要避免实就虚，避强击弱，这次打打鼓新场，正是拣弱的打，为什么又不妥了？”毛泽东没有坐下，却也没有离场而去。他说：“这，我听了半天，你们好像根本没有把敌人的位置搞清楚是不是？你们仔细看看地图，你打打鼓新场，能避开周浑元和吴奇伟？能避开孙渡和郭勋祺？西面是孙渡，西北是周浑元，东南是吴奇伟，东北是郭勋祺，距离都很近，有的一天路程都不到。我们要是打打鼓新场，只要同犹禹九部一接触，其他各路纵队就会一齐出动。到那时，我们面对的还只是王家烈吗？同志哥呵，那将是5路纵队，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兵力！我们能钻得出来吗？娄山关的王家烈，是孤立无援之敌。吴奇伟后来援是援了，可他是从贵阳出发的，援掉了两个半师。显然，敌人的这一次摆法，是吸取了遵义之战的教训的。”

大家都挤着看地图。有的人一边看地图一边擦着头上的汗珠子，小声嘀咕道：“说的是，说的是啊！”王稼祥说：“嘿，你老毛就是比我们要高那么一截，要深那么一层。说得对，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是不行的。看来，这打鼓新场这面鼓是敲不得的，一敲，几头狮子就都上场了。那么，你倒说说，到底打哪里好？蒋介石又给我们画了个圆圈，不打不走总是不行的。”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打鲁班场！第一，鲁班场有周浑元的13师和96师，打好了油水大；第二，打不好有路可走，蒋介石现在画的这个圈圈，目前也只有这个方向松动一点，前景好一点。大不了再过一趟赤水河。”一番争论，主要是能否从敌人丛中窜过来，前进到鲁班场的问题。毛泽东说：“抓紧一点可以，眼下人家正在忙着修碉堡呢。”又是周恩来，首先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穿过去打鲁班场。接着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也认为“鲁班场虽系强敌，但总比被4路强敌围困好，而且有路可走，这着棋就可能走得活一点。”

打不打打鼓新场的争论，又一次显露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向鲁班场开进途中，张闻天找到王稼祥说：“看来，人多也不一定就能把事情办好，不承认个人天赋不是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我们结束了个人说了算，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央和军委一二十号人，几乎天天开会，这不是个办法。我的意见，军事指挥问题，还是由老毛、恩来和你3个人来决断，就叫作3人指挥小组，你看如何？”王稼祥说：“可以考虑。眼前的提法也委实有些不伦不类，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太不够组织化了。当然，3人指挥小组，主要还是让老毛拿主意，让他的权力再大一点，更充分一点。”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中共中央于3月11日宣布组成中央3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为便于指挥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朱德为前敌总司令，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朱德对此很高兴，戏言道：“这就好了。我早就说过，朱毛朱毛，我这朱是离不开毛的。”

3月14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布了攻打鲁班场周浑元部的命令。命令规定：“以1、3军团主力和干部团为右翼，取道坛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的左后侧；以5军团和3军团的两个团为左翼，由西南方向攻击敌之正面；以9军团的两个团进至坛厂作预备队，另一个团到香枫坝阻滞吴奇伟纵队。由于在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对在黔各路纵队有“不可随意轻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的命令，又严令各路军“抓紧就地筑堡，求得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中央红军各路纵队抄小路由鲁班场开进途中，

竟一路无事，都按时赶到了作战地域。然而，鲁班场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

15日下午发起总攻，开始还有所进展，1军团的5团攻下了鲁班场西侧的白家垭，接近了敌前沿；3团在董家坡歼敌一个营，俘敌400余人。但后来激战3小时，进展甚微。原因是敌人的碉堡都修好了，都躲在堡垒里不出来。眼看天黑了，夜战也对付不了敌人的堡垒。这一仗的前线指挥是林彪和聂荣臻。林彪自然有牢骚了：“他娘的，我说应该打打鼓新场嘛，为什么到这里来啃骨头！”聂荣臻说：“报告吧，这一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林彪刚要拿起电话，电话铃响，传来朱德的声音：“林彪同志吗？立即撤出战斗！部队连夜袭占茅台、仁怀地区，准备渡赤水河西进。听清了吗？”林彪只回了两个字：“晓得”。他想骂两句娘却没有骂出来，南昌起义的连长不敢对总司令太造次。他放下电话，神情茫然：“又渡赤水河……”

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所离鲁班场小镇也只有两个山头。朱德给林彪打完电话说：“林彪像是有点情绪嘞。”毛泽东说：“不管他！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只知道打胜仗，走直路，走近路；却不知有时候也是要打点败仗，走点弯路，走点远路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两千年前就有人懂得，现在有的人却不懂。”就在这时，毛泽东脑子里原来还有些模糊的想法——大不了再过赤水河——此刻越发清晰和坚定起来。他觉得，唯有再渡赤水，才能把敌人从碉堡里牵出来，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到川南去，然后再来一个大的机动。他望着远处暮色中敌人的碉堡群，跟朱德、刘伯承说：“你们看，这是不是有点像闽赣边的景色呀？”朱德说：“你是说，我们得像第三次反‘围剿’那样，也来个千里跃进？”毛泽东抿嘴一笑说：“知我者，玉阶也。走，到茅台喝好酒去！”

3月16日，1军团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便歼灭了敌人一个连，占领了茅台。茅台，因酿制美酒闻名中外。大部队进入茅台以后，休息一天，会喝酒的都大喝了一通，不会喝酒的，也都装上一壶，以备擦脚活血，舒筋活络。茅台镇前的赤水河有渡河铁索浮桥，中间的小船不在了，但铁索还是好好的。军委工兵连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很快就把浮桥修好了。

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野战军于16日晚至17日12时前，全部由茅台渡过赤水河。军委纵队17日上午渡河。刘伯承正在小镇街上指挥纵队向赤水河前进，李德的警卫员跑来报告说：“总参谋长同志，不好了，李德喊不醒来了。”刘伯承问：“怎么回事？”警卫员说：“他昨天晚上跑到义成老烧房喝了一通酒，回来以后又喝，一直喝到下半夜，醉得四仰八叉的，嘴里不停的说胡话，打都打不……”刘伯承说：“别说啦！他在哪？”警卫员领着刘伯承来到李德的住处，一屋子的酒气，只见李德还躺在那儿，嘴里胡言着：“巴，巴伐利亚，伏，伏特卡……不，比中国的茅台，差，差远了……”刘伯承懂俄语，听了哭笑不得，跟警卫员说：“快去，就说我说的，来付担架，把他抬走！”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走过赤水河上的浮桥以后，在一个小树林里休息，随即刘伯承也追了上来。周恩来问：“刚才有人过桥都不能走，是担架抬过来的，谁病了？”刘伯承说：“哪是啥子病啊，是喝醉了。”毛泽东说：“嗨，这就笨了不是！喝酒喝醉了，把他弄到赤水河里洗个澡不就行了？此地有个说法：喝酒忘了娘，想娘喝赤水。”刘伯承说：“倒是没想到这一层。我只觉得，他不用下赤水河，喝的酒也足够把他自己漂起来了。”“谁呀，这么能喝？”王稼祥问。刘伯承说：“还能有谁！巴伐利亚的布劳恩先生。”大

家都“噢噢”地叫了起来。周恩来说：“这就怪不得了，总参谋长同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进攻巴黎，传说当中有一条就是巴黎城里收藏有中国的茅台！”正说闹着，李德拄着棍子歪歪扭扭地来了：“各，各位，我请求你们在，在这里多停一两天好，好不好？我，茅台酒没有喝，没有喝，没有喝够啦！”刘伯承翻译了李德的话，把大伙乐的，李德也发酒疯似地傻笑起来，倒像是他们从来没有过什么隔阂似的。据说，李德从这以后，情绪逐步趋向正常，没再在背后嘀咕过什么。毛泽东在草地同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他还支持了毛泽东。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以后，便进入川南古、叙地区的崇山峻岭中隐蔽休息，以待来机。

这期间，毛泽东没言打仗的事，只给刘伯承交待了两件事：一是前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大造红军北渡长江的舆论；二是要军委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带一个排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控制起来……

且说重庆的蒋介石，他在3月13日得知红军离开了遵义、鸭溪地区向西北方向运动，他还沉得住气，“主力似仍潜伏在长干山附近及其南北地区，有与我周纵队决战，乘机西窜模样。”他电令各路将领，要在长干山地区“聚歼该匪”。15日，当中央红军穿过敌丛，在鲁班场向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并于当日撤出战斗，不知去向，蒋介石才乱了方寸，彻夜难眠。难眠在于他画的那个圈圈似乎又破了。第二天早晨，前方急电报告“匪陷茅台、仁怀”。他火了，抓住吴奇伟有电要梁华盛师“到达香枫坝时，有匪阻我，前进即止”一端，大发雷霆，当即手令斥责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并下令周浑元代行前敌总指挥，要薛岳到贵阳管修公路和维修机场的事。薛岳和吴奇伟有口难辩，委座不是有过“匪情明了，方可大举”的明令么？冤无申处，只有大骂一通“昏君”了事。17日，前方又报知“窜匪已渡赤水河西窜”，蒋介石越发坐立不安。凑巧这两天陈诚和贺国光去‘川南剿总’同刘湘、潘文华“协调川省军务”去了，陈布雷又是一介书生，弄点政务文墨可以，打仗却是一窍不通的。蒋介石只好亲自挥毫，草拟电文，命令各路纵队一齐出动：“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在委座的严令下，5路纵队，浩浩荡荡，全都离开了才修筑起来的乌龟壳。

紧接着，当红军进入了古蔺地区，红1军团前出伪装主力的3团在镇龙山打了一仗，蒋介石更加相信“窜匪意在渡江”，这是他最忧心的，“一当朱、毛同徐、张合股，几万人变成几十万，事情就难办了。”他赓续作出了在赤水河以西古蔺地区围歼红军的部署：“周纵队主力进出鄯家渡，向古蔺方向寻匪堵截……吴纵队归周代总指挥之指挥，会合一路追剿……郭勋祺所部向仁怀、古蔺尾匪追剿……孙纵队速赴大定、毕节、清水镇一带防堵……王纵队一部进出新场北地区，寻匪截击……”他在电文最后再次写道：“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周、吴、孙、郭、王各路纵队，得令后都将主力移师赤水河以西，向古蔺地区合围而去……

令发后的第二天，3月23日下午，陈诚和贺国光匆忙回到重庆，刘湘和杨芳毓也同时前来“请安”。蒋介石颇有不快，说：“还是前方军事要紧，怎么一去这么几天呐？我的最新部署你们都知道了吧？甫澄兄，仗又打到你四川来了。”陈诚说：“我们就是为委座的最新部署赶回来的。委座，在黔各

路纵队主力都涌向赤水河以西古蔺地区，似有不妥呀？”蒋介石愣了愣，说：“怎么个不妥法？朱、毛股匪意在北渡长江，不全力在古蔺地区聚歼，将遗祸无穷！”陈诚说：“当然，能在古蔺地区聚歼更好，问题是就怕重蹈扎西之辙呀！”蒋介石惶然，说：“难道你们对窜匪北渡长江之图尚有怀疑？”他思虑片刻，又道：“不，这一次我不怀疑了。第一，他是因为上一次没能过了江，才作这第二次冒险的；第二，我们总是担心他东去湘鄂西，然而事实一再证明，他们的兴趣不在萧、贺，而在徐、张。徐、张有10万之众，又有地广人稀的川西北。第三，他们回窜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一点我也是有所估计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就看我们这一仗打得怎么样了，看他们还有多少可回窜的了。甫澄兄，元靖，你们的看法呢？”刘湘和贺国光本来同陈诚有相同的疑虑，但见委座言之在理，又估计到了“窜匪”回窜的可能性，有关疑虑的话就不想说了。刘湘说：“委座说的是，我川军只有严守江防，全力打好这一仗了。”贺国光拣现成的附和道：“甫澄兄说的是，剿匪成功，在此一举。”陈诚还是没有被说服，说：“委座既然对窜匪回窜的可能性有所估计，那么，他们回窜的方向，有可能是……”蒋介石说：“我讲了，这要看我们这一仗打的怎么样，看他还能剩多少了。剩得多，还可能回窜方向可言，要是残之又残，就只好绿林为寇，还谈何回窜方向！”

蒋介石的话没完，宴道刚执电报走进客厅，边走边说：“前方急电，朱、毛股匪昨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回渡赤水河东进……”

在座蒋介石、陈诚、刘湘、贺国光、杨芳毓，全都哑了。

好大一阵，倒是刘湘首先发话：“道之兄，回窜多少？”陈诚说：“我军各路大军正向指定位置开进，都不曾打响，自然是窜过去多少，又回窜多少了……”

刘湘回到座位上，脸上有一种难以察觉的宽松表情。

陈诚、贺国光、宴道刚都眼睁睁望着瘫了似的委座。蒋介石不声不响地靠在高靠背椅上，头朝后仰着，眼睛似睁似闭，好久好久，当侍从医生赶了来，他才忽地站了起来，大吐了一口粗气，又一掌击在案桌上，女人般的窄嗓子叫道：

“娘希屁，明天飞贵阳！”

第十四回 四渡赤水跳出“牛阵” 黔北道上二将骂娘

话说中央红军在川南古蔺山区隐蔽集结数天之后，眼看蒋介石在黔的主力纷纷北渡赤水，“牛鼻子”牵了过来，毛泽东抓住敌人“欲围未成”之机，出敌不意，挥师东进，四渡赤水。3月22日，1军团在林滩，3军团在太平渡，9军团在二郎滩，军委纵队在九溪口，5军团为后卫，一天一夜之间，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在重庆的陈诚倒是懵对了，“西窜多少，自然东窜多少了。”但在现场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却叫“朱、毛的古怪战术”弄懵了。他们都已发现“窜匪”东窜，军情要紧，也都上报了“渝辕”；但是，谁也不能明了“敌之回窜”，不敢回答“究竟回窜多少”。在金沙前敌指挥所，薛岳召集诸将领分析敌情，他发问说：“这朱、毛是怎

么了，是在茅台喝酒喝疯了不成？他们怎么又回窜了……”吴奇伟说：“是啊，他们由遵义地区北进叙、古，意在寻路北渡长江，镇龙山一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胜仗，是说不上受阻的，他们却又掉头东窜，实在令人费解。”周浑元说：“因此，窜匪究竟回窜多少，主力尚在何处，不可大意。”小诸葛孙渡也认为，“共匪素用曲线行动。此行东窜，是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实难料定。”薛岳问王家烈的看法，败军之将，神情惶然，无言以对。薛岳最后说：“各位言之有理，我薛兵团在江西是上过赣匪‘诱敌深入’的当的，贸然分兵东追，只怕是在两个方向上均遭不测。”前敌总指挥怕上当，22日下午，他还是在敌情通报中作如下分析：“匪由茅台渡河后，分两路西窜，一路经大村、鱼岔河、镇龙山；一路经石宝寨、铁厂、锅厂坪。其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龙云根据他的通报，当天数电各路纵队，再次重申“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直到26日，当红军已经进入遵义、仁怀之间的地区，薛岳还在说：“窜匪西窜成份居多”，并令他的后方辎重物资继续源源北运，形成敌我相相对进的局面。

蒋介石是3月24日飞抵贵阳的。随行的除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侍从室主任宴道刚外，还有陈诚、何成浚、顾祝同、吴稚晖、陈布雷等一帮高级军政人物。蒋介石走下飞机，机场上冷冷清清，除薛岳驻贵阳司令部的一位副官处长前来领路外，不见一个当地官员。宋美龄脸有惊异：“大令，这是怎么回事咯？”蒋介石宽慰道：“剿共要紧，剿共要紧，想必他们都在前线忙着布兵堵截东窜之匪……”

两军相战，理解对方行动的企图是极要紧的。蒋介石住进薛岳驻贵阳司令部，得知各纵队都还在原地观望未动，好不气恼！第二天一觉醒来，便要陈诚亲自电话传他的命令：“各路纵队从速掉头尾追东窜之敌，不得有误”。谁知，哪一路也不痛快！薛岳在电话上说：“薛修兄，敌情不明呀，似不宜擅举！”孙渡根本就不想动，跟陈诚说：“我们才奔袭了500里，粮草供应还没有跟上来。再说，我从这里回滇、黔边，不是还要近一点吗？”王家烈则干脆说：“我还回黔北去挨打吗？我得靠近薛兵团啊……”只有周浑元有些积极性，他在陈诚说话的口气里，得知他将取代薛岳代行2路军前敌总指挥，惊喜之下，当即表示“尽快掉头”。

“牛”大掉头难。黔北战场一时出现相对的平静。

毛泽东突然挥兵东进的“诡计”，敌人不理解，自己队伍中也有不理解的。在自己人中，不只是基层干部战士有不理解的，在高级指挥员中也有不理解的。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们懂得运动战是怎么回事，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四渡赤水”这样大的运动；他们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必须避强击弱，却难以接受眼前这样地在强敌丛中驰骋纵横；他们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对入黔以来一再放弃根据地的打算，如此毫不停顿地走下去，却又疑虑重重。因为不理解，也就有些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三渡以后便有了苗头。一渡好说，有个北渡长江同4方面军会合的前景在吸引着全军上下；二渡也值得，深入黔北打了个转移以来的大胜仗——遵义战役。三渡四渡是怎么回事？实在令人琢磨不透。

这一天，彭德怀和林彪走到一起了。近来，两个人的情绪都不高。林彪前些日子同聂荣臻提出打打鼓新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接着要他指挥鲁班场战斗，结果又没有打下来，心里早有几分抱怨。他满以为三渡赤水以后，

在川南打上一两个漂亮仗，消消心里的怨气，谁知才踏上川南地界，又奉命掉头东进了，心里的怨气反倒增加了一分。彭德怀在遵义战役后，3军团伤亡最大，那时他就想，是不是还是黎平会议曾经议决过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听说毛泽东正在同遵义上届革委会的委员们谈恢复遵义革委会的问题，心里很高兴，“很好，川北，黔北，湘鄂西，恰成三角态势；红军一当积蓄力量，便可问鼎中原！”谁知没听到什么结果，部队又出发了。三渡以后，没有什么名堂，忽又掉头东进，东进不两天，又折转南下，他实在弄不明白是要往哪里去。心里正憋着，昨天晚上，遵义战役负伤留下的几个原3军团的战士，从白区冒着危险逃了出来找到他，一个个有的手断了，有的脚断了，伤口还血淋淋的，都哭脸抹泪的要跟部队走，说是“好多伤员没能活下来，把老百姓也连累得家破人亡！”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打过大枪的军团长，没有办法带上断手断脚的，也没有时间来安置他们。他心里该有多难过，多么焦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主力军团的军团长，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牢骚起来了。

林彪说：“娘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老走弓背，不走弓弦？”

彭德怀说：“什么弓背弓弦呀，我看是麻花，走麻花！”

林彪说：“说得对，麻花，作到地图上就是麻花！”

彭德怀说：“林老弟，我看啦，凭地图打仗不行，在担架上打仗也未必行哩。秀才们放个屁，当兵的跑断腿。这样走下去何时是个头啊！”

林彪说：“本人有同感。就说10天前吧，我说要打打鼓新场，他们不同意，说我和聂荣臻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硬要我去啃骨头，结果啃掉了几百人。”

彭德怀说：“要我说，打鼓新场不该打，鲁班场也未必该打。我就是希望能停下来，搞搞根据地再说。黎平会议说到黔北搞根据地，后来又说到川黔边搞根据地，光是屁响不闻屁臭。你晓得我们甩掉的那些伤员是怎么遭罪的，又是怎么害人的吗？”

林彪说：“是呀，没有根据地，傅连璋想摆摆摊摊都来不及。你为什么不提提这些事？”

彭德怀叹息一声说：“提？有什么用？还不也是‘只及一点，不及其余’？”

……

牢骚，说重不重说轻不轻的牢骚。这个“牢骚事件”，连同后来发生的事情，虽说史不详载，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某些人物的个人命运，是有过不小影响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因此酿成党和军队内部的一场大的斗争，颇为费解，却也是万幸。

艰难的战争环境里，人的脑子往往聪明得多。

部队南下到仁怀以东的一个深山沟里，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请几个军司长“打牙祭”，参加作陪的有朱德、刘伯承。陈昌奉弄来的几只鸡还没有做好，毛泽东便同军团长们聊起天来，他说：“还是先说说话吧。要不哇，你们呷着什么都不香喽。”林彪和彭德怀一听，禁不住面面相觑。林彪在彭德怀的耳边说：“我们有好吃的了……”彭德怀小声回道：“管他的，能说说话也好，说话也是打牙祭哩。”毛泽东抿嘴一笑，没理茬儿，说：“本来早就想和大家说说话的，难得有会到一起的方便。你们在路上碰到一起是不是也

聊聊天，嘀咕嘀咕呀？该聊聊，该嘀咕嘀咕，让你们走了这么远的路，连嘀咕嘀咕都不让，哪还行么？骂骂娘也是可以的嘛。从江西出发，我同王稼祥、张闻天走到一起的时候，没少嘀咕，有时也骂骂娘。只是，他们两个都是读大书的，我也上过几天洋学堂，骂起娘来水平都不怎么样，文骂而已矣。其实，骂娘大有好处，中国的郎中先生讲，人就讲个气通气顺，一气通气顺，身体就好了，是不是呀？”彭德怀和林彪都闷着不吭声，都在琢磨那骂娘的事怎么走漏了？毛泽东笑笑接着说：“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中医学，还是说说我们的三渡四渡吧。为什么要三渡？是不是因为鲁班场一仗没有打好，没法子了才三渡？非也。鲁班场一仗打好没打好，都是想到要三渡的。先打鲁班场，再渡赤水河。想想看，你不打鲁班场，薛岳、吴奇伟能从遵义周围拔出来么？你不前出到川南古蔺地区，他能跟着你西渡赤水河么？人家不西渡赤水河，你能跳出他的圈圈么？三渡者，牵‘牛鼻子’也。善战者，不光要能指挥自己，还要能指挥敌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嘛，我们过去常讲诱敌深入，诱敌深入不就是牵‘牛鼻子’嘛。三渡如此，四渡就更好说了。本来就是为要四渡才三渡的。这一点，我想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宜宾左右的长江，我们是过不去的，没有那个本事。既然没有‘八仙过海’的本事，就只好学齐天大圣了。你以为我在那，我却到这了。也许有的同志哥要问了，你怎么把‘牛’往北牵，而不往东牵，往南牵？东边怎么行啊，刘建绪、李云杰、李韞珩不早就在那里摆好了么，他们就是要死守湘黔边，不让我去湘鄂西，再往那边把黔敌牵过去，岂不是两个‘牛群’大会合，怎么跳得出来呀？往南牵，一则有桂军廖磊部在南，二则可能堵了自己的路。所以，只有往北牵，才能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还有嘛，嘿，我们同蒋介石先生江西一别，山水远隔，牵挂挂胸，现在人家到贵阳了，还不该靠上去亲亲热热么？”

“要打贵阳吗？”林彪匆匆插问道。

毛泽东笑了笑说：“看吧，恐怕意思还是要有那么点意思的。”

正说着，一股久违了的肉香味扑鼻而来，贺子珍端着一大盘红烧鸡跨进了门槛。贺子珍生孩子以后，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她脸色红润，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又成了中央红军中三十几个女人中的大美人。她把大盘鸡肉往桌上一放，眼睛扫了扫几个军团长的神情，说：“边吃边说话吧。除了鸡，还有贵州的砣砣肉。可不许‘八仙过海’似的打飘飘，都得实实在在的给我嚼光了。酒嘛，我带来几罐，茅台！”

几个警卫员涌进门来，摆碗筷的摆碗筷，倒酒的倒酒，打牙祭的气氛上来了。

朱德以客为主，邀人入座，又连连赞道：“好香，好香啊！”

贺子珍说：“朱主席，你恐怕还不知道这菜为什么这么香吧。跟你说，这贵州鸡可不是我们江西鸡，贵州鸡半是家养，半是野放，都成野鸡了。野鸡比家鸡香不是？”

罗炳辉生性活泼，爱说笑话。他“嗨”的一声说：“贺大姐，这可就麻烦了，你是成心让我们犯错误怎么的？”贺子珍说：“怎么，你是担心我不收你们的伙食费是不是？”

嗨，润之在你们军团吃得还少吗？今天是一点回敬。”

罗炳辉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贺子珍说：“那是什么意思？”

罗炳辉说：“我们都成了打野鸡的啦！”

一桌人全乐了。

彭德怀和林彪一边乐，一边琢磨事儿。“看来，这次打牙祭是贺子珍推动和张罗的……”彭德怀想起前几天在赤水河边同贺子珍的相遇。当时，贺子珍问他：“彭军团长，你该是知道的吧，我们到底是往哪走呀？”彭德怀愣了好久没答话，他还想问问贺子珍是怎么回事哩。他说：“最近没见老毛？”贺子珍说：“好多同志倒是要我见见他，可老也没跟上。他倒好，往北走他走后头，往南走他走前头，比我们少走好多路。”彭德怀苦笑了一下，原来贺子珍心里也不舒服哩。便说：“往哪走？我也不知道，我看啦，这叫耍龙灯，龙头一摆，我们龙尾就跟着摆就是，管它摆到哪里去！”想到这，彭德怀心里禁不住乐了。谢天谢地，老毛刚才说到“可以骂娘”，不是针对那场牢骚来的。他就怕有人听了去，告了大状。现在看来，就是他在赤水河边同贺子珍说的那句话了，是贺子珍连同她自己的意思都说给了老毛，老毛说不定也意识到了工作上有疏漏之处，贺子珍怕她的润之再往心里去，误了军情大事，于是便张罗着打一次牙祭，疏通疏通。贺子珍这人有头脑、心眼儿真不错，彭德怀很感激的。便说：“子珍同志，你把我们关照到家了，谢谢你了。”贺子珍说：“彭军团长，看你说的，革命本来就是一家嘛，就是要讲个团结共事，有什么话说说就完了。”彭德怀一怔，心里说：“果然如此！”他看了林彪一眼，林彪也在暗暗地点头。彭德怀越发高兴起来，义无反顾，抓起筷子就上阵：“来啊，打野鸡喽！”

席间，毛泽东边吃边说：“南下干什么？寻找新的机动。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考虑，想给你们打个招呼。贵州，我看是不能久呆了。呆来呆去，顶多也就是江西那个局面，熬不出个什么头来的。老在贵州转来转去，也难以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现在，全国抗日热潮正在继续高涨，日本人都闯到关里来了。老是在内线战场上是不行的，得想办法到外线战场上去。到了外线战场，我们的手脚就放得开了，就能真正创造新的局面！”说到这，军团长们眼前豁然开朗，一个个全都振奋起来，喷着肉渣儿说：“原来是这样打算的！”毛泽东说：“怎么才是这么打算的，遵义会议决议就是这么写的嘛。”彭德怀说：“可不是！蒋介石安内，把我们也给安糊涂了。”

朱德接着说：“看来，等着蒋介石开笼放鸟是不行的，老毛同志说，我们自己得想办法飞出去，飞到那个活动范围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这是政治家的头脑。说老实话，老是抓到个内战打，而今眼目下，也难以得人心。你说是蒋介石要消灭你，你不得不打，可老百姓怎么看呢？刚才老彭说了，蒋介石打的旗号就是‘攘外必先安内’，鬼话是鬼话，却也难免有人会信的，你把老蒋拖住了嘛，他也是不得不打嘛。而要抗日，你在贵州抗什么日呀？当年我在云南反袁世凯，反来反去也就那么回事；后来我到四川去，到武汉去，光景就大不一样了。”

李卓然也在苏联学习过，回国后做过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能指挥打仗，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也很有头脑。他说：“我非常拥护中央和军委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未来行动的打算，红军的真正转机，不只在内线战场上打几个胜仗，而是要通过打仗，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钻到抗日前线去，那就会如鱼得水了。我希望中央在选择打出去的路线上有一个好的次策。”

毛泽东说：“到底从哪条路走出去？无非两条：一条在东，一条在西。东边的路可能近一点，但很难走得过去；西边的路远一点，但有希望走出去。”

我是倾向从西边绕的。这一来，就又有一个人走长路的问题了。万水千山，我们可能才走了一水一山。下一步是走出贵州。到底怎么走法，是不是请朱德同志谈谈？”

朱德说：“有这么一个考虑：9军团不过乌江，留在乌江以北阻击西来尾追之敌，牵制薛兵团；其它各军团，抓紧南渡乌江，渡乌江以后，兵分两路，一路示之以东，一路示之以西，尔后都向南，再向西南。这样，南北两路，唐僧取经喽。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在金沙江上游适当地点渡江北上！”刘伯承说：“具体说来，9军团明28日晨起，兵分两路，一路向长干出，一路向香枫坝，伪装主力，路上多摆些标语，多搞些炊烟，示之我将进攻仁怀，主要是阻击长干山之敌不使之南下。任务不轻，长干山有敌3个师。1军团以一部兵力袭占仁怀、遵义之间的倒流水，尔后向两翼延伸，撑开敌人的封锁线，掩护主力安全南下，直取乌江边。”

毛泽东看大家的情绪不错，说：“贺子珍让我们打个牙祭，我是借花献佛喽。各位小佛爷，怎么样啊？罗炳辉同志，你可是孤军作战啦，困难肯定要大一些，就是看上你是个云南老蛮，对云、贵地区比我们都熟，你得多辛苦了。别看你是孤军，但目标还得越大越好，手脚放得越开越好，消灭敌人越多越好。你看行吧？”

罗炳辉咧嘴笑着说：“只要不把我当陈毅甩下不管就行。”

毛泽东骤然一脸愁容，说：“是呀，陈毅他们是很难很难的了，现在还不知是怎样的一种光景……不过，炳辉同志呀，把你留在北线，仗是要多打一点，但走的路可能还要少一点嘞。主要是在战略上能有所配合。”

朱德说：“9军团在井冈山就是有名的战略奇兵。”

毛泽东又拿目光扫了扫彭德怀和林彪。彭德怀是高兴的，他的高兴是真诚的。他说：“很好。有了打算，有了目标，部队工作也就好做了。”林彪仗着自己年轻，机灵聪明，常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觉得，西进北上的方案是好的，但把9军团甩到乌江以北地区，自成一路，这未必是高招。但是，他没有说。他只是说：“搞好南北两路的联络看来是很要紧的。”

刘伯承补了一句：“13分队无线电台随9军团前进。”

……

中央红军的一个重大行动方案，就这样在打牙祭的时候下达了。

毛泽东最后说：“还得多句嘴，未来的行动方案，绝密，来往电报中不得出现‘金沙江’、‘北上’一类的字样。平时说话，连自己的堂客，不论大脚的还是小脚的，都不能透露。

知道此事的女人只有贺子珍一个，走漏风声就找她！”

贺子珍一看牙祭打到这份上，心里很高兴，正想借机乐一乐。听毛泽东这么点到她，大男子主义不是！她走到桌前，端起满满的一碗酒，挺起才当母亲的胸脯子：“谁敢说我贺子珍只是个女人，不是个男人？来吧，对饮这一碗！”

在座都哑了。

罗炳辉突然高声叫道：“对，两口子对饮吧！”

且说贵阳城里的薛岳司令部，一桌酒席也正在进行。上等的菜肴，上等的餐具。坐在上席的蒋介石，却吃着什么也不是滋味。且不说各路纵队对掉头尾追东窜之敌动作迟缓，连日来阴雨连绵，飞机不能出动，连“东窜之匪”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席间，陈诚看出了委座的愁苦，说：“委座，努力

用餐饭吧。朱、毛跳得出小圈内圈，也跳不出大圈外圈的。”蒋介石斜了陈诚一眼，拿起餐巾擦了一下带小胡子的嘴，又重重地摔在桌面上：“叫薛岳速回贵阳！娘希屁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嘛！”话刚落音，薛岳和吴奇伟匆匆走进大堂，敬礼道：“校长，学生失礼了。”蒋介石正气着，半天没说出话来。陈诚说：“二位辛苦了。”宋美龄连忙端上两杯现成的茶，走近薛岳和吴奇伟：“先喝杯茶吧。”薛岳和吴奇伟接过茶杯，手都是抖的。一则害怕，委座生气了；二则他们自己心里也有气。薛岳已经从周浑元那里得知他的前敌总指挥被取代了。他是回来复命不干了。蒋介石起身踱了几步说：“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么？为什么召都召不回来？为什么拖拖拉拉不予东进？现在倒好，连窜匪的主力在哪里都不知道了。我问你，敌人在哪里？”薛岳不是个软骨头，他转身坐下了，腿也翘了起来。蒋介石更来火了，咬着牙帮道：“伯陵，我是问你呐？”薛岳说：“请问周浑元吧，我已经在昨天把前线事务都移交了。”蒋介石为之一怔，他差点忘了他在重庆下的那道换将命令了。此刻薛岳提起，又见他气鼓鼓的，便干脆说：“你也应该想一想了，你的兵团8个师，入黔以来都干了些什么？只有土城一仗还像个样子，还是川军郭勋祺打的。一而再的被敌突破，一而再的扑空，我都替你感到脸红！你就是因为这个按兵不动的吗？”薛岳说：“委座，我们的确有失之于被突破，也有失之于扑空的，可我们没有一次的行动不是遵照委座的命令行事的。上月以来，委座曾数电明令：敌情明了，方可大举。此次共匪再度东窜，其意在何，实难料定，飞机侦察，又逢春雨；要是仓促尾追，中敌圈套怎么办？天理良心，学生伯陵跟随校长这么多年，我能有令不行，有意按兵不动么？”蒋介石的心火还是没有下去，说：“叫你这样一说，黔省剿匪战事不顺，倒是本委座的责任了？你薛岳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辞修，把那道命令……”蒋介石的话没完，顾祝同从邻室走来：“委座，周浑元电，东窜共匪并没有走多远，今晨出现在长干山东南侧，并有迹象表明是他们的的主力。”众云：“他们还在长干山？”酒席桌子已经清理，陈诚把一张大地图展开在桌面上，蒋介石走近看地图。陈诚说：“委座，这样看来，薛兵团没有贸然东进，倒还省事一些了。”蒋介石说：“歪打正着而已。传我的命令：周、吴纵队就地堵击；孙渡速取直捷，用最快速度，赶到打鼓新场、黔西一线围堵；遵、桐地区的部队严密向西警戒，待命向西攻击。显然，窜匪正举棋不定，难择东西，又一次给了我们聚歼的机会。”

陈诚和顾祝同转身去传达命令，其他人因没有吃好酒席，一个个悻悻地走了，厅堂上只有蒋介石和薛岳、吴奇伟。蒋介石说：“你们入黔以来很辛苦，这一点校长是知道的；仗打得不大好，诸多原因，这一点校长也是体谅得到的。我要跟你们讲的是，我们不光要打仗，要消灭共匪，也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要办呐，这就有个各方面该怎么照顾和处置的问题。你们是高级将领了，脑筋要多装一些事情才好。就说伯陵吧，不当总司令，当前敌总指挥，多好呀？不降官职，不丢兵权，还能把滇军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为什么要周浑元代一段？龙云在昆明有言，说2路军有薛岳任前敌总指挥，他不过是个挂名总司令。君不见他连贵阳都不来一趟么？他会不会影响孙渡呢？这是一。第二，为什么让周浑元而不让梧生出任代总指挥，是考虑到，周浑元同湖南方面关系比较深，让他同刘建绪取齐，这对于推动湘军的剿匪军事只是有好处的。所以，伯陵，梧生，你们都不要转不过弯子来。梧生仍回前线做纵队司令，伯陵就留在我身边工作一段，同陈诚、何成浚、顾

祝同一起，大家齐心协力，争取尽快解决黔省共匪。”

薛岳和吴奇伟想表示点什么，才张嘴叫了声“校长”，陈诚、顾祝同、宴道刚匆匆从侧门走来，何成浚、吴稚辉、陈布雷也从过道涌了出来。蒋介石问：“有什么情况？”

陈诚说：“共匪在刀把水突破乌江，前卫到达黑神庙，想必大部队已经……”

蒋介石顿时又脸不是色。他扬了扬手，不让陈诚再说下去。他疾步走向地图，看了看，抬头问薛岳：“刀把水是哪个部队？”

吴奇伟说：“59师黄道南团。”

蒋介石直起身子，吐了口粗气。当着薛岳、吴奇伟的面，他不想再发作。只是说：“梧生呐，你赶块回前线去吧。”

吴奇伟巴不得乘机脱身，一个立正，转身上路。

薛岳跟上：“我送送你。”

薛岳和吴奇伟走后，蒋介石说：“我们的治军是不是太松懈了？你们总是在我面前说，这个使不得，那个也使不得，丢城失地就使得了？不，这回一定要惩办！”

当晚，蒋介石签署了一道通令，查办了吴奇伟纵队59师354团团团长黄道南。通令说：“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察觉。军队如此腐败，实属罕见。推其原故，乃由各级主管官事前不亲自巡查沿河地形，详询渡口，而配置防守部队。

乃至部队配置后，又不时时察其部下是否尽职，并不将特须注意之守则而授予防守官兵。是上下相率懈怠，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此次匪由后山附近渡河，在一昼夜以上。而我驻息烽部队之主管官尚无察觉，如此昏昧，何以革命。着将该主管官黄团长道南革职查办，以为昏惰失职者戒……”

就从这天晚上起，没有薛岳的薛岳司令部，彻夜灯火通明。

陈诚说：“没想到共匪竟然南渡乌江……”

蒋介石说：“我也以为，南线是吴纵队，该是万无一失的。”

顾祝同说：“共匪南渡乌江，又是何用意？”

蒋介石说：“密切注意他的东窜。”

宋美龄问：“息烽离贵阳可是不远啦！”

陈诚说：“请夫人放心，他们不敢打贵阳的，3万人枪站岗都不够用的。”

陈布雷说：“他们当年可是几次攻打长沙啦！”

何成浚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朱、毛不会那么傻。”

蒋介石凭栏望星空，道：“辞修，明天可以出动飞机！”

陈诚说：“好的，我马上通知航空大队。”

宋美龄一脸愁容，说：“大令，我想回南京。”

蒋介石说：“你不是还想游游花溪吗？”

第十五回 蒋介石魂惊贵阳城 小诸葛东援保大驾

话说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以一部佯攻息烽，主力则南下扎佐，逼近贵阳。尔后又作两翼佯动：以1军团的一部向右指向贵阳城，意在东调滇军；以1军团的另一部伪装主力，向东指向清水江，示之以红军将东去湘鄂西。大部队则待机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南下。

这天傍晚，毛泽东和刘伯承徒步穿山过垅，他们要亲自给佯攻贵阳的1军团2师交待任务。走在途中，刘伯承自语道：“三渡以后，孙渡的动作不大，就看这回了。”毛泽东说：“你怀疑孙渡调不出来么？”刘伯承说：“事情总是有两种可能性的吧？”毛泽东说：“不，这一回东调孙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除非蒋介石什么部队也不调。可是不成啊，军师阁下。据梁兴初侦察，贵阳城里，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只有4个团。蒋介石是个精明人，他不可能为了‘剿共’连自家的身价性命都不顾。要调，只能调孙渡。9军团在乌江以北牵制着周、吴两个纵队，调不动；他也不可能调王家烈的，他信不过；他当然也可以调东线的部队，但是，我们已经前出到清水江了，他还敢调么？他要调，老子也不让他调了。”毛泽东特意用了四川人爱用的‘老子’，显得很有信心。刘伯承连连点头道：“透彻，透彻！”他想了想，又问道：“他要真像你说的，什么部队也不调，稳坐钓鱼台，作了我们不敢打贵阳的判断，又怎么办？”毛泽东说：“好啊，他完全可能有这方面的判断，也需要他有这方面的判断；他要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判断，而是绝对地判断我要打贵阳，就拖不住他了。我真还怕他早早地带着堂客开溜，没法托他帮这个忙了……”

说着，他们来到了2师4团的休息地——山村后的树林。师、团干部都在。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4团团长沙耿飏，政委杨成武。他们一见毛泽东和刘伯承匆匆走来，后面还跟着几个参谋，心里都很高兴，叽叽咕咕：“有任务了！”师政委刘亚楼，24岁的精干小伙子，脸庞儿轮廓秀气，又能说会道。他迎着毛泽东和刘伯承，便叽里呱啦说开了：“毛委员，总参谋长，我们师呀，满登登的；最近伙食开得也好，刚才还打了个牙祭，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干部嘛，下放来一批，自己又提了一批，还有多余的塞在战斗班里呢。情绪嘛，就更没说的了。嘿，我们军团长已经给我稍稍自由了一点点，我们要……”他伸出胳膊在空中画了个大勾，还要往下说：“这主意太……”毛泽东扬扬手，笑了笑说：“我说刘亚楼呀刘亚楼，你要是个女人就更麻烦了。你还让不让我们说话呀？”刘亚楼“嘿嘿”了两声，还是甜言蜜语地：“我知道，毛委员对我们2师，嘿，没说的，一向印象好，有光荣任务，当然得首先给我们，2师喽，是不是，我没猜错吧？”毛泽东说：“好吧，算你刘亚楼嘴甜。”

就在一棵大树下，警卫员们把围观的战士往一旁吆了吆，毛泽东便同师、团干部谈起佯攻贵阳的任务来。毛泽东说：“这个任务不大也不小，不重也不轻。看地图。你们呐，就4团一个团便行，从这，经过这，去戳戳这几个地方，这，这，还有这！为什么要戳这几个地方呀？你们都知道了吧？蒋介石和他的那位俏夫人现在正在贵阳城里，你不戳戳他，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他家门口呐。就是要戳得他心惊肉跳，大呼救命。叫谁呀？叫孙渡。孙渡赶来贵阳保蒋介石的大驾，不是就不在那边碍我们的事了？明白吗？”刘亚楼和陈光是从林彪那里知道那个“大勾勾”的，自然一听就明白东调孙渡的意义。刘亚楼很高兴，扭头跟陈光嘻嘻说道：“这回呀，你可得让我了，我带4团去！”陈光比刘亚楼大4岁，性格沉稳一些，说：“毛委员，这个任务倒是不错的，也很要紧，可就是完成任务的标准不大好掌握呐。”毛泽东

“唔？”了一声，陈光接着说：“我是说，他调不调孙渡，得从他的电报电话里才能知道，万一窃获不到呢？万一他娘的吃了豹子胆……”毛泽东皱了皱眉头，又看了刘伯承一眼，说：“就是啊，我和总参谋长来，就是想找你们想想办法的。”刘亚楼此刻在一旁独自叨咕着：“心惊肉跳，心惊肉跳，要戳得他心惊肉跳……”他忽地掉过头来，说道：“有啦！除了戳他的城东城西两个出口，再戳他的清镇飞机场。蒋介石的座机就停在那里，他能不大呼救驾吗？”陈光的脑子也活动开来，说：“对，佯攻出口的部队，多贴些标语：打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保叫他沉不住气！”毛泽东和刘伯承都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就这么办！电报电话的事你们不用管，我找其他人弄去。还有一点是很要紧的，要尽快赶到贵阳城下，越是天气好越要动作迅速。”刘伯承补充道：“毛委员的意思，天气好，啥子座机就可能上天，他娘的要是跑了，你还吓唬谁去？”

“明白了！”师、团干部齐声答道。

且说蒋介石果然在第二天出动十几架飞机，在贵阳东、北两个方向上轮番侦察，侦得红军一部直下贵阳，一部向东窜去，他便急急召集将领们开会讨论“窜匪的行动”。因空中侦察未能侦得红军主力之所在，会议一开始，便就“窜匪主力位置”展开了一场争吵。陈诚说：“显然，匪之指向贵阳的一部，是其主力的侧翼警戒，或是打援的，主力似在贵阳东北角，成东窜形势，图谋同他们的2、6军团会合。”顾祝同说：“未必，未必。他既然还是坚持东窜湘鄂西，有什么必要南下到刀把水来渡乌江，而不在渡赤水以后直接东窜？匪之有意隐蔽主力，空中侦察不到，就不宜作通常的判断，认定主力是在前卫的某个适当位置。”何成浚比蒋介石年长几岁，1905年的老同盟会员，眼下虽只是武汉行营主任，却又是蒋介石的老幕僚，说起话来爱摆老资格。他说：“是呀，这是个极要紧的问题。指挥之误，莫过于视觉之误。视觉失灵，便是戏台上的三岔口了。余之所见，匪之主力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尚在息烽以西地区，觊觎王家烈，妄图重演遵义之战的故技也未可知。”正说间，宴道刚走进厅堂，说：“委座，各位，周浑元金沙电，长干山之敌气焰嚣张，乃敌之主力，今晨猛攻我前沿，肖团损失严重。”众皆哗然。陈诚起身道：“匪之主力还在乌江以北？不可能，不可能……”蒋介石见众人不语，点名问薛岳：“伯陵呐，你看呢？”薛岳本不想说话的，委座点到，不能不说。他叹息一声说，“我早就有这个感觉了，朱、毛在茅台喝酒喝疯了，都成了疯子，疯子！主力还在长干山，可以对付我们一个个的整团，一部却又窜到这边来了，相距数百里，这怎么解释？我的意见，还是守城为要。刚才辞修说，匪之主力不可能还在乌江以北，我也是这么看的，那又可能在哪儿？只有一种可能，隐蔽集结在临近贵阳的东北角。要是这样，可不是好玩的了。城内空虚，吴、周纵队又受阻过不来，王家烈还可能在看我们的笑话。我们可不能要空城计呀……”薛岳所说，使蒋介石感到惊恐。他压了压说：“这个，这个匪之主力在乌江以北的可能性是小的，这个长干山当面之敌不是小股，也是这个大体不错的，他主要还是要防着薛兵团。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话，那么就是讲，他的这个主力是已经南下了。那么，就无非两种可能性：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二是再东窜湘鄂西。这两者，本人认为，还是这个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怎样，都威胁到贵阳的安全。为此，这个，作这样的部署：调湘军两个师到余庆防堵；杨其昌部3个团到施秉、镇远防堵；李韞珩部向余庆急进，堵截匪之东窜；桂军廖磊军到平越、牛场一线堵截；

周纵队和黔军沿乌江北岸布防；吴、孙两个纵队分路向东追击前进，直至占领清水江以西地区……”蒋介石的话似完未完，他仰靠在椅子上，不吭声了。

陈诚近前问道：“我们就照委座所示下命令吧？”

蒋介石没动身子，只挥了挥手：“下！”一会，他拉直身子道：“讲漏了最要紧的一点：孙渡部东调贵阳，命令先下！”

当晚，蒋介石还是不放心孙渡的东进命令，又连发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电报给孙渡，令孙渡“速率全部向鸭池河、镇西卫、清镇前进。并望激励将士，兼程猛进，当有一旅于4月1日晚赶到镇西卫宿营。万勿延误。”时隔一个时辰，他又手令孙渡“亲率本部星夜赶至镇西卫待命。”又面告宴道刚：“安排车辆，到镇西卫接运孙部驻防清镇，看守机场。”

却说蒋电发到黔西孙渡司令部，王家烈正在那里做客，两个地方军阀头目正酒足饭饱，说得热闹。王家烈说：“阁下，朱、毛这回来了个南渡乌江，你看是什么意思呀？我看呀，他们是硬要将那么一军哩，你我有热闹可看的了。”孙渡说：“绍武兄，热闹不热闹，反正你我还得大面子上过得去才是。我好办喽，我背后还有个龙老板，你老兄可是顶了贵州这块天的，抽掉你没人扶一把啊？”王家烈说：“是呀，上一回我就差点杀身成仁了。哎，我说孙老弟，我王绍武真要到了那一天，就只好投奔你们龙老板名下做个食客了，到时候还望老弟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孙渡说：“也别说得那么凄惨，大不了到哪里混个闲差。”正说着，电报到了。孙渡看完电报说：“老兄不幸言中，真热闹起来了。”王家烈问：“怎么回事？贵阳的？”孙渡说：“要我东进，显然是保驾勤王啦！”王家烈愕道：“怎么这么快啊，他们前天才过乌江嘛！”副官赓续又送上两份电报，孙渡接阅后说：“万万火急，看来，不东进不行了。”王家烈说：“老弟说得对，大面子总是要过得去才是。”孙渡一边整装一边说：“那，我就失陪了？我得先赶到安旅去。”王家烈说：“好吧，你走我也走，回金沙，路上跟共产党打打夜战去。”

孙渡走后，王家烈还没有来得及上路，便有龙云从昆明发来的密电，令孙渡不要东进，“所部速退回安顺、镇宁，确保滇黔要道。”留守副官知道“王主席”脑子里装的什么货色，也就不跟王主席保密，并问王家烈怎么办：“是不是把孙司令追回来？”王家烈说：“天都这么黑尽了，上哪追去？我看啦，让他去，你们孙司令年轻，说不定此去还能谋个什么前程，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那位机要副官竟依了王家烈，压下了龙总司令的电报，孙渡也就“违命”连夜率部东进贵阳了。

孙渡因保驾有功，后来日益发迹，最后做了兵团司令和省主席；只是那位机要副官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被龙云撤了官职，发配回乡做小生意去了。这是后话。

且说4月3日，蒋介石的行辕（还是薛岳的司令部）一片恐慌和忙乱。飞机侦察，红军一部已经由扎佐进至沙子哨、新添寨一带，离贵阳城只有几十里；在贵阳以东的福泉县境，也多处发现“敌情”。几部电话在呼叫。宴道刚在呼叫龙云：“龙总座，贵阳吃紧，孙部现在在什么位置？”龙云还蒙在鼓里，说：“贵阳吃什么紧呐？我让他们移师安顺、镇宁一线了。”宴道刚压下电话，跟一旁的蒋介石说：“龙云反了，他把部队西调镇宁……”蒋介石的眼睛里直喷火。顾祝同在呼叫何键：“何总座，共匪有袭占贵阳迹象，是否请令李云杰部速渡清水江西进？”何键在电话里说：“过得去么？刚才接李韞珩电，他们侦得有匪一部在清水江架设浮桥。”蒋介石夺过电话：“情

报可靠吗？”何键没有听出委座的嗓音，说：“可靠不可靠，你们离得那么近嘛！我这里是湖南的洪江。”蒋介石只好压了电话，一转身，宋美龄在呼叫南京的何应钦：“敬之，情况很不好很不好呀，请速派飞机，两架飞贵阳，两架飞昆明！”蒋介石惶然的神色，变成了眉头锁紧，他不知道事情是不是真就糟到了这等地步。他正在琢磨何键的电话：“匪在清水江架桥，这该是个不错的迹象，说明……然而……”不等他琢磨透彻，薛岳上前拿起电话：“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要周、吴纵队不惜一切代价南下贵阳吧？”蒋介石没置可否，抬头见陈诚走了过来，问道：“辞修，事情果然会很糟么？”薛岳没再摇电话，同蒋介石一起眼睁睁地盯着陈诚。陈诚显得比较沉着，说：“不必慌乱，给我个把团固守这山城一隅，也能抵挡一些时日的。”薛岳说：“哪里有成团的人给你呀？几个团都在外围防守！”蒋介石说：“把王天锡找来！”

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正想危难时刻冒险立个大功，以图官运通泰，闻讯后不几分钟就跑步赶来了。在这之前，他以贵阳城里军阶最高的人物给委员长请过安。一见面，蒋介石就问：“王天锡，你手下有多少？”王天锡说：“委座，打大仗不行，打小仗还是够的。我有个宪兵营，还有两个消防连，加上警察，有400多人。”蒋介石说：“好，你就把你的人马组织起来，把行营四周城垣上的碉堡都加固起来，之后同我的别动队一起，警卫行营，严查附近户口和过往行人。你看，事情能办好吗？”宋美龄补充道：“事情办好了，委员长不会亏待你的。”王天锡挺胸道：“委座有令，万死不辞！”王天锡领命而去，蒋介石看了宋美龄一眼，说：“我想起当年在中山舰救孙先生的事了……”

当晚，月色降临贵阳城。蒋介石步出行营，他要亲自查看一下行营四周的碉堡修得怎么样。沿城垣走了半圈，他火了，“娘希屁！光是麻袋围个圈圈顶什么用呐！这还像个做师长的带人修的碉堡吗？郭思演失职，失职！”郭思演原是99师师长，因蒋到贵阳，薛岳特意把他抽了出来，留在贵阳做警备副司令。陪同视察的就有薛岳在，他想到自己的一关还没有过去，也就无心为郭思演申辩什么，他还加了一句：“这也太马虎了！”陈诚一看也的确不像个样子，不在它到底有多大用处，用得上用不上，对委座的命令如此敷衍塞责，是不能容许的；又见薛岳是那么个态度，他当即把话传了下去：“撤了郭思演的师长职务！”

第二天又是个雨天。上午，蒋介石又在案前琢磨何键的那个电话。由何键的电话，想到跟前的人对敌情的掌握如此的糟，一个整天过去了，“窜匪”到底是不是在清水江架设浮桥，还没有得到证实，他心里又不免生起薛岳的气来。他正想同薛岳谈谈“及时掌握敌情”的问题，顾祝同骤然仓皇走进厅堂报告说：“委座，前面来电话，匪一部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蒋介石怔了好一阵，才问道：“水田坝，水田坝在哪里？”顾祝同说：“东北角，距贵阳30里。”蒋介石没有慌神，他起身看了看墙上的地图，说：“东北角？那是向东去的，向东去的？”不等顾祝同答话，宴道刚又匆匆走进：“乌当和清镇来电话，清镇机场附近发现敌人的便衣队！”蒋介石这才脸色白了，厉声道：“叫王天锡！”王天锡昨晚就奉命住进了行营司令部，他闻讯赶来，蒋介石说：“王天锡呐，也该你立个大功了。你去准备一下，挑选20个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两顶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王天锡走后，蒋介石实在是坐立难安了。“辞修，你是不是太大意了。

共匪显然是要断我后路啦！”陈诚说：“委座，果有不测，我陈诚罪该万死！然而，我还是不解，机场出现的为什么是便衣队？”蒋介石恼道：“你不要再耍你的小聪明了！”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孙渡带随员跑步来到门口。

“委座，孙渡前来报到。”

蒋介石眼神发呆，差点晕了过去……

且说中央红军进入贵阳东北角的福泉山河，滞留了好几天，只有小动作，没有大动作，原因是未来行动的时机和路线，一时还难以最后决断下来。人们忧心的不是黔中的周、吴两个纵队8个师，也不是湘黔边的何键、刘建绪近10万敌军，而是滇军孙渡部的6个旅是不是调得出来。本来，无线电侦察分队早几天就窃得了蒋介石致孙渡的两份火急电，令孙渡东援贵阳，大家正高兴着，却又窃得龙云致孙渡的电报，令其回退安顺、镇宁地区。孙渡到底听谁的？没把孙渡难住，倒把毛泽东他们难住了。周恩来说：“不管滇军是不是东进贵阳，我们还是要按原计划前进，无非到那边困难大一点就是了。”毛泽东说：“当然，在这里停久了也是祸事。想不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怎么样，明天？”刘伯承说：“是不是再等上天把，孙渡到底是东进还是回撤，情况还不明啦。”正在这时，参谋报告：“杨成武带着一个便衣队回来了。”毛泽东“哦”的一声：“快叫过来一趟！”杨成武和他的便衣队，是冒雨摸黑从贵阳城南绕回来的，此刻正在院子里的屋檐下抖落雨水，听有人叫他，便跟着来到后院的堂屋，抬头见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不觉一惊：“你们怎么跑到这前边来了？”毛泽东说：“等你了嘛。”杨成武说：“孙渡的几个旅都调过来了，说不定还有驻到三江铺来的。”“是吗？”毛泽东很是兴奋：“快说说！诸葛亮加上个鲁子敬，正把这几位曹孟德难住了。”杨成武说：“我带便衣队袭击清镇机场，刚那么弄了一下，天就黄昏了，一支部队就从老王冲那边开过来了，小跑着，看装备，法国货，孙渡的？抓了两个一问，果不然，孙渡的第8旅。两个家伙还都是小参谋，不，小副官。据两个家伙说，他们开动了5个旅，一个旅进城，一个旅驻清镇，一个旅驻三江铺，另外两个旅驻哪，说是看薛司令的用场。首长，我们没误事吧？要从时间上说，袭击机场好像是马后炮了。可是，不钻到那里去，两个舌头又可能抓不到，多少还是有些收获的。”像是约好了似的，毛、周、朱、刘都同时长长地吐了口气。

周恩来说：“谢谢你，杨成武同志。”

朱德说：“也该谢谢蒋介石喽，他又帮了个忙。”

刘伯承说：“看来，我们向东的动作可以大一点了。”

毛泽东说：“说得对，清水江的浮桥要多架几座。”

周恩来说：“你的意思是，让孙渡再往东边挪一挪？”

毛泽东说：“他不是还有两个旅没有地方宿营吗？”杨成武乐着，说：“嘿，你们啦，比我这个便衣队长还鬼！”

且说蒋介石在兵临城下的境况中，原本对孙渡的“援贵”已经不抱希望，正在思虑着有朝一日如何整治龙云的时候，孙渡却一身战尘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显然是“抗命援贵”呐，蒋介石是何等的惊喜和感动！他热泪盈眶，连声叫着“之舟！之舟！”只差没有喊出“你为君我为臣”来。孙渡倒觉得受宠若惊了，惶然道：“委座，事情很糟么？”蒋介石说：“共匪南窜，一部已经到了清镇，一部到了三江铺一线。贵阳，几乎是座空城。”孙渡轻轻地

笑了笑，说：“委座，放心好了，我的6个旅过来了5个旅，至少，贵阳是守得住的。”他随即说了部队的开进情况和现在各旅的位置，又道：“委座，到清镇之匪，乃小股便衣瞎窜，是谈不上迂回贵阳的，我部一到，他们就不见影了。”蒋介石说：“东边可是闹得凶了，到处张贴标语，说是打进贵阳城，活捉我蒋某。嘿嘿，当然，有你之舟到贵阳，我也就大放宽心了。之舟，你们这次星夜兼程，辛苦了，犒赏第3纵队3万银元，到贵阳的各旅各1万元。以后凡作战有功的、都赏。现在，请洗漱一下，行营为你洗尘。”孙渡感恩不尽：“谢委座。”

酒宴后，蒋介石要薛岳督令孙部各旅如期到达指定位置，抢修工事，全力守城。他要同孙渡“继续交谈一下”。交谈中，蒋介石才察觉到，孙渡并没有接到龙云的那个令其回撤的电报，他心里又不知是何滋味了。加之孙渡说到：“此次紧急援贵，尚未报知龙总。”蒋介石便“嗯嗯”地想了想，对，乐得知之为不知，剿匪战事要紧，不必现在就去加那个“楔子”。再一想，又觉得不妥，龙云还能不追究他的参谋长么？他一追究起来，暗地里找孙渡的麻烦，岂不乱了孙渡“援贵”的决心。他便说：“之舟呐，你就放心吧，这次令你东援的电报，是同时抄发给你们龙总的，按说他是知道你到了贵阳的。我想，他要是顾大局的话，他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就是要他龙云到贵阳来，他也得来的吧？”孙渡听着，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便说：“倒也是，这次率部东进，行色匆匆。要是耽误几分钟，给他发个报也就好了。他也许有话了？告御状了？”蒋介石不正面作答，说：“地方上的官长，大都有那么一点，总怕自己的那一块块怎么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土地爷还要保一方的平安嘛。”小诸葛不难猜测到，龙老板已经有怨言了，便说：“委座，我这次紧急奉命来贵，事前没有报知龙总，他肯定是不痛快的，他这人我知道的，这些年来，我们并非外间传说的，合作得那么亲密投机。委座，他要是抓住我的什么，有为难学生之处，还望薛总座他们在这边帮忙开脱开脱。”蒋介石见孙渡自己把“裂缝”摆了出来，便慨然道：“何必找薛岳，有我呐。”

不光是当前有事可以找我，以后有什么事，也可以找我。岂有此理！我在这里，各省各军都得听我指挥，这是有言在先的。”孙渡讨得这样的几句，也感动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说：“委座，他无非是不让我东进。不，他就是明令不让我东进，有委座的命令，我也要东进！”蒋介石说：“说得对，党国利益至上！对你来说，之舟，大不了离开云南，外面的天地可是比西南一隅大得多啦！”

一席酒后的交谈，变成了一场投靠与收买。孙渡从此以后便日益疏远龙云，最后脱离了龙云，在蒋介石的麾下，做了兵团司令和热河省的省主席。

当晚，蒋介石的心情踏实多了，他想睡个好觉。他有好几宿没有睡好觉了。他想就在办公室兼作战室里搭个行军床睡，免得女人打搅。他刚要宽衣躺下，便有被撤了师长职务、正在泡茶馆的郭思演打来电话。侍卫官问委座接不接，蒋介石说：“他还有什么说的？不接，告诉他有事找陈诚去。”侍卫官说：“他说他有重要情报。”蒋介石只好接过话筒，郭思演在电话里说：“委座，我是郭思演，将功折罪，有重要情报向委座报告：共匪已经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蒋介石咬着牙帮说：“要是情况不实，我军法从事！”不等他把话筒递给侍卫官，陈诚走来说：“委座，可靠情报：窜匪在清水江架了4座浮桥。”蒋介石思考片刻，说：“刚才郭思演打来电话

说，匪东窜龙里、贵定，看来情况属实了。娘希屁，今晚的觉又睡不好了。叫他们来，孙渡也到。”

灯火大亮，众将领都来到了作战室。蒋介石说：“我早就作了这样的判断，窜匪意在东窜。现存已经证实，他们是要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再出湘西回江西。机会又来了，诸位。部署嘛，大体还是日前的那个部署：何键在东；徐源泉、郭勋祺在北；廖磊在南；周、吴纵队和王家烈在西。考虑到乌江以北还有溃散的一股，周、吴纵队有可能难以全部东进，所以还须加一项，孙渡部留两个旅防守贵阳即可，另外3个旅向东追击前进。诸位，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匪已走头无路，东不成西窜，西不成东窜，看起来眼花缭乱，实际已是黔驴了。

知道黔驴的故事吗？”

“黔驴技穷。”不知谁填了一句。

蒋介石说：“对，一定要在清水江以西地区聚歼解决问题！”

陈诚说：“关于部署，是不是再下一次命令？”

蒋介石厉声道：“下！”

第十六回 花溪戏水美龄再受惊 东进道上孙渡险毙命

话说中央红军向东佯动，蒋介石再次上当。他把能东调的孙渡纵队继续往东调，令其“马上出发，向龙里、贵定方向追击前进，首先开赴黄平、施秉附近防堵，奴该处无匪情，继续赶到镇远附近迎头阻击。”才上钩的孙渡要表一番忠心，部队每个人又得了两块大洋的奖赏，劲头也不小。于是，一天之间，孙纵队的第2旅便到达了贵定的瓮城桥，第7旅到达了龙里，第5旅已经过了图云关正向虎场前进，都远离贵阳近百里。这一来，贵阳城再度空虚，四郊也呈空白。就在这挡上，红军出其不意，掉头向西，再次逼近贵阳，在作佯攻之举的同时，向南一拐，在贵阳以东40几里的黄泥哨至观音山之间，穿过湘黔公路，向黔南进发。

事有蹊跷。就在红军再度威胁贵阳、向南拐向黔西南的4月9日这一天，蒋介石却偕夫人宋美龄，在几位幕僚的陪同下，在城南花溪公园游山玩水，完全不知道“朱、毛窜匪”在眼皮底下作大的战略行动。

游园之举是宋美龄促成的。宋美龄时年30出头，一代女骄，正在由“娇妻美妾”向“男人与政治并重”过渡。她既有年轻女人的娇羞作态，又初有“当一半家，作一半主”的锋芒。她不参与军事指挥，但陈布雷起草的文稿，她是一定要过目的。正因为女流者也，不谙军事，近来受惊不小，吃不好，睡不安，国色天姿大有损伤。这天一早，在两个女佣的侍奉下，她费了不少工夫把自己打扮了一番，但还是大有“空施粉黛”之感。她转身找到她的“大令”，怨艾道：“你看呐，我都成什么样子了？昨天何应钦从南京飞来，见到我问蒋夫人在哪？都不认得我了。大令，我们还是到哪里散散心去吧。”蒋介石这些天忙的，连女人的兴趣都大落了，哪里还顾得上夫人是什么样子。此刻抬头一看，他也愕然了，跟前的夫人，哪里还是宋家的三小姐，都快成了营养不良的家庭主妇了。他心里顿时泛起了一片怜爱之情，便说：“对不起，夫人，这些天来没有顾得上关照你。说的是呐，反正‘窜匪’已

经东去，又一次聚歼之战也已部署就绪，是该松弛一下了。你不是老想着那个花溪吗？我们就到那里去玩玩，驱驱到贵州来的霉气，如何？”

宋美龄小姑娘似的跳了起来。

号令发出，宴道刚出动了半个别动队，连同王天锡率领的一队宪兵，立即提前赶往花溪，把个山水秀丽的公园“洗”了个人净路幽。

车队来到花溪门口。下得车来，蒋介石便给宴道刚打了个招呼：“今天谁也不许谈战事，让夫人玩个尽兴。”宴道刚领命，当即通报了随从人员，并令别动队和宪兵也“回避”到背静处去，“别让夫人见到心烦，懂吗？”

这天天气也好，雨后放晴，又值盛春，满园滴翠，小河流碧。进得园来，宋美龄一见好山好水，神色果然大为改观。“大令！”当她同“大令”相依着走在河边山石间的小路上时，她眉飞色舞地赞叹了起来：“花溪，花溪，果然是花之溪，花之山咯！”蒋介石附和道：“是的是的，一地有一地的山水之美。”兴致上来，宋美龄的话便打不住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都埋怨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咯？太不公平咯。地要平了，就没有山的青水的秀了，还有什么招人之处？天要老是晴着，也就没有雨后的这般景色了。雨后复斜阳，良辰美景咯。大令，你说是吧？”蒋介石只是笑了笑，不曾作答，他实在无心山水，他脑子里还是他画在清水江以西地区的那个“圈圈”。他扭头看了一眼吴稚辉和陈布雷，示意他们陪夫人说说话。两个文官派上用场了。吴稚辉说：“夫人说的太有见地了！没有山和水，中国的文化便不堪设想了。没有这奇山异水，便没有中国画，哪里还有吴道之、唐伯虎呀？”陈布雷跟上：“岂止没有吴道之、唐伯虎，连李白、杜甫，乃至李时珍、徐霞客，也都没有了嘛，整个中国文化就大为失色，不堪设想了。”宋美龄放慢脚步，同吴稚辉、陈布雷走在一起。她见“大令”独自走在前头，心里有些悻悻然，说：“还是文化人，互为知音。我原也是喜欢艺术的。我们三姐妹，大姐不说，天分差一点，我和二姐庆龄，从小喜欢音乐美术，曾经有志于文化事业的。谁知，二姐跟了孙先生，搞开政治了，越搞越糊涂；我呢，一跟上他就剿共，剿了八九年，剿到这里来了。什么时候我也能跟你们一样，随随自己的心愿就好了。”陈布雷说：“这全怪共产党作乱！”宋美龄说：“说的是咯，要不是共党作乱……呃，你们倒说说，这该死的共匪就那么几万兵卒，怎么就这么难剿呀？前些天还叫他们吓的，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似的……哎，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吴稚辉迎脸笑道：“夫人，我们还是谈山水吧。”陈布雷想起了委座打的招呼，也连忙把挑起来的话头往回拉：“稚辉兄儒雅仙骨，酷爱山水也。人道是，人不可无浩然之气，也不可无雅然之趣。还是学古人好。古人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者，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者也。我们今天就醉倒在这山光水色之间好了。瞧这水，时而明静如镜，时而飞瀑如帘；山色倒影，鱼在白云间，真能把游者醉入神仙境界了……”宋美龄听着，觉得似有不对头处，她望了一眼前面闷头走着的“大令”，怅然道：“是不是共匪此次东去，前线会有大的麻烦？”吴稚辉说：“不不，前线有麻烦，委座还能让我们到这里来玩赏山水么？玩我们的好了，瞧这水啊，真是高山有好水……”宋美龄有些恼了，说：“亏你们还是剿匪的舆论专家，今天倒避讳起剿匪之事来了。”陈布雷乐得做个“近臣”，他朝前面蒋介石的背影努了努嘴，悄声道：“夫人，委座一片深情呐，进园便有号令，今天游园，谁也不许谈战事，要让夫人全身心地饱赏这山水之美！”宋美龄问道：“是吗？”吴稚辉说：“一点不错。”

宋美龄“咯咯”地笑了，引得园中的几只喜鹊也“嘎嘎”地飞出了枝头。

夫人紧走几步，陈布雷和吴稚辉快步跟上，他们赶上委座，一起步入一个飞檐舞角的凉亭。宴道刚早已候在凉亭中，他连忙指挥几个随身侍从，端上备好的茶水糕点。人们坐定，抿着花溪水泡的龙井。蒋介石神情不错，比乍进园时显得轻松多了。然而，当他才问了一句夫人“怎么样”，突有王天锡匆匆跑来，他一头大汗，神色惊慌地报告道：“委座，请，请回城吧。城，城南发现匪情，正朝花溪方向窜来！”顿时，在座的轻松神情一扫而光，全都哑了。宴道刚急问道：“离这里有多远？”王天锡说：“也，也就二十几里！”宋美龄禁不住失声叫道：“上帝——”她叫了上帝又叫大令：“大令！别动队，别动队——”吴稚辉和陈布雷也慌神了：“王司令，你的宪兵队呢？”蒋介石起身道：“胡说！这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宴道刚又问王天锡：“你怎么知道这消息的？”王天锡说：“电话。宪兵3连连长的电话，他们在那边为行营办山货，叫共匪全抢了。”蒋介石转了个圈，“嗨”的一志，又扬了扬手说：“不必惊慌！那定是流落的散匪，成了饿鬼，合伙打劫行商罢了。想想嘛，共匪几天前就东去了，孙纵队也追了上去，怎么还能有成股的在这边？不理它，我们玩我们的，喝茶！”他的话音刚落，远处传来“嘎嘎”的枪声，一声接一声，由稀而密。蒋介石也愕然了，问王天锡：“这是怎么回事？是你说的那个方向吗？”王天锡说：“是的，就是那边。”

难得花溪一游的游人们脸色全白了。顿时，枪声把别动队员们从隐蔽处召了出来，路口，山头，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整个公园竟是战场一般。宴道刚叫道：“委座，这不像是流落的散匪呀？”蒋介石强作镇静，他不能当着他的幕僚和警卫们表现出他的惊慌失措来。他举目远处，在沉闷的枪声中自语道：“不要紧的，枪声离这里还远……噢，陈诚他们来了。”片刻，陈诚和薛岳小步跑了上来。陈诚禀报道：“委座，共匪并没有东去，主力掉头向西，又向南折去，似在观音山以东地段穿越湘黔公路，方向看来是黔南。”蒋介石的脸色由白转红，又由红变青：“向南去了？这枪声是怎么回事？”陈诚说：“这是他们的侧翼警戒部队同我们的宪兵队遭遇上了，已经相持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厉声骂了起来：“娘希屁，又叫他们的几座浮桥把我们骗了。孙渡呢？孙渡哪里去了？”陈诚和薛岳对瞧了一眼，都把话压在舌根底下。蒋介石提高嗓门：“问你们呐，孙渡在哪？他干什么去了？”陈诚说：“委座，孙渡的情况有些不妙，据他的警卫报告，他的车子在半路上遭共匪伏击，现在下落不明。”

蒋介石半天才吐出两个字来：“什么！？”

薛岳说：“委座，别动大队都来了，还是回城吧？”

脸色铁青的蒋介石显得疲惫不支，叫两个警卫架着走出了凉亭。宋美龄是用滑竿抬出公园的。

且说中央红军在孙渡的3个旅9个团东进过龙里以后，才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的一个狭窄口子上，以急行军的速度穿越湘黔公路向南进发。几路纵队说不清楚，反正像鸭子翻田坎似的，几个钟头就全过去了。这时，担任左、右警戒的几个连队，他们原是1军团先头团的，现在变成后卫了。在右翼谷脚警戒的红1团3营，得到后卫部队的信号，正要撤出阵地，随后卫5军团南进，忽然从贵阳方向开来一辆小汽车，车顶绷着伪装网。8连连长孟庆生说：“宪兵队送的礼不够意思，又来大礼了。给我打！”一阵枪响，汽车趴下

了。只见从汽车上钻出好几个来，有的倒在公路上，有的朝山上跑去。孟庆生挥枪带着一伙人冲了上去，地上的3个没气了，有一个伤了左腿。看看车里，车里只有一付望远镜，几包香烟，一把盛茶的铜壶。“指挥车？”孟庆生连忙叫两个战士把那个俘虏伤员架进路边的树林，一审问，方才知是孙渡的指挥车，孙渡跑掉了。孟庆生说：“他娘的，真还是份厚礼呢，可惜跑了。”有战士说：“他跑不多远的，我去把他捉回来！”孟庆生说：“算了，让他去指挥他的部队东进吧！”他们没法把带伤的俘虏带走，只好给他裹了裹伤，给了他一块银元，让他自己找地方活命去。

孟庆生带着他的连队撤出警戒阵地。大半天的警戒，等于休息，战士们体力都好，一个长跑，超越了后卫，回到了1军团的序列。天气已经炎热，连队停在一条小河边洗脸休息，大家正在说说闹闹，只见几付担架沿河走了过来，孟庆生想：“军委纵队的？毛委员说不定就在担架上。”他很想见见毛委员，他有好久没有见到毛委员了。要不是毛委员在越城山里解了他身上的绳索……他正琢磨着，一付担架在他跟前停了下来。孟庆生走近几步，果然是毛泽东从担架上跨了出来。孟庆生高兴地叫道：“毛委员，你好啊！”毛泽东点点头，问孟庆生说：“你们是在右翼打阻击的吗？怎么这么快就赶上来来了？”孟庆生说：“是呀，得到信号，我们就撤出阵地往前赶了。”毛泽东又问：“还顺利吧？听说你们在那边还打了一仗，伤亡情况怎样？”孟庆生说：“伤亡倒没什么，就是没有打好，跑了个大家伙。”毛泽东不禁愕然：“跑了个大家伙，什么人啦？”孟庆生说：“滇军长官孙渡。他坐着车子从贵阳出来，也赶巧了，正要从我们阵地前穿过去，我们一个急速射击，打死3个，打伤一个，跑掉了两个，当中就有孙渡。”毛泽东听着，轻轻地摇了摇头，随即又皱了皱眉头：“好家伙，你们真行啊，把孙渡打了……”孟庆生顿觉惶然，问道：“毛委员，打错了吗？”毛泽东沉默了好一会，说：“算了算了，打就打了吧，谁叫他那么积极为蒋介石卖命哩。呃，我说你这个同志哥，我们好像在那里见过，你叫什么名字呀？”孟庆生心里有事，听毛委员的口气，好像不该打孙渡，心里一犯愁，也就没心思去提他同毛委员的那段交情了，说：“毛委员，我也琢磨着，是该让孙渡去指挥他的那几个旅向东去，别打搅他。可是，我们事先不知道车里坐着的就是他呀，他小子也太冒失了，孤家寡人地在路上跑……”毛泽东又哈哈乐了，说：“你这个当连长的，真还有些头脑嘛。说的对啊，就是该让孙渡指挥他的部队往东走得越远越好。不过，打了也有打了的好处，打他个魂不附体，他以后碰到我们红军，就得考虑考虑该不该毛手毛脚的了，对吧？噫，我刚才问你叫什么名字呐？”孟庆生这才说：“毛委员，你忘呐，在越城山里……”他说着，一边做了个双手被捆的动作：“想得起来不？”毛泽东“哦哦”两声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吵吵要回江西的，叫你们的排长大人把你光着膀子捆在一棵大树上，开你的斗争会，孟庆生！是不是？”孟庆生笑哈了腰，只顾连连点头。毛泽东又道：“你呀，真还给我添了点麻烦，有人说我是同情右倾，我们俩右到一起了。怎么样？你好像不怎么右嘛，当连长了嘛。”孟庆生说：“什么左呀右的，就是不想打湘江上的那种败仗而已。”他说着朝大个子的毛委员勾勾手，让毛委员弯下腰来，他贴着毛委员的耳朵说：“早就当营长啦！扎西整编，下放，现在是大材特用，营级干部的连长。”毛泽东听说“大材特用”一词，禁不住又乐了，说：“你们1军团的人真能创造，还有‘大材特用’的说法，不错。哎，我说孟庆生呐，你可别犯愁，好好干，你的尾巴

会长起来的……”

他们正说着，周恩来和王稼祥从河边洗完脸走上坡来。毛泽东向他们招手道：“快来快来。恩来同志，稼祥同志，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朋友，1军团的营级干部连长孟庆生！”孟庆生给周恩来和王稼祥敬了个礼，嘿嘿地笑着说：“首长有事，我走啦。”毛泽东说：“别忙别忙，我还没有介绍完哩。你们还不晓得这位孟连长在谷脚干了件什么事吧，他们把孙渡的车子打了，孙渡差点命赴黄泉。让他再给你们说说。”周恩来和王稼祥听说打了孙渡，才洗过的脸绷紧了，但见一旁的毛泽东神情泰然，才又放松了放松。孟庆生说了一遍打孙渡的经过，最后说：“首长，这事干得不怎么样，刚才毛委员给我说了，可能添麻烦了。”周恩来说：“唔，你这一功呀，恐怕只好先欠着你的了。”王稼祥说：“这一来，滇军恐怕就不会走得太远了。”毛泽东说：“所以呀，我们得加快速度，尽快进入长顺地区。”周恩来说：“孙渡还有两个旅正在由安顺、镇宁东进，要给部队打招呼，不能恋战，各走各的。”毛泽东说：

“说得对，两姐妹回婆家，你朝你的东，我朝我的西。”

孟庆生这才完全明白“打孙渡”的麻烦所在。他“叭”的一个立正，把手举到帽沿前说：“首长，给我个处分吧！”

周恩来“嗯”了一声，把孟庆生的手拉了下来，说：“你不是毛委员的朋友吗，哪有朋友处分朋友的呀？去吧，我们马上要给你们林军团长一个命令，1军团今晚就得占领长顺城。”

却说惊魂花溪的蒋、宋一路人马，像是自己在哪里被“围剿”了一番似的，车鸣马啸，搞得一路鸡飞狗跳，行人骂街。回到贵阳城里，一进入行营，蒋介石便倒靠在案前的高背椅上，瘫得像是不能理事一般，当侍卫官端来洗漱的面盆，他都懒得动弹，只是从牙缝里吐出几个字来：“都去都去！”

侍卫官们退到门口守候着，厅堂里只有蒋介石独自一人。他眯着眼睛想呀，想来想去，竟想起了他的“新生活运动”。他的“新生活”中有一个“信”字，信者诚也，诚者实也，诚实之道，便有个“责之于人，不如责之于己”一说。是啊，“共匪”再次东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以至又南下黔南，迢迢千里，何至如此？不怪天不怪地，就怪自己的人无智无能呐。于是，他便一个个地琢磨起自己的手下来。他认为，周浑元是情有可原的，他被罗炳辉一股阻于长干山以西；王家烈也是不可苛求的，他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川军和湘军也都各有自己的防守任务，求之太多也有不当。还有谁呢？薛岳是自己留在身边的，嫡系中只有个吴奇伟了。对，最可恼的就是这个吴奇伟！这个吴奇伟，遵义之战打了那样的败仗，这次又是先失机于仁怀以东，后失机于乌江两岸。他要是在这两地把窜匪堵住，哪里还有后来这些事情……他越想越是这么回事，他从靠背上直起身来。椅子响动，侍卫官从门口走进来候命。蒋介石说：“叫陈诚和薛岳。”说完，他便拿起案上的纸笔，手书电令：“对此区区残匪，既不敢进攻，犹恐被匪诱入夹击……如此旷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纵匪之逃窜而已。军人至此，精神安在？虽知残匪无几，而且疲饿不堪，何畏之有？况既明知其诱我深入，则我可预事防备，将计就计，正为军人运用智力之良机，奈何避之不敢进也。属忠属逆，且看来日，望自酌之。”他刚一甩笔，陈诚和薛岳奉命走了进来。蒋介石说：“我起草了个电令，你们看看。”陈诚和薛岳看了看电稿，眼睁睁地望着委座，他们不知道电令是发给谁的。蒋介石说：“这

回你们不能再为他说话了！”他随即数落了一通吴奇伟的不是，“他要是在那里堵那么一下子，也不致造成今天的局面，是不是？”陈诚和薛岳这才明白委座是要处置吴奇伟，两个人都傻了眼，有话却不敢张嘴。蒋介石说：“马上发出！”陈诚应了声“是！”蒋介石又说：“孙渡现在下落不明，一个纵队司令呀，我们在江西伤亡最大的官长，也就是个师长张辉瓒，这叫我怎么给龙云交待？之舟可以说是抗命东援，我视同嫡系……”陈诚一看委座还气在这一头，便说：“委座，孙渡的遇险，也怪我和伯陵兄。我们原也是劝他不要单车往东去的，担心路上有散匪，他急着要赶到前线去，没有劝住，果不其然……”

陈诚的话没完，门外一阵脚步声，一身穿着官兵难辨的孙渡，一脸尘土走进门来：“委座，我回来了！”

整个厅堂都哑了。

蒋介石一看是孙渡脱险归来，心头又惊又喜，又恼又怒，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竟是痴人一般，想说什么却说不出。陈诚和薛岳大怔之后，说：“之舟兄，委座为你很是担心啦！”孙渡说：“委座，学生大意了，有劳委座劳神挂牵。”蒋介石这才从坐椅上缓缓地站了起来，咬了咬牙帮，又坐下说：“挂牵算什么，你是党国之大材嘛，天有不测，岂不是一大损失？到底是怎么回事？坐下说。”孙渡便说了说他的被伏击，他的脱险，他的穿山过水逃到龙里，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贵阳见委座。最后说：“我就是想到委座惜将如子，便赶进城来问安；也怕因此流言四起，有损剿共大业。委座，这没什么，为将在军，不过小事一桩。渡稍事休息后将再返前线。”蒋介石说：“不必了，不必了，你好好休息一下，你的部队也就地在那边休息几天好了。”孙渡愕然，看看陈诚和薛岳，问道：“军情有变？”陈诚说：“共匪主力已经在观音山东侧越过湘黔路，进入黔南了。”孙渡眨了眨眼睛，不由得“唉”的一声，头也埋了下去。好久，他才抬起头来：“怪不得如此蹊跷，竟在出城30里的地方遭敌伏击……委座，下一步如何打算？”蒋介石起身踱步，边想着边说：“前一段，我们的判断是粗糙了一些。窜匪既然在长干山地区还留有一股，力量还不小，能顶住我两个纵队，又怎么会分兵去湘鄂西呢？要说是乌江以北的一股是为了牵制我主力，阻我追击，从战术上讲，也不可能拉开这么大的距离呀！失算，失算了。”他停了停接着说：“那么，现在，我请你们想想，匪之主力到底在哪里？乌江以北的一股也是自称主力的，是不是？”陈诚和薛岳一听，顿觉愕然，委座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莫非共匪主力在北不在南？陈诚和薛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共匪主力要是还在乌江以北，他怎么会跑到清水江去“示之以东”？但他们谁也不想当面指出委座判断的幼稚和可笑。他们心里有数，委座今天受惊不小，脑子乱了。蒋介石又追问道：“说啊！窜匪才三几万人，岂敢开辟两个战场？”陈诚只好说：“委座，诚如伯陵兄所说，朱、毛已经成了疯子。对于疯子，作一些超越常规的判断是必要的。诚以为，作共匪主力仍在乌江以北的判断，公算起来，根据恐是不够充分。伪装主力，是共匪惯常耍的花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的这一股，不曾摆开主力架式，其实是大可能是他们的主力的。诚以为，主力不主力，主要还是看匪之头目、他们的指挥机关在哪里。而这，正是我们的难处，我们还从来没有侦察到过匪之首脑的具体位置，这也就给我们在判断匪之窜逃方向上带来极大的困难，也是匪之所以能在我们眼皮底下窜来窜去的原因所在。”蒋介石点了点头，把目光指向薛岳。薛岳早就不

想作什么战略战役上的分析判断，他怕再出错，便说：“辞修说的对，侦察敌情不好，判断起来困难。这事，一半怪我，一半怪天，天无三日晴……”

蒋介石早已精神不及，但还是想听听孙渡的意见。他扭头一盯孙渡，像是才发现孙渡的狼狈样似的，心里禁不住暗自乐了。心中一乐，又来了几分精神，说：“之舟哇，你这个西南诸葛亮，这回可是失街亭了，小失街亭。说得对，小事一桩，失了街亭的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嘛。你可要振作起来，下一步你的任务也许更重……”

孙渡胸脯一挺说：“我听委座的。委座要我往南打我就往南打，要我往北打我就往北打。”

蒋介石说：“很好。这个嘛，今天就不谈了，我还得想一想。就这样吧，你快去洗刷一下，换换衣服。我们都有些累了。”

“谢天谢地。”陈诚和薛岳都在心里嘀咕着。

显然，毛泽东他们在贵阳周边成功地玩的声东击西、示北而南的把戏，给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的智力也是一个损伤，他们对红军主力在南在北都一时无从决断了。

第二天，蒋介石一觉醒来，他的头脑才清醒过来。昨天晚上他睡得不错，这要归功于夫人的提示，睡前宋美龄给他说了：“大令，不管怎么说，共匪已经南逃，这还是我们的胜利。”他是咀嚼着“胜利”两个字昏然入睡的。今天一早醒来，他再次咀嚼着夫人的“提示”。咀嚼来咀嚼去，由于脑子好使多了，他才发现，“共匪”两度威逼贵阳，不战南窜，固然可以说是我之胜利，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呐。“代价有二。”他在心里说：“一是上下胜利信心有所挫伤，连何成浚都在说：让他们流窜好了，看他们流窜到那个爪哇国去！二是兵临城下，为将为帅的难免有失态之处，声望攸关，也是极需注意的。”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高级将领会议，整饬一下上下。他还在床上，便在电话上发出号令：“本日午后，就在绥靖公署，高级将领能到的都到，还有政界负责人，我要训话。”

头脑机敏的蒋介石，在高级将领会议上，一开头便说：“我此次与诸君在贵阳相见，这种机会，是很不容易多得的，将来革命的历史上，必可以留下一个最有价值的纪念。”神情和气势都是很像个样子的。他接着说：“现在剿匪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大家要晓得作战不好用呆板的办法。所有的战略战术，都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量敌为谋，随机应变。各位高级将领对于这一点没有十分注意，因此到现在，剿匪还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从战场指挥官的位置上跳了下来，把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了他的手下。这就是说，你们不要再有什么“怨天”之言。再往下，他大篇论述了“共匪”的几大弱点：“共匪”不熟悉民情、地形、道路；处在我之大小包围之中；已经饥饿疲困之极；所到之地，既不能停得太久，又不能跑得太快；兵力奇少，越来越少；等等。大大鼓作了一番“胜利信心”。他的逻辑头脑也是不错的。在座都是高级将领，谁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共匪”这样的不行，你在黔省亲自指挥的不下5次的“聚歼”，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为此，蒋介石又掉过头来夸赞了一番“共匪”的战略战术：“共匪的一大长处，就是惯于运用掩护战术，他只要找到10里或四五里正面的空隙，就可以安全窜过去。他的掩护部队配置得相当之好，例如此次……他配备在底坝的掩护部队，据我判断，最多不过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数的部队，便牵制了我们在息烽的一师多兵力，何等巧妙，何等的巧妙呀！”他说到这，稍有停顿，会场

上便有人拍起巴掌来。蒋介石举目看去，是吴奇伟！吴奇伟的巴掌像是在他胸口抓了一把，脸上禁不住有了些愠怒。他不能再有失态之处，他迅速从尴尬中脱了出来，继续下边的话题。

他根据《孙子》的“围地篇”和“死地篇”，讲了8条战术原则。他最后说：“现在，共匪已经陷入围地和死地，我们如果还不能将他消灭，那还能做人吗？！”

吴稚晖很赞赏蒋的高级将领会议，“明智之举，明智之举也！”他代表非军界人士在会上发言说：“当此共匪南北流窜之际，无论军界、政界，都应该有个清醒头脑，上下同心同德，军政协力相助，区区共匪，谈何剿灭不了之理。本人对中国匪史小有研究，愿在这里贡献给大家：历来流窜西南一隅之匪患，不论多寡，都是末日到矣！”

没有清醒过来的是孙子的后代孙渡。孙渡被核准不参加“高级将领会议”，他整整睡了一个时日。当他睡足睡醒以后，诸葛亮还是没有“亮”起来，不知面临的危难。怪不得后人只知道广西有个“白诸葛”，不知云南有个“孙诸葛”。孙渡作为滇军支柱——6个旅18个团的前线总指挥，他既没有去琢磨一下他的紧急援贵，东出黔东，会在他和龙云之间发生什么冲突，也没能去想红军南下黔南，会同他的云南、他的滇军有什么关联。在这之前，龙云在知道他率部援贵以后，曾数电于他：“若匪窜过贵阳后，我军应即暂行告一段落，停止前进。”他一概置之不理，只听委座的。事至于今，他还不曾把他统领的滇军大部推进到黔东、自己险些丧命这样的大事向龙云作出报告。直到这天晚上，滇省驻贵办事处主任黄毅夫来找他，递给他龙云的一件绝密电，他才顿然有悟，连声骂自己“该死，该死！”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第十七回 紫云城老裁缝赠衣 北盘江敌营长献船

话说“云南王”龙云，并非一个昏庸军阀，他始终不为“第2路军总司令”的头衔所动，时时警惕蒋介石的“假途灭虢”。蒋介石到贵阳已有时日，他作为第2路军的总司令和省主席，连礼节性的应酬都没有，足不出滇。幕僚劝他，他说：“反正人家是战场指挥官了，何必去碍手碍脚。”他不想走刘湘的路，更不想做王家烈第二。他也知道，防备着蒋介石的“假途灭虢”，最要紧的还是个孙渡的问题。孙渡要是被蒋拉了过去，他就成了个光杆司令，釜底抽薪，灭虢成矣。因此，他在得知孙渡率部“援贵”以后，便立即派了他的耳目到了贵阳，名之曰“为孙渡办些事情”。此人便是黄毅夫，公开身份是云南省驻贵阳办事处主任。龙云对孙渡的“违命援贵”，本来早就不满，“他的东援贵阳，是有个人目的的！”龙云正在筹划着怎么把滇军调回滇、黔边境，这一天，忽有黄毅夫密电，告知孙渡率部东进黔东，孙渡本人险些丧命。龙云气的火冒三丈，大骂了一通“狗不看门，何以为食！”他要召回孙渡，“撤了他的参谋长！”电文都起草好了，幕僚孔繁跃、周钟岳赶来，劝阻道：“主席，使不得，使不得。蒋介石还在贵阳，我们能把他召得回来么？只怕是把他推得更远了。再说，共匪已窜入黔南，黔南就是滇东呀！万一匪窜本省，获罪于蒋，麻烦就更多了。”龙云一听，倒也觉得是理，便息了息

火说：“那该怎么办？就这么共产党还没来我们就完了么？”幕僚说：“还是两方面都考虑到吧，后续的几个旅不能再到黔东去。”龙云依了幕僚的劝说，给黄毅夫发了个密电，要他转告孙渡：后续旅团“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将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切要！切属！”

黄毅夫就是拿着这个电报来找孙渡的。孙渡看了电报，一看龙总座如此火气，他也火了，“我有什么办法呀，君命难违嘛！他要有什么异议，给委座讲好了，犯不着就断我的炊嘛！”想了想，又觉得现在就同龙云闹僵，不是时候，委座也不一定赞同。他也知道黄毅夫是干什么吃的。便接着说：“老兄，我是军人。军人是怎么回事，你该是知道的吧？君命在先，还是侯命在先？我难啊老兄，我可是差点连命都掉了……”黄毅夫说：“参座，龙主席龙颜不悦，也就是担心你的险遭不幸呀。委座都说了，在江西也只是战死一个张辉瓒。当然，龙主席考虑的还不只是这个，参座是知道的，他历来是很看重本省利益的。在先，匪窜滇东北，他很着急；现在匪窜黔南，离省城更近，他能不更急吗？你是带兵打仗的，这方面你比我懂。万一吴三桂似的，都涌进了云南，滇军却远在黔东，该怎么办？”孙渡一挥手，不让黄毅夫再说下法，说：“老兄，叫你这样一说，我的责任就大了。这么吧，请从速报告龙主席，请他给委座一个电话，我马上回师。”

孙渡等了两天，也没有等到委座令其回师的命令。第三天，他求见委座，要求回师滇黔边，也说了龙总座的意思：“委座，现在匪窜黔南。龙总的意见，云南吃紧，滇军理应守土堵剿赤匪。”蒋介石说：“之舟，回师是要回师的，但不能回到那边去。连王家烈都懂嘛，剿灭赤匪，要不分畛域，要有个统一指挥。”原来，蒋介石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两条：明的一条是他的判断和部署，他判断中央红军进入黔南后，不可能南进广西，也不大可能西进云南，大有可能是绕道清镇、安顺之间，进入黔西同罗炳辉部会合，尔后另谋他途。他是从这一判断出发部署兵力的。暗的一条是计谋。他想，红军即使西进云南，那也不错，如同数月前薛兵团进驻贵阳，中央军也就可以跟进昆明了。因此，他接着说：“你们纵队可以回师到安顺、镇宁以西地区，待桂军由南向北把窜匪压迫过来，便可同周、吴、王纵队形成夹击，歼匪于织金、黔西地区。”孙渡斗胆问道：“委座，匪若窜入滇省怎么办？”蒋介石轻轻一笑说：“即便如此，你们已经到了安顺、镇宁以西地区，要往西进，还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孙渡又问：“委座，龙总方面有电话给你么？”蒋介石说：“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孙渡无可奈何，只好回电龙云：“本部不日将回师滇黔边，守土堵剿，总座勿虑。”孙渡的这一手，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龙云，缓和一下他同龙云的冲突。事实上，他的部队在回师的半路上，在安顺、镇宁停下来了。孙渡的电报，叫龙云空喜欢了一场，反而松懈了滇东北的防务。

且说中央红军进入黔南以后，由于蒋介石的误判和瞎指挥，赢得了一个脱离强敌的大好时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长驱直入，连克数城，完成了西进黔西南的任务。

这期间，两军上层之间的斗智斗勇，无甚精彩之笔；倒是在下层颇有些奇闻趣事，不可不述。

那是4月11日，南进的中央红军突然掉头向西，左翼1军团奉命占领长顺和紫云两座县城。林彪把攻占紫云城的任务交给了红2团。紫云城里有一个营的民团武装，200来人。团长、政委命令团侦察排进城，交待说：

“少数民族地区，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把情况搞清楚，不要太惊动了老百姓。”城里的民团哪里知道红军来得这么快，他们正在为自己升格当正规军忙活着。前几天，他们接到上峰的命令，全营要被扩进犹国才的某旅某团去。说是能拉起多少人，就当多大的官。营长就把全营的人分成三拨：一拨下乡抓壮丁；一拨搜缴鸟枪大刀；一拨在城里筹办服装。营长李有才劲头可大了，壮丁抓了上百，鸟枪抢了几十支，城里的服装也做了几百套。这天上午，李有才正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训练抓来的壮丁，“一二一”喊得震天响，红军便衣侦察排从后山上下来了。李有才一看，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跟他抓的壮丁差不多，他高兴极了，“又弄来这么多！”便大嗓喊道：“快来快来，都给我站好。唔，十好几个嘛，你们就编成一个排，老子一会就给你们派个排长来。衣服嘛，一会就给你们发，都是新家伙。咦，是谁把你们弄来的？”侦察排长说：“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李有才更忘乎所以了，说：“好样的！我说哩，我们是正规军啦，不干是傻瓜！”侦察排长说：“老子才是正规军哩！”他一挥手，几个侦察员上去，就把李营长拧了，枪也下了。李有才还以为是壮丁造反，说：“弟兄们，用不着这样，你们要是不愿干，走好了，行不行？”侦察排长说：“我们是红军！”李有才顿时两眼就翻白了，被抓来的壮丁乱作一团。侦察排长朝天一枪说：“你们乱什么，不当白军当红军嘛！当然，回家也是可以的。愿意当红军的跟我走！”侦察排押着李有才上了紫云大街，一路喊着：“乡亲们，我们是红军！大家不要乱，照常开店做生意！”李有才也在侦察员的“提示”下，一路吆喝着：“凡我民团的，都回二衙门集合！有枪的带上枪，有铳的带上铳……”霎时，紫云城里挂起了许多红旗，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欢迎红军进城。原来萧克的6军团西征时，有一支部队曾经到过紫云，紫云的老百姓都知道红军是打土豪的，“欢迎红军回来打土豪！”的口号声喊得震天响。

欢呼声中，红2团继续前进，王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的4团在紫云城里停了下来。

当天傍晚，紫云街上响起一支锣鼓队，十七八个男女抱着大摞大摞的衣服朝4团团部走来，为首的老裁缝给哨兵说：“我们要见红军官长，有要事相商。”4团政委杨成武闻声走了出来，问道：“老大爷，有什么事呀？”老裁缝说：“你是什么官长，团座还是团副？”杨成武说：“算个团副吧。”老裁缝说：“是这么回事，本县民团在本店定作了两百套军服，他们没来得及拿走就完了，丢了烧了又可惜，我看你们用得着的，就送你们吧，也算是我老汉对红军的一点意思。”杨成武一时愣住了，不收吧，是军衣，老百姓不会买来穿；收吧，这些衣服还可能是裁缝老板的。便问道：“老大爷，他们给钱了没有哇？”老裁缝说：“嗨，别说衣服还没有到他们手上，就是到手了，他们还能给我几个钱？”杨成武翻了翻新做的军衣，布料手工都不错。私下里想，要是穿上这些衣服扮个国民党兵什么的，倒是挺好的哩。便说：“老大爷，这些衣服我们要了，多少钱一套？”老裁缝说：“多少钱一套？红军官长，我要是卖衣服来的，还敲锣打鼓干什么？我是赠衣啦！”杨成武连忙说：“不不不，那可不行啊老大爷，红军是有纪律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老裁缝说：“红军官长，求你也替我老汉想想，我做了这些衣服，没朝民团要到钱，倒朝红军要起钱来了，往后我还怎么在这紫云做人？只好跳北盘江了。不行，你得给我收了。街上的人都在说我了，说我给该死的民团……”老裁缝说着，眼泪水都淌出来了。杨成武一看不收不行，白拿了又犯纪律，

便说：“老人家，这么吧，衣服我们收了，布钱我们给，缝工的工资由我们来开，就算是你老人家操心给红军做了两百套军衣，反正我们杂七杂八，什么都穿的，你看行吗？”

老裁缝感动的老泪纵横，拿过锣锤，把铜锣敲得咣咣的：

“我是给红军做的军服喽！我是给红军做的军服喽……”

再一件有趣的事是北盘江上“敌营长献船”。

前出紫云30里，便是黔西南最大的河流北盘江。西去云南，必渡北盘；欲渡北盘，必走白层。白层，是贞丰、兴仁的门户。右翼3军团奉命夺取白层渡口。4月15日黄昏时刻，军团先遣团参谋长蓝国清带1营赶到白层渡口东岸。据事前了解，白层因地处要冲，常有重兵把守。果然，经侦察，河西渡口小镇驻有犹国才的一个营，渡船和商船也都停靠在河的对岸，河面又水深流急，无法涉渡。蓝参谋长成了“难参谋长”。1营营长说：“管他的，先火力侦察一下吧？”蓝国清说：“要打就来猛一点，能弄过来两只小船也不错。”营长亲自操机枪，蓝国清亲自喊话。一打一喊，对岸毫无动静；再打再喊，小镇灯火全灭了。

干部战士全愣了，“空城计么？”正观望着，蒙蒙夜色中，从对岸划过一只小船来，一个打小白旗的在船上喊：“红军弟兄！我是营长副官，你们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商量，请别开枪。”蓝国清一看守敌有这一手，求之不得，便说：“你过来吧，就是有事要同你们商量商量啦！”营长副官上得岸来，问道：“哪位是红军长官？我姓刘，刘副官。”蓝国清说：“我就是。刘副官，有话请说。”刘副官说：“红军长官，我们是不是和气办事？我们黄营长说了，只要不打，好说好商量。他要我过来问问红军弟兄们有什么事？”蓝国清说：“到这里来还能有什么事？就是要过河嘛。”刘副官说：“就是过河？过了就走？”蓝国清说：“也算是借路，借上三两天就行。”刘副官一跺脚说：“嗨，这事好说，我们营长也是这个意思。船只、渡口给你们用几天，我们到山上宿几天营就是了。”蓝国清没想到事情是这么简单，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刘副官说：“犹国才犹司令的。嘿，不瞒长官说，我们不想跟王傻瓜王家烈那么干了。王家烈现在怎样？鸡飞蛋打喽。”蓝国清又问：“是你们犹司令要你们给我们让路的？”刘副官说：“那倒不是，这全是我们黄营长拿的主意。其实，嘿，要打，我们也打不过你们，你们连机枪都有。”蓝国清说：“这倒是实话，我们不光有机枪，还有炮哩，刚才搞火力侦察，就是想看看明天天亮的时候，炮弹往哪里落……”刘副官连忙扬手道：“别别，可别动炮。我们不是答应让路了吗？”蓝国清说：“可不能言而无信！”刘副官说：“明天一早，我们的人撤出小镇，我带几个弟兄帮你们调船。要有坏心，杀我们几个的头，行吧？”蓝国清说：“就是嘛，都是中国人，何苦呢，现在该……”他本想说几句抗日的道理，又怕泄露什么，便改口说：“都是些穷弟兄嘛，何苦为那些有钱人东跑西颠的。”他说着叫了一声“1营长！”又道：“这位弟兄摸黑过江来，辛苦了一趟，总该……”营长明白参谋长的意思，转身找到供给员，拿了10块银元来。银元在供给员的背上磨得锃亮，月光下雪白雪白。1营长把雪白的银元递给蓝国清，蓝国清转手把银元递给刘副官，说：“今晚辛苦你了，这是一点小意思。拿去和你们黄营长买壶酒喝吧。”刘副官接过光洋，抖着手说：“这……我这个营副官，一年的薪水，除了吃穿，也就10来块钱。好吧，我收下了，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明天看我的就是了。”他说着转身要走，走出几步又回头说：“我们营长上年就花

过红军的大洋，嘻……”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小镇江边清静清的。晨光中，只见刘副官领着几个船工和半个班的徒手士兵走下坡来，在刘副官的指点下，船工和士兵分头上了船，解缆的解缆，撑船的撑船，5只木船便全部划了过来。刘副官跳上岸来：“请红军过江喽！”1营长一声号令，一个连队从土坎后跳了出来，涌向木船，第一批过了江。过了江的连队，进入小镇，果然镇上不见一个敌兵。1营长回到江边给了信号，蓝国清便指挥另外两个连队分批上船过江。过得江来，蓝国清找到刘副官说：“不错，刘副官，言而有信。能见见你们黄营长吗？”刘副官说：“参座，我们黄营长真还想见见你们，可这心里头，嘿……”蓝国清越发觉得有点什么蹊跷事，随即又想起了刘副官昨晚临走时说的那句话，“我们黄营长上年也花过红军的光洋”。他说：“为红军办好事，我们还能把他怎么样呢？请告诉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正说着，红军营长领着白军营长来了。红军营长说：“参谋长，黄营长有事一求。”蓝国清说：“黄营长，有事说吧。我正想见见你啦。”黄营长说：“上级有命令要守住这个渡口，万一守不住也不能随便就放弃。你们就这样过去，恐怕不大好，还是假打一下吧。”蓝国清问：“你的部队在哪里？”黄营长说：“那个小山上留有一个班。都枪口朝上放几枪就是，然后我们撤，你们占那个山头。”蓝国清朝1营长说：“这个忙是应该帮的，你去安排一下吧。”而后，蓝国清便同黄营长聊了起来：“黄营长，你该不是当过红军吧！”黄营长说：“不不，我没有干过红军。我要是干了红军……”蓝国清又问：“跟我们红军共过事？”黄营长又摇头：“也没有。”蓝国清再问：“家里有人当红军了？”黄营长还是摇头：“也没有。”蓝国清怕问僵了不好，把话打住了。黄营长却反问起他来：“参座，你们的朱德总司令也要打这里过江吗？”蓝国清不觉一怔：“噫，你见过我们的朱总司令？”黄营长说：“见过，还听过他的讲话哩。”蓝国清更糊涂了：“这又是怎么回事？”黄营长说：“我就全说了吧，参座。我原是王家烈手下的营长，遵义那一仗，我带伤被俘了。我们一伙被俘的军官，不论带伤不带伤，都被带到遵义城里，一边治伤，一边学习。有一天，来了个讲四川话的红军，他给我们讲话，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讲当兵的该到抗日前线去打鬼子，完了就讲对我们的优待，说愿意当红军的可以当红军，不愿意当红军的可以回家，还要发给路费盘缠。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红军的总司令朱德。我正带着伤，又是营长，不敢当红军，就邀了几个同乡，领了路费，回家了。走到半路上，几个人一琢磨，怎么能回家种地呀，手都生了，也不想去吃那个苦。回王家烈的部队吧，又觉得对不起红军，当着朱总座的面，我们都表白过的，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再干白军。怎么办？得找个端碗的地方呀，便设法投奔了犹国才犹司令，犹司令的部队都在这黔西南一角，王家烈是号令不动的，心想到这边来干，不可能再碰到红军了。不曾想，你们还是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蓝国清自语了一句，接着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黄营长心里“咚咚”直跳，说：“参座，我让路借船，不给红军添麻烦，算个将功折罪总是行的吧！”蓝国清说：“我不是笑我们冤家路窄，是笑你没白花了红军的几块大洋。呃，你不是想看看我们朱总司令吗？瞧，他们来了。”黄营长一看几匹高头大马来到了江对岸，他却害怕了，说：“参座，我看到就行了，看到就行了。我还是归我的队伍去。”说完，也顾不上“蓝参座”允许不允许，拔腿就朝坡上跑了。

朱德和刘伯承连人带马渡过江来，打发警卫员找到蓝国清。朱德说：

“嚯，你这个蓝参谋不简单啦，听说在这里办了场外交？谈判对手呢？”蓝国清说：“他很想见你，可又害怕，跑了，才上坡去。”朱德问：“是不是在云南干过的，是我的旧部呀？”蓝国清说：“不是，他没有在云南干过，倒是在王家烈手下干过。”他接着便说了说黄营长的情况。刘伯承说：“这么回事！那也用不着跑嘛，说来，他也算是我们的旧部嘛。”朱德说：“你这就言过其实了，他怎么会是你我的啥子旧部嘛？”刘伯承说：“怎么不是呀？俘虏大队不是红军的俘虏大队么？从红军的俘虏大队出来的，不是旧部是啥子？”朱德笑笑说：“你这不叫言之有理，叫辩之有理。叫你这样一辩，真还有必要见见这位旧部了。”

据说，蓝国清当天还真找到了那位黄营长和刘副官。黄营长和刘副官还在白层街上办了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了朱德和刘伯承。还说是酒席宴上，犹国才正好来了电话，刘伯承和犹国才还在电话上说了很长的话……属真属假，难以查证，不便细说了。

西进云南途中，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贺子珍负伤。

那是在渡过北盘江向兴仁的行军途中。当时，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杨厚增 8 位大姐随 4 团行动。遇敌机空袭时，贺子珍为保护伤员，扑在钟赤兵的担架上，钟赤兵没有伤着，她却 7 处被炸伤，昏迷了一个整天没有醒过来。抬着她走了一整天，她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她问杨成武：“你们是不是告诉毛委员了？”杨成武摇摇头说：“还没有，大姐，就等你醒过来。”贺子珍说：“做得对，不要告诉他。他事情多，别耽误他。”到第二天晚上，毛泽东还是知道了，便带着傅连璋赶到了 4 团。7 位女红军见毛泽东到，都赶来宽慰他。贺子珍自己也说：“没么子要紧的，都是弹片伤，擦破点皮也算一处哩。”毛泽东说：“我不管你多少处伤，那是傅连璋的事。我要跟你讲呀子珍，我们毛家死的够多的了，你不能再加数了。就说从江西出来的这一路上，我们不是已经丢下一个了？三分之一，也可以了嘛，还要叫我把你也丢下？”毛泽东的话真挚，深沉，当中不无抱怨，那也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对妻子的负伤非常难过。贺子珍听毛泽东提到毛家牺牲了那么多，特别是提到丢下的孩子，心里一恸，眼泪就滴出来了：“润之，以后我小心点就是，可别为我耽误了行军打仗的事，哦？不好意思的，是，给团里添麻烦了……”毛泽东在贺子珍的床前坐了半个钟头，问了问 7 位随团行动的女红军的情况，便转身去给 4 团的干部讲形势和任务去了。

贺子珍的负伤，大家都很难过，但谁也不认为是件多么不幸的事情。被围追堵截的红军，流血牺牲原本是家常便饭。只是在几年后，贺子珍因伤难痊愈，不得不到当时的苏联去治疗，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女人撞进了延安那个不平常的窑洞，人们这才明白，蒋介石的轰炸，没有炸垮红军，却炸散了军中一对美满夫妻……

然而，当时他们谁也不曾想到那是悲剧的开始。

毛泽东走后，蔡畅问：“子珍啦，想吃什么不想？”

贺子珍说：“他刚才的那几句话，真还把我惹饿了。”

康克清说：“好，好，毛润之胜过傅连璋。”

傅连璋在一旁说：“那还用得着我不？”

刘英恨道：“你这个傅傻瓜！”

第十八回 红军入滇龙云乱阵脚 出使昆明薛岳舞清风

话说中央红军在白层和者坪渡北盘江后，继续分兵西进，1军团连克安龙、兴仁、兴义等地，3军团进至兴仁以北之安姑一带。兴义城，何应钦的家乡。“赣匪”们谁个不知道何应钦其人呀！部队进入兴义县城，一改过去找“干人”（穷苦的人）交朋友的宿营方式，都抢着钻进了何姓的洋楼别墅，把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吓得削发的削发，画脸的画脸，还有半夜里下嫁长工逃之夭夭的。部队纪律有些松懈，却也美美地休息了几天。4月22日，主力红军乘敌空虚，继续兵分两路，向云南进发。右路3军团进入富源县境后向沾益前进，左路1军团占罗平后向曲靖前进。两路红军在进入滇境后都打了“叫关仗”，右路在富源的白龙山全歼了滇军李崧独立团，左路在攻占罗平县城时消灭了当地的地方武装。

却说红军深入滇境上百里，昆明城里的龙云竟还蒙在鼓里，他还在悠悠然等着孙渡率部返回滇、黔边，图谋布兵黄泥河一线，堵红军于滇省之外。问题在于红军行动迅速，也在于蒋介石封锁了消息。蒋介石有空中侦察，他是知道中央红军在何时何地“窜入滇境”的。他不说，把敌情通报压下了。对于“共匪窜滇”，蒋介石悲喜参半。悲的是他在贵州逼红军北上的计划又破产了，喜的是红军到了龙云的家门口，他可以借机作龙云的文章了。为了这一喜，蒋介石耍开了花招，他一方面故作焦虑，数电孙渡说：“敌情不明，切望注意侦察。”意在稳住孙渡原地不动，另一方面又密令薛岳：“周、吴纵队似可脱离北线之罗炳辉，向西超越孙渡，进入滇省……”他想重演半年前中央军进驻贵阳的一幕。

蒋介石的这一着，激化了蒋、龙之间和龙、孙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令孙渡“注意侦察敌情”，孙渡照办了。停在安顺、镇宁地区的孙纵队，南翼的第5旅临近北盘江。孙渡令第5旅“从速掌握敌情”。第5旅派出侦察队前出到北盘江侦察，得知红军已经渡过北盘江！情况报知孙渡，孙渡吓了一跳。“如此看来，共匪必将进入云南了，这是龙总座最为恼火的啦！”他面图苦思，想起了龙云的“假途灭虢”之说。数月前中央军进驻贵阳，把王家烈一脚踢开的情景也就浮现在眼前。他开始怀疑起蒋介石要他停兵安顺、镇宁的真实用意来了。面对这般冲突，孙渡不得不为自己的前程斟酌再三。他私下想：是功成名就还是鸡飞蛋打，说不定在此一举了。他是有心投靠蒋介石的，却也不想让栽培自己多年的“龙老板”落个王家烈第二；他还想到，蒋介石要在昆明演“逼宫戏”，也未必能演得成，龙云不是王家烈。一旦戏演砸了，我孙渡岂不要两头落空？为此，他驱车赶到安顺。薛岳正在安顺“休假”。他找到前敌总指挥说：“薛总座，共匪已渡过北盘江，滇省危急，职部还是回师滇东堵截吧？”薛岳当然是知道蒋介石意图的，他到安顺黄桷树来“游山玩水”，原本就是来查看孙部的动静，看看他的周、吴纵队何时入滇为好。可事有蹊跷，薛岳赞成蒋介石“图滇”，却也不赞成蒋介石做得过火。听了孙渡的要求，他半是推委半是同情地说：“孙老弟，我上有挂名的总司令，也有不挂名的真司令，此等用兵之事，整个纵队的行动，还是请他们的示下为好。”孙渡说：“你还是前敌总指挥呀！”薛岳说：“我目前在休假哩。”孙渡又说：“委座原先的打算是逼匪北上，在织金、黔西地区

聚歼匪众，岂料南边的桂军按兵不动，堵而不压，使匪向西窜去，日前已渡过北盘江。在这种情况下，我3纵队还留在镇宁，岂不是要把共匪赶进我云南么？这一来，我在龙总面前将何以交待？”薛岳还是装糊涂，说：“那倒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共匪又不是第一次窜入滇境。”孙渡不禁悚然。私下想，原来他们早就有共匪入滇的判断和打算啊！他再次想起了“假途灭虢”。他不想再问下去，也不敢再问。便说：“薛总座，我不能不回趟昆明了。你恩准与否，我都得回趟昆明。”薛岳琢磨了一阵，说：“你个人回昆明一趟，这有什么呀，龙主席毕竟还兼着我们第2路军的总司令嘛。不过，老弟，还是不要说是我准的假。”

却说4月24日，在白龙出被歼的滇军独立团团团长李崧和罗平县长，两个人只身逃进昆明城，撞进龙云官邸，向龙云报告了独立团被歼、罗平县城被陷的事。龙云大惊失色：“他们……早已进来了？”随即暴跳起来：“你们！你们为什么才向我报告？”李崧答道：“报告总座，仗还没打响，电话线就叫共匪割了，路上还有散匪堵了口子，我们是……”在座的周钟岳问李崧：“照你们估计，共匪现在可能在哪儿？”罗平县长答道：“我们脱险以后，乘马在陆良会合的，而后坐汽车奔省城来。估计共匪现在还出不了罗平和富源县境。”龙云生气无出处，轰走了李崧和罗平县长后，便大骂起孙渡来：“家贼！全是家贼生祸！要他率部返回昆明，为什么半路上又停下来了？现在怎么办，要兵没有兵……”幕僚孔繁跃叹息道：“他有靠山了。没有靠山的命令，他一个滇军的参谋长，敢违抗总座的命令么？”龙云接着吼道：“他有靠山就靠嘛，当他的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嘛，可部队总还是我的！”

噫……”他说着，想起了贵阳方面近半个月来无敌情通报之事，他把消息断绝同部队调不回来这两码事联系起来，一琢磨，觉得当中大有名堂，便问幕僚道：“你们说，他们把部队留驻那边，是指挥不当，还是另有他图？”周钟岳说：“谜底就在这里！滇军不返回来，共匪就可以迈开大步入滇了；共匪一入滇，滇境空虚，中央军也就有理由进来了？总座不幸言中了，假途灭虢！”龙云两眼一直，跌坐在大理石面的椅子上：“这，这无疑是娘希屁的主意了……”

正说着，门外传来一阵急速的脚步声。非常时期，几个贴身警卫连忙拔枪窜向门口。

“是孙参谋长！”只见孙渡风风火火走上台阶，跨进客厅：“总座，孙渡回昆复命。”

厅堂里的龙云、孔繁跃、周钟岳，见孙渡突然到来，也都怔了怔，但都没有从坐椅上起身相迎，一个个倒有横眉冷对之态。孙渡见孔繁跃、周钟岳在座，又补了一句：“多日不见了，各位。”说话间，见在座情状都不那么对头，孙渡心里也有些悻悻然了，便自己找个坐椅坐了下来，不声不响，且听龙老板如何发作。

龙云，云南昭通人，彝族，时年50岁，15岁进云南陆军讲武堂，36岁做滇军军长，45岁统一云南，做了省主席。他年长蒋介石3岁，是各路“围剿军”司令长官中年纪最大的，在军中任职的资格比蒋介石还老。孙渡小他14岁，更是他的小辈子。对孙渡，他一方面重用他，因孙渡在一次军阀混战中救了他一命，孙又有些军事才干；另一方面又总是提防着他，孙渡年轻，别号“小诸葛”，怕他有二心。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围剿军”第2路军总司令，孙渡为第3纵队司令，他不为自己的总司令而高兴，却为孙

渡的纵队司令而担忧，他怕孙渡由此同蒋介石裹在一起，图谋他的权力。现在看来，事已酿成，云南不落在共党手里，也会落到蒋介石手里，他能不心火上窜么？僵了好久，龙云才从牙缝里问孙渡：“你带回来多少部队？”孙渡不冷不热地：“纵队各旅都还在原地待命。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请总座的示下，是不是……”龙云一听部队还在安顺、镇宁待命，他实在控制不住了，打断孙渡的话说：“你知道共匪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孙渡说：“总座，我就是想到共匪日前已经渡过了北盘江，有可能窜犯我省，所以回来……”龙云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不容任何人的插话，厉声发了一通：“还可能呢！共匪早就进入罗平、富源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鬼迷心窍？不叫你东援贵阳，你迫不及待，连电报都不收就上路了；叫你不要越过贵阳，你把3个旅弄到贵定以东，其它几旅还在继续东进；叫你回师滇黔边境，你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却又在安顺、镇宁停了下来。这都是为什么？为什么！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可能！共匪进入滇东北，罗平被陷，李崧团被歼！这也许还是小事。我说的滇东北，不是扎西那个滇东北，而是离昆明只有百几十里，急行军只是一天的路程！你现在叫我怎么办？这边只有个第3旅，还有个路警大队，你要我唱空城计吗？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龙云发火，全在孙渡的意料中，但说到要“处置”他，他有些懵了。他不知道是仗势强硬下去好，还是暂作冷静，看看事态的发展再说。他一时惶然不知如何作答。

两个幕僚见孙渡懵着，也觉得临阵斩将不是办法，便想出面劝解一下，求得共度难关，来日再作计较。孔繁跃便说：“总座，大事当前，还是商量商量为上。孙参谋长这几个月来，转战黔省，且不说功劳多大，辛苦还是不少的；日前在黔东，遭敌伏击，大难不死，也算是我滇军的一大幸事。他远在黔省，蒋亦坐镇贵阳，他不是没有难处的。”周钟岳接着说：“外有外的难处，内有内的难处。境内的难处现在是显然的了，一旦兵临城下，将何以是处？总座不能不为此忧心如焚。因此，我有一建议，滇军是不是不要再耽误，立即回师，驰援省城，有关滇军在黔作战之当与否，容后再作计议不迟。”

孙渡见两位幕僚有如此之说，心头便松了松，说：“孔、周兄言之在理，我即刻返回镇宁，率部回师。事情既然闹到这一步，也容我表白几句，即使战死沙场，也不是屈死鬼了。”

滇军入黔，主要是4次大的行动：一次是奔袭扎西，一次是驰援贵阳，一次是东进贵定，一次是回师镇宁。这4次大的行动，我作为滇军纵队司令确是卖力的。为什么？天理良心，就是想在黔省解决朱、毛共匪，把仗在黔省打了。此等打算，总座当初便有所嘱。第二，无奈共匪神出鬼没，纵横莫测，我部在黔省一再扑空，战果微微，确系事实，渡深为愧疚。然而，扑空者，又何止我孙纵队？所有在黔各路纵队，除了王家烈纵队被吃掉大部，谁个不扑空？所谓大包围大聚歼，实际上全是大扑空。一再扑空，我就在想，到底是谁指挥了谁？据共匪俘虏供称，他们是在牵着老蒋的鼻子走。老蒋的鼻子都叫人牵上了，我孙渡的鼻子又还能怎么样？第三，本人追随龙总多年，生死与共，岂有二心？在黔省有不看僧面看佛面的问题，回到家来，我孙渡何尝不顾佛面……”

孙渡的这一席话，又显出了他的“小诸葛”本色了。他开脱了自己，宽慰了龙云，又遮盖了蒋介石，也把两个幕僚打进了闷葫芦……

孔繁跃恍惚一阵，说：“总座，回师之事不宜迟呀！”周钟岳说：“现在

回师本省，贵阳方面想必不会阻拦的。”

龙云瞥了孙渡一眼，说：“你看呢？”

孙渡说：“我小憩一会立即回程。”

孙渡走后，龙云打起了精神，号令侍卫说：“叫副官长！”一会儿，几个文武副官长进入厅堂“听差”。龙云跟两个幕僚说：“你们对他的回师竟有些兴趣，我却不然，没有10天半月，他能回得来么？急迫的办法，副官长注意！第一，立即组织一个昆明城防司令部，把能抽出来的部队，包括周边各县的民团和路警大队，都集中到城东南一线，务使共军仅能通过边隅地区，转向邻省，一个大有可能的方向是让他们奔四川去。因此，第二，速令刘旅长正富立即赶到巧家，同罗炳辉取得联系。罗炳辉是彝良人，当年干过我的滇军，刘正富和他是同乡。可通过罗炳辉，劝说红军由巧家渡金沙江，他们的朱德知道那条路。我们可以向他们言明，滇军意在保境，不予远追，只要求他们不要从昆明附近通过便可。”孔繁跃和周钟岳听了，顿时脸色煞白，没想到龙总座有这一手！但一会，他们的白脸变成了红脸，连声赞道：“好，好，这个办法固有不便处，却是切实有效的。”龙云接着说：“还有一着更为紧要，速电贵阳方面，大讲求援之词，请中央军追剿各部，速向会泽、巧家方向！各报即刻发出。”

龙云对他的这几着甚为得意，周钟岳却又有些茫然了，嗫嚅道：“总座，这后一着，对我同罗炳辉的君子之交颇有不义之嫌啦？”龙云说：“这就要看共产党那两条腿到底怎么样了。”他停了停又道：“我没有办法嘛，我不求援在先，并示之以刚才说的那个方向，蒋介石要扑到这昆明城下怎么办？姓蒋的扑共产党不行，扑王绍武之流他是很有能耐的。”

周钟岳释然，说：“总座说的是。其实，红军要是现在就抓紧往那个方向去，中央军也是没法跟得上的。”

孔繁跃说：“他跟得上个屁！”

龙云签发了电文，副官长走后，龙云又道：“共党能否答应口头协议，倒也难说的。我们还得作暂避一时的考虑。万不得已，只好到缅甸去走一趟了。遗憾的是季节不好，天气……”

龙云的话没完，孙渡返了回来：“总座，我刚才给贵阳打了个电话，薛岳说，他将率吴奇伟纵队，连同我们的第3纵队，还有湘军的一个师，不时即开赴我省，问龙总座有什么意见？”龙云听了，瞠目相望，好久才反问孙渡：“你认为呢？”孙渡说：“此事还望总座深思。”龙云从鼻子里“哧”了一声，说：“你还没有忘记你的滇军参谋长身份。”他接着提高嗓门跟周钟岳、孔繁跃说：“你们看，他们抓得有多紧。不行！中央军当然要追剿窜匪，但不得进入昆明。薛君个人来省，我当表示欢迎。大军入滇，大可不必。”孙渡皱眉道：“就这样回复么？”龙云说：“还要怎么回复？顶多再加一句，昆明城小，容不下七八个师！”

却说第二天，龙云正得意于他的“先下手为强”，蒋介石却钻了他的“薛君个人来省，我当表示欢迎”的空子，派薛岳带着副官和卫士一行5人飞临昆明，前来同龙云面商中央军入滇事务。临行前，蒋介石给薛岳交代说：“龙云不比王家烈，力求说通；实在说不通，也就算了，可就我的意图，作些恰当解释，以便协力剿共。”

人上了飞机以后，龙云才接到贵阳的电话。“他娘的，硬是剿我胜过剿共哩！”龙云跟他的幕僚说：“走吧，一行5人，不怕的。”

龙云在机场接到薛岳。一个总司令，一个前敌总指挥，却是头一次见面。一个自恃饱经世面，独霸一方；一个自恃年轻气盛，靠山牢靠，一交手便笑里有刀。龙云握着薛岳的手说：“伯陵兄，你是来壮我胆的么？”薛岳说：“龙主席，光是我到昆明来，可是壮不了你的胆啦。”龙云说：“怎么，你还要来一次进军贵阳么？”薛岳说：“既然是中央军，就得像个中央军的样子嘛！”龙云哈哈一笑说：“可是，据我所知，你的年初进军贵阳，样子倒是很像个样子的，只是对你个人来说，好像并不是件什么美差呐。‘仓促进贵，纵匪北进，当予军中自责’，是这样的吧？”薛岳闹了个大红脸。龙云连忙说：

“走走走，进城慢慢谈。”

在汽车上，两个人还在斗嘴。薛岳说：“这里的机场离城也不远啦！”龙云说：“共匪不会到这里来重温贵阳机场之梦的。”

来到龙云的官邸，稍事喘息，“面商”便开始了。薛岳想起龙云在机场上掀他的老底，说：“龙主席，要不是你提起贵阳之事，我倒是忘到脑后去了。这也说明，剿灭共匪，乃党国大事，个人小有委屈，是算不了什么的。”龙云说：“是呀，你的委屈是算不了什么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委屈，而是其它的什么。可王家烈的委屈就大了，他现在是纵队司令，跟我们孙娃儿孙渡是一辈了。”他停了停，又补了一句：“他的纵队司令恐怕也不会有多长时间了吧？”薛岳听龙云说起了王家烈，随即想起了自己同王家烈在一起发牢骚的事，心头禁不住有些酸苦。薛岳看不起王家烈，却也有些同情王家烈。他本来想说：“其实，王家烈也不必去做那个纵队司令，连军长也不要做，做个省主席就行了，或是干点别的什么……”他想了想，把话噎了回去。他意识到抖落蒋介石对王家烈的“腹案”，也就泄露了蒋介石对龙云的“天机”。他的头上禁不住冒出了几颗汗珠来。他掏出手帕来抹了一把脸，说：“龙总，军情紧急，关于中央军入滇剿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再商量商量？委座的意思，剿共之军事，需要各方面的协力，而我总觉得，滇省军力单薄呀！”龙云本来想在说说笑笑中，心照不宣地把事情对付过去便算了，此刻见薛岳逮着不放，他的彝族血流起作用了。他侃侃说了起来：“阁下，若是较真起来，我也要讲真的了。首先说，我并不是一概反对外力入滇的，我已经发出了求援电报，也许你还没有看到，请求中央军向巧家、会泽方向追剿。附带提醒一句，他们把罗炳辉留在那边，主力显然还是要到那边去会合的，这不是瞎指目标。问题在于，什么叫协力剿共？共匪入滇好几天了，你们有飞机侦察，想必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吧，可是，敌情通报断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有的人希望共匪入滇！要借助共匪入滇！这是一。请不要打断我。第二，滇省什么时候有过兵力单薄的事？打从讨袁以来，云南都是出兵外省的。可现在的确是单薄了，单薄得要耍空城计了。我的6个旅十几万人现在还在安顺、镇宁。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滇军我下令都调不回来，硬要把第3纵队留在远离滇境的安顺、镇宁？恐怕是为了早挪窝，免得到时候昆明城内挤不开吧？第三，孙渡是我的参谋长，此人颇有才干，承蒙看得起，可以高就于他。如何？”

薛岳终究年轻，又还不曾撇掉年轻将领的正直，他觉得龙云提出的问题是不好解释的，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他怕越解释越糟，他自觉对付不了阅历深厚、性格强悍的龙云。他只好说：“龙总，说了这么多，我忽然觉得，我们似乎太看重你我之间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了。其实，在战场上，你

是总司令，我是前敌指挥，我们是主副之间的关系，是同僚啦。从这上说，我考虑的是战场用兵问题。其它的有些事情，薛某一介武夫，不知不知不知也。我要知道如总座所说，我还敢来昆明么？我看这样吧，龙总，关于中央军进不进云南的问题，完全由你定，你觉得需要，我们就来，你要是觉得中央军来了反而碍了你的手脚，我们就不来。不管怎么说，你是第2路军总司令，我的周、吴两个纵队还得听你的指挥。”龙云机敏，立即抓住，把薛岳的话卡死：“好，就照你说的办。我也不为难阁下，中央军进不进云南，进多少，走什么路线，听我的就好办。怎么样？我们休息一会，龙某为阁下洗尘。”

薛岳掏出手帕，又一次抹去头上的汗珠。

洗尘之宴，龙云是大尽了同僚之谊、地主之谊的。席间，宾主聊起了“剿匪的艰辛”来。闲聊中，薛岳提出来要几份云南省的小比例尺的军用地图，说：“行军打仗，没有份好地图真是难死了。在贵州，我们走错了多少路呀！好些扑空买卖就是因为没有一份准确的详图造成的。”说罢，见龙云脸有难色，薛岳又一次怔住了，便连忙补充道：“有了云南省的准确详图，一旦龙总要我们入滇完成点什么任务，我们也就好规规矩矩按指定的路线前进，不致把路走错了。”龙云“嘿嘿”一笑，用筷子指着薛岳说：“一个为将的军人，倒耍起小心眼来了。这个好办，图库在郊区，我要人弄好了给你们送去就是。喂，伯陵老弟，我要重申一句，我可不是一概不赞成中央军入滇呀。”

薛岳朝龙云翻了个白眼，什么也没有说，挑起一夹过桥米线往嘴里塞去……

第十九回 巧中巧巧家传秘语 急中急龙云献军图

话说进入云南的中央红军，在打了“叫关仗”之后，一路春风，4月27日占沾益和曲靖，29日占寻甸和嵩明。也许是龙云很是坚信他同罗炳辉的交道会成功，红军连占4城，封死了云南的东大门，却不见昆明城里的龙云在用兵上有多大的动静，东不见孙渡的回师，西不见滇军的围堵，连‘围剿军’内部的往返电报也似乎销声匿迹了。

“我们开个会吧，研究一下取何路线的问题。”周恩来提议说。

毛泽东说：“有必要，有些问题是要讲讲清楚。听说，走了这么个大圈子，机会也来了，有的人思想又反复了。”

在曲靖，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召开了负责人会议。会议由洛甫主持，洛甫要毛泽东提出议题，毛泽东的情绪很好，说：“好吧，我先说说。我说呀，绕了这么个大圈子，现在总算有点眉目了。我今天不说这个圈子绕得对不对，只说有点子眉目是怎么回事。眉目者，北渡金沙江的时机已经到来也。怎么样，是不是这么回事呀？唔，你，你，你，你，还有你博古同志，都高兴了，说明这是我们的共同看法。军团里头，有的同志却不那么高兴喽，又像是抓到什么洋理了，又牢骚起来了……不不，不说这个，只说渡金沙江的问题。只要北渡金沙江，同4方面军的会合就大有希望；一当同4方面军会合，我们的光景就会更好的，对不对？昨天晚上，我找了两个老跑生意的问

了问，此去金沙江，远处460里，近处400里。我们搞个抛数，把绕的路算进去，600里，800里。这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吧？这是一。第二，到底走哪条路好？一条是巧家，这条路朱德同志走过，罗炳辉也在那边，缺点是远一点，靠敌人的主力要近一点。再一条是元谋方向，有商道渡口，也隐蔽一点，缺点是这边有好几个县城，会不会在半路上卡住还难得讲。到底选哪条路好，大家可以考虑考虑。第三，我们到了这里，断敌之所断，估计敌人对我未来的前进方向会有所判断的，我们要搞点什么手脚，示东而西，还是示西而东？也请大家议论议论。第四，最近我们连克数城，昆明城里的龙云好像动静不大，这可不是件好事呀。我的意见，还是要打搅打搅他老人家才好，这位老总前一阵不是有些寂寞吗，还是让他忙活忙活。当然，适可而止。此人是彝族对吧？再说，他跟王家烈不一样，跟孙渡恐怕也不大一样。蒋介石到贵阳这么久了，他好像没动窝啦。打搅一下，主要是让他把他的第3旅从昆明以北调进城里去，不是要把他搞跑。有情报说，此人早有打算，不得已的时候就跑缅甸去。可跑不得，他要是跑了，事情就麻烦了。我说完了，大家说。”

毛泽东的“有点眉目”鼓舞了到会的委员们，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不在渡口的远近，主要看好过不好过，过得去过不去。”有的说：“渡口的远近是一回事，渡江以后的路程远近又是一回事。”博古平时开会很少发言，这回见毛泽东认可了他的“高兴”和“共同看法”，他真的高兴起来了，冲朱德说：“朱德同志，我们还是踏着你的足迹前进吧！”朱德笑笑说：“我的足迹嘛，怕是这么多年不好找了。听刚才泽东同志所说，我倒是很赞同这么一点，敌人对我的前进方向肯定会大体判断得差不多的，而所说的两条路相距又不远，就是那么一个狭小的地域，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选准。二是一定要有示东而西还是示西而东的战术考虑。现在看来，敌人有可能主要作东路的判断，因为我们的9军团在那边。”周恩来说：“蒋介石会不会来个逆判呢！”刘伯承说：“地域狭小，他也有可能在这两条路上同时下功夫。只是；东路离他们近，有可能压力要大一些。”王稼祥说：“看来，主要还是争取速度，争取时间。”洛甫说：“说得对，1、3军团不宜背朝金沙江走得太远了，要……”

正议论着，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快步走进会场：“有重要情况。罗炳辉军团长巧家来电，滇军一个旅长叫刘正富的找到他，转告了龙云对我中央红军的要求，说是只要红军不逼近昆明附近，可以从巧家渡金沙江，他们以保境为重，不予追击。罗炳辉同志已表示同意。”在座都惊呆了，想不到龙云有这一手。一会儿，一个个又“嘿嘿”地笑了。毛泽东说：“我说呢，龙云的文章原来在这里！情报确实么？”曾希圣扬了扬手里的电报：“这是罗军团长的电报。就看他那头的刘正富其人了。”朱德说：“可靠，完全可靠。”毛泽东说：“何以见得？”朱德说：“龙云出于自身的利益，他是完全可能这样做的。另外，刘正富这人我听说过，跟罗炳辉是同乡，都是彝良人，一起干过滇军。”在座纷纷点头。王稼祥说：“嗨，这龙云也会兜圈子，守到我们在跟前，干吗跑到巧家去！”朱德说：“这就不能怪他了，他也得找个可靠的嘛；要不，把他卖到蒋介石那里，咋个办？”王稼祥跟了一句：“瞧，都是老滇军喽！”大家又都笑了笑。洛甫说：“这样说来，我们就只好走东路了？”委员们大都表示同意：“当然，既然有这么一个条件，自然走巧家这条路；而且，从这条路直上川西北也近得多。”毛泽东又一次语出众议，说：“不，

不能走东路。”洛甫问：“为什么？”毛泽东说：“龙云的这一手，确是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确定了渡江路线，但不是帮助我们确定走东路，而是走西路。第一，看得出来，敌人对我都是作东路过江判断的；第二，龙云会不会先君子后小人，在他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掉过头来给蒋介石指示目标？第三，我们正好有了一个将计就计的机会，要不还难得做像。因此，我的意见，示东而西，走元谋方向！”朱德率先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孙渡拖延回师昆明地区，大有可能是蒋介石的意图，他们从那里奔巧家方向只是个向右一侧身的问题，路程也是很近的。孙部如此，其他中央军也会作这么一个部署的。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乘敌空虚，尽快渡过金沙江。前些日子讲，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现在是渡过金沙江就是胜利。”听朱德这么一补充说明，人们的恍然神情释然了。周恩来说：“怪不得蒋介石总是朱毛长朱毛短的！我同意走西路。”毛泽东说：“如果大家赞同这个方案，我的意见，9军团在那边作巧家渡江的舆论和姿态，这边的1、3军团，可派个小队打一下杨林，放点攻昆明的风，乱不了龙云，也乱一下蒋介石。同志们呐，刚才王稼祥同志说了一个极要紧的问题，要抓紧时间，抓紧速度。这就是讲，不要把同敌人拉开的距离又缩小了。明天天黑前，主力务必离开现地，向禄劝、武定方向……”

散会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走在一起。周恩来说：“这一来，9军团的同志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了。”毛泽东说：“可以给罗炳辉同志一个电报，要他在那边也搞点小动作，示北而南，或是示南而北，别只是盯着那个巧家渡口。”朱德摇头笑道：“啥子哟，不必不必，他是那地方的人，该从哪里过江，该做点什么姿态，他会有主意的。告诉他一个过江以后会合的大概方向就行。”毛泽东说：“有理，别弄个报把他框住了。”他见朱德情绪轻松，又道：“朱德同志，我们没有踏着你的足迹前进，你倒像是卸了付重担似的。”朱德说：“哪哟，我也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愁喽……”周恩来被感染，说：“朱德同志，你先别说，让我来猜猜你心里的愁如何？”朱德应声：“要得。”周恩来说：“昨天我见到康克清了，她还是坚持着，说是要等有了一块像样的根据地，再跟你过礼拜六，你是不是愁这个？说！”朱德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周恩来说：“我猜对了吧？”朱德说：“千里之遥也。现在行军打仗，我愁那个干啥子？不对不对。”毛泽东也纳闷了：“哪又是愁的什么呀？”朱德说：“地图！到云南来还没有搞到一份像样的地图。”周恩来的笑脸凝住了：“对对，地图，只有地图，方可与东风同日而语嘛。”

说来也巧，说地图地图到。怪不得有后人讲，1935年是万水千山中的中央红军最走运的年头。他们正说着，只见总部管理科科长刘金定和几个红军战士，一人扛着一个大纸卷迎面走来，还有两个挑担子的。刘金定边走边说：“总司令，毛委员，周副主席，咱们搞到好东西了。”朱德问：“啥子好东西？”刘金定把纸卷从肩上挪到胸前：“地图呀！你不是要地图吗？还有白药，治枪伤的好药。”朱德一脚跺在地上：“在哪里搞到的？”刘金定说：“龙云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都喜呆了。毛泽东说：“这龙云够朋友嘛，还说他可能先君子后小人嘞，错怪了，错怪了。”周恩来冲朱德说：“他是念着你们老滇军的旧情哩。是写信朝他要的？”朱德说：“没有哇？”刘金定一旁“嘿嘿”笑道：“是我们在半路上打了一辆汽车，缴获的。”红军的3个首脑人物迭声“哦”了起来：

“你这个刘金定也卖起关子来了。走，找个地方谈谈。”

原来，这天午后，军委纵队前梯队在曲靖以西16里的缅甸坡关下村隐蔽，想躲过敌机的侦察轰炸时刻，尔后前移寻甸方向。下午4时左右，打前站的管理科长刘金定和作战参谋吕黎平，带着先遣分队出发了，他们沿着滇黔公路侦察前进，走不到一个小时，忽然从昆明方向开来一辆小汽车。他们迅速隐蔽下来，侦察队长陈育才说：“打得，是军车！”作战参谋吕黎平说：“还是先打汽车吧。”刘金定说：“对，别使手榴弹，车上说不定还有用得着的东西哩。”汽车距离只有几十米了，一个排子枪，汽车趴下了。侦察队涌了上去，从车里拖出了两个白军来，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军官。说时迟那时快，一伙子红军战士，押俘虏的押俘虏，搬东西的搬东西。有战士说：“妈的，都是些纸，不要了吧？”刘金定上前撕开包皮纸一看：“地图？唔，好东西，都拿走。”几个干部钻进树林审讯俘虏，原来当官的是薛岳的副官，是专门留下来拿到地图赶往贵阳的。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笑完说：“刘金定啊刘金定，你们这一功劳可不小嘞，比缴获多少武器还有用，让总司令给你们立一功！你说这地图是龙云送的，也没有错嘞，他不给蒋介石送地图，又怎么能到我们手里？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图；于今红军进云南，是龙云献的图，妙哉，妙哉！”毛泽东一来情绪，一有点什么由头，便爱说古道今。此刻便又说起了“三国”：“这张松，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嘞，人长得虽然丑陋，脑子却蛮聪明的，也很有些学问。读了曹操的《孟德新书》，一目10行，竟能背下来，还识破了曹操的新书用兵13法，不过是抄了战国时的无名氏之作。结果把曹丞相气的，差点砍了他的头。要说这张松献图之是耶非耶，我看啦，他是聪明之中有糊涂，他本想献给曹操的，后来却献给了刘皇叔，结果你们说怎样？请客容易送客难，刘备一进四川就不走了。龙云是不是有见于张松的教训，把本来要送给蒋介石的地图，又送给我们了……”“喂喂，我说朱德同志呀，你好像不大想听啊，我这是说你们四川老乡的故事嘛。”朱德说：“图是我们缴获的，泽东同志。张松的故事还长着哩，你们接着讲吧，我得根据地图下命令去了。”说完便转身走了。毛泽东这才从“三国”中走出来，说：“就是就是，地图是你们缴获的，不是龙云送的。龙云送地图给蒋介石，还是有先君子后小人之嫌嘞……”

当晚，毛泽东有闲，他同俘虏的薛岳副官谈了一次话。一次“随便聊聊”的谈话。

薛岳的副官叫刘剑秋，30来岁，身子高大，模样英武。同毛泽东交谈几句后，他见毛泽东说话挺和气的，便问毛泽东“在红军里当什么差？”毛泽东说：“跟你同行，小参谋，也是弄地图的。”毛泽东的语言功夫是没说的，甚至很有些表演天赋。他一片真诚地：“副官老弟呀，我还得感谢你嘞，帮我解决了个大难题。我们到云南来，就是缺地图啦，弄得我这个小参谋都快当不下去了。”刘副官一听同是小参谋，精神越发放松，胆子也大了起来，说：“你老兄的难题是解决了，我的难题可是难到底了。怎么样，看在同行的份上，也帮我一把，放我一马。你该不难想到，我是不能再回到薛岳哪里去了。即使不杀头，又还有什么奔头？我回家，找我的家人去。”毛泽东说：“这倒是实话。地图之事，非同小可。不过，往开里想，对你个人来说，也未必是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你说你要回家，对嘛，一走了之，完了。这事好办，老弟，包在我身上好了。说来，你倒是有点大意了，怎么一个人就带着车子在这条路上跑啊！”刘副官得到回家的许诺，禁不住有点激动了，说：

“这可是怪不得我的。是他下的死命令，要我连夜赶到安顺，等着用图。”毛泽东问：“有这么急么？”刘副官说：“嗨，你不知道，要到这10份军用地图不容易啦。我是4月25日跟他来昆明的，他们都回贵阳了，就为这几份地图，把我留下了。怕龙云反悔，不给。嘿，真还是那么回事，饭桌上答应得好好的，说是给军用详图，结果你说怎么着，他们走后，龙云拿出来的是普通地图！你搞地图的知道，打仗，普通地图管个屁用！我把情况报告贵阳，他又给龙云来电话，龙云不认帐，说是下边的人拿错了。拿错了再拿吧，这才叫人把军用地图拿了出来。我把拿到军用地图的事情报告贵阳，他在电话上说：‘从速上路，连夜赶回。’我哪敢耽误，只好冒险了。我知道路上有可能碰上你们。没法子，当兵的得服从不是？”毛泽东问：“你刚才说的他，到底是谁呀？”刘副官说：“薛总座薛岳呀！”毛泽东摇摇头，笑道：“老弟说笑话嘞。堂堂2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就为了几张地图，亲自跑昆明？”刘副官说：“说假话不是人！当然，他带我们奔昆明，不只是为那几份地图，还有更要紧的事情。”毛泽东急问道：“还有什么事情呀？”刘副官脱口而出：“中央军入滇的问题。”毛泽东心里一怔，却又装得像个爱听故事的小青年一般，嘻嘻地：“中央军入滇还要谈判谈判，唔，怎么样？打起来了没有哇？你们薛总座比龙云年轻，不会打不过吧？喂，说说，反正我们都闲着没事。”刘副官扭头看了看门口，好像这里不是红军的驻地，还是他那个“前敌指挥部”似的。一会，他反应过来，抿嘴一笑说：“好吧，反正我现在是俘虏，招供点什么也就那么回事。”接着，他尽其所知，讲了薛岳是怎样奉蒋介石之命前往昆明的，薛岳同龙云是怎样斗嘴的，最后又是怎样成交的。“其实，与其说是成交，还不如说是不欢而散。

龙云那人真还不好收拾。”毛泽东暗自乐了，问道：“到底成交了什么呀？”刘副官说：“龙云原则上不反对中央军入滇，但是，什么时候进，进多少，走什么路线，都得听龙云的。”毛泽东闷了闷，他无需再盘问什么，副官没有说到的，他也能推断个八九不离十。他转着话题说：“是呀，一个总司令，一个前敌总指挥，要是打将起来，岂不取笑于天下！”

呃，我说刘副官，听口音，你好像不是你们薛总座的老乡呀，府上哪里？”刘副官说：“我是东北人。”毛泽东“哦”了一声说：“东北人？逃难进关的？”刘副官说：“可以这么说，只是逃得好看一点就是了。”毛泽东说：“这又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到了薛岳的部下了？”刘副官说：“老兄，一言难尽了。我本是东北军的，司令部的参谋，跟张学良进的关；张少帅到武汉，我也就跟到了武汉。也不知张少帅同薛岳是怎么搭上的，把我给了薛岳，我也就从江西来到了贵州，云南……”刘副官的声音有些沙哑了。毛泽东说：“这确实有点难为你了。日本人侵占了东北，男子汉大丈夫，却背井离乡，还勒令你把枪口对着自己人，这对一个有血性的中国男儿来说，无异于极刑！我劝你，老弟，单枪匹马回老家，恐也有些难处的，也未必能搞成什么事情，你不如回到张少帅那里去。张少帅这人，我当然不认得喽，但我相信他是好人，他不会不要家乡的，嗯？”刘副官怔怔地看着毛泽东，好久没有说出话来。毛泽东问：“你不想回到张少帅那里去么？”刘副官答非所问，说：“老兄，听你这样一说，我真是佩服你们红军中的朱、毛了。朱德，毛泽东。他们的厉害不只是在军事上了。你见过他们吗？”毛泽东说：“见过，当然见过的。不过，红军中的厉害人物也不只是他们两个。你想嘛，红军才多少人，蒋介石又动用了多少人，可就是奈何不了红军！”刘副官说：“听你刚才的口

气，红军是想抗日的？那么，此后的行程是不是……对不起，这是军事机密，是不该问的。”毛泽东说：“没什么。你说的对，红军是要抗日的，非常想抗日。可是，你很清楚的，走不出去呀，前后左右都在堵，要消灭我们，叫‘攘外必先安内’。我刚才说你们张少帅是好人，你知道不知道，少帅是不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他说着愁苦地叹息了一声：“唉，有什么法子，只好走到哪算哪了。”

一场“随便聊聊”，足足聊了两个小时。刘副官最后说：“能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吗？”毛泽东说：“小姓张，张得胜。”刘副官诡谲地笑了笑，颇有疑惑，却又不能不信，说：“好啊，张少帅的家门！那就拜托老兄了，帮个忙，我回张少帅那里去。”

毛泽东说：“放心吧，这个忙我张某人帮得上的。”

刘副官被带走以后，毛泽东连忙给管俘虏的保卫局长李克农打了个电话，嘱他亲自处理释放薛岳副官的事，“此人原是张学良部的，尚有爱国心，他要求回张学良那里去，路费给够。”放下电话，他想琢磨一下刘副官提供的情报，推断一下蒋介石在“薛龙会商”失败以后会有什么新的诡计，他正兴致勃勃地揣摩着，洛甫在几个警卫员的护送下来到他的住处。

“洛甫同志，有急事？”洛甫说：“泽东同志，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本想不给你说的，待过了金沙江再论，可又怕误了过金沙江的大事。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众人皆昏他独醒呢，还是众人皆醒他独昏……”毛泽东估计是下边有谁发什么难了，说：“嗨，你怎么绕这么大个圈子！有什么事直说嘛。”洛甫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来，一边递给毛泽东一边说：“现在形势该是不错的吧？你瞧林彪的，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毛泽东接过信看着，信是林彪的亲笔，是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一个建议，说是毛泽东、朱德同志宜集中精力管党内大事，军事上的战场指挥可由彭德怀同志负责。毛泽东一看便明白，这是要他下台，下军事指挥之台。

刚才的高兴劲烟消云散了，他显得很生气，好久没有说出话来。洛甫说：“你放心，中央不会听他这个建议的，此事我已同恩来同志谈过，他也说暂且不予理会。但他说，还是该让你知道这件事。”毛泽东说：“我不认为这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也不认为这是林彪一个人的事，是有人在鼓动。”洛甫说：“你知道一些情况？”

据说，世间的糊涂有两类，一类是糊涂虫的糊涂，一类是聪明人的糊涂。聪明人的糊涂又有两种，一种是大智若愚，即所谓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一种是玩弄聪明，便难得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林彪兴许是这后者。红军数渡赤水，他本来就有意见，此时见部队四渡赤水后，绕道贵阳以东，穿黔南，又到了滇东北，几乎走了一个封口的圆圈，他觉得他的那个“走弓背，不走弓弦”的意见已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他甚至想，当初一渡赤水到扎西，或是三渡后不再向叙、古，而是向西突破滇军孙渡，不是早就过了金沙江了么？他越想越觉得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也不怎么行。部队占领寻甸、嵩明后，1、3军团又靠拢了。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老彭啦，现在的领导还是不行啊！部队到了这里，谁知道还要怎么绕呀？你出来指挥吧，我们跟你走，尽快北上同4方面军会合。”彭德怀一听，吃了一惊，在电话上回答说：“你这个林彪啊，也学会放炮了。不妥，你是参加遵义会议的，不能提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把我提出来，就更不妥了。”林彪见彭德怀“怕事”，便自己动手向中央提建议，写好以后，他还要聂荣臻参加签名发出。聂荣臻一看是电话

上说的那么回事，再次劝他，“不妥不妥，太不妥了！”他拒绝签字，也不同意林彪提这样的建议，“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党的领导人？你不能在遵义会议上举手，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就说军事指挥吧，敌人围追堵截，想不多走点路是不可能的，我们在井冈山也不是没有搞过大的穿插……”聂荣臻没劝住。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时，左权、罗瑞卿、朱瑞在场，也参加劝了，哪里劝得住。林彪自恃他在军事上是把强手：“换个人来指挥，决不可能走这么多的冤枉路！”

洛甫问毛泽东：“你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说：“他们无非是说，四渡赤水是不必要的，最好一渡就解决问题，真是异想天开！这事，四渡后南下贵阳途中我就知道，他们一路骂娘喽，贺子珍出主意，我还找他们谈过一次。现在，不过是一次反复。对于这次反复，我也有所闻。”毛泽东说着把话打住了，他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洛甫听毛泽东说到心里有数，想起了他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暂且不论这个圈子绕得对不对”之说，心里也就放松了许多，说：“那就搁置一下再说吧。”毛泽东说：“说得对，目前不能去扯这个皮，我同意你和恩来同志的意见，过了金沙江再说，但事情总还得有个答复吧？此事就说到这里吧。洛甫同志，我也有个重要情况要跟你说。我刚才同薛岳的副官谈了两个小时，颇有收获。”他接着说起了刘副官提供的薛岳去昆明的情况。他说：“我们的那个估计是对的，龙云不是王家烈。他不让中央军入滇。所谓不让中央军入滇，主要是不让中央军进驻昆明。因此也可以说，他只是原则上不同意中央军入滇。这一来，龙云的帮忙就不那么彻底了。薛岳回到贵阳以后，有可能说服蒋介石答应不进军昆明，龙云一得到这个许诺，他又可能作出某些让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当他们都察觉我将在滇东北渡金沙江，中央军和滇军，乃至湘军一部，都还有可能穿越滇境，追我北上的。因此，我们不能恋战了，还是王稼祥同志的那个意见，要抓紧向金沙江。”

洛甫连连点头：“好的好的，你和朱德同志抓紧下命令吧。”

毛泽东这一夜睡得不大好：“这个林彪，竟还是个娃娃脑壳……”

第二十回 杨成武禄劝吃大宴 罗炳辉宣威啃火腿

话说4月29日，朱德连夜起草了一个作战文件，命令红军迅速向金沙江前进，并就各军团的行进路线、渡江地点、注意事项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原本是一份作战命令，该由主要负责军事指挥的朱德和毛泽东署名发出。在审阅过程中，毛泽东商得周恩来的同意，改题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并在前面加了一段话：“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毛泽东采取这种“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红军的主力”的作法，是他的大度和机智，也是一种暂时的容忍。他心里有数，林彪和彭德怀要同他闹别扭，事

情是很麻烦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的1军团打头阵，尽快拿下禄劝、武定、元谋3座县城。3军团作为相邻的右翼，向同一方向前进，5军团仍担任后卫，“向龙云告别告别”。

且说林彪写了那封信，心里倒也惴惴不安了一阵，但见没有谁找他理论什么，又见作战命令是以军委名义发出的，且是不再绕圈子，是直奔金沙江，他还以为自己的意见有些作用了，也就放宽心的去指挥军团执行作战任务了。

按照军委下达的作战命令，林彪令王开湘、杨成武的4团为先头团，他给团长、政委下达完任务后说：“这回可不是要你们兜圈子了，一条直路到金沙江。因为是直路，就得快，要隐蔽，要跟偷运鸦片的烟贩子那样，钻到江边，拿下龙街渡口！”

王开湘和杨成武受领任务后，两个人既兴奋又发愁。王开湘说：“3座县城啦伙计，这怎么快得了，又怎么能搞得很隐蔽呀？”杨成武说：“可不是！看来，3座县城都不能硬打，得搞点智谋才行。”王开湘说，“用第一次打遵义的办法？”杨成武说：“对啊伙计，紫云城的老裁缝送的那两百套新军衣不是还没有用吗？我们就来个中央军入滇怎么样？”王开湘说：“他娘的，也只好这样了！从1、2营各抽出一个连来，加上团侦察连，全都当上中央军！”商量停当，他们立即把先头分队集合起来动员。侦察连连长王友才听说要他扮个中央军连长，说：“要我扮个啥不行，扮个大姑娘小媳妇也只差这胸脯子平了一点。问题是这么多人扮起来，还能不露马脚吗？”杨成武说：“那地方中央军从来没有去过，说不定好懵。再说，我和王团长跟大家一起去懵。你看怎样？”王友才说：“你懵个啥？这么大的个子！”杨成武说：“你是连长，我当然得是上校团长啦！”王友才乐了一阵，嘟囔道：“妈妈的，当国民党了还不能提升提升，还是个小连长！”

为了争取时间，4团兵分两路：杨成武带一路奔袭禄劝，王开湘带一路奔袭武定。两路前面都是“中央军”开路。

据侦察，两座县城都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杂牌民团。这一天，杨成武率一队威威武武的“中央军”来到禄劝城下。果然，守城的民团不开枪，只是挡住去路，问道：“你们是哪里的队伍？”王友才一看只是问问，他走上前去，挺了挺腰板说：“你看呢？”民团说：“当然，你们不会是红军就是喽。听我们上峰说，红军没吃没穿，饿得凶神恶煞的，手拿土枪梭标、青面獠牙……”王友才恼道：“你给老子罗嗦这些干什么？老子听得多啦！快给老子放桥开门。”民团说：“不成啊老弟，上峰有交待，不论军民，都得问清楚了才能进城。”王友才近前一步说：“怎么，我们上司没有给你们交待我们要来？”民团说：“没有哇。”王友才又问：“是真没有还是假没有？”民团刚要答话，来了个带袖套的小头目，看来是带班的，他走到王友才跟前：“请问长官官阶？”王友才近前一步，不声不响，出手便是一个耳光，打完了才说：“眼睛瞎了！老子是上尉连长！我们的上校团长还在那里等着！”

你是怎么带你这几个兵的？胆大包天，敢把老子们堵在这里！我问你，到底是开门还是不开门？老子给你说清楚，误了事别怪老子不给你们说情！”挨了耳光的小头目，捂着发烧的脸喝令他的手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通报！”王友才听说还要等通报，正要说什么，杨成武带着一伙人上来了，边走边说：“不要吵嘛，不要难为弟兄们嘛。”小头目和他的民团队员们，一

听杨成武一口外省口音，派头十足，又一看大块头的肩上有些明晃晃的家伙，也闹不清是什么校，估计官阶不低，一个个的眼睛便大了，有的站得笔挺，有的弯腰鞠躬。

小头目又冲他的手下吼道：“放桥，开门！”吼完，朝杨成武笑脸问道：“请长官的示下，是去旅店，还是去县政府？”杨成武说：“公务要紧，先去县政府。”

杨成武一路人马进入县政府“小憩”。这里的“土官土霸”也少有见过中央军的。听说来了中央军，禄劝县县长、县警察局长、民团团长、商会会长，以及县城里的绅士、地主，都来了，有的还带着太太，他们齐集在县府大厅里，等候“中央军”团长的接见。在“上尉连长”王友才的导演下，杨成武首先在小客厅里同胖县长见了面。叙谈几句之后，在县长的陪同下，来到大厅同禄劝的“要人”们见面。禄劝的要人们见“上校团长”气派非凡，一个个打躬作揖：“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啦！有中央军到，保境安民，我们也就放心了。”杨成武说：“怎么，都知道红军的事了么？好的好的，我们就是要到江边来看看防务的。”警察局长问，“红军到什么地方了？”杨成武说：“你这个警察局长还不知道？倒也是，红军鬼得很，来无影去无踪，把我们拖得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会到这里来，是难得说的；反正，大家小心一点就是，凡是他们不怎么喜欢的事，我看，还是不干或是少干为妙。”有地主老财说：“是呀是呀，别往枪口上碰呀！”王友才帮腔说，“枪口碰不得，刀口也是碰不得哩。你们龙主席就说，对红军，还是让他们过一趟，走了算。”县长说：“那么请问团总，你们此行来……”杨成武说：“刚才不是说了？就是来看看你们这边的防务。怎么样，有些准备吧？”胖县长叹息道：“唉，偏僻小地，能有什么准备，有几个警察和民团而已……”

说着，几桌酒席摆开了。杨成武发愁了。吃吧，耽误时间；不吃吧，这辈子还没到县衙门吃过酒席。便连连说：“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胖县长说：“为远道而来的团总洗尘，不成敬意喽。请。”席间，杨成武忽然想起一个大疏忽，事前不曾明确同奔袭武定的王开湘的联络办法。他离席问王友才怎么办，王友才说：“不就是想知道那边的情况吗？现成的县长大人在，请他帮忙嘛。”杨成武被点通，入席问胖县长说：“元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胖县长说：“元谋离这里还远，不大清楚。”杨成武把话拐到武定：“武定呢？”胖县长摇头答道：“一县管一县，也不甚清楚。”杨成武说：“武定离这里可是近得很啦！”他说着把筷子往桌面上一搁，打开了官腔：“老百姓交了钱粮，养了你们，几十里的地方都一无所知，这不是玩忽职守吗？”席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胖县长惶然道：“团座，我们这里历来都是各管各，连过往商税，他们是他们的规矩，我们有我们的章程。”杨成武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非常时期！”王友才连忙上前道：“团座，你别急，咱们不就是想了解一下那边的防务吗？这事简单，县长马上打个电话问问就是。”胖县长说，“就是就是，我现在就打电话。请问团座要问哪方面的情况？”杨成武说，“把武定县长的电话要出来，我同他讲好了。”胖县长当即离席走近一旁的电话，要通了武定县长，他先在电话上说：“老兄，看来红军不远了，中央军已经到了敝县，团座亲征，要我们抓紧作些准备。贵县防务上有些什么情况？”武定县长说：“有个屁的防务！还不是跟你一样，就是几个毛警察和民团。刚才接到昆明的电报，说是要把金沙江的船只搜集起来烧了。他娘的，那是元谋的事，你我连船都没有几只可烧的……”杨成武夺过电话，

说：“没有船烧就算了嘛，有船也未必真要烧嘛，扣下来就行了嘛，我们还要用嘛。别他妈的急得像蚂蚁似的，我的部队很快就赶到你们县。他们到了以后，请转告他们，本团座即将去元谋执行任务。”

宴席将散未散时，城门口打来电话，说有大队人马正从城南翻山而来。接电话的是警察局长，他正追问是什么队伍？杨成武一只酒杯砸在地上，王友才和他的侦察员们立时“哗哗”地拉响了枪机：“都不要动！”霎时，席间禄劝的要人们如坠梦境，全傻眼望着“上校团座”。杨成武说：“本人是红军团长，不是白军团长。翻山而来的是我们红军！”胖县长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几个土老财浑身筛糠一般。杨成武说：“不必惊慌。吃了你们的酒席，总还有点交情了嘛。只要求你们做到三点：一是不要同红军为敌，把警察和民团的枪都缴了；二是帮助红军筹办一些粮款，主要是款项；三是不要同外界通电话，昆明要打电话来，就说这里没有见过红军。听清楚了，做到这三条就行。另外嘛，得委屈你们在这县府院里住上几天，算是我招待你们喽。”

杨成武的话刚完，4团参谋长带着一个连进了县衙大门。参谋长走进厅堂，本想给杨政委报告点什么，但见满堂不欢而散的宴席，心里禁不住乐了，“对不起，打搅了吧？”杨成武把参谋长喊到一边交谈了片刻，尔后说：“这都是禄劝城里的头面人物，刚才请我们吃酒席了。你们需要什么，找他们好了。我先走一步了。各位，谢谢你们的酒席。”酒席的主人们连醉带吓，还瘫着。

杨成武带着他的侦察队扬长而去。

由于武定县县长事前接到从禄劝打去的那个电话，当王开湘带着人马来到武定县城时，受到了更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当天傍晚，也是由于禄劝县长在4团参谋长的“说合”下，事先给元谋县长“通了气”，说红军“只要两样东西：一个钱粮，一个路。”当杨成武带着人马赶到元谋县城时，元谋的大小官员和民团全都集合在城门洞，欢迎红军入城。

红4团不费一枪一弹，一天之内连取三城。“五·一”前后，中央红军主力全都开进到了元谋境内的金沙江南岸地区。抵近大江边，全军大振奋。马上诗人不写诗，只在嘴边吟：

万里金沙东逝水，朝朝暮暮，白了少年头……

暂不说中央红军主力渡金沙，且说“战略奇兵”侧翼建奇功。

“战略奇兵”9军团，3月底在乌江北岸马鬃岭分兵，一直在北线单独作战，为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威逼贵阳、飞兵昆明，作了强有力的战略配合。编制3个团的9军团，牵制了薛岳的周、吴两个纵队8个师，打了不少好仗。分兵后不几天，在黔西老木孔，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打垮敌人5个团，俘敌两千，缴枪千余，令蒋介石一时搞不清红军主力到底在南还是在北。身陷敌丛的军团部队，在大暴露（大摆标语，大打旗号，大放炊烟，大肆佯动）之后，又来个大隐蔽，演“化装戏”。4月中旬，军团侦察科长曹达兴化装成敌团长，揣着敌团长的名片，带着侦察连的侦察员们，两天里巧取了长岩镇、瓢儿井，歼敌上千，缴获甚多，搞得敌人“红白难分”。在北线孤军作战一个月，军团部队不但扩充了实力，人员大增；家底也搞富了，枪弹用不完，钱挑子沉甸甸的。

从奴隶到将军的军团长罗炳辉，头脑机敏，有勇有谋。在巧家地界的一个小镇上，他见到了龙云派去联络的刘正富，两个“老乡”在小客栈里一见面，罗炳辉开初有些不高兴，他以为刘正富是“劝降”来的，待到刘正富

说了“龙老板的意思”，罗炳辉当即与之拍案成交：“可以。红军不进昆明，你们让路，我们在巧家过金沙江。老实说，老兄弟，红军进昆明干什么？你们怕云南落在蒋介石手里，我们更加反对，我们还能帮蒋介石这个忙吗？但是，唔，有两点恐怕还是要注意一下子的。第一，我们说的是不进昆明，但昆明是不是还要打一下子呢？我看，还是打一下子好，要不，人家会说，我老蒋在贵阳，红军搞得我心惊肉跳的，龙云在昆明，红军倒挺客气了，龙老板是不是同红军有什么勾搭呀？这不叫我们龙老板为难么？要帮，就互相帮一下子嘛。第二，我们要过金沙江，滇军还是要追一追的，你不追怎么行呀？我的意见，滇军更积极地追，追到中央军前头，保持适当距离就行。怎么样？”刘正富听了，高兴极了：“你老兄还是我们云南人啦，乱世之秋，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只是，嘿，恕老弟失礼，老兄当得了贵军的家么？”罗炳辉说：“这一点你放心，红军里面，不是老板同伙计的关系，就看谁说的对。只要意见对头，上边是会采纳的。”刘正富不住地点着头，面对从奴隶到军团长的事实，他还有什么不可相信的呢？

刘正富走后，罗炳辉把谈判情况说知军团政委何长工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何长工和黄火青很是赞同，也很高兴，都称赞军团长“办了一次成功的外交，将来可以当外交部长。”罗炳辉说：“当外交部长不行，我这脸太黑。”黄火青说：“那就做工业部长，下煤窑！”罗炳辉说：“对对，哪里黑咱们就到哪里去，把全世界黑地方通通搞亮了！”说笑一阵，他们共同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罗炳辉说：“我们这是又一种形式的战略配合，下面该是第三次大的配合行动，掩护主力渡过金沙江。”

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罗炳辉在滇东北果然来了个示北而南，小部队在巧家方向作渡江佯动，大部队南下宣威，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开进元谋地区。在南下宣威途中，罗炳辉得知孙渡纵队已经从镇宁方向追来，他很高兴，他的意思就是为了让滇军夹在红军与中央军之间。为了让孙渡“头脑放冷静一点”，他托人给孙渡捎去口信：“本军此行系迎接主力北上巧家。”

其它诸端皆同龙总司令有协议，切望照协议办事。”据说，孙渡竟有回复，说：“端谁的饭碗听谁的命令，自己做君子图自己的名声。”罗炳辉拿不准孙渡后一句话的意思，问何长工是怎么回事，何长工说：“他的意思是说，咱们都得做君子，都得照协议办事。”罗炳辉说：“那可不行，他孙渡的老祖宗就不会同意。战场上都照协议办事，那还有‘兵者诡道也’！”

4月27日，9军团攻占了宣威城。宣威，盛产宣威火腿，名扬国内外。部队进城后，审判、枪毙了两个作恶的典狱官，从监牢里放出了数百被关押的老百姓；又打开县政府和几个大财主的仓库，没收了大批的粮食、火腿、布匹。全城一片欢腾，老百姓过年一般，吃上了大米饭，啃上了火腿。

罗炳辉出生在离宣威不远的彝良，为奴隶娃子的罗炳辉，从来没有吃过火腿，后来当上滇军的下级军官，也没有捞着吃火腿的机会。这回，他可要美美的饱餐一顿。他见警卫员掂来一只黄澄澄的火腿，像是烤熟了的，便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割下一块就往嘴里塞，才一合牙帮，“哇”地一口吐了出来：“这是什么玩意儿，又腥又咸，吃不得吃不得，还不如啃地瓜！警卫员，快找地瓜来！”一旁的何长工和黄火青哈哈大笑。何长工说：“那是生的，煮熟了才能吃的嘛！”云南曾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何长工在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吃过中国的宣威火腿。他说：“别急别急，我一会教你们法国人是怎么吃宣威火腿的……”正说着，供给部长赵熔走了过来，说：“何政

委，不用你当先生了。吃这东西，说得来也未必做得来。说巧不是巧，宣威出名的火腿大师傅，说全城的人都吃上火腿了，也得让红军吃个美味，主动要求给我们做餐火腿席。现在正在弄。”罗炳辉正在嚼地瓜去腥味，说：“要吃你们吃吧，我是不敢领教了。”一会儿，警卫员拉开桌椅，一桌火腿大宴摆上来了。蒸火腿，炸火腿，烤火腿……黄澄澄，金灿灿，香味浓烈。罗炳辉闻着火腿香，嘴里的腥味全没了，“噫，这家伙好像还是吃得的呀！”他第一个入了席。他大口大口地嚼起来，边嚼边嚷：“他娘的，差点把自个家乡的好东西冤枉了，这么好吃！”他吃喝了一阵，一手抓上几块火腿肉走了。他来到院子里，直属侦察连正在开饭，他大讲了一通火腿的吃法，像是个吃火腿的行家里手。此后，9军团流行开了一段顺口溜：

九军团进宣威，
火腿儿满天飞；
军团长啃火腿，
生熟都不论……

4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9军团相机占领东川。5月3日，9军团抵达东川城下，兵分三路，把县城团团围住。围倒是好围，打却不大好打。罗炳辉和何长工来到前沿观察，县城城墙坚固，高有12米，宽有4米。罗炳辉难住了，“这家伙还不好弄哩！”何长工说：“看来得让他们投降才行，反正他们只是个民团，人枪也不多。”说到民团，罗炳辉忽然想起来，前几天曹达兴侦察得知，东川民团团长是干滇军时的旧相识，跟刘正富也是认得的。

这不是个好机会么？罗炳辉要通信兵把电话搭在敌人的电话线上，满城找那个旧相识。结果真还找到了。罗炳辉在电话上说：“老伙计，我是罗炳辉呀，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手下的兵嘛，不多，就是一个军团，我们要从你们这里路过去会泽。你看是打呢，还是你们投降算了？”老相识一听是罗炳辉，半天没答出话来。罗炳辉说：“怎么，不想跟我说话吗？”旧相识说：“你，你要是真罗炳辉，我们就谈判谈判，你要是假罗炳辉，我还想打一打哩。”罗炳辉说：“那就打吧，我还不想认你这个孬种哩。我可给你说清楚，你那400来人，一两百条枪，可是不经我打。就这样，我要架梯子了……”老相识连忙说：“不不。我说罗炳辉，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罗炳辉呢？”罗炳辉说：“你出来一趟，或是我进城来，不就认到了？”老相识说：“好吧好吧，看样子你是真家伙了。我马上出城来。

在什么地方？”罗炳辉说：“你出哪个城门都是我的人，问问他们就知道。”

不一会，11个打白旗的走出城门来。罗炳辉老远就认出了那个旧相识，他迅步上前去：“你们打白旗干什么，快收起收起。既然是谈判，就不必打白旗了嘛。”就这么几句话，老相识和他的同伙们脸上便有了血色，似乎不用谈就通泰了。他们来到何长工和黄火青他们等候的一棵大树下，劈头就说：“请说吧，贵军有些什么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得到的，能搞得到的……”罗炳辉真还煞有介事一般，他给他的旧相识民团团长介绍了何长工、郭天民、黄火青，说：“老伙计，别看他们的穿着不怎么样，可都是些非凡人物。我们的政治委员何长工，留法的学生；这位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留学苏联的；我的这位参谋长郭天民，1926年的老黄埔。今天啦，你们也算是见面喽。说到要求嘛，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路上就是那么几件事。请

我们的何政委说说吧。”何长工说：“你们既然是老相识，就算是帮忙吧。第一，让红军进城，也好有个住处，当然得是很安全的喽；第二，帮助筹备一点粮款，出门在外，只好走到哪吃穿到哪了；第三，我们还想在贵地招点兵，希望东川当局不要阻挠。”民团团长一听是这么几件事，心里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说：“好，好。我们照办。我方的要求，只有一条，希望保留我的民团。至于双方的安全，我把民团都搬出城去就是，不知可否？”罗炳辉说：“可以，民团是你们的饭碗嘛。但是，我们还得加一条，东川城里有两个大坏蛋，一个是县长杨茂章，他在江西当过县长，杀了我们不少人；再一个是劣绅刘二爷刘善初，唐继尧的舅父，作恶太多。这两个人我们得办。既然到东川来了，多少也得给老百姓办点好事。你们同意不同意？”民团团长说：“我们不阻拦就是。”罗炳辉说：“行啊，照顾到你们的处境，民团可以不参加公审大会。怎么样，我们进城吧？”老相识民团团长的要求又一次得到满意的答复，情绪活跃起来：“炳辉，够朋友！请稍候，我得组织一点欢迎队伍，你是回老家啦！”

红军进入东川县城，第二天便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公审和处决了杨茂章和刘善初。借助高涨起来的群众情绪，又广泛开展了群众工作，分粮，分盐巴，分布匹衣服。群众掀起了“拥红”高潮，在东川的3天时间，有1500多青年参加红军，筹得款项10万元。

更大的收获是“战略奇兵”的战略配合。9军团接连占领宣威和东川，迷惑了敌人，蒋介石和龙云都以为红军是要在滇东北会合以后，再北上巧家渡金沙江，完全忽略了元谋方向。同时，宣威和东川是滇东北两座大县城。9军团在宣、东的大肆活动，镇住了敌人，使得滇军和中央军在滇黔边境迟迟不敢疾进，中央红军主力便得以顺利地开进了金沙江南岸的元谋、禄劝地区。

5月2日，朱德电令9军团：你部在完成掩护任务以后，可考虑于5月4日左右返回巧家，择地渡过金沙江。

罗炳辉阅电后说：“对头，有约在先，还是从巧家渡金沙江好。你说呢，何政委？”

何长工“哼”了一声说：“就听老滇军的吧！”

第二十一回 刘伯承金沙施巧计 毛泽东江畔抒诗情

话说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元谋、禄劝地区以后，有如神秘地来到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人们担心的似乎不是身后的蒋介石，而是前面的那条江：过得去么？

金沙江，长江上游，源于青藏高原，奔腾南来，在元谋境内突然来了个急转弯，甩开了与之并行的澜沧江和怒江，独自掉头北上，形成了有名的长江第一弯。奔腾的金沙水，在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大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冲出了3000多米深的大峡谷。流经元谋、禄劝的金沙江，水流虽然渐缓，但江面却宽了，且高山深谷的地形并没有显著的改变。

两县长数百里的江段，历来川滇商客往来，也就那么几个渡口，又是深藏峡谷深沟中，要找到都是不容易的。

最为焦虑的是毛泽东。在由寻甸到禄劝的行军路上，毛泽东找到刘伯承说：“伯承呀，千军在一渡。你们四川老乡都说你刘伯承是神龙下水，你得把我们都弄过金沙江啊！”刘伯承说：“你放心吧，人家做买卖的行商都过得去，我们还能过不去么？”毛泽东说：“那可就不一样喽，人家行商屁股后头跟的什么人呀？半路上相好的。我们屁股后头可是蒋介石哩！”刘伯承笑了笑说：“就是呀，蒋介石跟我们也是太相好了，总是难分难舍。但是，只要我们力求隐蔽一些，争取的时间充裕一些，就好办。”毛泽东说：“愿听其详。”刘伯承说：“因为金沙江不比赤水河，是要费些手脚，需要些时日的。暴露得早，敌人就来得快，时间就紧张了。”毛泽东又问：“你要多长时间？”刘伯承说：“一个星期怎么样？”毛泽东说：“给你10天！”刘伯承叫道：“是吗？”毛泽东说：“会有10天时间的。你想嘛，当蒋介石发现了我们，他们还得吵吵架不是？把他们吵架的时间同开进的时间加在一起，我估计，少说也得10天。”刘伯承说：“你算是把蒋介石摸透了。”毛泽东笑道：“都相好这么长时间了嘛！”

大部队行动，要做到完全的隐蔽是困难的。5月1日下午，正当1、3军团派出侦察队在前面寻找和夺取渡口，部队随后向金沙江开进的途中，天气突然放晴，几架敌机临空，中央红军主力的行踪暴露了。

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在得知红军主力原来不在巧家、会泽方向，而是在禄劝、元谋之间选择渡口北渡金沙江，他气急败坏，把喝药水的杯子也砸了。“图滇”不成，红军远遁。他大骂了一通龙云的“娘希屁”，开始了同龙云的又一次内讧。他百思不得其解，连失数城，让红军进到了金沙江边，他龙云能不知道么？他怀疑龙云同共党有勾搭。打从龙云当初要挡住孙渡援贵，他就有这个怀疑。蒋介石当即在贵阳召开“紧急将领会议”，提出“欲灭共匪，必先惩治地方异党”的问题。陈诚附和：“委座言之有理。看来，安内之内，有个需从党国内部安起的问题。”何成浚不予赞同，说，“异党者，只能是共党；龙云谈何异党？即使有迷于地方利益之弊，也是不宜作异党惩治的。”薛岳则从军事角度予以反对，他说：“敌我态势已经如此，因龙云的事情耽误时间，只怕是共匪早已过江去了。再说，龙云的事情一弄起来，难免不同孙纵队发生冲突，那将如何是了？”吵了好一阵，蒋介石消了消气之后，觉得薛岳的意见确是很“实际”的。他问薛岳：“你说怎么办？”薛岳说：“命令各纵队疾追快堵，再来画个‘圈圈’。”蒋介石说：“还画什么圈圈？你的兵团还在寻甸、曲靖以东地区，追得上吗？要是把7路纵队都调动上去，脚踏‘龙土’，他不得又生事端？我看呐，娘希屁，干脆就顺了他好了，让他全权指挥入滇部队，让他也尝尝剿共的滋味。”何成浚说：“好，好，委座这一着棋好。”宴道刚当即起草了致龙云的电报。报云：“……匪窜元、禄渡江，殊为可虑。刘文辉在金沙江北岸之部队，兵单防广，恐难独任防堵。中前令川军郭勋祺部开赴鲁甸、巧家，乃为就近协助文辉会理部队，以防堵金沙江北岸也。已饬该部整饬军纪，兄可无虑。至入滇之湘军及各纵队，仍请兄直接指挥，以免往返误时，不必客气。并已电令伯陵前往，一切遵兄命而行矣。”

险些被惩治的龙云，却接到了一封文词恳切的电报。龙云一时也琢磨不透。数月来，滇军在“剿匪”上可以说毫无作为，最近又接连丢城失地，为什么再次委他以重任？他反复研读电报，方才捉住了蒋介石要说的到底是什么。他娘的，他这是耍花招，玩诡计啊，眼看在滇境“歼灭共匪”不行了，

他想找个脱身之计，以全委座的面子，而把过错都推到我龙某头上。老子才不上你这个当哩！龙云当即复电蒋介石，拒绝指挥中央军，并声言“川军不得入滇”。本来，龙云对于中央红军进入元、禄之金沙江南岸地区，在这之前他已略有所闻，他是乐得以知之为不知，“免得宣威的火腿又要遭一次大灾难！”对于所谓的“罗刘之约”言明的红军在巧家渡金沙江，他也不想计较了，“管他在哪里渡江，只要他们离开云南去四川就是。”又恰在这时，龙云在香港的几个旧友给他打来一封电报，说：“我们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云南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认为“此文符合西南的利益。”因之，“围剿”之事，他是不想再动什么心思了。

事情还没有完。薛岳是蒋介石的忠诚将领，即使多有委屈，仍不改对蒋介石的忠心。他很体谅委座的气恼、难处和悲苦。在接到龙云“拒掌帅印”的电报后，他也气恼了，说：“他拒绝指挥中央军，倒可以看作是有些自知之明，问题在于中央军和川湘部队在滇的行动，总得有个说法嘛！”他请求飞赴昆明，当面同龙云商量“统一指挥问题”。薛岳亦非善人，他手下有8师10万之众。财大气粗，兵多将勇。他不赞成现在惩治龙云，却不是不想有朝一日把龙云搞掉。他早就在蒋介石面前嘟囔过：“他龙云又怎样？我的8个师不进昆明则罢，要进还不是易于反掌之事！”第二天，薛岳果然气鼓鼓地飞到昆明，他一进入龙云官邸大厅，便说：“龙总，共匪进入元、禄地区，前有金沙江的阻隔，良机尚在，总座何不指挥各路纵队从速北进，以竟剿匪大业？只要适得其时，击其半渡，即使不能全歼，也能再来一个‘湘江之役’！怎么可以有兵不用，拒掌帅旗？”龙云一时摸不透薛岳的来意，只见他口气不小，便试探道：“伯陵老弟，真要有‘湘江战役’之二、之三，当然好啊。可难喽，赤水河，乌江，北盘江，不都是机会吗？关于拒掌帅旗的问题，本座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难啦，朱、毛一股，非一般匪众。”薛岳本来就火着，听龙云戳到了贵州一段，那正是他的痛处。正好，他就是要让龙云知道一下好歹。他说：“总座，要说起贵州这一段，倒是确有些教训可说的了。共匪几渡赤水，就是企图在泸州、宜宾一线窜渡长江是不是？窜过去了吗？没有。为什么？川军江防严密。就是因为窜不过去，所以才有共匪多次回窜黔省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你作为2路军的总司令，不是不知道的么？那么请问总座，此次共匪改道元、禄，欲窜渡金沙江，他是不是就能窜过去呢？要是窜不过去，又会怎么样呢？我想，已经在泸、宜一线取得江防经验的川军，是不会守不住金沙江的。共匪一旦窜不过金沙江，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到那时，滇省剿匪军事恐怕是另一种光景了吧？”薛岳不等龙云答话，他不知龙云是不是听懂了他的最后一句，又补充道：“当年的吴三桂窜滇，追剿吴三桂的清军，可是不管你昆明不昆明，哪里该去就奔哪里去的！”龙云被打了个半懵，他不知道薛岳说的是真有些道理，还是有意恫吓。的确，这个“回窜”的问题，他真还不曾把它当作一回事想过。他叹息着思索了好一等，一直在走钢丝的龙云又走开钢丝了。他说：“伯陵老弟，你说得对，我们是得有多手考虑才是，回窜之事，不可不防。需要言明的是，天理良心，我和孙渡也不是图轻巧，只想让共匪离境了事。刚才说了，我就是觉得这共匪也确实太难对付了。委座亲率大军，历时数月，从江西剿到我们云南，不是成效甚微么？我龙云又能怎样？好吧，伯陵老弟，共匪尚在我滇省境内，我不客气，你也别客气，部队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你下

命令好了。署不署我的名，听你的便。你看行么？”龙云不想再说什么，“回甯问题”实在令他感到惊恐。薛岳见目的已经达到，说：“总座终究见识过人，剿匪大事，各路大军，尤其是我中央军，早就该这么办，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龙云抬眼惶然道：“你今天来就是要我这句话的么？”薛岳说：“还有一句，委座想到昆明来一趟，一来看望你，二来有可能把行辕设到昆明来，问你什么时候有方便？”龙云这才真正感觉到了薛岳的来头，便连忙点头道：“来，来，他什么时候来，我，我都是方便的……”

有了龙云“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的承诺，薛岳在昆明便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命令他的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李韞珩部“向元谋急进”，“向元谋兜剿”，“向元谋追剿”……说来蹊跷，几道命令都没有要龙云签署。起草军事文电的薛岳副官说：“算了，薛总座本来早就不想顶着头上那块‘浓云’”。

且说中央红军生1、3军团在左右两个方向上夺取龙街和洪门渡两个渡口后，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说：“渡口敌情虽不严重，但江流水急，没有船只，架桥很是困难。毛泽东这会儿是真的焦急了，他连忙找到刘伯承说：“伯承啦，我们是不是过于强调隐蔽了？两翼的两个小渡口，固然隐蔽，但水流太急，难以架桥，船也没有。是不是请你亲率干部团在中段夺取皎平渡。这是云南到四川的主要渡口。渡口大目标大，但成功了用处大。我还是那句话，千军在一渡。没有个好渡口，就没有一切……”毛泽东把话说到尾处，才发现刘伯承穿了一身崭新的国民党将校服，愣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刘伯承说：“我正要带干部团去皎平渡再演故伎喽。”毛泽东立时高兴起来，拍着刘伯承的肩膀说：“终究是你刘伯承！快去。”中央负责人都很着急。周恩来亲自找干部团团团长陈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谈了话，洛甫亲自给干部团全体指挥员作了战斗动员。

刘伯承带着化装成中央军的干部团第2营奔皎平渡而去。

5月3日下午，刘伯承和前卫连来到离江边十几公里的老杉树，碰上禄劝县一个区公所的文书正奉命去江边传达封渡烧船的命令，他问“中央军”是哪个部队的，很想套点近乎。

干部团的战士都是干部，大都是精灵得有点“毛病”的，对付一个小文书自然不在话下，回答说：“红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是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的。请问你是……”文书说：“嘿，我们是一码事啦！”干部团的“干部战士”说：“一码事？你一个人两手空空，能把渡口封住？”小文书立即从兜里掏出一纸公文来：“瞧，龙主席才下的命令，要把沿江的船，不论江南江北的，通通弄过来烧了！”“干部战士”接过公文边走边传看起来，一个个故作惊诧：“哟，烧了怪可惜的，放哪里藏起来不就行了，或是沉到水里也成啦，老百姓造只船不容易啦！”文书说：“嘿，你们才有所不知哩，龙主席前几天下的命令就是沉船，过后修修还能用不是？他娘的老蒋不同意，说从那里到那里，所有船只都得集中起来烧掉，不能藏河岔里，或是沉到水里了事。这死老蒋……”他说着猛地把话打住，翻了个白眼，又在自己脸上连连打起耳光来：“该死，小的该死，胆敢在中央军的面前放肆……”巴掌正响着，刘伯承走了上来，问道：“船烧了没有哇？”文书一看是当大官的，脸更不是色了，慌忙道：“报告长官，烧船的命令才接到，我这正赶去传达。”刘伯承接过连长肖应棠递上的公文看了看，说：“很好，这事由我们来办吧。”接着，他又问了问当面皎平渡的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

小文书见当官的说话倒也和气，便悄声道：“长官，我替老百姓求个情吧。辛辛苦苦一辈子置起来的家当，一把火点了，往后咋办呢？是不是拖到岔沟里藏了起来，或是沉到水里了事。我们求菩萨保佑长官和弟兄们在外步步高升……”刘伯承笑笑说：“你这个人倒还有点良心喽。听你这样说，船是有藏起来的了？”文书说：“不瞒长官说，老百姓哪有愿意烧船的呢！”刘伯承说：“那好吧，你带我们去找船吧！”小文书傻了：“长官？”刘伯承说：“你不用怕，我们也不会白用老百姓船的。你要是把船烧了，我还真要找你的麻烦哩。”小文书的脑子全乱了：“长官，你们是……”刘伯承说：“我们是红军！”小文书傻了一般，想往前走却迈不动腿。肖应棠在一旁叫道：“快带我们去找船！船要是出了问题，拿你是问！”

临近江边，刘伯承兵分两路，一路由小文书带路，在江这边的河岔里找船；一路夺取渡口，直到消灭对岸的守敌，完全控制皎平渡。天黑时刻，刘伯承带着人马来到渡口南岸，暮色中，一只送探子过江打探情况的木船停靠在江边，船工正等在船上。前卫连的侦察小组来到船头，船工以为是探子回来了，说道：“回来了？”侦察员顺口答道：“回来了。”几个侦察员上得船来，把船工拉进船舱，控制起来，船便成了前卫连的渡江船。肖应棠命令3排在南岸掩护，他带两个排飞船过江。船靠北岸，侦察小组摸上岸去，敌人的两个哨兵也以为是过江的探子回来了，待到近前一看，想盘问一句也没有来得及，便当了俘虏。接着，根据小文书提供的情况，1排往左打民团，2排往右打厘金局。1排来到民团门口，哨兵问：“谁？”刚抓来的俘虏回答说：“自己人。”敌人哨兵再要问什么，两个红军战士已经拗住了他们的脖子。十几个红军战士冲进了院内，几十个民团正在抽大烟。战士们大声喝道：“缴枪不杀！”民团队员有的举手举枪，有的还倒在那儿：“莫慌莫慌，我抽完这一口……”打厘金局的2排是船工张朝寿带的。张朝寿出主意说：“厘金卡子，用不着动刀动枪，我把你们带进去就是。”黑地里，全排便冒充纳税的来到了厘金局。厘金局的头目姓林，人称林师爷。张朝寿又说：“你们是外地人，口音不同，我来叫他开门好了。”说着便朝院里喊：“林师爷，请你起来一下，我们是赶猪卖的，来给你上税。”林师爷正躺在被窝里睡觉，只听他在屋里恼道：“啥子嘛！深更半夜的，不办公事，明天赶早来！”当地人都摸透了厘金局视财如命的德性，张朝寿便又喊：“林师爷，你要是觉得打搅了瞌睡，我们又要赶路，这回的税金就算喽。”林师爷连忙在屋里叫道：“你到底是哪个？等等，我马上起来。”一会儿，只见门缝里灯光一闪，大门洞开，林师爷便被捆了个牢牢实实。红军战士涌进厘金局，不费一枪一弹，缴了厘金局的枪，还发了笔大财，没收了5000元大洋。

干部团2营连夜过了金沙江，完全控制了北岸渡口。天亮时刻，担任找船任务的一路，在小文书的带领下，在下游的小岔沟里找到了5只木船。刘伯承高兴的，把眼镜都跳落了。

他连忙用无线电报告毛泽东，提出军委纵队立即开进到皎平渡渡江的意见。接着，他同宋任穷渡江到北岸，在北岸的山洞里起草了《渡河守则》，从干部团抽调干部设立了渡河司令部。刘伯承跟宋任穷说：“任穷啊，你是当渡河司令，还是做政治委员呀？”宋任穷说：“不不，看样子，从这里渡河的不只是军委纵队，这渡河司令和政治委员，是个蛮大的官，我不能当，还是你来吧。”刘伯承说：“你是怕我先斩后奏，毛泽东不批准是不是？不，他会同意的。我知道，他会同意的。”宋任穷踌躇片刻说，“行啊，我就给你

当个帮手，在江边挥挥小旗好了。”刘伯承说：“那，你还是做政治委员吧，司令的位置给陈赓留着。现在，你赶快去弄几头猪几头羊来，要是能弄到酒，也弄些来。别舍不得花钱，我们手头不是有现成的5000大洋吗？”宋任穷眨了眨眼睛说：“明白了，红军到四川了，总参谋长要尽尽地主之谊了。”刘伯承笑笑说：“你呀，想得倒美！我刘伯承现在有那个本事，能招待得起千军万马？我是要款待我们请来的船工。几十个船工，除了让他们吃好喝好，还要按天给他们发工钱。那个小文书还得单给一份奖励，他帮了我们的忙。”宋任穷猛地跺脚道：“糟糕！总参谋长，那个小文书可能还在俘虏队里啦！”刘伯承也跺了一脚：

“还不快去把他弄出来！”

毛泽东是5月4日过的金沙江。也许是宋任穷的“地主之谊”还留在刘伯承的脑海里，刘伯承领着渡河司令部的干部战士在江边列队次迎。毛泽东第一个走下船头，接着是周恩来、王稼祥、朱德、洛甫、博古，还有李德。毛泽东好不高兴！他咧嘴笑着，快步走近刘伯承：“我没有说错吧，你刘伯承就是神龙下水呀！”周恩来也到了跟前，握着刘伯承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呀，伯承同志！”刘伯承说：“上岸休息吧，刘金定已经把房子安排好了。”毛泽东说：“伯承同志，我们可是踏上你四川的土地啦，光是这么欢迎一下子不行啊！”刘伯承说：“喝碗羊杂汤吧！这地方出山羊，管保好喝，我要宋任穷弄去了。”王稼祥愣问道：“就让我们喝碗羊杂汤？”刘伯承说：“对不起，主任同志，羊肉我得拿来款待我们的船工。”王稼祥还想回什么嘴，毛泽东说：“伯承说得对，划船人呷肉，坐船人喝汤，公公道道。”一伙人便都乐了。

就在江北岸的崖坎下，临时召开了简单的负责人会议。刘伯承介绍了北岸的地形、敌情，说到起草了《渡河守则》，成立了临时渡河司令部。朱德说：“根据刚才收到的情况报告，1、3军团在龙街、洪门渡架桥很困难，船只也很难搞到够用的，是不是都到这里来过江，这样也许还要快些。”毛泽东问刘伯承：“要是都从这里过江，大概要几天时间？”刘伯承说：“7条船。只要抓得紧，秩序好，一天过万把人是没有问题的。”毛泽东说：“就这么办，请朱德同志安排一下，都赶到这里来过江。看得出来，伯承同志早就是这么打算的，连渡河司令部都组织起来了嘛。”刘伯承说：“说到这，我可是先斩后奏了。我让宋任穷做渡河司令部的政治委员，司令员的位置给陈赓留着，不知中央和军委……”刘伯承的话没完，只听江面上有人在喊：“总参谋长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有人问：“那是谁呀？”毛泽东说：“谁？红军中不大不小的人物。”

伯承啦，你去对付他吧，我们上岸去了。”

刘伯承往坡下走去，只见陈赓拄着棍子从船上走下来。陈赓，人年轻，资格老，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搭救过蒋介石，“四·一二”被蒋介石抓进监牢，杀不敢杀，放不敢放，是宋庆龄把他保出来的。他在红军中做过团长、师长，屡立战功，部队精简整编，他做了干部团团长，算哪一级干部，说不清。总之，是红军中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他一边瘸着腿往坡上走一边嚷道：“总参谋长刘伯承，你干的好事嘞！你为什么把我甩到医院去了，害得我开小差也开不成！”刘伯承迎着说：“你不是负伤了嘛？”陈赓说：“负伤？你负过伤没有？你的一只眼睛还瞎了呢！你也太不关心我陈赓了，负伤就甩！你说，过金沙江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有战略意义的事对不对？你却把我甩了！”

叫后人怎么说？陈赓是躺在担架上做梦，梦见龙王爷背着他过的金沙江……”刘伯承乐了，说：“你想怎么过金沙江呀？”陈赓说：“怎么过？你怎么过，我也得怎么过！”刘伯承说：“那好，我现在给你宣布，你是渡河司令部的司令员！刚才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的。”陈赓哑了半天，问道：“真的？”刘伯承说：“军中无戏言。我敢跟你开这样的玩笑？”陈赓把木棍“嗖”地甩进金沙江里：“准是你总参谋长提的名了！走，快给我说说任务。”

几分钟后，毛泽东改变了刘伯承的决心，任命陈云为渡河司令部的司令员，蔡树藩为政治委员。他当着刘伯承和陈赓的面说：“干部团这两个人我经常要用，你不能动我的。”陈赓后来有戏言：“袁世凯做了80天的皇帝，我陈赓做了8分钟的渡河司令……”军委纵队过江以后，接着是1军团和3军团过江，最后是后卫5军团，9军团同时在下流会泽过江。

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直住在金沙江北岸半坡上的山洞里，像检阅似的，看着一船船的部队渡过江来，又一路路一行行地在山路上向北去，他们心里头是何等的得意和激动！

部队渡过金沙江，把几十万敌人甩掉了，四渡赤水之战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此去川西北，同4方面军的会合也就有了实际的可能性……

除了指挥事宜，毛泽东每天总要在洞口的石崖上坐上一阵。5月7日，1军团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军团政委聂荣臻来到毛泽东住的洞口，向他报告了部队渡江情况。毛泽东大概是想起了林彪的那封信，说：“好嘞，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聂荣臻听出了毛泽东的话里有点别的什么，接着又道：“我们有个野战医院是在鲁平渡过的江，林彪赶到前面去查看情况去了，他特意要我来向你报告。”毛泽东“噢”了一声，说：“谢谢他了。呃，荣臻啦，你们龙街方向为什么就搞不到船呀？”聂荣臻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他想做点弥合的工作，说：“船，是我亲自带人找的，那边的地方官执行命令坚决，查得也严，渡口两岸十几条船，有的真烧了，有的叫船主敲散了，把木头埋在地里。野战医院是跟侦察分队过的江，因为船是临时钉起来的，他们过了一趟，就不能用了。而要架桥，没有船是很难的。万幸的是军委干部团找到了这么多的船，他们为全军立了大功……”毛泽东笑着扬了扬手，说：“荣臻啦，应当说，你的说明是有说服力的。怎么样，你对全军渡过金沙江一事有何评价？”聂荣臻说：“我认为，中央红军西征以来，遵义会议是一个转折，这次渡金沙江是又一个转折，这后一个转折是从前一个转折来的，是军事上的一个转折，它说明我们四渡赤水之战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不知道这样看对不对？”毛泽东高兴了。他觉得聂荣臻把全军渡过金沙江的军事行动同四渡赤水联系起来，从战略意义上作出评价，是很有些见地的。他说：“荣臻啦，你抓到事物的本质了。说得对，四渡赤水之战的终点不在乌江，也不在北盘江，而在金沙江！”

第二天一早，3军团开始渡金沙江。下午，毛泽东又来到洞口的山崖上，他在那里坐了好久，他想见见彭德怀或是杨尚昆，看看他们是不是也有聂荣臻那样的评价。他希望他们在事实面前能有那样的评价。但是，他等了好久，彭德怀没有来，说是带着部队从另外一条路走了，杨尚昆还在医院的行列里。傍晚，他不再去琢磨什么“评价”问题，他把自己全身心地投进雨后斜阳下高山大河的壮丽景色中。他看着部队抖擞地行进在苍茫暮色中，他的诗兴又发了，又想起了辛稼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那么多诗家骚客，却偏偏又进出个辛稼轩来。他想赶走辛稼轩，却赶不走辛稼轩的一首《西

西江月》，便信口吟了起来：

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溶金。白鸥来往本无心，选甚风波一任。别浦鱼肥堪烩，前村酒美重斟。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

他刚吟完，徐特立和董必武拄着棍子出现在他身后。董必武说：“西江月，谁人之作呀？”毛泽东转身，笑而后愕，道：“怎么，二位老同志还没有上路啊？”徐特立说：“不忙，蒋介石还远哩。总司令要我们北进时随3军团，后面还有5军团。”毛泽东关照两位老同志坐下。徐特立接着说：“打搅你的诗兴了。怎么又想起辛弃疾了，他的这曲《西江月》不怎么样嘛，特别是最后两句。”毛泽东说：“是呀，这位老先人真会戏弄人。开头两句不错，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溶金。这不正是眼前景色的描绘么？接着来的两句也还可以。”

说的是御史唐介率家人渡淮，中流遇大风，波涛泛滥，舟人甚恐，唐介却稳坐舟中，吟诗道：‘圣宋非狂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风波’。大有闲庭信步之意。下半阙就不好了，简直不是辛弃疾了，怎么能说吃吃喝喝罢了，不管国家兴亡之事？他是发牢骚吧？”徐特立说：“是的是的，是牢骚。爱国受屈，岂不牢骚？不过，我倒觉得，中间的‘白鸥来往本无心，选甚风波一任’，也可作另一种解释：中流风浪起，白鸥本无心。”毛泽东愣住了，“先生，你是在以今解古吧？愿听先生教诲。”徐特立笑笑说：“润之，我和必武同志昨天见到子珍了，她的伤势正在痊愈。她很挂牵你，要我们来看看你，转告她的一句话。”毛泽东问：“她又唠叨什么了？”徐特立说：“不是唠叨，是挂牵。她说，路还很远，希望你能爱惜些。”毛泽东是知道自己妻子的语言习惯的，他能体会到妻子看似平常的一句话里所包含的东西。他沉思片刻说，“徐老，董老，特意捎这么一句话，自然也有你们的意思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董必武说：“润之，四渡以来，有的同志有点意见，还有上书的。这是恩来同志在路上随便跟我聊起的。我和特立同志想，意见也罢，上书也罢，恐怕主要还是认识问题。我们还想，全军过了金沙江，有的同志的意见有可能化解了许多。这些问题，谈一谈是有必要的，但是，终究是认识问题，谈的时候还是宜从团结出发，从爱惜出发。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过不少的教训。就是这个，是否有当，仅供参考。”毛泽东听到后边的两句官场用语，禁不住乐了，说：“对，应当参考，应当照办。二位老同志呀，你们虽不直接指挥作战，却对我们红军是关怀备至的，谢谢你们了。怎么样，此事就说到这，我们和一首如何？此情此景，想必你们不会没有诗兴的吧？”徐特立说：“这就看董老了，我是不行，突然袭击更不行。”董必武说：“不不不，我也不行。一路上诗情倒是时有涌现，但一直不成章句。”毛泽东说：“那就抒抒诗情，留点杂句也成啊？”董必武说：“请吧。”毛泽东说：“我们从江西出发，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征途漫漫，万水千山，时间才半年多，可谓万水千山只等闲！现在到了四川，瞧这金沙江，水拍云崖，天长地久，有感于刚才二位老同志的深情厚意，我是深深体验到金沙水拍云崖暖了。”徐特立叫道：“好句子，好句子！”董必武说：“七律，可作七律！”毛泽东笑笑说：“可惜，还只是作了几句，不得成章，吟来作引玉之砖？”徐特立和董必武雀跃起来：“快吟快吟，知之为快也。”毛泽东面江吟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回荡在峡谷中的诗句，在不该断处断了。

毛泽东转过身来：“嘿，就这几句，下边看来是……”董必武说：“大渡河，下边是大渡河！”毛泽东高兴地一挥手说：“对，下边是大渡河。明天一早，我们就向大渡河前进如何？”

董必武和徐特立倒像是学生似的：“虽说是一首不曾写完的诗，却也叫我们受益非浅……”

第二十二回 以奖代惩龙云走大运 啼笑皆非薛岳拾草鞋

话说5月3日至5月9日，中央红军在皎平渡如龙舟竞渡般地飞越金沙江时，贵阳和昆明之间那场讹诈与反讹诈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日前，薛岳飞昆明以“共匪回窜”讹诈龙云，龙云着实吓了一跳。龙云想，要是川军堵截严密，共匪的回窜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一旦出现那种局面，与其说“共匪”回窜，还不如说是中央军回窜……

薛岳一离开昆明，龙云便召见幕僚，商讨“两面对敌”的问题。他说：“薛岳提出的‘回窜’问题，我们过去想得确是少了。共匪两次窜犯古、叙，都没能过了长江；而上游金沙江，水流湍急，地形险要。要是川军堵截有力，共匪还是有可能窜不过去的。他一旦过不去，又不可能留在元、禄地区背水而战，岂不就要回窜滇中或是滇西南搞他们的根据地，这不就麻烦了，我们就有个两面受敌的问题。懂我的意思吗？”幕僚们先是沉默不语，龙云又说了说他同薛岳“会商”的详细情况，孔繁跃突然站起说：“恐吓！讹诈！完全是恐吓讹诈！”龙云愕然：“有话好好说。”孔繁跃说：“省座，薛岳是在你拒绝指挥中央军之后来昆明的是不是？他们恐怕不会不琢磨一番，你为什么拒绝指挥中央军的吧？视兵权如命的，在黔省以战场指挥官身份指挥作战的，竟然拱手让出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这可信么？显然，他们是以共匪回窜为由，压你就范，既同意中央军在滇自由行动，又承担起滇黔剿匪失利的全部责任，如此而已。”周钟岳说：“孔兄之言，甚有道理。最要紧的一个问题是，此次共匪北渡金沙江成功与否，到底作何判断？我以为，他们大有可能成功。第一，此次共匪北窜元、禄地区，我们都蒙在鼓里，川军能有多少发觉？即使有所发觉，刘湘的部队能及时赶到江边么？第二，金沙江江面狭窄，地形隐蔽，即使没有船，他们也会想出一些办法的，不是说他们两次渡乌江都是用的竹筏子么？我在想，我们此刻在这里猜测共匪渡金沙江的成败，也许他们已经过去了。北渡金沙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一当渡了过去，他还怎么可能回窜？只怕是请也请不回来了。也许贵阳方面是那么判断的，共匪不可能过了金沙江。”孔繁跃说：“不，他们也作了共匪有可能渡过金沙江的判断。”

龙云如醒大梦，恼道：“骗局！原来是一个骗局……”他琢磨了一阵，又道：“那么，他们既然作了共匪窜渡成功的判断，为什么又那么心急如焚地要我指挥各路入滇部队？”孔繁跃说：“刚才不是说了吗？共匪窜渡金沙江成功，便宣告了滇黔剿匪的完全失败，这不正好由你来承担么？”龙云更恼了：“他娘的，啃着黄瓜撒尿，他两头都逮着了。好在没有上他们的当，薛岳前几天发布的命令，我没有签署。”周钟岳说：“省座，并非万事大吉呀？”龙云说：“共匪不回窜，一走了之，还有我的什么事？”周钟岳说：“不，

共匪回窜他们有文章可作，共匪走了他们也有文章可做的。”龙云茫然，道：“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周钟岳说：“我们说的是共匪一旦窜渡成功。可共匪是在哪里窜渡成功的呀？是在滇省境内窜渡成功的！这样的口实他能不抓么？你尽管拒绝了指挥中央军，但2路军的总司令还在。其实，老蒋想把剿匪一旦失败的责任推到地方军政要员头上，从委任你做第2路军总司令就已显出端倪了。”龙云这才全醒过来，说：“说得对，说得对，我们还得准备一手才是。”

在幕僚们的策划下，此后数日，龙云便同蒋介石进一步斗起法来。5月6日，龙云得知红军在皎平渡渡金沙江的情报，作为铺垫，他当天便给蒋介石发了个电报，埋怨江北“未见川军布防”，“恳祈钧座立电刘部即日驰赴江岸严防为禱。”说是“惟对岸无兵，匪便有渡过逃脱之虞。”5月7日，为把角色演得更像，他给他的滇军发了个措词强硬的作战命令，同时抄报蒋介石。电令说：“一、匪过大江未成，誓窜坏洲，必已军心慌乱，希望断绝。兵法攻心，良机难再，我军务趁敌众气馁之时，分兵猛攻，压迫该匪于会、巧方面，可期解决。二、务抽调劲旅，兼程向匪右侧前进，防其窜过寻、沾。三、匪方重心，全在军委。我军无论何时，发现其军委所在，各选有勇有为之团长，不惜牺牲，直前猛扑，本擒贼擒王之旨，将其重心摧毁。四、顷奉委座电，匪首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4人，无论生擒格毙，查实均奖国币10万元。即谕官兵知照。”“剿匪”之决心，昭昭可见也。5月9日，龙云得知红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他心中得意，却“痛心疾首”地给蒋介石发了一个请求处分的电报：“……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初意满以为匪到江边，纵不能完全解决，亦必予痛惩，使溃不成军，藉以除国家之巨害，而报钧座之殊恩于万一。詎料得此结果，愧对胞泽。不问北岸之有无防堵，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无毒不丈夫，无损不得利。龙云还以奉派销毁船只的参军孟智仁“趑趄不前贻误军机”为借口，将其处死，开脱自己，向蒋介石表白他对“共匪窜逃过江”有着不可了却的恼恨。

且说蒋介石收到龙云的电报，得知“匪已过江无疑”，气得“娘希屁”都不行了，只道是“也好，也好，反正这贵阳我也住够了。”缓过劲来以后，他召开将领会议，讨论龙云的电报，是否惩处龙云的问题。他说：“共匪连金沙江都能窜渡过去！你们说，这是不是龙云搞乱子造成的？”听口气，委座是要处置龙云了。众将领考虑到自己的面子，也都乐得办了龙云，以告世人。薛岳尤其考虑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便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就说共匪窜滇以后吧，龙云简直不是在剿匪，而是在窝匪，藏匪，送匪。这决非危言耸听，也非欲加之罪，不患无词。共匪窜滇当初，他不于堵截，待到李崧团被歼，他还在收兵昆明，名为防匪，实为防我，致使共匪在滇东如入无人之境，七八座县城不攻便破，这不是窝匪么？昆明临近前线，他却不掌握敌情，一再说共匪将从巧家方向窜渡金沙江，致使我周、吴纵队一直以巧家为目标，而共匪实际上是在向元谋开进，这不是在藏匪么？当发现匪已窜至元谋地区，成窜渡姿态，他却把孙纵队摆在曲、沾一线，后又移至宣、东地区，夹在其间，又迟迟不予进击，挡住我中央军的去路，这实际上是在掩护共匪，图谋送共匪出境了事！如此等等，罪不可赦。因此，我认为对龙云不可姑息，当予严惩。”陈诚说：“军法不严，无以为战。龙云不只是在剿匪军事上设置重重障碍，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同共匪暗中有结？刚才说共匪

入滇之初还有李崧团的被歼，后来的元、禄、武三县，据侦察，竟是地方官员列队欢迎进城的，这也太鲜廉寡耻了。地方官员如此劣迹，是在上者的昏庸，还是有所授意？实难料定。此等事情，当予查究。即使难以查究，可以留待军统，但贻误军事严重，且本人自知负罪在身，处置一下，以告各地，实属必要。”顾祝同也说：“要是这次再放龙云一马，往后云南的事情恐怕就更不好办了。”

何成浚是在座的长者，时年53岁，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曾为蒋介石斡旋过诸路军阀，颇有成效。此次蒋介石把他从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行辕主任上调来“剿匪”前线，意在要他参佐对各地军阀的工作。处置龙云，自然得听听他的了。蒋介石问道：“雪竹兄，你看呢？”何成浚抿了一口茶，说道：“刚才各位说到龙云的过错，无非两条：一条是军事上不力；一条是同共匪何端怎样。这两条都不好说呀。各位，剿匪军事上的失利，非今日始，你查究起来，我们都在这里，又往哪里搁？单单惩处个龙云，外界将作何议论？要说他同共匪有勾搭，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他们不也有可疑之处么？我认为，与其惩处一个人，不如驾驭一个人。委座英明，还能驾驭不了一个龙云吗？但要是惩处他，可以设想一下，荒蛮之地出身的龙云，他要同你翻了脸，你怎么办？我们总不能把‘剿共’变成‘剿龙’吧？那样一来，外界舆论岂不哗然？此其一也。其二，共匪既然窜过金沙江，少不了要动用川军各部，惩处龙云，固然对各路川军官长有所震慑，但也有另一种作用，他害怕了，缩手缩脚，不敢用兵，岂不也糟？委座对川军的主旨就不在惩处。川军在川北的‘六路围攻’，失利不小，委座却在南京召见刘湘，许诺多端，高屋建瓴，非我等所及也。其三，滇军主将孙渡，其人目前尚难把握。他和龙云，字号如同一人，一个志舟，一个之舟，合起来便是志在一舟，生死与共也。听说龙孙二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深厚关系，我不甚了了。休说孙渡，那些旅、团长又怎么样？军阀之旅，切不可低估他们的根基。

当年我做阎锡山的工作，最大的麻烦是那些师、团长怕当了中央军丢了那个醋壶子。总之，对龙云，我的意见还是避开惩处，另择他途，我想委座是会有办法的。”

众将领被何成浚的意见打哑了，都怔怔地不敢再说什么。蒋介石脸色却由怒而喜，他很赞赏何成浚在权术上对他的认同，心头对龙云的那股气恼，竟化作烟云散去了一般。他一改刚才的调子说：“你们呐，作为高级将领，不能光晓得打仗，还得学会多方面地考虑问题才好。共产党里有些不知事的小把戏，比如林彪啊，陈赓啊，在黄埔时都还是些小孩子。我们这里也有些知事不多的，成天就知道打啊，做什么官长啊，何主任就比你们高明得多。他说的不要光是想到惩处人，还得学会驾驭人，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就这样，照何主任的意见办，明天我们都去趟昆明，带好礼品，奖而不惩，以奖代惩。道之，你先联络一下，就说是我说的，是慰问各军首脑的，也想散散心。”

以奖代惩！众将领莫不为之咋舌……

5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并一帮将领，飞抵昆明。对于蒋介石的昆明之行，龙云事前得到预告，又从在贵阳的耳目黄毅夫那里得到些情报，他暗自乐了。龙云也会来事，他不惜破费，大讲排场，把接待蒋介石夫妇一行人马的招待会和洗尘大宴安排在滇池边的大观楼。“盛情之下，天

王老子也不敢翻脸。”他偕同僚10余人在机场热烈迎接蒋介石。当幕僚孔繁跃向宴道刚报告了接待委座的安排，宴道刚又转报蒋介石后，蒋介石说：“这可有点子不敢当啊，志舟兄，我是来慰问你的嘛！场面大了，倒像是你在慰问我了。”龙云“嘿嘿”笑了笑，说：“边远之地，场面想大也大不起来，还望委座谅解不周之处。”

500里滇池，烟波浩淼；近水阁楼，景色万千。蒋介石夫妇下得车来，在楼前水边停了停脚，宋美龄在啧啧赞叹滇池的美景，蒋介石却在暗自想道：“这龙云倒也心计不凡呐……”

在人数不多却也热烈的招待会上，权作讲演词，蒋介石大赞了一通龙云“终于迫使共匪走上石达开灭顶之途”的功劳，并当面撕毁了龙云的“请罪电”。蒋介石说：“我们为什么历经数省而没有将共匪彻底剿灭？就是因为共匪长于山林野外作战。河网地带他不行，城市作战他不行，他就是乐于在搭界的山地里跟我们兜圈子。但是，山太大了，地形太险要，他还是不行，越城岭他就不敢久留，我们在湘西山区给他们作了点准备，他也不敢去了。现在好呐，我们的各路大军把他们赶进了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险山恶水之中，这是一条什么路呀！石达开全军覆灭之路！共党首脑率领的这股朱、毛赣匪，指日可灭，志舟兄的这份功劳还小吗？本委座为嘉奖志舟兄统率的滇军作出的这份贡献，特拨款50万以补近来剿匪之开销。”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龙云这才相信了委座来昆的“诚意”。他不感意外，却也受宠若惊，说：“谢委座，太谢委座了！说来惭愧，龙云不才，用兵太儒，又眼界短浅，优柔寡断有余，当机立断不足，不无错离委座指挥要旨之处，还望委座多有教诲，龙云日后当有所长进，共赴剿匪战事，完成灭共安内之大业。”会场上又响起了一阵掌声。因是招待会，宋美龄也是要讲几句的。她用上海腔说：“你们讲剿共咯，我讲新生活咯。委员长提出新生活运动一年多，国民热烈响应。我讲一点粗浅体会贡献给各位。讲两个字咯：一个仁字，两个人在一起的仁。仁者爱人，仁德者，宽以待人，互相爱护咯。再一个是义字，我字头上一只羊。这个字就是讲咯，我是扛着羊来的，我们一起宰羊祭天咯，皇天在上，我们是朋友，永无反悔咯。就讲这两个字，不多也不少。朋友相处，仁义而已矣。”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招待会正进行中，阁楼外一声“孙参谋长到！”孙渡大步来到阁楼前，后面跟着9旅旅长刘正富。孙渡和刘正富是接到龙云的紧急通知，从前线匆匆赶回来见蒋的。他们走上台阶，一看蒋介石和龙云迎在门口，两个人一紧张，脸色发白，孙渡单腿跪地，刘正富也跟着跪了下去。孙渡声调悲切地说：“委座，渡抱恨非浅，堵截不果，共匪窜过了金沙江……”蒋介石不禁想起了在贵阳乍见“援贵救驾”的孙渡的情景，当时他是视孙渡为救命恩人的。

他连忙道：“孙将军，不必过礼，快请入座。”孙渡平身，龙云介绍刘正富：“这是9旅旅长刘正富。”刘正富一身都在抖，他是有“通匪”之罪的，他也知道，龙老板才办了参军孟智仁。龙云连忙给孙渡和刘正富通信息：“刚才委座还夸你们啦，把共匪赶上了石达开覆灭之途。”孙渡和刘正富的脸上这才有了些血色。入内坐定，蒋介石问孙渡：“罗炳辉到底是在哪里渡过金沙江的？”孙渡说：“会泽的盐井坪，时间是5月6日至7日。酿此祸端，主要是当地的船只并没有烧掉，只是沉在水里，结果叫他们打捞起来，四五十只木船，自然速度就快了。卑职所部是11日追到江边的，所有船只都叫共匪破坏殆尽。共匪手段狡猾，花银元把船买了，而后沉入江底，现大都被

冲走了。一来无船过江，二来考虑到薛总座‘防敌回窜’的意图，职部现正严密防守会泽、巧家一线的东岸。”蒋介石又问：“依你判断，匪现在何处？我们将采取怎样的行动为好？”

龙云见蒋介石同孙渡要说的话还多，怕打搅他们的交谈，便传令招待会结束，请女客们和地方政要都游游滇池去，听通知再来入席陪客。当阁楼里只有一帮将领的时候，招待会便一变而成了作战会议。只听孙渡在说：“此次共匪窜渡成功，除本省沿江各地方官员督令烧船不力之外，北岸防堵不严，几无守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想必川军方面也是一时调兵不及；再者，他们可能注重的是大渡河的防守。从战术上讲，这倒是有些道理的，川军一旦深入西昌、会理地区，前面三向都是金沙江，后面是大渡河，怕困在这个狭小地区，腹背受敌，背水而战，那是有些危险的……”

“拿地图来！”蒋介石不等孙渡说完，叫道。

说话间，宴道刚令作战副官连忙将一张大地图挂在阁楼的木板墙上。蒋介石走近地图看了看，像是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连声道：“好，好，好啊，怪不得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灭了……”他停了停，接着手指地图说：“诸位，你们看，金沙江由北而南，在仁和、元谋向东拐去，在会泽又向北去了，直到绥江才又向东。西昌、会理地区恰成一个半岛地形，半岛的后部又是大渡河。刚才之舟讲的川军不敢前进到金沙江来防守堵截，是川军方面考虑到这么一个地形，这是可能的。那么请问，共匪现在可是到了这个地区了，我们该怎么办呐？”蒋介石很是得意，他不时拿眼睛盯盯孙渡，意思是说，你孙渡摸到了象，却不知道象是什么。手下将领们也都了解他们的委座，委座只有当他心里有了答案的时候，他才问左右“怎么办”的。众将领只是窃窃私议，都不回答委座的“怎么办”。蒋介石提高嗓门说：“我要再次重申，这次第3纵队，主要是第3纵队，把共匪赶进这个三角地带，为我们在这个狭小地区，把共匪变成又一个石达开，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份功劳是不次于湘江之战击其半渡而歼其大半的！共匪窜过金沙江，他也许以为金沙江帮了他的大忙，殊不知，金沙江成了我们的天然屏障，一道不可攻破的堡垒线，这道堡垒线同大渡河连接起来，更是妙不可言了。请诸位注意，我们要把窜匪封锁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彻底歼灭。具体部署是不是这样：薛兵团（含李韞珩师）由现地迅速过金沙江，追击前进；川军20军和21军一部，由杨森指挥，火速进至大渡河东段堵截；刘文辉的24军主力防堵大渡河西段。刘文辉和杨森应到汉源接敌指挥。刘文辉在大渡河以南的5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并受薛岳指挥，主要是在这一地区，同薛兵团协同作战，搞他个天翻地覆。孙渡的3纵队作为第2梯队，可有3至4旅渡江跟进，其余各旅主要布防金沙江，保障通道，防敌回窜……诸位，我再重申一句，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匪入此彝汉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之地，必步石军覆辙，希望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功。”蒋介石得意处，差点忘却了身在何处，孰宾孰主。抬头见宋美龄从外间走进来，方才想起他把个招待会变成作战会了，便笑了笑说：“对不起，扫了大家的雅兴了。没有法子呀，志舟兄给了这么个好机会，之舟兄又出了这么个好题目，我也就喧宾夺主了。”

哦，志舟兄，你还是2路军的总司令呀，你看这样行吗？”

龙云今天是第二个最得意的。“围剿”者与被“围剿”者都已北去，他这个“被围剿者”也似乎得到了解脱。放下包袱，龙云又显出了他的精明。

他接着蒋介石的话说：“绝妙的作战地域，英明的战役部署。如蒙委座恩准，就叫作‘大渡河会歼战计划’。诸位，共匪的去向是同川匪会合，阻其会合，聚而歼之，在此一役！我们要深切领会委座的苦心积虑和雄才大略，两股匪众的会合，将遗大祸于党国。时至今日，石达开可以有两个，3个，而石达开的葬身之地，只能有这一个。我滇军将唯委座之命是听，前赴后继，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关于战役部署，我只有一项补充，考虑到共匪西窜绝无可能，在南追北堵的打击下，只有东窜一种可能。为此，在南北夹击的同时，川军郭勋祺纵队似应从犍为、沐川方向楔入，击其中段！如能将匪断为两截，则匪之灭绝，更是肯定无疑了。可否，请委座定夺。”

蒋介石连连说：“好，好，补充得好。”又问众将领：“诸位意下如何？伯陵呐，你还是前敌总指挥，有什么说的吗？”

在一片叫“是”声中，薛岳说：“我的先头李抱冰53师明天就向金沙江开进。”

蒋介石朝薛岳翻了个白眼，说：“好吧，照此下达我的命令！”

说完，便坐在特设的大理石面的太师椅上，心里颇有几分激动。

龙云近前道：“委座，请小憩，即便小宴。”

蒋介石说：“好咯。这一来，我也就有心思欣赏欣赏你们的滇池风光了。”他说着起身走出阁楼，众将领相随。他在阁楼前的石栏处举目望了望滇池，伸了伸胳膊，扭头见阁楼两旁大柱上有长长一幅楹联，欣然说：“啊，这便是中国有名的长联了，道之，陈布雷没有到，只好你来了，断断句看。”宴道刚恰在一本杂书上看过这幅“长联”，便兴致勃勃地念起上联来：“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蒋介石边听边看，词句的意思大体是明白的。他连声赞道：“好啊，这对联写得好啊！对联对联，功夫就在对。看看对得怎么样。”宴道刚便接着读下联：“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读着读着，蒋介石不高兴了：“算了算了。娘希屁，好好的一个上联，对这么个下联！什么叹滚滚英雄谁在，这不都在么？看这最后，‘两行秋雁，一枕清霜’，败兴！志舟兄，不要让你们的将领来读这劳什子对联。”一旁的龙云应声“是！”又叫道：“周钟岳！一会叫人把它下了，把这劳什子烧了！”蒋介石说：“什么时候我要陈布雷另对一个下联就是。”阁楼前的何成浚、薛岳哭笑不得。陈诚说：“看来，只有夫人才能搭救这幅楹联了。”宴道刚听说要毁了楹联，正没了主意，听陈诚说到可求夫人的慈悲，便慌着要去找宋美龄。陈诚说：“不必惊慌，宴席上一说就是了。我才不相信龙老板真要下掉这楹联呢。”

从招待会上告退去游滇池的女客和政要们都返了回来，听说龙老板要下掉楹联，一个个全都傻了眼，正无言处，周钟岳从阁楼走出来，高声唱道：“委座洗尘大宴！”尔后走近蒋介石和龙云，躬身道：“委座，龙总，请入席吧。”

龙云跟了一个字：“请。”

且说薛岳在大观楼说的“我的先头李抱冰53师明天就向金沙江开

进”，其实只是一个临时的应付。他不想说别的，也不能说别的。薛岳，一介武夫，年已40，为人尚有军人的耿直。他当时的心情很郁闷。对龙云搞“以奖代惩”，他很有些感触，令他想起了他的进军贵阳，为之“图黔”，结果却遭了个全军“通电”，那是“以惩代奖”了？以惩代奖也罢，以奖代惩也罢，照此下去，将何以为人手下将？每每想起，他心里都有些颤颤的。这还不是主要的，要紧的是，对于蒋、龙津津乐道的“大渡河会歼战计划”，他独有异议，他觉得那压根是纸上用兵，异想天开，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成其为一个战役计划，实施起来定是漏洞百出的。他私下里同陈诚谈过所谓的“大渡河会歼战计划”。陈诚在重庆在蒋面前为他说过好话，他相信陈诚不会出卖他。他说：“一个战役计划，首先是战役指挥问题，没有统一的战役指挥，一切计划都是空谈。北线川军的堵截，二刘一杨，谁指挥谁呀？这里的作战计划已就，刘湘还在梦中；即使刘湘赞同，他也未必能指挥得了刘文辉和杨森，还谈何中央指挥地方，云南指挥四川？再者，地形险要，于敌不利，于我又利乎？利与不利，敌我皆然。大江大河，历来背水而战者，非敌即我，非我即敌，是难得说利在哪一方的。”陈诚只回答了他一句：“阁下好自为之吧。”

薛岳就是带着这么一个精神状态，率领他的先头53师由东川出发开拔金沙江的。5月16日，部队来到江边，满江空空荡荡，连个老百姓也见不到，像是到了一个荒蛮的世界。

薛岳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他要各团派出侦察队，来一个比赛，看哪个团最先找到红军渡江的渡口，“最先找到渡口的每人奖大洋一元！”3个团的侦察兵沿江侦察了一整天，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捡了不少红军穿破了的草鞋。这天，各团团团长带着他们的侦察兵，肩上挂着破草鞋，来见薛岳了，说他们都发现了红军的渡口，有草鞋为证，伸手要银元。

薛岳哭笑不得。

53师隶属吴奇伟纵队。吴奇伟的其他3个师19日才开始渡江，周浑元纵队25日才渡江完毕。渡过金沙江的薛岳兵团，迟迟不敢向前推进。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停留了近10天，薛岳兵团竟没能追上。在后来的追击中，薛岳兵团一直同红军保持相当距离；在整个所谓的大渡河战役中，薛岳的部队几乎没有同红军发生战事。薛岳后来在回答蒋介石的质问时说：“我追得越急，共匪北进越快，川军越是到不了位，匪之北窜就更有成功的把握。”

蒋介石无言以对。

第二十三回 边城不克老彭受挫 会理会议林彪挨批

话说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向会理进军途中，3军团调整为前卫，陈赓和宋任穷的干部团随3军团行动。会理县，川康边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一个县，是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进入川康地区的第一个县。毛泽东打算在这里停留一个短时期，一来补充人员物资，二来开开会，总结一下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工作，把上层指导思想再统一一下。3军团先头部队，5月8日就到了会理城郊，意在攻占会理城。毛泽东亲自给彭德怀交待说：“最好

能打下会理城，实在拿不下来，就把他们困在城里，别让他们出城来打搅我们。”

彭德怀说：“遵义都打下来了，还能打不下个会理城！”

因进军神速，部队都还不大了解会理城的情况。会理县城，虽边远小城，却是个老城。

史载：“汉置会无县，萧齐时没于獠蛮，后没于南韶，置会川都督府。”历史上经过多次战事的会理城，竟有高12米、宽6米的城墙，砖石浆砌，很是坚固。城里守敌是刘文辉所属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的刘元塘旅，近两个团的兵力。刘元塘旅在通安同渡江后北进的红军打过一仗，是败退到会理城固守待援的。刘元塘手段毒辣，他把城墙外的民房全都烧光，使红军难以隐蔽接近；把在通安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又释放的几十个士兵通通杀掉，以防他们为红军作宣传。他要“踞城固守”，封闭了所有城门，决心死守。

3军团包围县城是顺利的。部队一到城郊，很快便夺取了城东的东山寺和城西南的西来寺等制高点，方圆不过数里的会理城便在红军的火力控制之下。谁也没有想到，小小会理城竟是一块骨头。彭德怀赶到前沿制高点，手举望远镜一观察，心里禁不住格登了一下，也想起了毛泽东说的“实在拿不下来”的话，便止不住骂道：“他娘的，小小一个县城，竟有这么高的城墙！不行，要想办法拿下来，一定要拿下来。要不，3军团成了吹牛匠了。”

彭德怀坐镇前线指挥。他令10团担任围城任务，11团攻东城门，12团攻西城门。

战斗9日打响，迫击炮、机枪、步枪一齐向城里开火，进行强攻。整整打了一天一夜，部队还是没能进了城。彭德怀骂娘道：“他娘的，一个小小的会理城，还这么费手脚！”干部团的肖劲光说：“那就围吧，围死它！”彭德怀说：“不行，还得想办法！不就是城墙上不去么，挖地道，从底下钻！”彭德怀便要副参谋长伍修权组织坑道作业。会理城围了一个星期，挖了一个星期的地道。最后地道是挖成了，结果因炸药太少，爆炸力又太低，5月14日起爆，两处炸点都没能把城墙炸塌，会理城终于没有打下来。

彭德怀一边操心攻城的问题，一边参加会理会议。会理城没有攻下来，会议上又因林彪的那封“换帅信”把他牵了进去，搞得他内外交困……

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会理附近的铁厂村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军团负责人有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确定红军过金沙江后的行动任务，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会议在洛甫作了形势问题的报告后，毛泽东作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以来的军事工作总结。本来，毛泽东在作军事问题的总结时，他脑子里就装着董老和徐老在金沙江边的“进言”，他只想正面地阐述“四渡”以来的运动战思想，同时不点名地回答林彪等提出的不同意见，这是为进一步统一领导思想所必须的。那时，开会发言都没有讲稿，都是即席而谈。就在毛泽东发言当中，有人插了进来说：“我们能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说明四渡赤水以来的运动战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是完全正确的。有同志上书中央‘三人小组’，要求撤换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军事指挥，这是个原则问题，是执行不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问题，应当得到认真的解决，求得分清是非。”

一个插话，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这样的严重分歧，是

该好好谈一谈的，不能再拖。”会议一下子便转到了对林彪的批评。林彪年轻气盛，性格却又内向，他不怕事，却也不吭声。他也估计到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只好闷头听着。毛泽东一看难以压住会议对林彪的批评，而且，他也委实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原则的。林彪太狂。便说：“好吧，反正我也起了个头了，大家就来谈谈四渡赤水的是非得失吧。”聂荣臻不是政治局成员，却是1军团的政治委员，是知情人，他不得不作一个比较充分的发言，他首先说了林彪是怎样同彭德怀通电话的，林彪是怎样坚持要发那封信的，他又是怎样劝阻而没有劝阻了的。他说：“林彪同志主要是对四渡赤水之战有不同的看法，有意见，特别是在鲁班场战斗失利之后。我以为，林彪同志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四渡赤水之战，总的战略目标是要渡过长江，实现同4方面军的会合，这个战略意图是遵义会议作了决议的。因此，‘四渡’是遵义会议决议的贯彻和实施。林彪同志却把它看作是个人的随意指挥，这是不恰当的。四渡赤水为什么有四渡，而不是一渡，两渡，三渡？没有办法嘛，过不去嘛，只有在运动中寻机消灭敌人，摆脱敌人，才能找到机会，在可行的地段上，或是渡过长江，或是渡过金沙江。既然是运动战，哪有不多走路呢？林彪讲的弓背弓弦，其实，运动战更多的恐怕就是走弓背，而不是走弓弦。只有走弓背，才能隐蔽自己，出其不意。当然，部队多走了那么多的路，很疲劳，有些怨气，这是难免的。但我们是指挥员，看问题总还得宽广一些才好。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渡过金沙江了，四渡赤水之战是成功的，战略目的达到了。所以，我曾同毛泽东同志谈过，四渡赤水之战，从军事上讲，终点是渡过金沙江；从政治上讲，是实现同4方面军的会合。而林彪同志的信，恰巧是在我们将要摆脱敌人，成功地渡过金沙江的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乏战略上的思考。也许他是看到机会来了，怕再兜圈子？要是这样，大可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嘛，为什么要写那么一封信，劝都劝不住？我就说这么多。”

接着是陈云、王稼祥、刘少奇、凯丰等发言。陈云主要是讲，对中央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动不动就撤换这个撤换那个。我们不能重犯过去‘左’的错误。王稼祥主要讲了几句建党以来的历史，说解决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容易，作为相当负责的干部，要能正确地认识中央领导，爱护中央的正确领导。刘少奇的发言，着重批评了林彪的骄傲情绪，说1军团在江西，在西征路上，打了许多胜仗，有很大的贡献，是红军中的主力军团，但是骄傲不得，骄兵必败，这是历史教训。刘少奇在发言中，提到他同杨尚昆联名写给中央的一封反映部队思想情况的信，说这封信彭德怀同志没有签名，他有些不大理解。说他起草的这封信，完全是想让中央了解部队的一些真实情况，并没有别的任何意思。刘少奇的这一段话，本意是想为他的信作个说明，却又一次拖了彭德怀一把。毛泽东想把话接了过去，正要张嘴，凯丰举手要求发言。凯丰的发言是这次会议上最激烈的，调子最高。他也许是吸取了遵义会议的教训，这一回他坚定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他说：“我完全赞同刚才有同志说的，林彪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是组织原则问题，一个是反遵义会议决议，一个是要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这还了得么？马克思主义的党是有纪律的党，铁的纪律！也是承认权威的党，破坏权威，也就是破坏了党。我认为，林彪的问题，应该严肃对待，严肃处理。”凯丰的话，把林彪激怒了，他站了起来，说：“说我的信是认识问题，有错误，我接受；说是组织原则问题，我不同意。我的信是写给中央的，是一个建议，是非组织问题吗？”凯丰回道：“毛

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不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你也是参加了遵义会议的嘛！”林彪对道：“是呀，岂止我参加了，你也参加了嘛，我没有你那么跳得高就是喽！”凯丰又道：“有错误就改嘛！”周恩来一看要吵了起来，便扬扬手说：“走题了，走题了。我们要讨论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工作总结。”他停了停接着说：“当然，同志们，刚才大家对林彪同志有所批评，这是不能叫着走题的。林彪同志的信是不妥的，可以说很不妥当。但是，关于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我以为，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正确意见，也就批评了林彪同志的错误意见。下面还是请毛泽东同志讲完他的总结吧。”

毛泽东这才接着讲他的军事工作总结。他在报告中着力强调的是，在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弱小的红军必须坚持运动战。他说：“即使在同4方面军会合以后，这种战法还是少不了的。运动战可以选择一个战场，也可以有两个以上的战场。四渡以后，我们把9军团留在北线独立作战，这一着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要是没有9军团在北线牵制吴奇伟和周浑元，还有王家烈，我们哪有黔西南的大迂回，哪有滇北的隐蔽进至金沙江？罗炳辉在北线也是采取运动战的办法，这是他的成功所在。运动战的精髓是什么？有人说就是一个走字，这是不言而喻的，运动运动，不走还叫什么运动？但我以为，运动战最诀窍的东西是调动敌人，指挥敌人，一个一个的活剧就靠这个东西子才能演得起来。一渡后把敌人调向扎西地区，二渡后我们打了大胜仗，三渡后又将敌人调至叙、古地区，四渡后把敌人调向黔东，威逼贵阳又调出滇军。这样的七调八调，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就莫奈我何了。这个调动敌人的问题，除了作战场的全盘观察之外，在中国，还有一个好的条件需要利用起来，这就是敌人营垒中的矛盾。蒋介石同地方势力的矛盾，各省军阀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我在遵义会议上讲过。总而言之，运动战就得运动，既运动自己，也运动敌人。刚才聂荣臻同志说得好，运动战不多走路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多的是走弓背，而不是走弓弦。这就说到林彪同志的那封建议信了，他就是那么一个片面性，只见其弦，不见其背。然而，他的意见为什么又那么郑重，而且有些尖锐性呢？这是因为有人在鼓动。我说的是，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都是右倾……”

轰！会场嗡嗡起来。彭德怀这才想起他还没有看过林彪的那封信，他想看看那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周恩来见他目光在搜索什么，便把手头的一张纸递给彭德怀。彭德怀一看，竟轻轻地笑了一下，心里在说：“我当是怎样的一封信哩，不就是个战场指挥问题嘛。”他把信还回给周恩来，回到座位上，依然笔挺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说。大家也都愣了，等了他好久，他才淡淡地说了几句：“林彪的这封信写得不对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来改变前敌指挥，不对头；特别是把我提出来，就更不对头了。说到右倾，前一段是有那么一点，因鲁班场和习水两仗没有打好，有些烦闷。烦闷就是右倾。”他没有提到林彪给他打电话，没有说及他在电话上是怎样回答林彪的，也压根没有去申明他根本不知道林彪写信的事。也许是想为林彪分摊点什么吧。因他不认帐，却又作了自我批评，这个看来很严重、叫人记取了几十年的问题，竟然就这么过去了。会议并没有展开对彭德怀的批判。40年后，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追述道：“大概是5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4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

封信，当时也未介意，认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1、3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1军团指挥3军团，有时3军团指挥1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逼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就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在《自述》中还提到：“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申明是申明了，但为时已经晚了。

要不是刘伯承和叶剑英赶来会场，说到蒋介石有一个“大渡河战役计划”，伍修权又打来电话向彭德怀报告说，会理城的坑道爆破没有成功，扩大会议也许还要开上一两天。毛泽东说：“倒也是，已经七八天时间了，薛岳该上来了。没有说完的话以后再说吧。”

洛甫宣布会议结束。

走出开会地点，林彪找到毛泽东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怕你再带着我们绕圈子。我晓得，彭德怀也不想再绕了，心想让他负责前敌指挥，也许能快一点同4方面军会合。”毛泽东这时才狠狠地说了林彪一句：“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林彪独自一个人走在小路上，他故意把警卫员甩得远远的。他心里的火气正没处放，猛抬头见陈士榘走了过来。陈士榘是军团教导营营长，前几天教导营有几个开小差的。林彪逮住了，劈头喝道：“陈士榘！你这个营长是怎么当的呀？”陈士榘怔了怔说：“军团长，教导营有不正常的减员，我有责任。”林彪说：“教导营是培养战斗骨干的，你倒是培养出开小差的来了，我要执行纪律，处分你！”陈士榘埋头说：“我接受处分。”林彪说：“禁闭一个月！”陈士榘一听，慌神了，说：“军团长，给个别的处分吧，部队天天走路，我怎么蹲禁闭呀？”林彪气恼着走了，边走边扭过头来说：“不准骑马！明白吗？不准骑马！”

陈士榘傻站在路边“嘿嘿”直乐。

林彪的警卫员走上前来，也乐了，说：“咱们1军团点子多吧？这叫马下禁闭法。”

陈士榘笑道：“嘿，这样的禁闭，我都坐了大半年了。”

且说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同朱德、周恩来研究部队北进的问题。他们首先听取了刘伯承和叶剑英关于敌情的详细汇报。叶剑英说：“从敌人的来往电报中得知，薛岳兵团由南向北追击，现已有53师渡过金沙江；北面是川军刘文辉和杨森，企图沿大渡河堵击；郭勋祺的几个旅拟从沐川方向由东向西击我中段。总的是想围我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他们把它叫着‘大渡河会歼战’，说是要重演石达开覆灭的历史。”周恩来问：“进展怎么样？”刘伯承说：“南面追兵的情况要紧急一些，53师过江以后，控制了渡口，估计吴、周纵队三五天之内也会渡过江来。这是需要考虑的主要之点。

53师几天之内还不敢有大的动作，据后卫5军团报告，53师过金沙江后，在通安以南地区停下来了，一是怕我诱敌深入，二是要保障金沙江通道。北面，从蒋介石的电令看，是浩浩荡荡两三个军，刘文辉的24军，杨森的20军，还有刘元璋的川康边防军5个旅。但是，据我琢磨，川军方

面主要是挡在我们前进路上的刘元璋部，其他各部料难按时赶到指定位置。刘文辉的24军大部还在川西坝子的西部地区，能否听命蒋介石，移师大渡河，还是个问题，他不能不保他的雅安。二刘又是冤家。杨森对川康这边的事情不可能太积极，他的地盘在川中地区。川军各路军阀都是宁可对方遭到削弱的。杨森的部队目前还在内江一线。

比较积极的可能是郭勋祺。但是，晓得中央红军厉害的，在川军中也就是他。他的部队目前正在由宜宾向沐川方向开进。四川军阀怕红军，有比龙云更怕的一面，几乎没有一支部队不被4方面军打败过；也有不如龙云那么怕的一面，4方面军在四川已经快两年了。不是稀客，老朋友了。”

毛泽东今天的心情很好。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他又去掉了一块心病。此前他有两块心病：一个是长江、金沙江到底过得去过不去；再一个便是林彪、彭德怀挑起的事端。现在，金沙江过来了，前头再也没有大江大河了；林彪和彭德怀的问题，不过是遵义会议的余波，也过去了。他是怀着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听取刘伯承和叶剑英的敌情汇报的。此刻他踱着步子说：“这个蒋介石呀，他可真能画圈圈，又画出了个大渡河会歼战，还把石达开请了出来。

大概是蒋介石是一石，石达开也是一石，石到一起了。咦，一个石头，一个石脚，好有一比呀。蒋介石是石脚，脚上绑着大石头，总是追不上我们；石达开是石头，脑壳里有块蠢石，所以就相信敌人的善心，自己跑到敌人那里去，结果被诱杀成都。我们共产党、红军的头脑可不是一块蠢石，脚上也没有绑着大石头，我们一身很轻巧哩。你们说对不对？”

毛泽东很赞成刘伯承对川军的分析，他很沉得住气，也充满自信，他觉得，只要全军上下一致，听从他的指挥，实现同4方面军的会合是没有问题的。他接着说：“当然，不管怎么说，人家总还有那么一个圈圈嘛，我们得抓紧上路。我还是得讲，要准备走难走一点的路，至少要靠近难走的路走。难走的路靠西，好走的路靠东。要告诉部队，且不可被蒋介石的什么‘险路、绝境’所吓倒。敌人，包括当年的石达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我们红军所具有的走难路、险路的精神的。方向是德昌、西昌、冕宁、直奔大渡河，具体路线请伯承和剑英同志划定一下。关于部队北进的组织问题，我有一个想法。伯承啦，你也许忘了，我可是记着的，北上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是你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现在又到了你们川康了，你得多做出一份贡献才是。我的意思，组织一个先遣支队，从干部团抽些人搞个工作队，再加上1军团的一两个团，由伯承率领，打头阵。你们以为如何？”

周恩来和朱德稍一思索便表示赞成。他们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一向是用1、3军团打头阵的，考虑到林彪、彭德怀才挨了批评，他有点不放心。周恩来处事周全，他不说及这一层，只是说：“好，这样好。5军团做后卫已经有经验了，还是让他们做后卫。9军团要到前面才能会合，目前他们还在我们以东地区。3军团攻了几天会理城，很疲劳。从1军团抽调两个团组织一个先遣支队，由伯承指挥，这就有把握多了。”毛泽东顺着周恩来的思路说：“说的是，有把握多了。此行要过彝区，有伯承同志和干部团的同志，遇到问题可能会处理得好一些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在这个地区，我们还得比诸葛亮做得好一点才是。”朱德还从旁找了一条理由说：“这个主意好，伯承同志在这条路上，还可能遇到旧部嘞。”毛泽东问刘伯承：“伯承同志，你以为如何呀？”刘伯承应命道：“好吧，理当我是个向导。只是，

是不是请中央再派个同志，我们一起带队前行？”叶剑英说：“我请战！”毛泽东盯了盯叶剑英，又扭头看着周恩来，周恩来说：“不妥吧，剑英一靠前，总部没有参谋长了。”毛泽东说：“这么吧，既然抽调的是1军团的部队，就让聂荣臻做先遣支队的政治委员好了。”朱德说：“要得要得，先遣支队就该有个政治委员的角色。”刘伯承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聂荣臻也是四川人。”毛泽东不胜惊喜，道：“嗨，光想到你刘伯承，忘了个聂荣臻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去川西北的意见，也有聂荣臻一份嘛。巧了，他也是四川人。这就热闹了，川军战川军！”周恩来也高兴起来，他主要考虑到，这一来1军团的问题也照顾到了，也便说起笑话来：“朱德同志呀，我们不是踏着你的足迹前进，但到了还是踏着你们四川人的足迹前进啦！”

在座都哈哈乐了。乐完，正要散去，邓小平悄然走了过来。毛泽东说：“你这个邓小平呀，你是个小目标小呢，还是有意躲着我们，怎么老是见不到你呀，最近干什么去了？”邓小平简单明了：“跟到走。”毛泽东问：“秘书长的事情你不做了？”邓小平说：“早交给刘英同志了。”毛泽东又问：“有事吗？”邓小平见毛泽东情绪不错，说话也就随意起来，说：“不来不是，来了就得有事，还怎么常来常往呀？”毛泽东伸出指头指了指邓小平，说：“都听到了吧，也是个刺头！”邓小平笑道：“今天不想刺什么，我是听到你们在这里哈哈大乐，也想来乐一乐的。”朱德一看没什么要紧事了，便说：“你们还有啥子乐的就乐吧，我和伯承同志办事去了。”说完，便同刘伯承、叶剑英走了。毛泽东接着跟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呀，我们刚才开了个会，你知道了吧？”邓小平说：“我就是听说开了个会才赶来的，终究做过几天中央秘书长嘛，想知道一点会议精神。”毛泽东说：“你先别打听会议精神，我倒要考考你，不，就算是听听你的看法吧。你说，四渡赤水之战到底怎样？”邓小平摇摇头说：“这可真要把我考住了。我不在指挥之位，说不出啥子的。”毛泽东说：“不，你得说。你不会没有看法的。”周恩来说：“说吧说吧。”邓小平说：“真要我说？”毛泽东见邓小平想说又不敢说，心里竟有点惴惴的了，说：“说吧！你无非是说只要一渡，不要四渡嘛！”邓小平说：“要我说，问题根本不在几渡上，而在那种打法上。”毛泽东问：“你认为是个什么打法？”邓小平说：“猫捉老鼠，老鼠捉猫！”毛泽东和周恩来听了，闷了好一会，才品出“猫捉老鼠，老鼠捉猫”的滋味来，两个人便哄堂大笑起来，邓小平也“哈哈”乐了。毛泽东说：“概括得好，概括得好啊！猫捉老鼠，老鼠捉猫。你猫捉我，我老鼠还捉你嘞！”邓小平说：“对头。猫来了，我躲起来；猫不来，我还逗逗你；你到跟前了，我老鼠似的跑了；有了机会，我还咬你一口。这个办法，往后恐怕还得用的。敌人还是只猫嘛。”毛泽东越发高兴起来，说：“小平同志呀，你是不是到军团去工作一段呀？”邓小平一怔，说：“不不。倒不是不想负责任，而是现在军团的干部都是满的，有的同志又挨了点批评，别搞得人心惶惶的，有啥子事情，我到军团跑跑就是。”

毛泽东哑了一阵，说：“是呀，这就是你邓小平的棉……”

可是，棉里总还得有针吧？”

邓小平说：“说到针，真还想扎你们一下。”

毛泽东说：“扎吧。”

邓小平说：“你们别把林彪惯坏了。”

周恩来闷着没吭声。毛泽东叹息一声，不无伤感地说：

“看来，刚才开的会用不着给你传达了……”

第二十四回 总指挥下书服旧部 彝务官假打骗元璋

话说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5月14日离开会理，沿大道向西昌方向前进，第二天便到了德昌县境。德昌城，位于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河谷中，地处要冲，是西昌的第二道门户（第一道门户便是会理）。先遣队侦察小组的侦察报告说，德昌守敌是川康边防军第16旅，辖3个团，两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一个团又一个营守德昌城，旅长叫许剑霜。刘伯承一听乐了，说：“总司令真还料准了，果然遇到了旧部。”聂荣臻跺脚道：“是吗？”刘伯承说：“这个许剑霜，顺、泸起义时的团长，还加入过共产党。”

就是吃不了当共产党的这份苦，更怕掉脑壳，就跑了。当时只晓得他跑川西了，竟在这里混了个旅长。”聂荣臻喜出望外，说：“没说的，请总指挥下书吧！”刘伯承说：“顶用么？”聂荣臻说：“凭当年总指挥的赫赫名声，吓也得吓他一跳！”

刘伯承当即草书一封：

许旅长剑霜如见：

本人刘伯承也。泸地一别，近十载矣！世事苍桑，欣闻足下服务川军，感慨之余，亦甚有幸。本人一如既往，红军中参佐军事。相逢在即，可否一见，聊叙旧谊？往者往矣，来者可追。本军志在北上，驱除日寇；无奈征途险恶，只得转战千山，经湘广而云贵，涉湘乌而金沙。抗日何罪，围追堵截者，天良何在？红军迫入川康，亦乃假途而已，非为他图。兹遇贵部，非冤家路窄，权作友军相待。让路则谊，则大义，则为军之道也。若作交战，渔利谁人？坦诚相告，望作明察：借路而过，不相刀枪；如要堵截，打一打也无不可。时不可待，立复为感。

顺致

大安

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 即日

刘伯承的信是总部参谋李佐送进德昌城的。侦察参谋李佐，搞情报的好手，又颇有文化，能说会道，还有一手“联络”功夫。他理解刘、聂的意图，要他去送这封信，是不只送信的。他扮着刘元塘部的副官，骑一匹当地的小马驹，大摇大摆地进了德昌城。他来到许剑霜的旅部，找到许剑霜，在许的耳边说：“许旅长，有位老朋友托我捎封信给你。”许剑霜为之一怔，问道：“你是谁？”李佐说：“红军的联络官。”许剑霜不由得要掏腰间的手枪，可手腕已被李佐掐住：“我可不是来动家伙的，许旅长。”许剑霜无奈，只好说：“请跟我来。”李佐随许剑霜来到他的寓所客厅。许剑霜支走勤务兵，李佐递上“内详”。许剑霜拆信一看头一句，“本人刘伯承也”，顿时大惊失色，跌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李佐一身敌军穿着，真像是副官一般，给许剑霜倒了一杯定神水。“看信吧，看信吧，好说好商量的。”许剑霜朝李佐翻了翻白眼，这才抖着双手，把信展开来看。看着看着，头上的汗珠便滴到了信纸上。也不知是惊恐还是激动，他看完信连连呼号起来：“刘总指挥，刘总指挥，怎么会是你啊，怎

么会是你啊……”李佐愣了愣，但见许剑霜对他的老上级还有几分敬畏，便笑着说道：“是老朋友吧？我没说错吧？”许剑霜却是哑了一般，两眼发呆，不言不语。李佐急着要听他的答复，便说：“许旅长，军情急迫，请你速作决断。”许剑霜还是不答腔，他再次读信，反复读了几遍，还是愁肠百结，不知如何是好。他在琢磨，让路不打，上边怎么交待？打吧，小小一个简编旅，哪里是“刘总指挥”的对手……

李佐等了好一阵，见许剑霜还是闷声不响，他心里又窝着一股对“叛徒”的火气，便道：“许旅长，看样子，你的意思还是打一打了？也好，那就照我们刘总参谋长信里的最后一句办，打一打也无不可。我告辞……”“不不！”许剑霜这才从坐椅上站了起来，说：“李参谋，你我都是军人，两军相敌，打与不打，非同小可，还得让我想想才好。”李佐说：“好吧，你想，我再等你几分钟。”许剑霜说：“不，几分钟不行，至少得两天，也许三天，我再回刘总指挥的话。”李佐火了，说：“许旅长，你要我们等两三天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对待老上级的态度吗？我跟你讲，许旅长，按说你也是个反水的，照我们江西的办法，我们打进城来，把你拿了，论党纪，论军法，都是理所当然的。刚才你想掏枪动武，说明你也是这样估计的，可我们总参谋长说，往者往矣，什么意思？就是说，过去的事情不查究了，只要你让让路，也不要你再来个反水，你可以继续干你的川军，当你的旅长。这也说明刘总指挥的诚意，就是急着要北上抗日，别的一概不究了。抗日！你该知道吧，日本鬼子把我们的东三省全占了，打到上海了！凡中国军人，不抗日还算什么中国军人？抗日有罪，围追堵截，又是在帮谁的忙？好歹你也当过几天共产党，这个道理该是懂得的。还有，许旅长，从你离党干川军，当上旅长算是你的运气，可你的旅长当的又怎样？据我们了解，川康边防军5个旅，从司令刘元璋到各旅旅长刘元璠、刘元琮、刘元宣等，大都是刘氏家族的人，你这个非刘氏家族的旅长，未必干得舒心吧？我们在通安同刘元璠打了一仗，抓到的俘虏，有的原是你这个16旅的。我不知道，你们各旅之间，是不是也常有人员调动？请许旅长郑重考虑，我们刘总参谋长说打一打也可以，这就是说，你那点力量是不经打的。一打，你的实力没有了，你的旅长还能当得下去吗？刘总参谋长说的，我们友军相待，不是对你这个老部下的一个极大关照么？”

听李佐这么一说，许剑霜像是才读懂了刘伯承的信，说：“李参谋，本人离党多年，又在这偏僻小地，世事尽皆渺茫了，今天倒是有些乍醒一般。我刚才说再等两三天，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把刘总指挥的大缄，速送西昌刘元璋司令处，也附上我的意见，如果他能同意，便是全线让路，岂不更好，我也好说啊？”李佐说：“许旅长要是有这份诚意，倒也是个办法。我们刘总参谋长要你们让路的意思，就是通报所有川康边防军，也是使得的。但是，问题在于，你们的刘元璋司令要是不同意怎么办？而且，走漏风声，你是有‘通共’危险。”许剑霜说：“西昌方面不予同意，这当然是可能的。这么吧，刘总指挥的信，我还是往西昌送，贵军要是赶路要紧，请面陈刘总指挥，你们走你们的好了，打与不打，我自有办法。”李佐问：“许旅长的意思是……”许剑霜说：“我总得放几枪吧？”李佐说：“好，响鼓不用重捶。我这就走。”

许剑霜亲自送李佐出城，分手时嘱李佐代为问候“刘总指挥”。

李佐飞马回到部队向刘、聂汇报了见许剑霜的情况，刘伯承说：“许剑

霜要把我的信送到西昌去宣传宣传，好倒是好，就是太费工夫了。来回几天，我们等不起。三等两等，把刘文辉和杨森都等到大渡河了，划不来。他说的应付办法，无非就是真真假假地打一下了。打就打一下吧，明天我们按计划前进，直取德昌城。”聂荣臻说：“说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时间紧迫，大部队即将上来了。”李佐有点不放心，说：“我是不是再进趟德昌城，给他交待明确一点？”刘伯承说：“不必了。许剑霜这人我有印象，干别的不行，欺上瞒下他还是很在行的。”

第二天一早，先遣队（杨得志的1团）沿大路用急行军的方式向德昌前进。在丰营站、八斗冲几处隘口，许剑霜的部队只稍作抵抗便撤走了。黄昏时刻，先遣队进入德昌城，只俘虏了200个民团，许剑霜旅守城的一个团不知撤到哪里去了。

且说许剑霜终究当了几天共产党，比较易于了解红军的意图。他深信刘伯承的部队只要路，不会要别的。因此，他把部队后撤到大山里以后，便带着几个随从到西昌去了，一来向刘元璋交丢失德昌的帐，二来看能不能说通刘元璋也让出路来。许剑霜其人，颇有些叛卖的手腕，在他看来，让路，红军可以顺利通过西昌地区，刘元璋可以保存实力。两全其美，说不定日后都是有好处可捞的。

却说许剑霜飞马来西昌邛海边的山梁上，但见西昌四城大火，烟火升天（注 ），他不禁大吃一惊，以为是红军在攻西昌了，“他妈的，来晚了一步！”他在山头上观察了好一阵，只听得满城的哭号声，却听不见枪炮响。想了想他才明白，刘元璋是在用刘元塘的办法“亮城”！他带着人马，冒着呛人的烟火，钻进西昌城，在城中心制高点的川康边防军司令部找到刘元璋。刘元璋正坐立不安，又有几分得意，见许剑霜到，一时竟顾不上问德昌的情况，只道：“你来了，看到大火了吗？”许剑霜说：“看到了，看到了。司令，火是不是放早了？”刘元璋问：“什么意思？”许剑霜说：“司令没有收到我呈上的刘伯承的信么？”刘元璋这才想起许剑霜送来的刘伯承要求“让路”的信一事，他眨了眨小眼睛说：“你给老子出难题！你是不是答应他们让路了？你的部队呢？”许剑霜说：“没有司令的吩咐，我哪敢啦？不过，我还真难住了，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想来想去，还是打，只是不硬打。我得为我们的实力着想呀。他们的大部队一到，我就把部队撤到山里去了。整个德昌，只损失了民团百几十个人。”刘元璋愣道：“你的德昌丢了？”许剑霜说：“也说不上丢不丢的，他们反正是路过而已。司令，我今天赶到西昌来，就是想向司令作个交待。如有不当，请司令惩处。”刘元璋摸着他的下巴想了一阵，突然高声叫道：“惩处个屁！谁不知道刘伯承的厉害！这不，城区部队正在‘亮城’哩。”听刘元璋说到“惩处个屁！”许剑霜心里松了一大块，胆子便大了起来，说：“司令，我赶来西昌还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让路吧，乐得做个巧手活，保存自己。”刘元璋怔了怔，说：“娘的，你是为共匪做说客来了？”许剑霜说：“不是，司令，我是看着有这么个机会。刘伯承认识我，我也认识刘伯承。实力要紧呀，司令！”刘元璋说：“得得，你别给我出这个主意。让路是一码事，让城是另一码事；让德昌是一码事，让西昌又是另一码事。别不知轻重。”许剑霜说：“让出哪座城也没有啥子了不得的，几天以后还是我们的，还有光复之功哩。”刘元璋说：“屁，他要停下来搞根据地怎么办？”许剑霜说：“司令，你放心。他们的人亲自给我说的，他们是要北上打日本。”刘元璋又恼了，说：“说半天，你许剑霜还在跟共产党私

通？”许剑霜笑笑说：“什么私通啊，就是有个老几来传那封信，信也给司令送来了。要说私通，我和司令一起同共党私通了？”刘元璋“嘿嘿”地笑了笑，说：“我说你他娘的许剑霜呀许剑霜，我好长时间都忘了你在刘伯承手下当过差这码事了。说来倒也是，你要早提醒一句，想起你那挡子事来，该让你早点跟你的刘总指挥联络联络，也图个不做亏本买卖不是？他娘的刘元璋混了个中将旅长（注），却丢掉了我一个多团……”许剑霜见刘元璋说到这份上，又道：“司令，要找刘伯承有什么事，现在还不晚啦！比如说，他要我们让路，我们可以提出来，他们不打西昌城……”刘元璋扬扬手说：“晚喽！四城都烧得差不多了。再说，刘伯承未必就听你的。我们的探子探到情报，刘伯承就是奔西昌来的，他就是要打西昌。要不，我们在城区集中4个团干啥子？看样子，还得加强防卫。昨天晚上三叔（刘文辉）来电话，要我们无论如何守住西昌城，要固守待援，说是丢城就是丢脑壳！你的部队是不是也往西昌这边靠靠？”许剑霜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许剑霜西昌“交差”，眼看顺利，却陡生“杀头”之险。驻西昌的刘元琮、刘元宣兄弟俩，早就想搞掉许剑霜，吃掉他的两个团。当他们从刘元璋那里得知许剑霜同共党“私通”，又丢掉了德昌城，便力主杀了许剑霜，在边防军中根除异己。刘元琮说：“这样的通匪之罪不办了，只怕是在三叔那里交待不了吧？”刘元璋高低不同意。刘元璋同许剑霜是讲武堂的同学，许剑霜投奔刘文辉，正是刘元璋以同学的关系，接受许剑霜到边防军做旅长的。他就是要用许剑霜来牵制刘元琮、刘元宣、刘元璋，要是搞掉许剑霜，让刘元琮、刘元宣他们吃掉许旅，扩大了他们的势力，于他的边防军司令地位是极为不利的。他说：“什么通匪之罪呀，不过就是点老关系而已。再说，他有心通匪，还能把刘伯承的信送到我这里来？把自己的脑壳送到西昌来？”刘元琮说：“此事不能由我们说了算，得报告三叔定夺。”刘元璋说：“你们是要把我也装进去么？我也通匪了么？现在不能闹这种事，保西昌要紧！”刘元璋怕元琮、元宣暗施毒手，黑夜里把许剑霜送出了西昌城。

许剑霜没想到刘家几兄弟要来这一手，他一不做二不休，在回德昌的途中，他给刘伯承递了一个情报：西昌亮城，有兵4团，雅安有令，固城死守。他的意思是劝刘伯承不要打西昌。他想，只要红军不打西昌，绕了过去，他就有办法对付刘家几个旅长，自己就能摆脱困境。凑巧，刘伯承的先遣队并没有攻占西昌的打算，而是当刘元璋将边防军主力集中于西昌后，趁敌空虚，绕过西昌，直奔冕宁。西昌平安无事。许剑霜后来抓住这一节，使人放出流言说，红军不打西昌，是许剑霜的功劳，许剑霜“丢了德昌，保了西昌。”许剑霜的杀头风险才得以过去，在川康边防军站住了脚。

且说西昌的刘元璋除了“亮城”，还玩了一个花招。他借口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把彝务指挥官邓廷秀的部队由冕宁调至西昌城南堵截，图谋一箭双雕。邓廷秀，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是川康边防军的异己力量。彝务官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也是知道刘伯承其人其事的。邓廷秀接到刘元璋的调动命令，心里本来就在犯疑：为什么要我的部队到西昌城南30里的荒山野岭打头阵，而“刘家军”却在西昌城里打“安逸仗”？老子今天得动动脑筋了。当他率部来到西昌城南黄水塘时，正琢磨着怎么把部队摆到有退路的地方，正在这时，他接到了刘伯承的一封信。刘伯承有见于邓廷秀所部的彝民性质，在给旧部许剑霜信之后，赓续又给彝务指挥官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比较给许剑霜的信要客气多了，岂止客气，

简直是兄弟之间的坦诚商议。刘伯承在信里说：“……红军此次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只是路是一定要过的。过路北上的，抗日寇，有烦见谅，切望邓指挥官给予方便。”

一代川中名将，就这一点也够邓廷秀发懵的了，何况“打枪都不还击”？邓廷秀在心里说：“刘伯承，真是大将人物，胸有雄兵，不计小技……”他连忙找来手下的亲信商量。他扬着刘伯承的信说：“刘伯承给我来信。大人物，说话是算话的。打枪都不还击。这事新鲜吧？”亲信们嚷嚷说：“新鲜，新鲜！”邓廷秀说：“既然人家打枪都不还击，我们还打不打呀？”有亲信说：“不打恐怕不行吧？刘司令就是要我们来保西昌的。”邓廷秀说：“人家刘伯承是路过，打不打西昌还难得说哩。”亲信说：“路过也会打的。会理、德昌该说也是路过，还不是都叫他们占了？”邓廷秀说：“打？可是，你们知道这刘伯承有多厉害吗？刘湘、杨森都曾是他手下的败将，凭我们这两下子，能是他的对手？”亲信问：“那怎么办呢？”邓廷秀说：“我看啦，刘元璋把我们摆到这黄水塘，原本就没安好心，他是想叫我们吃红军的家伙，把我们绝了。红军都不上他的当，我们自己倒要上他的当吗？”亲信们“喔喔”地叫了起来，说：“要是这样，我们还卖什么命？我们也该对得起这位刘大人物，人家打枪都不还击，我们还开什么枪？不打不打。”亲信们都嚷嚷着“不打不打”。取得亲信们的赞同，邓廷秀便在阵地上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这一仗，架势是要摆开的，西昌城里有人看着我们哩。但不能开枪，免得折了老本。听清楚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这天下午，刘、聂的先遣队来到黄水塘。刘伯承在望远镜里看了看两边山上的情况，默默地点了点头，给参谋说：“继续前进，队伍整齐一点。”聂荣臻有点不放心，说：“我们可是没有得到他的回话呀，又是这么个一道沟的地形，有把握吗？”刘伯承把望远镜递给聂荣臻：“你看吧，连工事都没有作，都是看热闹的架势。”聂荣臻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不由得笑了，叹道：“刘伯承下书，令‘蒋干盗书’大为逊色了……”

果然，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的邓廷秀部队，眼看着红军从山脚的沟里通过。有个彝族士兵情绪紧张，不小心走火了，引得其他士兵也打了几枪，邓廷秀当即下令制止，故意高声叫道：“谁再走火，我毙了谁！”他正担心红军会不会开枪还击，观察了好一阵，红军的行进队形闪都没有闪一下，一路走一路还在喊口号：“彝汉是一家！”“红军和彝胞是兄弟！”

邓廷秀要人大声问山下：“你们要打西昌吗？”

红军中有人大声回答：“忙不过来了，我们要赶路哩！”

邓廷秀听说红军不打西昌了，又眼看着红军先头部队在黄水塘前向西拐了过去，他双脚一蹦：“有啦！”便命令他的部队满山遍野地“喔喔”起来，这个团“喔喔”累了，那个团接着“喔喔”，打了三天三夜的“吆喝战”。

“没有老子们吆喝，红军能不直捣西昌吗！”4天头，邓廷秀想回西昌报功请赏，上马工夫，突然飞来几架中央军的飞机，把他的部队误炸了一通，死伤几十。邓廷秀先是气昏死过去，后来一想，“妈的，正好，要不老子还装不像哩！”眼看红军大部队已经过完，他便带着他的部队，抬着死的伤的，一路吆喝着回西昌向刘元璋邀功请赏去了，说是红军不敢打西昌，全是因为他的奋力堵截云云。刘元璋一时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说：“该赏，该赏。先把死的埋了，伤的治了吧。”

后因“误炸”事件败露，又有许剑霜“丢了德昌，保了西昌”之说，邓廷秀才装聋作哑，不了了之。

注 《西昌县志》载：刘元璋以亮城为名，计烧街道28条，民房3700余家，寺庙10余座，回教礼拜堂四大院。

注 红军围会理城7天7夜不克，蒋介石飞临会理上空巡视时投下手令，晋升刘元塘为陆军中将，并奖赏1万元。

第二十五回 王耀南戏言当“脱派” 刘伯承结盟小叶丹

却说5月20日，红军先遣队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地区。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石棉），过大渡河便是富林（汉源），这是通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渡口，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山路，而且要经过彝族聚居区。中央军委原定计划走大路。刘、聂根据冕宁地下党提供的敌情，当即向军委提出两条建议：第一，敌人显然判定我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因此，从富林渡河，将遇敌主力，不易奏效，我主力宜取西侧的小路，奔安顺场渡口；第二，仍不放弃走东侧大路的意图，请军委再令一团兵力，作为第二先遣队，经越西向富林佯动。

当时军委正在绕西昌的行军途中，电台联络不上。刘、聂决定：先到冕宁再说。守冕宁的邓廷秀，此刻还在西昌城南，刘元璋令其迅速回师原防地，他借口部队被中央军飞机误炸，消极拖沓，冕宁便成一座空城。21日，先遣队进入冕宁城区，受到城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先遣队司令部住进一座天主教堂，经电台再次联络，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刘、聂“改路”的意见，并派出1军团的第5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指向越西、富林方向，隐蔽主力意图。

在向冕宁进军途中，中央红军还迎来了一件喜事：罗炳辉的9军团在北线独立作战近半年，日前在西昌以北的礼州实现了同主力红军的会合。兵强马壮的9军团，向中央上交了几十匹骡马，几千块银元，主管后勤供应的叶季壮，高兴得直跳：又发大财了！

由冕宁奔安顺场渡口，最大的问题是过彝区。当地群众普遍认为红军过彝区太危险，地下党的同志也少有赞成经彝区奔安顺场的，连教堂里的法国修女们都说：“你们过不去的，过不去的，那是连上帝也去不了的地方。”为了作好过彝区的准备工作，中央作出决定，宣布废除这里的“换班坐质”制度，打开监狱，放出了几十个彝族首领，请他们喝酒，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解释红军为什么要借道彝区。毛泽东还亲自会见了彝族上层人士，向他们了解情况，慰问致意，还赠送了礼品。干部战士中有害怕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说是拿枪拿炮的几十万大军都挡不住我们，几个“倮倮”们还能把我们怎么样。为此，全军广泛地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却说5月21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进至冕宁西北的大桥宿营。第二天从大桥出发，便进入了彝族区。大家正紧张地走着，忽然前卫营营长尹国赤跑回来报告说：“刘司令员，聂政委，这彝区的事情说不定是有大麻烦哩！”刘伯承问：“啥子事？”尹国赤一张大红脸说：“嗨，刚才，一伙光身子的男女，光得不能再光了，从山里跑出来朝我们要衣服，开初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彝人，穷得没衣服穿，结果你道他们是谁？冕宁县县长一家！红军进冕宁，他们跑了不是，跑进山里，东西被彝人抢了不说，一身都剥了，没羞没臊的，嘻……”刘伯承和聂荣臻面面相觑了一阵，说：“你笑啥子？”尹国赤说：“他们连本地县长的衣服都敢剥，我们咋办？再说，我们队伍中还有女同志呀，叫人家也那么剥了……”聂荣臻噗哧笑了，笑完说：“彝胞剥县长的衣裤，那是怪他们自己，平时对彝胞作恶太多了。你给他们衣服没有？”尹国赤说：“女的给了，男的只撕了一件，分着挡挡家伙。他们说，宁可给红军当俘虏，也不去受那份罪。”刘伯承也禁不住乐了乐。尹国赤盯着问：“我们怎么办啦？”刘伯承说：“我们啦，也得有所准备，彝胞要剥，只好让他们剥了。”“什么？”尹国赤一脸的苦楚：“司令员同志，这剥光衣服的滋味，不大好受啊！”刘伯承又笑笑说：“怕啥子，我们反正要过河，光身子过河便当多了。走吧走吧，也许彝胞能给我们红军一点面子，给留条裤头哩。”

部队很快进入彝族聚居的山区。这里，山峦重叠，险峻陡峭，怪石凌空，道路崎岖。终因彝汉隔阂，彝胞听说“汉军”来了，把河里的跳涧石搬了，把一些独木桥毁了。刘、聂不得不命令王耀南的工兵连赶到前卫营的前头，用工兵当尖兵，逢山开路，遇河搭桥。事情不妙，才把工兵连打发上去，走不到一个小时，果然出乱子了。王耀南带着工兵连进入一道山沟，突然两边山上响起一片“喔喔”的喊叫声，数百彝民手拿长矛、弓箭从山上蜂涌而下，把工兵连包围了。战士们按照事先的预想，不开枪，不动怒，只是尽量靠拢，喊口号，作解释。但是，毫无用处。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彝民，猛地窜到通信员小刘跟前，抢了他的武器，把他按倒在地，扒光了他的衣服。王耀南一气之下，拔出了手枪，战士们也都拉响了枪机。王耀南突然一个冷静，把要说的话改了过来，喊道：“总部命令，不准开枪！”连长收了枪，战士们也都把枪收了。年轻的彝民们一看战士们都把枪收了回去，胆子更大了，全都“喔喔”地吼叫起来，冲进队伍，几个对付一个，把工兵连干部战士的武器、工具全抢了，把衣服全剥了。

干部战士都像做了个梦似的，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哭不是，笑不出。

王耀南吼道：“还盯着干什么？跟我往回走吧！”

王耀南领着几十号赤条条的往回跑，那光景可是红军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往回走了好几里，才遇上尹国赤的前卫1营。光身子的红军老远就在喊：“快，快脱条裤子来！”有的在喊：“没有裤子，衣服也成！”尹国赤赶上前去举目一看，一个个野人似的，身上只有块芭蕉叶，料定是工兵连叫彝民剥了，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其他战士也都跟着狂笑不止。尹国赤说：“怎么样啊伙计，是叫男人剥了，还是叫女人剥了？”王耀南说：“哪里还顾得了什么男人女人，只觉得是刚从娘肚子里掉下来的那滋味儿！”大伙又都乐了。杨得志跑了上来，一问是这么回事，吼道：“不许笑！谁笑，我让你那家伙也出来凉快凉快，哧……”他说着自个也乐了。乐完，命令部队解包袱，把多的衣服都拿出来……

王耀南跟杨得志又往回跑了一段路，方才找到刘、聂，报告了情况。刘伯承欲笑未成，说：“委屈了，委屈了。人没伤着吧？”王耀南说：“人倒是没伤着，我们连个指头都没有动他们。”刘伯承说：“那就好，那就好。晚上宿营，再装备一下，明天继续前进。”王耀南一时哑了，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头也低了下去。聂荣臻说：“别耷拉着脑袋呀王耀南！”

当年张飞打仗，就是脱光膀子干的嘛。当然，我们就是脱光了，也不能同彝胞干。我看啦，你们脱得很好。脱衣服也可能是架了一座桥，一座红军同彝族人民相通的桥。你刚才不是说，我们不开枪，不还手；他们呢，什么都要，就是不开枪。这说明有门啊，刘司令员，你看呢？”刘伯承说：“有门有门。明天，要是王耀南还走前头，就更有门了。”听到这层意思，王耀南的脑子活动起来，但还是有点不大情愿，跟杨得志嘟囔道：“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光屁股仗’呀！娘的，我们工兵连都成了‘脱派’了。”杨得志哈哈乐了，刘伯承问笑什么？杨得志说：“王耀南说，他的工兵连都成‘脱派’了！”刘伯承和聂荣臻也乐了。聂荣臻说：“此脱派非彼托派，你王耀南是个光荣的脱派哩。”刘伯承说：“这样吧，明天让肖华和冯文彬的工作队跟你们工兵连一起打前站，怎么样？”王耀南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说：“这样好。要不，我们连个同彝胞通话的人都没有。不过，嘿，还是请首长打个招呼，后续部队多准备几套衣服。万一再脱个干净，光屁股进了老乡的房子就麻烦了！”

大凉山的山沟里又响起了一片哈哈声……

第二天，先遣队向冕宁拖乌区前进。拖乌是冕宁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刘伯承和聂荣臻走在前卫营里。杨得志说：“还是请首长靠后一点吧？”刘伯承说：“人家国民党县太爷都不敢到这地方来，他当兵的还敢到这地方来？就有一条，可别叫彝胞老兄把我和聂政委给剥光了，我们两个剥个精光，可没有你们年轻人那么受看啦！”战士们都乐了。刘伯承边走边问聂荣臻：“老聂呀，感觉到工兵连脱光了的效果没有？”聂荣臻说：“我正在琢磨呢，瞧，河里的石头没有动，刚才过的独木桥也是好好的，兴许就是王耀南他们脱而不怒的功劳啦！”正说着，冯文彬领着个彝民老头从前面飞马而来。他们来到刘、聂跟前，下得马来，冯文彬说：“刘司令员，聂政委，这位彝胞老乡要见红军首领。”刘、聂欲下马相迎，只见彝民老头威风凛然，马上用汉语问道：“请问，日前在黄水塘，说是彝民队伍开枪都不还击，是你们吗？”刘伯承答：“正是本部。”老头又问：“昨天有人抢了一伙汉军，把衣服都剥了，也是你们的人吗？”刘伯承又答：“正是本部的人。”老头再问：“请问，

你们到底是哪家汉军？”刘伯承说：“我们不能叫汉军，我们是红军！”彝民老头这才惶惶地跨下马来，刘、聂也连忙下了马，迎了上去。老头又问：“红军是干什么的队伍？”刘伯承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队伍里各个民族的兄弟都有，有个彝胞兄弟，做了我们的军团长了。我们工农红军，是同官军打仗的，要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老头“哦哦”了一阵，又道：“那，你们为什么就这么走了？”刘伯承说：“实在对不起啊大叔，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了，我们得先去打鬼子。所以，要借路从这里过去，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有请老大叔帮帮忙啊？”老头又问：“请问官长你是？”刘伯承说：“这位是我们的聂政委聂荣臻，我姓刘，四川老乡，刘伯承！”老头为之大怔：“你，你就是刘伯承？”刘伯承也愣住了，说：“你，莫非也干过川军？”老头说：“我在冕宁城的班房里坐过质，听说过你的大名。好，好，既然是你刘伯承，话就好说了。”

我是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四叔，请你们在这里稍等，我去叫他来。”

老头飞马而去。聂荣臻喜形于色，说：“看来，让路的问题是不大了。”冯文彬抓紧说：“刚才没来得及给首长汇报。我们刚到的时候，沽基家支同罗洪家支正在械斗，我们打了几发信号弹，他们才停下来。沽基家支的小叶丹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给我们让路，我们帮他打冤家。”刘伯承说：“那不行！我们既要他们让路，又要说服他们不要打冤家。”

是不是赶快派人到罗洪家支去通报一下，红军决不会帮助他们打冤家的。注意，要带点见面礼。”

冯文彬走后，一个高大的汉子飞马而来。年轻人光着上身，围着一块麻布，赤足披发，后面跟着十几个手执梭镖的青年。他一来到刘伯承跟前，勒马叫道：“我是小叶丹，哪位是刘伯承？”刘伯承应道：“我就是。”小叶丹下马拱手，又一只腿跪在地上：“刘总指挥，沽基家支愿同红军讲和不打。”刘伯承立即上前扶起小叶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连连说：“好兄弟，好兄弟！我们本来就不是来同你们打仗的呀！我们是好兄弟，红军和彝族同胞是兄弟。”小叶丹愣了好久，说：“你，刘伯承，把我小叶丹当兄弟？”聂荣臻说：“就是想到我们是兄弟，我们才选择这条路走的呀！”小叶丹一腔激情：“好，好，红军这么看得起我小叶丹，你刘伯承这么看得起我小叶丹，我要同你结拜为兄弟！”刘伯承慨然道：“彝族同胞这么看得起我刘伯承，小叶丹这么看得起我刘伯承，上有天下有地，我和小叶丹是兄弟！”小叶丹说：“伯承兄弟！这，我们得到海子边去，歃血为盟。”

袁居海子，海拔2000米的一泓碧海，倒映着蓝天白云，摇荡着金波银浪。按照彝族的风俗，由毕摩（巫师）念了咒语，尔后杀了一只大公鸡，把鸡血滴在盛满湖水的碗里。刘伯承和小叶丹面湖而跪，气氛壮严肃穆。刘伯承举碗过顶，口中念道：“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和小叶丹是兄弟，生生死死不反悔。”接着喝了满满的一碗“血酒”。小叶丹也把碗举过头顶，口中念道：“上有天下有地，我小叶丹和刘伯承永远是兄弟，如有反悔，就像这公鸡一样死去。”誓毕，也把一碗“血酒”饮尽。壮哉彝海结盟，后人以歌咏其事，唱道：

碧绿海子明如镜，
兄弟情谊似海深；
举杯痛饮鸡血酒，
结盟修好留美名。

拜盟完毕，天色已晚。部队继续前进，当天走不出100多里的彝族区。聂荣臻说：“我们是不是干脆来个‘司马懿倒退30里’，返回到大桥宿营，争取明天白天通过彝族区，便于为大部队通过作些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同意，先遣队当天便返回大桥宿营。在大桥镇，刘伯承设晚宴招待小叶丹和他率领的18个大小头领。刘、聂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人把镇上的酒全都买了来，让他们吃饱喝够。席前席后，刘伯承和聂荣臻给沽基家支的头领们讲了许多彝族同胞要团结的话，小叶丹赞同从今以后，不再搞家支、部落间的械斗，要团结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话到亲密热烈处，刘伯承以红军的名义，送给小叶丹一批枪支弹药，授给一面写有“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的红旗，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沽基尔拉为副支队长，并当面写了委任状。小叶丹哥俩高兴极了，挥着红旗和委任状，一再表示一生一世“要听刘大哥的话”。

忠于结盟之谊的小叶丹（注），第二天带着他的人马送走红军先遣队之后，又接连奔忙了7天7夜，把红军大部队安全送过了他的部落地界。其他彝民部落，见沽基家支同红军兄弟相待，着人迎送，互有赠礼，也皆效仿，使红军如活动在老根据地一般。

却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3军团过彝区时，天公亦作美，5月的大凉山，春色正浓，举目望去，漫山遍野杜鹃盛开，部队唱着歌翻山越岭。正疑惑间，得知刘伯承在前面同小叶丹结义兄弟，无不心中大喜，一路便说笑起来。毛泽东说：“怪不得有如此光景！”

有幸言中了，共产党就是比孔明先生强，刘伯承胜过诸葛亮！”周恩来说：“伯承其人，川中一枝花，我党一奇才也！”朱德慢悠悠地说道：“啥子一枝花哟，不只一枝嘞。”毛泽东说：“对对对，川中何止一枝花，还有这一株（朱）喽！”朱德连忙说：“哪里哪里，吾乃几近老朽，哪敢冒充一花。说的是在前面开路的还有个聂荣臻，此人四川江津人士，也是我川中一花嘛！”张闻天说：“总司令言之有理！说聂荣臻是一枝花，名实相符，荣者盲木之荣，臻者言花之臻也。”

长长的行军行列中，响起一串粗声大嗓的笑声……

注《刘伯承传》：红军走后，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在因伤留下的某部政治委员的帮助下，与罗洪、洛伍家联合起来，发展到1000多人，坚持了5年多的斗争。

1941年彝族败类邓廷秀在反动军阀的支持下，挑拨离间，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民革命，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倾家荡产凑了1500两银子给邓廷秀，把红军政委赎了出来。后来小叶丹和沽基尔拉的委任状被邓廷秀搜去，以“通匪有据”，在大桥镇惨遭杀害。

第二十六回 孙继先奇袭安顺场 熊尚林首飞大渡河

话说蒋介石在昆明大观楼提出的“大渡河会歼战”计划，正如他的门将薛岳所估计到的，在实施的当初便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考虑到参战部队的变化，蒋介石想重新编组他的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的第2路

军，把云、贵、川三省的部队，加上他的嫡系薛岳兵团，总共上百万的军队，通通协调起来，以便实现他的聚歼“今日之石达开”的美梦。

然而，当他坐下来想在川军将领中遴选一个战役指挥官时，他却被困住了。川军“二刘”的宿怨，人所共知。由刘湘出任总司令，川康却是刘文辉的地盘；由刘文辉做总司令，刘湘又是冷落不得的。照薛岳的说法，“解决不了战役指挥，战役计划就是一纸空文。”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蒋介石本人早就是个战场指挥官；龙云的第2路军总司令，本来就是一个虚设。

最大的麻烦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北进的方向判断错误。他大讲73年前的历史，大作“石达开覆亡”之梦，却又不相信“朱、毛”真的会走上石达开的老路。他给身边的将领说：“毛泽东这个人，我是有些了解的，平时爱啃点历史，他不可能不晓得石达开的教训。他肯定会走东边的大道，取道汉源、荥经，图谋在雅安附近同徐、张一股会合。”他在5月21日给贺国光的手令中，给“敌情判断”定了一个基调。他说：“此时我军主要战略，第一在防止朱、徐两股会合，第二在防止残匪向西康逃窜。故现不必防徐匪东回，而在防徐匪南下。应急令第5与第3路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行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压止徐匪南窜，并希在此地带聚歼徐、朱两匪也。也此两匪必谋在雅安附近会合。故吾人既知其目标与方向之所在，应即照此预备，不必零星分防，随匪转移，而须急谋立于主动地位也。”根据这一判断，他令参加“大渡河会歼战”最积极的“河防指挥”杨森，率20军并21军王泽浚旅，驰赴大渡河之雷、马、峨、屏布防，完全把兵用错了方向。适逢此刻中央红军将计就计，令第2先遣团始则攻占越西城，进而攻占大树堡，佯攻富林，大造打雅安的舆论。届时在昆明的蒋介石，竟大吹其“料事如神”，更加坚信他的错误判断。当中央红军已经出现在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并即将夺取泸定桥时，蒋介石还在致薛岳的电报中说：“匪在安顺场偷渡，然其数只二三百人，故其主力今在何处尚未发觉”云。

且说中央红军先遣队走出彝区，以急行军速度，一天一夜奔袭140里，5月24日晚来到距安顺场数里的一个小村子。稍事休息后，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政治委员聂荣臻便给先遣团下达了夺取安顺场渡口的任务。刘、聂的情绪很好，先遣队成功地通过了彝区，按时来到了大渡河边，后续部队也都跟了上来，但他们也很焦急，他们在路上已经了解到当面大渡河的情况，全军要渡过大渡河，并非易事，又是一个“千军在一渡”！他们找来先遣团团团长杨得志和1营营长孙继先，聂荣臻首先问道：“杨得志，孙继先，你们两个知道石达开吗？”两个20才出头的营团指挥员，他们似乎高兴多于焦急，他们已经私下揣摩到，又一个光荣任务落到了他们头上。两个家伙在总参谋长和聂政委跟前已经快一个月，说话都很放得开的。杨得志“嘿嘿”笑笑说：“我听说了，石达开是石头，蒋介石是石脚。他们当然都不行喽。我们既不是石头，也不是石脚；我们是金丝鸟儿，金沙江都过来了嘛。”孙继先说话更莽撞，说：“就是，管他什么十达开九达开的，咱们是红达开，到哪里哪里就得开！”刘伯承不由得乐了，骂了句“狗东西”，说：“倒还挺有词的嘞，一个金丝鸟，一个红达开，看样子是过彝区的收获喽？好，有你金丝鸟、红达开的这几句话，我就放心了。听着，1团今晚就夺取安顺场渡口。按现在的序列，你们带1营去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再点

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记住，三堆火！”两个“红达开”双脚一靠，答一声“明白！”便转身要走。刘伯承又把他们叫住，说：“别慌！我还得给你们说说这大渡河和安顺场是啥子一回事哩。”

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由北向南奔腾在横断山中，如同长江第一湾，大渡河流至四川石棉县，也来了个突然掉头向东，形成一个90度的大转弯。安顺场便位于大渡河大拐弯以西40里处。这里，河宽约300米，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旋窝，俗称竹筒水，可让鹅毛沉底。由于水深流急，历来没有人在这里动过架桥的念头。

驾船横渡时，先得把船拉到上游200米处，放船后，要有十几个船工，篙橹齐使，与水流形成一种合力，方能使船斜冲到对岸。对岸有石坎，如临岸不准，撞上岸边石壁，便将船毁人亡。

“所以，你们不要光想到自己是只金丝鸟，山山水水的问题，也许比过去还要严重些。”刘伯承说。

聂荣臻说：“所以，刘司令员强调的，不是一点，而是两点：一是要消灭安顺场的敌人；二是要搞到船。有了船，我们才能说有了办法。”

刘伯承又道：“你们两个听着，是我们把全军都带到这个地方来的！明白吗？”

杨得志和孙继先更加热血沸腾起来，说：“保证完成任务！”

杨得志和孙继先立即带队出发，夜袭安顺场。他们边走边找老百姓了解安顺场的情况。

安顺场，位于大渡河南岸，百十户人家，守敌两个连，营长是当地恶霸地主、刘文辉24军彝务指挥部的赖执中。渡口北岸是刘文辉的精锐第5旅第7团的韩槐皆营，这个团的另两个营在下游15里处布防。根据蒋介石“确保河防，困厄红军”的通令，这天白天，韩槐皆和赖执中把安顺场的全部粮食和重要物资都运往北岸，还在通街堆满了柴草，准备把安顺场一火烧光。只因安顺场的房屋和财产大半是赖执中的，临放火时，两个人吵了个通街，老百姓都站在赖执中一边，安顺场才没有在红军到来之前被付之一炬，赖执中仍旧带着他的两个连守在小镇上。赖执中认为红军有可能从下游什么地方过河，“即使奔安顺场而来，也决不会有这么快的。”这天晚上，他还留有一只小木船在南岸归他使用。了解敌情以后，杨得志作出部署：他和孙继先率1营夺取安顺场，政委黎林带2营到安顺场下游佯动，3营为后卫。

孙继先又将他的1营作了如下分工：1连从安顺场南面进攻；3连从西南面进攻；2连和营部从东南方向沿河边进攻，并负责找船。

午夜，杨得志和孙继先率1营来到河南岸的山头上，忽然夜空中电闪雷鸣，整个河谷一片急风骤雨声和大渡河上轰隆轰隆的波涛声。1营3个连队冒着大雨从不同方向上直插小镇中心，赖执中“守夜”的部队还在打麻将，拉胡琴，唱戏。不到30分钟，两连敌人就被红军的勇士们解决了。赖执中梦中被枪声惊醒，跳墙时跌伤了腿，叫他的护兵背到彝族区躲了起来。整个战斗麻利快捷，又由于风雨声和大渡河的咆哮声，对岸的敌人竟毫无发觉。沿河找船的2连，把赖执中留下的那只小木船也缴获了。这时已是5月25日凌晨3时。

1营成功地抢占了安顺场，夺得了船只，孙继先却没有点着那三堆火。刘伯承、聂荣臻看不到那三堆火，好不焦急！派人下山打探情况，方才得知

敌人已经消灭，渡口已经占领，也搞到了一只船。刘、聂下山来到河边，找到孙继先，不由得喜怒参半，叫道：“孙继先呀孙继先，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孙继先惶然，却也听出了首长的话中有几分高兴，便也用高兴的话气着说：“我一发信号，你们几个首长还不得紧忙往山下跑？我得为首长的安全着想哩。”刘伯承似乎还有点恼，说：“你把我和聂政委急死在这大渡河边，就安全了？”孙继先这才“嘿嘿”一笑说：“首长，没点三堆火，原因有三：一是大雨，野地里点不着呀；二是我们在路上听老百姓讲，敌人正要放火烧了这镇子，我们一来就放火，老百姓咋想？第三嘛，嘿，这第三……”刘伯承问：“第三什么？”杨得志走近前来，说：“别听他胡说，他是顾了打仗，找船，把点火的事给忘了，刚才还在说要请求首长处分哩。当然，要处分也有我一份，我也忘了。”刘伯承这才抹了一把满脸的雨水，说：

“当然得处分！明天，把街上能吃的东西多买些，好好地……”聂荣臻接过道：“好好地撑撑他们几个！”杨得志和孙继先都咧着大嘴笑了。刘伯承又道：“部队赶快睡觉去，明天上午过河！”

黎明前，刘伯承着人找来二十几个船工，亲自同船工们谈了话。同时令杨得志在1团1营组织一支渡河突击队。首船突击队员由1营2连组成，连长熊尚林任队长，下有2排排长罗会明，班长刘长发、郭世苍，副班长张表克、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民、丁流民、陈万清。史称“17勇士”。

他们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外加五六枚手榴弹，英气勃勃。火力掩护是军团的机炮连，十几挺轻重机枪和3门迫击炮，炮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作过战的赵成章。

最大的问题只有一只木船。一只木船也得过，对岸阵地还在敌人手里。

天明后9时，一切准备就绪，刘伯承和聂荣臻在掩蔽阵地前发出命令：“开始！”杨得志立即传令：“火力掩护，强渡开始！”

在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下，以熊尚林为队长的首船8勇士，在当地熟练船工的摆渡下，从上游200米处驶离南岸，斜插对岸而去！船到大河中心，对岸碉堡的守敌突然向渡船开火，说时迟那时快，神炮手赵成章的两发炮弹飞过河去，掀掉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敌人的火力沉寂片刻后，当渡船飞近对岸时，敌人的火力又猛烈起来，渡船四周溅起高高的水柱。刘伯承和聂荣臻跳出工事，在机枪火力压制的同时，命令吹冲锋号，故意暴露目标，以分散敌人的火力。中央工作队队长肖华见冲锋号吹得不够响亮，夺过司号员手中的铜号，挺起胸膛吹了起来，其他各连的司号员也都吹响了冲锋号。

激越的号声振奋了突击队员，也振奋了船工。渡船离北岸只五六米了，敌人的火力又一次猛烈起来，对岸村子里的敌人在吆喝声中向渡口反冲击，企图把突击队“堵”回去。赵成章奉命再次射击，他又一次打了两发炮弹，炮弹在敌群中开花，不死不伤的向后溃逃。8勇士登上了对岸的石坎，占领了敌人的渡口工事，取得了立足点。渡船返回后，孙继先率第二船10勇士强渡过去。18勇士在对岸会合，奋起追击溃逃之敌，打得敌人血肉横飞，拼命逃窜，突击队完全控制了渡口阵地。

当面之敌韩槐皆营一崩溃，北岸余味儒团的阵地便全线发生了动摇，纷纷向下游溃逃而去，安顺场东西十几里的南北两岸便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强渡完全成功。

李一氓有《安顺场怀古》赞红军强渡大渡河：

澎湃铜河一百年，红羊遗迹费流连。
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
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
早知末路排安顺，何不南朝共死生！
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
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

且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是5月26日傍晚到达安顺场的。他们来到安顺场，心情都很愉快。先遣队如期夺取了渡口，杨得志团已全部渡过河去，1军团1师的其他几个团和军委干部团正在紧张有序地渡河。先遣司令刘伯承见中央负责人都平安到达安顺场，心里也很高兴，他搞来几缸米酒，请大家的客。他们有好些天不见面了，也还有些奇闻趣事，于是，乘着酒兴，席间便都说闹起来。毛泽东说：“昔者曹操煮酒论英雄，论来论去，论的是自己。伯承呐，你今天是论的谁呀？”刘伯承说：“各位别误会，酒是煮了，可不是要来论英雄，更不是自己煮酒论自己，我是慰问大家的，先到者为主喽。”毛泽东说：“你不敢论？那我就来论一论喽。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在座诸公，谁能当之？”席间都是熟知“三国”的，一个个都不想扮刘备，便只顾喝酒，不曾作答。毛泽东说：“我看啦，刘伯承就够。君不见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悦诚服，而我们的伯承同志，一下子就把小叶丹说通了，比诸葛亮强了7倍了嘛，还不够英雄么？”席间都嚷了起来：“够，够，太够了！”刘伯承说：“这样说，我这筷子真要掉地下了。”毛泽东说：“听到没有？伯承自比刘备，认了。曹操就说嘛，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大伙都乐了乐。刘伯承说：“说我个人，那是过了。我们，主要是靠我们党的民族政策，这个东西比诸葛亮的一套本来就要高明一些的。”

席间有混嘴而来的陈赓，全军有名的活跃分子，说起话来没上没下。他说：“什么政策不政策啊，我看，我们刘司令员有一手的确是很厉害的，我敢肯定，诸葛亮没有这一手。”毛泽东问：“怎样厉害的一手呀？”陈赓说：“脱裤子！”在座都喷酒而乐！大家都已知道王耀南的工兵连被彝民脱个精光的事。毛泽东乐完说：“伯承呐，王耀南当‘脱派’那会儿，你没脱吧？”刘伯承说：“我当时稍微靠后了一点。要是走在一起，还不得也脱。”一圈人又都哈哈笑了起来。朱德说：“刘伯承也脱，那真叫是我川中一枝花了。”笑声更加响了起来。毛泽东笑完又问刘伯承：“伯承呐，你跟小叶丹结拜的时候，是先跪的左腿还是先跪的右腿呀？”刘伯承一愣说：“这，我可没注意。不过，嘿，赌咒发誓，我的诚意是决没有问题的。”毛泽东接着讲起了一段掌故，说某朝某代，某大臣朝见新主，因下跪时跪错了一条腿，结果被贬黜琼州……故事正在进行，总政代主任李富春走了来：“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喽。”刘伯承连忙招呼警卫员：“倒酒来！”李富春喝了一口米酒，连赞“好香，好香！”接着在毛泽东的耳边说：“小镇上有个老秀才，有兴趣一见吗？”毛泽东说：“哦，这地方还出了个秀才？走，摆摆龙门阵去。”

毛泽东起身要走，见刘伯承走近身边，说：“伯承，还得想办法搞船，实在搞不到，就做木排！”

刘伯承点头道：“木排一会儿就可试渡。”

夜色降临时刻，毛泽东和李富春钻进小镇的一家小店，见到了李富春已与之见了一面的老先生。老先生一身青素对襟长褂，气色很好，精神矍铄，

看上去古稀之年。他起身为来客挪动椅凳：“有请。”毛泽东坐定后，问道：“老先生，高寿啊？”饱经世事的老先生，神情泰然，似乎这里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一般，也不为来客的生疏所忌，他嗓音平静而响亮：“虚度90春秋矣。”毛泽东不禁为之一怔：“噢，高寿，高寿了。请问。祖籍本地人士吗？”老先生答道：“先祖汉丞相的部下，历数10代之繁衍，自然也算得上祖籍本地了。”老先生文绉绉的，毛泽东更来了兴趣，笑问道：“这么说，老先生定是见过太平军了？”老先生说：“不才有幸，不只是见过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本人也是见过的。”毛泽东又“啊”了一声，说：“老先生，我们两个是从政于红军的。红军中姓石的有，可没有叫石达开的。可现在呐，都被人叫作石达开了，只是加了‘第二’两个字。请问老先生果如是么？”老先生听来客的口气，料定他们是红军中领头的；又见他们问及前程大事，神情便变得郑重而欣喜，说：“老弟是要问策于民么？”毛泽东说：“非问策于民，乃求教于老先生也。”

老先生沉思片刻，叹息一声，便说开了翼王的历史，从石达开的兴兵起义，累累战绩，说到他的灭亡。“其时，我辈虽届金榜题名之年，却因才学浅陋，好多事情也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后来有了些文墨，也才明白，那实在是悲乎者也！翼王天京分裂，教训者一；率部南下云南，教训者二；取道金沙，过彝区，来到这紫打地，教训者三也……”毛泽东“啧啧”有叹，他急着想听听历史见证人对石达开覆亡于安顺场的看法，便插问道：“老先生，翼王征战数千里，何以兵败紫打地？愿听先生高见。”老先生接着说：“翼王到了敝地安顺场，当时叫紫打地，更有大为不当之处。一曰用兵太慎。当时正是雨季。本来有上万兵勇渡过河去，他怕兵力分散，又渡了回来，后来再渡，河水猛涨，便不得成功。二曰贻误时机。他生了个儿子，竟不顾军情紧迫，传令所部‘庆贺三日’，待清军唐友耕部一到，防守巩固，便西不得过松林小河，北不得过大渡河了。前前后后，他们在这紫打地整整枉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时已6月中旬，他率残部6000人向东突围到利济堡，为老鸦漩河所阻，又不得涉过。他同部将商议，众部将相对而泣。次日，一代天国骄子，中了清军的诱降之计，在大渡河沉毙了10数妻儿，想‘舍命以全三军’，他自投罗网，随清兵去了成都，结果在成都被总督骆秉章杀了头，时年三十有三，所谓‘全三军’者，三军全成了大渡河上的冤魂……二位老弟想必知道汉丞相祭泸水之典吧，究其历史真相，大渡河上的冤魂是大大超过当时称之为泸水上的冤魂的！我这可不是泄你们的气呀，历史终究如此也。”

毛泽东深为感动，想不到老秀才对天国历史有如此中肯的见解，对翼王的悲剧命运寄予如此深厚的同情；他对红军的关照之情，也溢于言表。他正想说点什么，李富春却说：“老先生如此见解，令我晚辈深为敬佩。请问老先生，我们红军现今也来到这紫打地了，有何见教，老先生不必客气。”老先生轻轻地笑了笑，但一会又神情肃然，说：“老朽不才，腐儒之管见也。只因言及石达开，又是在这紫打地，自然是教训多于其他了。刚才说了，老朽不是泄你们的气。教训者，后事之师也；师其所然，乃历史常有相似之处也。你们来这紫打地，也正是翼王到这里的季节。雨季河溢，素为兵家所忌，况乎川军前堵后击哉。所以，我还是劝你们，尽快离开这里，乞谅老朽不留来客。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谢谢老先生的赐教。”毛泽东起身向老先生鞠了一躬：“老先生一席谈，

晚辈受益非浅；只因军务在身，只好告辞了。”

老先生起身道：“慢走。”

夜色已浓，街灯幽幽，毛泽东和李富春走在小镇街上。毛泽东感叹道：“老秀才，民间历史学家！”李富春说：“我今天算是真正明白你每到一地，必找当地人士……”毛泽东似乎没有注意到李富春在说话，他自个在自语：“老先生说得对，石达开覆亡紫打地，第一是战略死板，其次是失却时机。对的，不能战略死板，用兵不可不慎，不可太慎。石达开……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向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李富春已经看出，毛泽东说的是石达开，琢磨的却是自己的谋略。他说：“你刚才说到沿左岸直上，这个想法……”毛泽东突然侧过头来：“什么什么？我刚才说过沿左岸直上？”李富春说：“你说了，而且在我听来，你说的就是……”他们正嘀咕着走出街口，迎面走来急匆匆的刘伯承和林彪。毛泽东问：“渡河进展如何？实在不能再找到船了么？”刘伯承点头道：“船是不可能再找到了。刚才木排试渡也不成功，浪太大，无法控制木排的方向。现有的3只船，进展倒是正常的，1师已经渡过去了，干部团正在渡。照眼下这个速度，我计算了一下，全军如果都挤在这里渡河，得一个月时间！”毛泽东不由得脚步慢了下来，林彪说：“敌人不可能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不可能的，我们得想其他办法。”刘伯承又说：“我们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

毛泽东踌躇在山崖边，望着大渡河边黑压压流动的人影和点点灯火，想起老秀才刚才说的“我还是劝你们尽快离开这里”，想起他在金沙江边曾经有过的揣度，他原以为过了金沙江，就再不会有大江大河足以阻挡红军的脚步了，想不到这大渡河竟还是一道难题。对，是得想其他办法，尽快离开这里。他扭头跟刘伯承和林彪说：“你们的考虑很对。走，找个地方开个会谈。”

毛泽东一行匆匆来到渡口临河的一座碉楼顶上。一会，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也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开个会吧。刚才我和富春同志找镇上的一位老秀才先生谈了谈，他说到石达开的教训，一是失却时机，再是用兵太慎……”毛泽东的话刚开了个头，突然一道闪电刺破黑夜，随即一声“嘎嘎——”震耳欲聋的雷声，炸响在大渡河的上空，霎时便风狂雨骤，碉楼上的人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怎么决策的，竟一时听不清楚。

第二十七回 毛泽东险棋夺泸定 刘自乾失桥记大过

话说毛泽东等在安顺场临河的碉楼上，正要商量方面军怎样尽快离开“石达开覆亡之地”的时候，几声炸雷响起，大家的头脑似乎都被震醒了，吃米酒的那种欢乐情绪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急迫心情所代替，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风雨声中，毛泽东在说了他和李富春同老秀才摆的“龙门阵”之后，说：“当然，下边的同志说得好，人家是石达开，我们是红达开。石达开生儿子全军庆贺3天，红达开生儿子送人就是。但是，不同中

有同，敌人可能取得了天人合一的优势这一点，难说今天不似当年。河里发大水，于我大为不利。所以，我的意见，我们不在这里挤着待渡了，伯承和荣臻同志率1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进；林彪率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沿西岸北进。其他各部概由西岸跟进。叫着夹河北进，双箭一的，尽快夺取泸定。如何？”朱德当即表示：“这个办法要得。”

泸定有座铁索桥，我当年走过的，那是一座敌人难以破坏的桥。有桥便有泸定；有了泸定，同4方面军会合的问题就真的不大了。”刘伯承和林彪被点将，也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问：“东岸有路，西岸有路可走吗？”不待有人回答，张闻天说：“夹河而上，思路甚佳，可也是再次走险棋啦！”周恩来像是在回答王稼祥的问题，说：“我赞成夹河北进。至于路，有河必有岸，有岸必有路。”王稼祥点头道：“对，我们就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经过讨论，毛泽东最后说：“洛甫同志说得对，这又是一步险棋。当年翼王把渡过河去的1万人又渡了回来，我们今天把部队分开在东西两岸，不可不有‘殊途同归’之虑。我们一方面要有些勇气和胆量，因为是步险棋，才可能有出敌不意的成功。泸定城只有刘文辉的两个团。我们如能行动神速，两岸并进，配合着拿下泸定城，全军都过了大渡河，也就化险为夷了。另一方面，也要作坏的打算。万一被敌分割，刘、聂当率部在川西创造一个局面，为此我提议，罗瑞卿可做参谋长，肖华可做政治部主任，随刘、聂一起走。其他干部，干部团都有。”

却说第二天，5月27日，拂晓，两岸先头部队从安顺场出发，午后便进入了泸定地区。从安顺场到泸定城300里，军委要求左右两路纵队两天赶到，夺取泸定桥。一路上，山被水横断，水被山折回，山高水深，部队只能在河两岸陡峭的山崖间攀登前进。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描写这一片土地说：“这个地方在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中被视为圣地，它浸透了战争中英雄们洒下的鲜血。这是一片传奇的土地。2000年以前，‘三国’时期，这里是蜀国的土地。毛泽东对蜀国的兴衰史和那个时代的故事了如指掌。蜀国的50万大军在不断的征战中，无数次地渡过泸水（现在的大渡河）和金沙江。对蜀国的英雄们、那些巫师出没的崇山峻岭和穿山而过的激流，以及蜀国将领们把敌人引入歧途的神奇计谋，没有人像毛那样了如指掌。现在，他指挥的红军就行进在这块传奇的土地上……就好像一个英国人突然回到了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的时代一样。”

说传奇便传奇。东岸的杨得志团，这天一早就打了个“洗脸仗”。原来，先遣队渡河以后，敌人向后溃逃，但并没有走远。杨得志的先头团前出警戒，前卫连天黑宿营在一个小山村，第二天天亮才发现同敌人宿在一个村子里。红军住山坡这边，敌人住山坡那边。红军哨兵早发现，把大家叫了起来，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战士们才觉得像是洗了把脸一般，瞌睡才醒过来。

刘、聂率右纵队沿河向泸定前进。东岸的敌情较之西岸严重。红军在安顺场渡河以后，刘文辉估计到了泸定桥有可能是红军的目标，他令袁国瑞的第4旅防御泸定桥，“固守泸定铁索桥，防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其余部队在泸定县城附近择要防守，必须严密控制泸定通汉源和泸定通天全两条要道，确保雅属地区安全”。刘、聂率部进至瓦坝，便遇敌一个团，该敌以一个营前出20里向安顺场警戒。午后1时，红2团与敌接触，敌据守要隘，节节抗退；黄昏时刻，打到瓦坝附近，激战数小时，敌人溃退，红军才得以夜宿瓦坝。28日，右纵队急行军百余里，翻越了一座上下60里的高

山，到达得拖。战士们累得够呛，听说诸葛亮当年在这里驻扎过，精神便又来了，“诸葛亮都来得这里，我们还来不得！”在得拖只打了个小仗，便就着敌人的锅灶宿营了。29日，先头红2团进至铁丝沟，遇敌一个团，这一仗打得激烈艰苦。铁丝沟，地形险要，左边是风急浪高的大渡河，右边是悬崖峭壁的高山，敌第11团凭险扼守，占领有利地形。邓华和肖华率部激战数小时，才将敌人击退。追击中，又在龙八步击退敌第10团，敌团长谢洪康自伤左臂，坐担架逃向雅安。铁丝沟战斗的胜利和龙八步的占领，为左纵队进军泸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且说左纵队以红4团为先头团，头一天在叶大坪、菩萨岗打了两个小仗，行程80里，夜宿什叶坪。第二天28日，先头团才走了几里路，就接到林彪的命令：“王、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王开湘和杨成武打开地图一看，部队所在的位置距泸定城还有240里。“啊呀，明天就是29日！”王开湘叫道：“这240里是一天的路程啦，难题，难题！”杨成武说：“我们把难题变马蹄吧！”

王开湘说：“马蹄？得长翅膀才行啦！”

红4团一路小跑，迅速接近了猛虎岗。猛虎岗，一座上下三四十里的高山，半山腰以上白雪皑皑，中间一条小路贯通，山顶隘口有敌人一个营扼守。王开湘心直口快，又嚷开了：“他娘的，从来只听说有景阳岗、卧龙岗，这里倒有一个猛虎岗，硬要老子做武松么？”杨成武看了看满山浓雾，说：“团长同志，你说对了，我们今天得来个卧龙岗同景阳岗相结合了。”王开湘问：“什么意思？”杨成武说：“有勇有谋嘛！瞧这大雾，不是天助你我么？偷袭上去，近敌解决。”王开湘说：“好主意！”随即命令1营冒着雨雾偷袭而上。1营逼近隘口，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狼狈而逃。4团跨越猛虎岗，穷追猛打逃敌，一口气追出30里，到了摩西镇。摩西有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先头营乘胜猛打，不到半小时，就占领了摩西。摩西到泸定还有一百一。从摩西出发，天已黑了，突然又下起了暴雨。王开湘和杨成武商量，3个步兵营彻底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其他通通甩掉。杨成武把马也留下了。王开湘说：“你不是说要把难题变马蹄吗？”杨成武说：“你不是说要长翅膀吗？”两个人便率部摸夜轻装奔袭，一路走一路鼓舞部队：“看谁走得快！看谁先走到泸定桥！”夜9时左右，对岸有部队打着火把向泸定开进，开初他们还以为是右纵队的部队，仔细听动静，才弄清楚是敌人在增援泸定。杨成武说：“向敌人学习吧！”王开湘说：“对，来个双龙抢珠，看谁走过谁！”他们立即命令部队把附近村庄老乡家的竹篱笆全买了下来，一人扎了一个火把。于是，两条火龙便在大渡河两岸蜿蜒游动起来。团机关的参谋找来几个四川籍战士，还叫来几个俘虏，以应付对岸敌人的联络。果然，行进中，对岸敌人用号音发话了：“你们是哪部分的？”司号员照敌人的号谱作了回答。大概是号音不怎么准，敌人在对岸喊：“你们到底是啥子部队？”四川籍战士回答说：“啥子部队！还不都是为了那座桥，你说老子是啥子部队？”敌人这才深信不疑，只听他们在对岸骂骂咧咧的：“哄鬼哩！红胡子能来得这么快么？晚上走这鬼路，连觉都不让老子睡！”夜12时，敌人的火把停下来了，一会全灭了，夜空中对岸传来喊声：“弟兄们！反正明天到，还是打个瞌睡吧！”杨成武要四川籍战士回答“我们也要睡觉了”，四川籍战士机灵，朝对岸叫道：“说得对啊弟兄们，格老子桥是铁的，人可不是铁的。我们也

要打个瞌睡喽。”王开湘立即命令部队灭掉火把，全团鸦雀无声，继续奔袭前进。

5月29日早晨6时，红4团进抵泸定桥西岸，消灭了桥西守敌，占领了西岸全部阵地和离桥头约半里的一座天主教堂。

泸定桥，建于康熙年间的一座铁索桥，是千里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由13根大铁索悬空拉成，两侧4根做扶手，并排9根铺木板，桥长100米，桥宽2.8米，距水面14.5米。铁索桥位于泸定城西，东西连着二郎山和贡嘎山。桥头石刻道：“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守敌为刘文辉24军第38团。团长李金山以一个营把守桥头，在桥头构筑了沙袋碉堡；一个营在左翼占领阵地，火力封锁桥面；一个营守城区。红4团到来之前，泸定桥西头的桥板已拆除大半，只有光溜溜的铁索，人已不能通行。守敌气焰甚高，在得知红军已到了桥西头以后，竟在东头大声叫喊：“有种的过来吧！飞过来吧！”

红4团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大会，进行战斗部署。研究决定：以一个营正面突击，组成3支突击队，梯次突击夺桥；以两个营组成严密火力掩护突击队；军团教导营在左翼警戒康定方向，阻敌增援泸定；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以号音震慑桥头守敌。刚部署完，军团来电：“守敌李团昨晚才到，立足未稳，你团应相机而行，即到即夺，不必等待。”王开湘说：“等？我才不想等哩！”

下午4时，总攻开始。

红4团10个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全团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号声、枪声在峡谷中回响，两岸的高山像是要崩裂一般。第一突击队主要由2连组成，连长廖大珠为队长，22名突击队员，每人手持冲锋枪或手枪，背插大刀，腰缠12颗手榴弹，冒着敌人的弹雨，攀援着铁索，像二十几只金猴，奋勇向前扑去。紧随其后的2梯队是王友才率领的3连，他们除了武器，每人夹一块木板，边铺木板边前进。红军历史上还不曾打过这样的既像空战又像水战的仗。杨成武在桥头阵地上叫道：“妈的，是天兵天降，还是蛟龙入海呀！”

火力！别顾得看热闹，再猛一点！”

守敌团长李金山见红军如此英勇，一面找他的营长研究防守对策，一面电话请示龙八步的旅长袁国瑞怎么办：“旅座，看架势，桥是很难守得住了哇……”袁国瑞此刻正被刘、聂的右纵队打得自顾不暇，在电话里只回一句“我这里也很紧张！”便没有下文。李金山在电话里只听到有人在喊：“旅长，旅长，快点，快点……”他一看东西两岸都来了红军，腹背受敌，又求援无望，他决定翻后山逃往天全。

李金山逃跑前，给部队下了一道命令：“谁丢了大桥我毙了谁！”

守敌仍在顽抗，封锁桥面的火力仍很猛烈，突击队员有了伤亡。王开湘骂娘带下命令：“他娘的，给我压制！压制！”两个营的压制火力再次猛烈起来。当廖大珠突击队接近桥东头时，桥头守敌乱了阵脚，便使出了最后一招：火烧桥头。霎时，堆集在桥头的木板和柴草被点着了，大火熊熊，浓烟滚滚。红军突击队员们顿时愣住了。王开湘和杨成武传下命令：“不要怕火！敌人放火，就是垮了！”廖大珠第一个跃起冲进火海，接着，突击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冲进火海。在一片喊杀声中，一排排手榴弹在逃跑的敌群中爆炸，死伤遍地。残敌向城中心溃逃，廖大珠指挥突击队尾追冲进城里，与敌人进

行短兵相接的巷斗。敌人一看红军人数不多，火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仍拼命抵抗，多次进行反扑。危急关头，王友才的3连赶到，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的后续部队也已冲过铁索桥向左右发展。经两个小时的激战，县城守敌大部被歼，少数逃跑。

红4团胜利地攻占了泸定城！

当夜11时许，右纵队的1师2、3团攻击前进到泸定桥头时，一叫“口令！”回答是“自己人！”左右两个纵队在泸定城“小会师”。12时，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听取杨成武和王开湘的汇报后，高兴异常：“1军团立了大功！4团立了大功！”并要立即去看看铁索桥。杨成武提着马灯，领着刘、聂走上泸定桥头。他们在桥上走了个来回，在返回东头的途中，刘、聂停在索桥中心，俯首桥下的大渡河，激流翻滚；仰头看看高耸的群山，像云层挂在星空。他们都着力地在桥面上连跌几脚，感慨万千。刘伯承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聂荣臻说：“我们胜利了！我现在才觉得我们完成了先遣队的任务……”刘伯承又道：“应该在这里立块大碑，铭刻下我们的战士立下的奇功！”

夺取泸定桥的第二天、第三天，5月30、31日，林彪率领的1军团本队和5军团陆续赶到了泸定城。林彪本人是31日上午抵达泸定桥西头的。年轻的军团长站在桥西头坍塌的碉楼前，望着滔滔大渡河上横空飞过的铁索桥，一腔感慨，脱口而出：“如果说安顺场是刘伯承的，这泸定桥该是我1军团的，我林彪的！”机敏过人的军团长接着想了许多。他悟到了泸定桥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将具有怎样重大的意义，他像是重新发现了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无比的勇气，他悔恨地想起了自己三渡赤水后的骂娘和会理会议前的那封信，他觉得他的确是个“娃娃”。他不能再是个娃娃了。机不可失，他要表白一下自己。他这么想着，眼前的铁索桥在他心目中变得越发高大雄伟，乃至神圣起来。他暗自在心里说：“不能随便过这座桥，得把上桥的第一步留给他……”正午，当刘伯承得知林彪已到了桥西，打过电话来要他过河进城有事相商时，他说：“你们看着办吧，我得陪毛泽东他们一起过，让他走最前头！”刘伯承在电话里愣了愣，没想别的，倒觉得林彪的话是一个提醒，说：“好吧，到时候也通知我一声，我和老聂到桥头接他们。”

当天下午，军委纵队赶到了。林彪率军团参谋长、主任等在桥西迎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负责人。毛泽东一见林彪便说：“林彪呀，你们1军团的‘二杨’得好好表扬表扬喽，夺取泸定桥他们立了大功！”林彪高兴得眼睛都笑眯了，说：“是呀，一个杨矮子在东岸，一个杨长子在西岸，都有功劳！不过，功劳最大的还是夺桥突击队。我们已经准备了，突击队员给大奖，每人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周恩来说：“少了，少了。再加一套衣服吧，写上‘中央军委奖’！”朱德说：“这个奖法好，他们冲桥头火海时，衣服恐怕都烧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挥挥手说：“总司令也是个小气鬼。奖是奖，发是发，一人两套！”林彪说：“没有那么多呀。”毛泽东说：“找叶季壮要！”林彪点着头。毛泽东又问林彪：“噫，林彪呐，你怎么还没有过桥呀？”林彪略一踌躇，脸一红，说：“我一来到这桥西，原本想一口气从这桥上跑过去的；当我来到桥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是怎样的一座桥啊！泸定桥，一座来之不易的桥，一座伟大的桥，一座为将来的历史学家们有可能大加称颂的桥，一座神圣的桥！我不能随便就

这么走过去，我把踏上去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我得等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到了以后，我跟着走过桥去……”

谁也没有想到林彪竟激情地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历经战火的军团长，从不多愁善感，也从不读什么诗词作品。连毛泽东也怔住了。好久，毛泽东才“嘿”地笑了一声，说：“都听到没有？我们的林彪同志，不光是会打仗，也还有些诗情嘞。”朱德却听出了林彪的另一层意思，他似乎是在作自我批评，只是不想直说，便帮林彪挑明说：“说诗情也可，说是有些政治头脑也是不错的。我们的军团长已经不是个娃娃了。”果然，林彪的脸更红了，低头道：“跟了这么些年，还能老当娃娃么，总会一步一步有些长进的。”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爽朗说道：“请过桥吧，伯承和荣臻在桥那头等着哩！”毛泽东伸出指头指了指林彪的鼻梁，想说什么没有说，便迈步向桥头走去。

在林彪的引导下，毛泽东走在最前头。他昂首走上桥头，走出10来步，便感觉到了桥的摇晃，他用双脚抖着桥面，桥身明显的摇晃起来。朱德连忙招呼道：“莫晃莫晃，看桥面，别看河！”毛泽东压根没有顾及朱德的招呼，他迈开方步走着，想起了自己的诗句：“胜是闲庭信步。”陈昌奉朝前挤着，想搀他一把，他不让陈昌奉靠近他。毛泽东走出几步，俯身看看桥面的木板，又摸摸一旁粗大的铁链。一会儿，他转着身子，望望前后左右直冲云霄的高山，又低头看看脚下波浪翻滚的大渡河。来到桥中心，他停下脚步，一只手习惯地插上了腰际，嘴里喃喃道：“大渡河，泸定桥……大渡桥横铁索寒……”

毛泽东一行人用了一刻钟的时间，才走完大渡河上的这100米，是一次速度最慢的行军。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桥东头迎着毛泽东，一个个满脸胜利的欢笑。

聂荣臻后来有诗道：

安顺急抢渡，
大渡勇夺桥，
两军夹江上，
泸定决分晓。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宣告了蒋介石“大渡河会歼战”的彻底破产。然而，破产者此刻却还在酣梦中，梦想着川军中定有“骆秉章”一类的人物，成功地解决“今日之石达开”。蒋介石对川军的印象，经历了一个由坏变好的过程。刘湘对红4方面军的“六路围攻”打得一塌糊涂，那时他对川军的印象是很糟的。然而，中央红军“窜黔”以后，土城一仗，郭勋祺打得很不错。潘文华在川南的江防也是十分得力的，使得红军两度不得窜渡长江。红军渡金沙江后，攻打川康第一城（会理）不克，刘元璋在西昌用“亮城”的办法对付红军，他更加相信川军“剿匪”的诚意和他们的战斗力。他寄厚望于刘文辉和杨森。因此，在红军未到达大渡河之前，他在昆明一直是很沉得住气的。直到得知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偷渡”，他的那个“东路判断”发生了动摇，他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妙，“虽说朱、毛走的是石达开的覆亡之路，若是没有‘骆秉章’还是不行的！”5月26日，蒋介石由昆明飞抵成都。他俨然是要在成都做“今日之骆秉章”了。他一走下飞机，便大声问刘湘和贺国光：“他们的主力到底在哪个方向？呵，在哪个方向？”贺国光和刘湘也是才从重庆赶来成都接驾的，川康堵截又是刘文辉和杨森的事，他们也不知道红军主力此刻到底在哪里。贺国光惶然道：“我马上查询。委座先

下榻休息吧。”

蒋介石住进他的中央军校所在地——成都北较场，连个将领会议都开不成。刘文辉在雅安，杨森在洪雅，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李家钰等，都在前线对付红4方面军。两眼一抹黑，蒋介石感到惶恐不安和失去对手的寂寞。这一天，他在庭院的树荫下独自看地图，看着看着，一声“娘希屁！”把跟前的宋美龄吓了一跳：“大令！”贺国光闻声走上前来，蒋介石拍案道：“娘希屁，都眼瞎了不成！明摆着他们的主力沿大渡河西岸走了，就在这，在这！离河岸不远，同东岸的一股相呼应的。不可能不相呼应。好，好，此窜更是走头无路了。”贺国光连忙走近地图，拿起放大镜在地图上晃了一圈，也像是有了重大发现，愕然道：“委座，我敢说委座的判断千真万确！”蒋介石说：“速电雅安，叫康泽来成都一趟。”贺国光答道：“日前已发出电报……”

话犹未了，康泽赶到。别动大队头目挺直腰板，敬礼道：“委座，卑职康泽到。”蒋介石说：“来得正好。你们别动队在成都给我准备一两个杀场。”康泽神情惶恐，他不知道委座将问罪于谁。蒋介石说：“最好是骆秉章杀石达开的地方。”康泽这才明白委座要为谁准备杀场，却一时又像吞了只苍蝇一般，有话不敢说。蒋介石又道：“雅安的情况怎样？”康泽的别动大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分驻雅安、汉源，主要是监视刘文辉及其所属24军。康泽说：“委座，我们上了刘文辉的当了。他的24军号称两个师，川康边防军也号称两个师，还说有几个直属旅，其实，他的部队总共不到两万人，是根本不足以抵挡共匪的。他也根本没有按委座的指令到汉源同杨森协同指挥。对于大渡河的防守，他坚持大树堡为界，杨森部不得南进，也不得西进。四川有个老学究，前清秀才，后来专攻西学，有言论说：‘历来图川者，都是借川以立其足，丰其羽，尔后问鼎中原。’刘文辉同此人有接触。刘在同僚中曾有言论说：‘共党西进又北窜，无非是要找条生路。谁处是生路？我不相信共党会看上川康不毛之地。’云南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让’，川康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放’。

漏洞就出在……”康泽见委座脸不是色，把话打住了。蒋介石喝道：“说！漏洞出在哪里？”康泽说：“卑职看来，刘文辉一是兵少，二是蓄意‘放生’，石达开自然就……”康泽不敢再往下说。蒋介石说：“说下去！”康泽翻了个白眼，还是不吭声。蒋介石瞥了别动队司令一眼，转过身去背手踱了一圈，又吐了口粗气，说：“你说的漏洞，不出在别处，出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看错人了！娘希屁，本该让刘甫澄或是杨森出任战役总指挥的……只是，说共党头目已经不是石达开了，这种说法太悲观，现在还不晚！”他说着走近地图，手指一片等高线，朝贺国光说：“速令杨森部追歼大渡河东岸之敌，并奔袭泸定、天全，趁敌分割在大渡河两岸，一定要把他们……”

他的话没完，刘湘从树荫下的甬道匆匆走来：“委座，自乾有报，泸定失陷，共匪的中央方面军全都过了泸定桥……”蒋介石的眼睛由小变大，又由大变小，他跌坐在石凳上，好久才呐呐道：“娘希屁！判断对了，却没有判断够……”

蒋介石终究不是个轻易认输的角色。第二天，他召集陈诚、贺国光、刘湘等商议说：“朱、毛图谋与徐、张会合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必须把他们隔断！把朱、毛一股围困于雅安地区，把徐、张一股围困于川西北。分割合围，尔后聚歼之。”陈、贺、刘均表赞同。于是，蒋介石当天便以行辕参谋

团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庞大的调兵作战计划：刘湘的21军进至绵竹、灌县、大邑、新津线；李家钰部进至理番、威州、茂县；胡宗南部进至平武、松潘、江油；郭勋祺进至新津；邓锡侯部进至懋功、宝兴、芦山、天全；杨森部扼守汉源、荥经；刘文辉部扼守泸定、康定；薛岳的李、周、吴纵队由越西出汉源寻匪追击……

次日，为稳住军心，完成他的“分割合围”，蒋介石在他的中央军校礼堂里召开了一个将级以上的大型军官会议，大讲了一通“剿匪之战略战术”。他开篇说：“此次本想召集一般高级将领在成都会议一次。现在因为有几位还在前方指挥作战，不便回来，所以今天先请各位来谈。并借此机会，将我的意思告诉各位。现在四川的情形，并不是特别的不好，若与3年以前的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各部官兵也很有精神，不过剿匪没有经验，还摸不着头绪，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就使土匪得以任意流窜，苟延其残余生命。其实我们有这许多军队，要剿灭这一些残匪，决无问题。最要紧者，还在乎研究缺点，讲究方法，建设心理，改良军队，使剿匪工作提早完成。”接着他讲了8项战略战术原则，从“流寇穷追，踞匪紧围”，一直讲到“擒贼先擒王”。川军各路师旅官长，大都是第一次听委座当面训示，倒也听得津津有味，心情也颇为紧张。最后，却听委座尖着嗓门说：“我要附带地讲一下行军要则。我从前在江西规定，在匪区行军必须在下午2时以前到达预定的地点，并集合完毕，2时以后，就再不许行军。因为土匪的惯技便是孙子上所谓‘击其惰归’，每每在下午4点以后的时候在中途来袭击，或是攻我前卫，或是截我后尾，就是受很大的吃亏……所以每日的行程，最多不得超过30里……”会场“轰”地骚动了，接着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有的一边拍巴掌一边说：“30里好，30里好啊！”有的说：“我真想喊30里万岁！”

掌声过后，会议气氛陡然又紧张起来。竖耳听去，贺国光在宣读给刘文辉记大过的处分通令：“查朱匪未赴金沙江以前，曾经迭电刘军长文辉派兵布防金沙江上游，分段筑堡防守。迄至窃渡之后，又经迭电布防西昌、越西、冕宁诸城，并令在大渡河北岸沿线，逐段切实筑堡。刘亦先后复电一一遵办，各端俱案。后查，实际全未遵行。即以猛虎岗搜获匪队讲话材料内云，匪方各军，在两天内能行300里，还要作战，可为铁证。否则碉堡阻滞，行动决不会如此神速。似此上下欺蒙，贻误戎机，殊堪痛恨。虽以前未经严申赏罚，但既经有令指示，自应协力奉行，而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历来军法之规定，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

蒋介石原本是压着一腔怒火走上讲台的，此刻在会议紧张气氛的刺激下，他终于发作了。他起身道：“本座重申5月24日手令：各路军必须大力筑堡，严密扼守！如有不遵令或阳奉阴违而懒慢贻误者，及其所守地区而未如令构筑碉堡以致失陷者，一经查明，必惩治其当地负责主官与其最高长官以督教不勤，纵匪养寇之罪！”

谁也不明白委座为什么这时又祭起了“堡垒战”，会场一片哑然……

第二十八回 泸定会朱德择险途 荥经城杨森玩旧招

话说中央红军进驻泸定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党中央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都是中央负责人，脑子里事多，脸上过铁索桥时的那种兴奋喜悦的神色不见了。毛泽东倒是很满意大家是这么一种心情，他笑了笑说：“很好。看得出来，你们都高兴过了。”朱德说：“也不是娃娃，过铁索桥好耍。”毛泽东说：“我看，部队好像还没有高兴完。要给部队泼点冷水了，要反一下偷安放心的情绪。今天，是不是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的的问题。目前，有两大难题：一是我们的目标已经暴露了，同4方面军会合的意图也就显然了，蒋介石不可能不拼命来阻挡我们，这里的地形对我们也很不利，朱德、刘伯承同志是很清楚的，二郎山以东是丘陵平原，极有利于敌人机动，敌人的大部队运动快，从山那边压过来，我们在这个沟底，前面又是大渡河，这是很不利的。出泸定向北是康定，多是一道沟的地形，也是有麻烦的，康定以北又全是藏族地区。因此，我们还不能在这里停留久了。偷安是不行的。二是我们至今不知道4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他们也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确切位置。这就有个下一步到底走那条路好的问题。总的目标是同4方面军会合，4方面军的位置也只能有个大概估计。大家说说看。”朱德说：“我很赞同大家的脑子要冷静一些。我们还得抢时间。这边的地形我是熟的，要跑，只有西边一条路。可是，我们不能再往西走，不能放弃同4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打算。至于4方面军的位置，既然他们西渡嘉陵江的消息是确切的，那么他们肯定是在川西北，大有可能是在平武、青川、北川这一带。他们要是从最近的敌方报纸上判断出我们的位置，还有可能向西南方向的汶川、理县这边靠一靠。从这里奔川西北地区，无非三条路。一是出康定，经甘孜、阿坝，再东进；二是出荥经，经雅安、名山、邛崃，一路北上；三是中间的一条路，经天全、芦山、宝兴，翻雪山过小金，再北上。别的就没得啥子路了。”周恩来插话说：“比较一下，请比较一下。”朱德接着说：“走康定方向，敌情较轻，但都是高原气候，藏族地区，食宿困难一些；靠近成都平原的这条路，人口稠密，供应不成问题，但敌情可能比较严重，刘文辉、杨森、邓锡侯都在这边；中间的这条路，有出敌不意的优点，但要翻大雪山，也是一条险路。但是，险路有险路的好处，我的意见是走险路。”毛泽东问大家：“怎么样啊？路是找到了，就看走哪一条喽。”王稼祥说：“部队走了这么远艰难的路了，是不是找一条好走一点的路呀？”张闻天说：“我的意见，还是走敌情较轻的北路，那怕路难走一点，也求得少伤亡。都是宝贝了。”毛泽东问陈云：“陈云同志呀，你看呢？”陈云说：“走哪条路，你们也把我撇下了。我真想跟你们一起走到头啊！”一旁的朱德愣了，说：“说啥子话啊，怎么会把你撇下呢？”毛泽东说：“是有这么回事。对，这也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也请会议通过一下。我们几个商量，想请陈云同志回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毅同志他们还在那边，迫切需要地方党的配合。怎么样？”“同意，同意……”王稼祥说：“一路的安全可得有可靠保证。”陈云说：“放心吧，有地下党的同志负责。”

毛泽东说：“再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吧。”张闻天说：“你定吧。”毛泽东思索片刻说：“我很同意朱德同志对4方面军所在位置的判断。三条路走哪一条，我也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见，走中间这条路。取左右两条路之长，避这两条路之短，求其出敌不意。蒋介石只会有两条路的判断，不会有这第三条路的判断。具体走法，还得作点文章。主力1、3军团再南进一段，目标清溪、富林。估计薛兵团的李抱冰快到大渡河了。几天前是蒋介石堵‘石达开’，

现在该是‘石达开’堵堵蒋介石了。一来迟滞敌人，二来也作个姿态。再视敌情，掉头向北。9军团留个把营看守泸定桥，其余部队，加上5军团，从这边择路翻二郎山，直下天全，得手后向东扫一扫，扫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敌人摸不着我们到底走哪条路。我琢磨，恐怕是要翻过雪山以后，我们才能松活一点。同4方面军会合，也才有了真正的可能。”

当晚，根据会议决定，朱德给各军团下达了行军作战命令。

高原之夏，夜空幽蓝。毛泽东在警卫的护卫下，他又一次来到了泸定桥头。星光下，他看了看烧毁了桥头堡，又走上桥面，摸摸粗大的铁环，铁环冰凉，不由得那个诗句又溜出了嘴：“对，大渡桥横……”“铁索寒！”有人在不远处应道。毛泽东扭头看去，只见蒙蒙夜色中，手扶铁索走来3个人。近前一看，是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毛泽东叫道：“是你们啊！唔，好，看来身体还行嘞！”徐特立说：“两个老家伙非拉着我来再走一趟铁索桥不可，跟小把戏吵吵要大人带他们进园子摘果果似的。”董必武说：“这是一座不平凡的桥啦！年轻人将来还可以再来看看，我们几个就难得说了。”谢觉哉说：“别说不吉利的话，我还想再来看看哩。哎，润之，听说你又有新的诗句了，一共有几句了？”毛泽东笑笑说：“路遥数千里，诗句才二三。这首诗怕是要到目的地才能写完了。”董必武说：“这才叫诗，也才有诗千古之说。”毛泽东说：“说的是。你们也该作一首啊？”徐特立说：“你那一首还没有作完，我们哪里作得出？”谢觉哉说：“诗不成章诗情在，我们就等着依韵而和哩。”毛泽东说：“好，好，我会抓紧写好这首诗的。3位老先生，老同志，近期事多，不曾交谈，有些么子想法呀？”徐特立说：“润之，你今天就别考我们了。反正，你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上就是。”毛泽东说：“那，前面可是还有难走的路呐，可能比大渡河西岸那条路更难走。”徐特立悄声问道：“何事搞的？”毛泽东也小声道：“准备过雪山。”董必武说：“这个主意好！我猜想你会选择这条路的。”毛泽东愕然“哦”了一声，董必武说：“北去会合，蒋贼最忌；单取岷山，是为上计。”谢觉哉说：“必武说得对，岷山千年雪，出敌不意。”毛泽东禁不住哈哈大笑：“多谢多谢。有你们这几句，我心里也就踏实了。怎么样，回驻地休息吧，明天又该上路了。”徐特立靠近毛泽东说：“又有好久莫见子珍了吧？该去看看她呀！”毛泽东说：“不要紧，她的伤已经好了。”徐特立说：“伤好了也得去看看！”毛泽东一声“是”没落音，贺子珍在桥头暗处说：“我在这。”贺子珍是找毛泽东找到桥头来的，她和警卫员在桥头已经站了好久，见毛泽东和几个老同志在谈话，她没敢走近前来，此刻她走上桥面，站在毛泽东身边。徐特立是个老活泼，朝董必武和谢觉哉耸耸嘴说：“我们就别打搅了吧？”3个“老家伙”走了。毛泽东跟贺子珍说：“你是不是也要在这桥上再走一趟呀？”贺子珍说：“真想再走一趟。白天过桥的时候，人多，还有马匹，没法子停下来看看，就像打秋千似的荡过来了。不过，明天白天再走吧，我找你有事，总司令在等着呢。”毛泽东问：“么子事呀？”贺子珍说：“跟我走吧。”毛泽东随贺子珍走下桥头，回头跟警卫班长胡昌保打招呼道：“昌保，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昌奉跟我走一趟就是。”

贺子珍领着毛泽东来到休养连驻地。一进小院，满院药香味。毛泽东问：“此地是中药铺么？”贺子珍只是笑笑，没吭声。通过庭院的小路，他们来到正屋的厅堂，只见十几个女同志在围着朱德七嘴八舌地连嚷带乐，有的把康克清直往朱德怀里推。毛泽东一看也乐了，说：“我说朱德同志呀，

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两个人订的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戏弄妇女了？”朱德说：“啥子我朱德戏弄妇女啊，是妇女们戏弄我朱德！”满屋子的人都乐了。朱德乐完说：“你来得正好，这些个长头发红军在开我的斗争会嘞。手段挺高明的，软硬兼施。”毛泽东坐下说：“软的一手我看到了，请问这硬的一手是怎样的？”朱德冲女红军们说：“你们自己说吧！”蔡畅说：“有点意见哩。从安顺场到泸定的这段路太难走了，我们有两个女同志是彭军团长叫一个排背了上百里，要不都过不来了。”朱德说：“都说我这个总司令没有把路选好，下回该……唔，你接着说吧。”蔡畅说：“就是这么一条意见，下回选路选好一点，照顾一下我们女同志。”朱德说：“还有呢？”蔡畅说：“没有了。”朱德说：“没有了？还有好听的嘛。”说着扭头朝毛泽东：“是说你的。”毛泽东说：“唔，早闻道，夕则改之。请说吧。”邓颖超说：“有几句顺口溜，说是，‘没有毛泽东，两眼成灯笼；有了毛泽东，铁腿才顶用；跟着毛泽东……呃，呃，回头是狗熊！’一屋子人笑着拍起了巴掌。毛泽东愣了愣，说：“小超同志呀，这后一句好像是你临时改了的，是不是呀？”邓颖超红着脸说：“我们也是听来的，觉得后一句改改好。”毛泽东说：“原话是怎样的呀？”邓颖超不敢说，瞥了贺子珍一眼，贺子珍说：“原话说是：跟着毛泽东，何时才是头？”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好，太好了！‘何时才是头’比‘回头是狗熊’好。第一，它真实；第二，不伤人；第三嘞，说明大家都在盼着有个头嘛。革命就得有个头嘛，一个阶段有个小头，一个时期有个中头，汇合起来有个大头：共产主义。这个大头，就是我们的信念。要是没有头，我们还这么千里迢迢干什么呀？至于说到选择行军路线的问题，我得替我们的总司令说句话了。路是我们自己选的，也是敌人给我们选的。我们自己选的那一部分，也不是总司令一个人选的，是中央集体研究的。下一步的路嘛，各位大姐、小大姐同志呀，可能还要难走一点喽。”女红军们都面面相觑了。蔡畅问：“走哪条路啊？”毛泽东说：“翻雪山！”女红军们一个个竟长吐了一口气，说：“这有什么！雪山不就是冷一点么？这一点我们女同志比男同志有优点，身上肉厚一点，经冻。”毛泽东说：“不。不论男女，到时候都得有充分的准备，雪山上不光是冷嘞。那座雪山究竟多大多高，现在还不大清楚。全军除了总司令几个，都没有翻过雪山呐。小超同志，你身体不大好吧？”邓颖超说：“不要紧的。还是那句话：跟着毛泽东，回头是狗熊！”毛泽东有些动情，说：“小超同志，还是说跟着党吧。”邓颖超又补了一句：“我这句话，还是从恩来给我谈的话里概括出来的。”

正说间，门口一阵脚步声，掀开门来，一股浓烈的药香味扑鼻而来，几个女红军每人端个大瓦钵跨进门坎，边走边嚷：“夜宴开始喽，四鸡大宴喽！”毛泽东和朱德愕然，问道：“你们搞的么子事呀？搞的啥子名堂呀？”蔡畅这才说了她们今晚请朱、毛来休养连一坐的真实用意。原来，休养连女队住的这个小院，原是敌团长李金山的团部，她们住进来以后，打扫卫生时，在木柜里发现一大包虫草、当归和贝母。女红军干部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都知道虫草、贝母是名贵中药。一切缴获要归公。蔡畅要个女红军拿去上交给卫生部的贺诚。

贺诚见到这样好的中药，喜之不尽，正要收下，忽然想到，30来个女红军这一路吃苦不少，有的身体很虚弱，这些中药正好给她们补一补。便说：“同志姐呀，这些药，数量也不大，你们就不要上交了。赶快拿回去，买两只鸡炖上，每个人喝碗汤。注意，不要喝多了。”

这都是给女同志补身体的好药哩。”女红军把药拿了回来，给蔡畅一汇报，蔡畅说：“行啊，就算是卫生部给我们女同志的一点特别照顾吧。”于是，买鸡的买鸡，找锅的找锅，忙活了好一阵，炖了一大锅“虫草贝母鸡”。

药香伴着鸡香，沁人心脾。蔡畅想起贺诚嘱咐的“不要喝多了”，便提议说：“这样好的东西，哪有只补女人不补男人的，是不是也喊些男人来补一补呀？”大家都说“要得要得”。可喊谁呢？有人提议：“就把我们这一伙堂客们自己的男人都喊来！都补一下，也好美美地过个星期六。要不，都快把两口子的事给忘了。”女红军们乐的，大家嬉笑着，你掐我一把，我给你一拳。蔡畅说：“不行不行，那样，我们这些堂客们就太自私了，嘿……”她说着，自个“噗哧”乐了。一会又道：“再说，把我们的那些男人都请了来，还怕招待不起哩。我看这样，就把总司令和毛委员两个请来，我们顺便还可以给他们发发牢骚。”康克清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同意，同意……”贺子珍在康克清的脸上拧了一把，说：“看把你高兴的！就怕把你那个男人漏了，真不害羞！”康克清说：“我害羞？我想着是补身子，你想着补啥，嗯？”两个人打闹了一阵，才照蔡畅的吩咐分头去找自己的男人。

毛泽东和朱德一边喝着补药一边听故事，几次乐得呛了嗓子。毛泽东喝了一碗，又要了一碗，喝着说：“真是好东西，才喝下去，这身上就发热了。感谢我们的女同胞，感谢……唔，对，还得感谢那个贺诚。对不对，总司令同志？”朱德慢悠悠地：“不，我谁也不感谢，我只感谢一个人。”毛泽东问：“哪个？”朱德说：“蔡大姐。”蔡畅说：“怎么感谢我哟，这都是她们在弄的。”朱德说：“要不是你蔡大姐修改请客标准，我朱德今天还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么？”满屋子的人又都乐了。

毛泽东起身道：“朱德同志，我们告辞吧？唔，今晚要是再走上百把里也不成问题。”

康克清把贺子珍推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还有事吗？”

康克清说：“你不说今晚再走百把里也不成问题吗？”

毛泽东想了想，才明白康克清的意思。他脸一红，手指康克清的圆脸蛋说：“你这个康克清呀，年纪轻轻的，鬼点子、俏皮话还蛮多哩！走吧，总司令同志，今天不是星期六，我们两个的待遇是一样的。”

毛泽东和朱德走出门来，峡谷上空乌云沉沉，大渡河在谷底轰鸣着。

朱德说：“有大雨呀！”

毛泽东说：“大雨好，大渡河的水就涨起来了……”

且说6月2日，林彪的1军团主力冒雨沿大渡河东岸南下，当天便到了化林坪。据2师侦察科长梁兴初等人的侦察，因1军团先头部队在5月30日渡过泸定桥后，当即便沿东岸南进到化林坪警戒，在化林坪打了一场激战，击溃川军一个旅。敌人惊动了，已经在化林坪前方80里的清溪镇集中了4个旅。梁兴初还获得一份情报，蒋介石的行辕参谋团和刘湘正急电调兵至天全、芦山一带。林彪把这些情况报告军委，军委当即决定，不与敌纠缠，立即掉头北进，经荥经，先敌夺取天全、芦山。

荥经，古老县城，唐时就是县治。其时荥经守敌是杨森的杨汉忠旅、罗润德旅。杨森不曾想到红军又从泸定南下。既然南下，他的20军就整个地成了红军的正面。这个在川北曾同红4方面军有过“勾搭”的老资格军阀，此时又琢磨起旧招来。杨森的20军，一共6个混成旅，在川北的“六路围攻”中都被红4方面军打得残破不堪，奉命出任大渡河河防指挥后，他四处

招兵买马，才勉强恢复了6个旅的建制。他就是要凭这点本钱，对外投靠老蒋，对内抗衡刘湘。他害怕丢了老本。他深知红4方面军的厉害。想想朱、毛的中央红军，长驱数千里，蒋介石的嫡系都无可奈何，进川康以后更是如履平地，他自觉不是对手。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以后，作为河防指挥的杨森，曾惶恐得几夜不能入眠，他既怕红军掉过头来找他的麻烦，又怕蒋介石对他不客气。日前接到通令，刘文辉厄运缠身，挨了记大过的处分，没有他河防指挥的事，他的胆子便又大了起来。当他得知红军果然从化林坪直冲他的荣经而来，他暗自思忖：“老子们为什么不能同他们也办个‘交涉’呢？1926年‘通电易帜’，就是在朱德等人的策动下进行的嘛，说来还有点老交情的；再说，杨汉忠同朱德还有点八杆子打不着亲戚关系……”于是，他亲自授意他的侄子旅长杨汉忠出面同朱德联络，要求与红军“互不侵犯”。根据杨森的密嘱，杨汉忠果然派亲信给朱德送来了一封信，以及该部的联络信号和番号等等。1军团先头部队飞马把“密信”后送给总司令，朱德看完信给毛泽东说：“怎么样，还是认认这个侄儿吧？”毛泽东说：“你们这些四川老总呀，不是旧部，就是什么子侄子！那还有什么说的，人家都喊‘尊叔大人’了嘛。”朱德当即写了一封信，全文道：

汉忠师长吾侄勋鉴：

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按照来意饬敝部先头部队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并颂

勋绥

朱 德顿首

杨汉忠接朱德信后立即报告杨森，杨森喜出望外，“格老子，看来这一关又过得去了。”他立马同他的总指挥喻孟群商定，对朱德说话要作数，“他要路给路，要城给城；假守假打，事前联络。”

第二天，当红军北进路过荣经县黄土坡时，驻守黄土坡的杨汉忠旅，只朝天放了几枪，便让开大路让红军通过。红军为了照顾杨森好交差，没有进荣经城。“剿匪”最“积极”的杨森实际是最消极的。多少年后，杨森私下说：“只有红军打过我，我从来没有打过红军。”

第二十九回 胡昌保血洒甘竹山 刘排长千里寻队伍

话说中央红军主力由荣经向天全北进，为隐蔽通过雅安西侧地区，要翻越同二郎山相连的甘竹山。甘竹山海拔近3000米，上下50里，满山原始林莽，暗无天日，没有人烟，无路可走。翻越甘竹山，最艰难的是军委纵队。时值雨季，雅安世称“雨城”。民间气象家说，雅安的雨只不过是二郎山、甘竹山那边下剩了的。红军先头部队是前一天翻过甘竹山的，军委纵队翻山的那一天，正遇上大暴雨后的小暴雨，才走过的路已经洗刷得无影无踪。

打前站的在前边探路，猛然看到前面有折断的大树，以为是先头部队开辟的路。近前一看，树是天打雷劈折断的。另择新路，丛林中却是雨雾茫茫，山坡到处淌水，低处山洪咆哮。眼看找到可走的路，有植被的地方，一脚上去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方去；无植被的地方，一脚陷进去又拔不出来。男

女老少的军委纵队几乎走不出甘竹山来。最大的困难是生不着火，烧不成水，做不成饭，找不到一块干一点的地方睡觉。大家只好接点雨水喝，把干粮伸进雨中打湿了吞下去。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负责人，还有李德，今天都随军委纵队一起翻越甘竹山。他们谁也没法骑马，更用不着说坐坐担架了。这可把警卫员们急坏了。他们不是怕累着“首长”，而是怕他们滑下山崖去，掉进山洪里。陈昌奉和胡昌保要一左一右架着毛泽东爬山下坡，毛泽东说：“莫牵莫牵，你们滑倒了，把我也不知要拖到哪里去了。”陈昌奉说：“这么吧，我在你身上拴副绑腿，前后拉着点。”毛泽东想想说：“唔，这个办法要得，值得推广，特别是在下山的时候。”他见两个警卫员在忙着解绑腿，又道：“不是通知过带点绳子爬山吗？”陈昌奉说：“绳子勒腰。”其他警卫员见陈昌奉和胡昌保在毛泽东身上拴绑腿，一个个果然都效仿起来，都纷纷解下自己的绑腿，把各自的警卫对象都拴了起来。这一来，再行进时，拉开距离倒不觉得怎样，到了稍平坦的地方走到一起，那情景，活似一串被押解的犯人。博古和李德的警卫员都没有在他们身上拴绑腿。李德的警卫员小张说：“他呀，两百多斤，赤溜了我也拉不住他的。”博古仗着自己年轻，不让警卫员“弄那东西”。李德首先发现前面的奇观，在后面哈哈大笑起来。博古问他笑什么，李德一边指指前面的一串，一边用俄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大问题了，中共领导人被抓起来了。”博古抬头看去，也“噗哧”乐了：“太像了，太像了，一伙流放犯！来来来，我们也加入这流放者的行列吧。”博古和李德的警卫员这才上前给他们绑绳子。李德的警卫员一边在李德身上拴着绳子一边说：“你呀，加上这根绳子，才真像个犯人哩。不信你让博古同志说说。”博古摘下眼镜，抹了一把脸，又甩了甩眼镜上的雨水，然后戴上看李德，不由得更乐了。李德满脸大胡须，胡须上蓄满水珠，活是雨中的一片森林。李德问：“你又笑什么？”博古乐完说：“小张说，有这根绳子，再加上你这一脸胡子，就更像走向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了。”李德又乐了起来，抖着胡须上的水珠说：“是的是的。这用得着你们中国的一句话：大哥别笑二哥。”

李德的情绪是在渡金沙江以后开始发生变化的，过泸定桥后有了更大的好转。他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超人的军事才能。在泸定桥头，他曾对博古说：“我现在才真正明白毛泽东为什么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同4方面军会合以后，红军开赴反法西斯战场，又有了同苏联相邻的大西北，前途自然要广阔得多。”因此，包括博古在内，人们都想不到在这甘竹山的丛林中冒雨翻山，李德竟一句牢骚都没有。他还给博古说：“这有什么呀，红军嘛！我们苏联红军铁流千里，冬季穿越西伯利亚；夏伯阳的部队在伏尔加流域打仗，那里的沼泽地比这难走得更多。”博古把李德的话翻译给红军战士们听，竟还起了不小的鼓动作用。

军委纵队当天终于没能走出甘竹山，他们在风雨中“靠着树站着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队伍才满身泥浆、周身巾吊地翻过了甘竹山。纵队下得山来，在山脚的一个村子里歇脚。村子里六七户人家，男女老少都以为是“神兵天降”，反倒向红军战士问这问哪，打听山里的情况。他们世代住在山脚，却因山高林密，野兽成群，从来没人敢闯甘竹山。红军战士背地里嘟囔说：“什么野兽成群呀，我只见到我们摔死的马……”

却说军委纵队小憩以后，继续向天全北进。才走出几里，天气忽然晴

朗起来。雨后山色，青翠欲滴，蓝天白云，飞燕凌空。也许是一夜的疲劳，人们的脑子有些迟钝了；也许是醉人的景色，麻痹了人们的警觉。人们竟没有想到这里离成都只有300里，向东又无高山阻隔，蒋介石的飞机是很容易飞来的。就在部队行进在山间小路上的时候，数架敌机凌空，向行进的红军轰炸扫射。一轮轰炸过去，毛泽东和军委警卫营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隐蔽好，敌机又飞来了。情况十分紧急。警卫营长杨梅生和政委赖毅立即指挥警卫营的战士保护毛泽东。只听空中传来“嗖嗖”的响声，眼看有炸弹即将落在毛泽东的附近。瞬间，警卫班长胡昌保喊了一声“主席！”一个箭步扑向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到一边。其他十几个战士也都朝毛泽东涌去。霎时，炸弹在附近爆炸，毛泽东安全无事，七八个警卫战士，有的负伤，有的牺牲。胡昌保倒在血泊中。硝烟中，杨梅生和赖毅奔上前来，要把毛泽东拉走隐蔽起来。毛泽东没有被拉动。他蹲下来双手抱起胡昌保，不停地喊着：“昌保，昌保！”同时招呼跟前的人：“叫卫生员赶快上来，给胡昌保上药包扎！”

躺在毛泽东臂弯里的胡昌保，腹部鲜血直流，他自觉革命要“成功”了，但还能意识到毛泽东没有负伤，很安全，他的脸上绽出了笑容：“主席……我不行了……你，你要多保重……我，不能跟着你胜利到达目的地了……”毛泽东说：“昌保，你是负伤了，卫生员马上到。”胡昌保又说：“我家是吉安，叫昌奉告诉我爹娘，我是为革命死的，死在四川……”卫生员赶来了，要给胡昌保包扎，胡昌保说：“先，给他们……我再同主席和大伙说句话……同志们，我不能跟主席……继续走了，你们……要好好保护主席……革命会……会成……成功的……”胡昌保的眼睛轻轻地合上了。毛泽东又喊了几声“昌保，昌保！”胡昌保没再醒过来，他牺牲在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地放下，要陈昌奉把他用的毯子拿过来，陈昌奉犹豫了一下，毛泽东哽着嗓门说：“听到没有哇同志……”陈昌奉只好转身把毛泽东用的唯一的一床毯子拿了过来。毛泽东接过毯子，把它抖开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尔后沉痛说道：“胡昌保，好同志，安息吧……”

艰难岁月，流血牺牲几乎是天天发生的事情。唯有这一天，毛泽东感到格外的悲痛。贺子珍负伤那回，他也没有这么难过过。他想起了张闻天在泸定的那句话：“都是宝贝了。”

他久久地站在那儿，望着抬向山坡的死者……

“泽东同志，你没事吧？”周恩来和朱德从前进方向返了回来，他们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随同周恩来和朱德上路。毛泽东边走边说：“刚才敌人的飞机主要是侦察的。我们的目标已经暴露。速令1军团，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迅速先敌夺取天全、芦山，可以4团夺天全，1团夺芦山。为万无一失，令9军团也攻打天全。”

朱德说：“9军团已经翻过二郎山到了太子地。”

毛泽东说：“好，这一来，罗炳辉有可能先于1军团夺取天全。告诉他们，天全得手后，可向东威胁一下雅安。”

周恩来说：“如有可能，还可出击一下邛崃方向。”

毛泽东说：“对，对，邛崃方向应有所警戒。”

且说9军团原是全军的后卫，何长工还带着一个营守在泸定桥头，阻击尾追之敌。因里程计算有误，绕道化林坪的方面军主力又因甘竹山迟滞了行军速度，结果，罗炳辉率领的9军团，还先期到达天全附近，成了前卫。

天全，雅安地区的一个大县，商业繁荣，人口70多万。守敌是杨森的第4混成旅和邓锡侯的一个旅。两个旅布防在县城、始阳和飞仙关一线。罗炳辉6月7日夜在太子地收到军委速夺天全的急电，当时他正在病中，发高烧。他不顾作战科长刘雄武请求把指挥任务交给他，坚持亲自部署战斗任务，“打仗是治病的良药！”他在调查了解了天全一带的河流渡口的情况后，决定从西北侧迂回天全城。在紧急召开的干部会上，有人提出，天全守敌是我们军团的几倍，是否有胜利的把握？罗炳辉说：“夜袭！我们夜袭，他能知道我是老九还是老十？再说，军委电报上说了，1军团也在向天全进发，说不定我们一打响，1军团就到了。你们该知道林彪其人吧！小子老虎腰上三撮毛，动作快得很，我还怕他抢了我的天全哩！”罗炳辉这么一鼓动，到会干部都通了，给部队一动员，部队的劲头也上来了。

9军团连夜奔袭，3个小时后，先头团便到了天全县城西的一座山上，隐约看到了流经天全县城的天全河。罗炳辉命令部队不咳嗽，不说话，隐蔽前进，绕到天全河上游，涉水过河，尔后直插天全城。拂晓时刻，敌人还在睡梦中，先头团打进天全城，几个街口同时吹起冲锋号，立时全城是枪声、手榴弹声，把敌人打得乱作一团。打得正热闹，不出所料，1军团的杨成武团果然赶到了河南岸。于是，两面夹击，不到一个小时，残敌便弃城向雅安方向逃窜。天亮时刻，两个军团的部队会师天全城。罗炳辉见到杨成武，大嗓说道：“杨长子呀，你们来得很及时啊，替我谢谢你们的林军团长。”杨成武说：“罗军团长，这一仗呀，不该9军团谢1军团，该1军团谢9军团。”罗炳辉笑笑说：“唔，你这个杨成武真还不错，行军打仗有个头，说起话来有舌头。”杨成武一时不明白“有舌头”是什么意思，脸便红了。罗炳辉说：“说你有舌头，就是能说真话，是个好政治委员！”

根据军委的意图，罗炳辉赓续命令部队向雅安方向追击，“追到飞仙关，把口子把住！”

第二天，6月8日，军委纵队进入天全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很高兴，一再表扬9军团又立了大功。何长工率守桥部队从泸定赶到天全时，军委派部队出城迎接。周恩来还专门找了个地方厨师，做了鸡丝面慰劳9军团的领导同志。图个热闹，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也参加吃鸡丝面。刘伯承一边吃着鸡丝面，一边就9军团完成的两项特别任务作了说明。他说：“毛泽东同志下令先敌夺取天全，这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有了天全，我们就有了芦山、宝兴，一条路就基本上开通了。要是拿不下天全，敌人聚集于雅安、天全、芦山这一线，这不只是堵了我们北进的路，而且，东进也很困难，南下也麻烦，只有再回渡泸定桥了。这一来，同4方面军会合的日程就大大地推迟了。要9军团再守一下铁索桥的意思也就在这里，就怕万一出现拿不下天全的情况，我们还得后退，还要用那座桥。所以我说，拿下天全，就打开了我们向夹金山、达维前进的通路，这一着是很要紧的。”毛泽东埋头吃着鸡丝面，嘟囔道：“听伯承同志这么一说，这面就越吃越香了。再来一碗！”

朱德和张闻天也在喊：“就是就是。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且说9军团在天全休息了几天。这期间，9军团部队中发生了一件喜事——刘排长归队。事情不大，却令人难以置信，一当置信，又令人大受鼓舞。这天，天气晴朗，部队在河边洗涮打扫卫生，忽然，一个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年轻人来到河边：“同志，我知道，你们是9军团的，我是无线电

14分队的，我要见军团无线电队的政委袁光同志。”洗衣服的战士问：“你是怎么回事？”年轻人说：“我掉队啦，才赶上来。”掉队归队的不稀奇。战士说：“无线电队在树林里擦洗机器，我给你叫去。”一会，战士领来袁光。年轻人一见袁光，一头扑了上去，呜咽道：“袁政委，我可找到你们了……”说着便晕过去了。袁光俯身仔细看了看年轻人，还在脸上拍打了几下，禁不住一声大吼：“刘明生！是你啊？”接着朝树林方向喊：“同志们，刘排长回来了！快，弄点喝的吃的来！”刘明生醒过来，接着又嗷嗷地哭了起来。跟前围了好多人。袁光说：“他是我们无线电分队运输排排长，叫刘明生，在贵州得重病，周身发抖，几天不醒，就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了。”战士们问刘明生：“你是从贵州赶上来的？”刘明生抹泪点着头。战士们全呆了，“乖乖！好几千里啦，还有大江大河的，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无线电分队运输排的人听说刘排长回来了，全都赶来了，拿来水和干粮。袁光说：“同志们，瞧他瘦成这样，我差点没认出来。让他先吃点东西，有点精神再给大家细说吧。”

就在河边的树林里，刘明生说了他千里寻亲人的经历。

刘明生是怎么被留在贵州的，他不知道。当他在老乡家醒过来的时候，一看给他喂药水的，不是排里的同志，也不是军团卫生队的，是个老大娘，就问：“大娘，这是哪里？”老大娘一看病得不轻的人醒了，很高兴，笑眯眯地说道：“哪里？家里呀！也行，就喊我大娘吧，侄儿和儿子差不多。”刘明生当时的脑子还昏糊糊的，反应不了老大娘说的意思。病好些以后，听了火塘边老两口的议论，他才明白，部队已经走远了，他被寄养了，给人当了儿子了。刘明生好不难过。当红军干革命，竟在这里给人当起儿子来了！不行，病好利索了，还得找队伍去。老两口只有个出嫁了的女儿，没有儿子，便待刘明生如亲生儿子一般，成天鱼呀肉的喂。当地民团搜捕红军的伤病员，老两口把刘明生背到深山的山洞里藏了起来，老大娘成天守着，老大爷就在山里打野味给“儿子”吃。刘明生竟不好意思说出他要走的话来。10半月后，刘明生成了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刘明生其实得的并不是什么大病，是累垮的，饿垮的。养息过来的刘明生，很标致的小伙子。老两口便琢磨着给“儿子”娶亲。

老头说：“娶了亲好。娶了亲，民团就是知道他是红军留下的，找人说说情，也就好办些了。”这一天，家里来了一帮子亲戚，当中有个姑娘总是媚眼盯着刘明生，刘明生开初没在意，年轻女子，见到受看的年轻男子，总是要多看几眼的，“我不也在看人家吗！”待到吃罢一桌酒席，老头把他和那女子喊到堂屋里，笑嘻嘻地说：“你们的意思我已经看出来了。”

还是按老规矩走吧，要是都心愿，就一起给祖宗行个礼，算是订亲了。”刘明生脸都白了，私下想，要是成了亲，更难走脱了。便说：“大叔，成亲是大事，我们才见面，还是让我再想想。”当晚，刘明生才把话说个明白：“大叔，大娘，谢谢二老对我的照看，给我治好了病，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是红军，我不能在这里停下来，我还得找队伍去。将来革命成功了，我再来这里看望你们老人家。”老大爷说：“要走？红军走远啦，不知道到哪里去啦，你找不到了。”老大娘说：“你们的人把你送到家来，说得好好的，治好病，留下，认作儿子的……”刘明生说：“他们没有想到老人家把我照看得这么好，我的病好得这么快。”

我现在身强力壮，能找到我们的队伍的。”老大爷竟是个开通人，说：

“好吧，找队伍去吧。只是，要是实在找不到，还是再回到这里来，我要那女子再等你几年。”刘明生高兴又激动，说道：“大叔，大娘，你们就是我的亲爹娘！反正，我江西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了，革命成功以后，我就回到这里来孝敬老人家。只是，大叔大娘，不能要那好姑娘等。红军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革命会成功的，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兴许不是三年五载的事。正是革命成功是件难事，我还得跟上去，一块干……”老大爷热泪盈眶：“老太婆，听到没有，红军得天下是没有问题的！可惜我们都老了，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走吧，明天一早就动身。听风声，红军好像是奔云南那边去了……”

第二天上路时，老大爷递给刘明生4块银元做盘缠，刘明生高低不接。老大爷说：“这是你们给的呀，是送你来的人给的抚养费，买药剩下的。”刘明生说：“大叔！我在这里吃住这么久，那几块钱哪里够啊。”老大爷说：“一家人咋又说出两家话来！带上，不带上不能走！”刘明生只好接过银元，还接了老大娘烤的几块荞面饼，行了个跪别大礼，便抹泪走了。

“我是在南渡乌江前病倒的。我不知道我们军团没有渡乌江，我是到了云南东川以后，见到留下的伤员，才知道我们军团一直在北线打仗。我第一步是过乌江，往南找队伍。一开始便走了些冤枉路。我想，敌人不是追我们么，我就看敌人的调动，他们往哪个方向走，我也就往哪个方向走。我快跟到湖南地界了，只见敌人掉头往回走，我想起了老大爷听到的风声：红军可能奔云南去了。我意识到敌人是中了我们声东击西的计了，我也就掉过头来往西走。刚才说了，走到云南东川，才知道我们队伍的一些确切消息。我见到的那个伤员就是我们军团的，他多么想跟我一起走，可他的一条腿没有了。他告诉我，队伍过金沙江去四川了。我赶到金沙江边，正是敌人大举过江的时候，我便混在敌人的民工中过了江。4块银元走了两个省。过金沙江后，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了，我就帮盐贩子当挑工。敌人走大路，盐贩子走山路，不把挑工、背工当人。我弄了一背篓盐跑了。还不错，有盐就能换到饭吃。我想窜到敌人前头去，一路上大小镇子、关卡，挤满了敌人，几次都叫白狗子把我‘轰’了回去。这样不成呀，老在敌人屁股后头，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队伍呀？我只好迂回了。这一迂回，便迂回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去了。那地方，不是荒山秃岭，就是大森林。后来见到人了，是我们在扎西见过的那种彝民。我知道彝民有奴隶主，抓到汉人要做奴隶。我只好又往有汉人的地方走。这时，我已经完全是个流浪汉了，只好厚着脸皮讨，讨点吃点，有了些力气，就继续往前走，一路走一路打听：这地方来过红军没有？几时到过这里的？他们往哪里走了？离我们的队伍越近，消息越好打听，我也就越来越有信心。这一天，我来到一条大河边，问老乡，河叫大渡河。在这之前，我拣到过敌人飞机撒的传单，说是‘直达大渡河，消灭石达开’，这‘石达开’自然是红军了。我在大渡河边来回走了好几趟，找不到自己的队伍，老百姓都说这地方没有打过仗；再一打听，说红军已经过河走了。我相信队伍是过河了，红军怎么会是石达开呢。我也就过河了。我是找了根木头漂过河的。过了大渡河，我慌神了，怎么也打听不到队伍的踪迹。往东走，到处是敌人，不像是红军通过了的地方；往西走，翻过几座大山还是大渡河。我着难了，没有目标了。我怀疑队伍是不是真的过了大渡河，是不是又是声东击西，往西边去了？我想再渡过大渡河，往西找。这一天，我来到大渡河北岸的山头上，忽然听到身后远处传来闷闷的枪声。听得出来，是我们自己的枪

声。我高兴的，一个人在山林里蹦呀跳呀。枪声就是命令，往有枪声的方向走。一个人隐蔽前进很方便。我便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没命地往前走。嘿，今天一早翻到了对面的那架山上，我拨开树丛一看，看到城边树林里有红旗，河边有唱歌洗衣服的，我，我便下山来了……”刘明生说完又呜咽起来。

谁也没有注意到，树林里汇集了几百人听刘明生“千里归队”的故事。刘明生的话音一落，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袁光振臂领呼口号：“热烈欢迎刘排长胜利归队！”“向刘明生同志学习！”袁光要接着呼第三句，只听人群一角响起铜锣般的一声：“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战士们一边跟呼口号，一边朝领呼口号的人看去，顿时，口号声又变成热烈的掌声。领呼口号的是军团长罗炳辉！罗炳辉拄着棍子，他的病还没有全好。他走近刘明生，紧紧地拉着刘明生的手：“刘明生同志，谢谢你！你的事，我要向中央军委报告，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同志们，有了刘明生同志这种革命精神，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战胜的？让我们用刘明生同志的这种无畏的革命精神去战胜新的困难，迎接新的胜利！”

“战胜新的困难！迎接新的胜利！”树林里一片口号声。

第三十回 夹金山消融千年雪 达维镇喜舞会师旗

话说9军团夺取天全后，在天全休整几天，又成了全军的后卫。1军团奉命继续夺取芦山、宝兴，做翻越夹金山的先锋。按原定计划夺取芦山城是红1团的任务。杨得志在得到天全已得手的消息后，立即率部向芦山进发，“同志们啦，好比吃饭，天全是夹菜，芦山是一口饭，不能光呷菜不扒饭啦。

呷了菜，扒了饭，前头还有个宝（宝兴）嘞！”

芦山守敌是临时划归杨森指挥的王泽浚旅。王泽浚以18团的两个营守备城西南河岸，团部和一个营守城里；另16、17两个团在城东北芦山岗构筑二线阵地。杨得志一看敌人这个部署，心里便乐了，“他娘的，老子还没有打，他就想好退路了。”黎林说：“他这是个聪明的摆法，天全丢了，宝兴那边是夹金山，他不往东跑往哪跑？”杨得志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别硬来了。化装进城，里应外合。拿下芦山城，叫他们跑都跑不行！”正巧，天全一部分有钱人，正在往芦山城跑。好机会。杨得志便令3营派出几十个人，扮着“难民”，夹在逃难的人群中，潜入芦山城。果然奏效。便衣队进城以后，当天夜里便占领了城内的周春岗高地。城里枪响，城外发起猛攻，王泽浚仓皇弃城逃往芦山岗，他的18团大部被歼。第二天，杨得志想等4团赶到，一起攻打芦山岗，因芦山岗有敌两个团。待杨成武的4团赶到，派往芦山岗的侦察小组回来报告说，王泽浚得知在邛崃、大邑方向发现红军，他怕被包围，一早就把两个团撤往绵竹方向了。

占领芦山以后，根据军委的意图，林彪命2师师长陈光率4团为前卫，带电台先走，限12日赶到懋功；政委刘亚楼率5团在4团后跟进；5团之后是军团部、1师和3军团的13团。芦山前面还有个宝兴县。林彪估计宝兴的敌情不会严重。

他令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便衣侦察队和1师侦察连先行出发，相机占

领宝兴，并调查过雪山的道路情况。

果然，刘忠率侦察队到达宝兴，宝兴城不见守敌，连县长、民团都跑光了。后来得知，敌人是考虑到红军不可能从宝兴翻雪山，又怕守宝兴守个无路可逃，便干脆放弃了宝兴。刘忠在宝兴城里骂娘说：“他娘的，老子还以为能在宝兴城里发点洋财，搞点什么过雪山的東西呢，闹半天，兔崽子根本就没有给老子准备点啥！”

杨成武的4团没有在宝兴停脚，一直奔到了大碛碛。大碛碛是夹金山南麓的一个大村子，有200多户人家，都是汉族。4团在这里做了一些翻雪山的准备。当地群众听说红军要翻夹金山，有的傻着大眼说：“红军行，红军行啊。听说红军都是大神大仙，大妖大怪哩！”上了年岁的人给红军战士们说：“你们真要是大神大仙，那当然行的，这夹金山就叫神仙山。可要我看，你们好像也都是些凡人嘛，那就不要冒这个险，还是另走一条路为好。”陈光找村子里年岁最大的一个老头问话：“老人家，这夹金山真是从自古以来没有人走过么？”老头的耳朵聋得厉害，警卫员在他耳边大声喊，他只摇着头，笑一笑，不答话。一个年轻妇女走来，说：“他是个死聋子，又隔口音，他听不清的。”陈光说：“那就不打搅老人家了。”陈光起身要走，老头又说话了：“他们说啥子？”年轻女人贴着老头的耳朵大声吼道：“问你，这后头的山，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没人走过？”老头摇了摇头，半天才说：“那倒不是。只是，上去的多，回来的少。”陈光不禁悚然，跟年轻女人说：“问问老人家，他上去过没有？”年轻女人说：“听我爷爷说过，他年轻的时候上去过。烧香。”陈光紧着问：“烧香？山上还有庙？”年轻女人又贴着老头的耳朵吼：“山上！是不是有座庙？”老头摇着头，笑道：“那是啥子时候的事了！寒婆菩萨不灵，没人去敬了。他们是要上山？”陈光连忙点着头。年轻女人在爷爷的耳边吼道：“他们是红军！要从这里过山去！”老头的眼神怔了怔，又“唔”了一声说：“不能早，不能晚。”

老百姓把夹金山说得这么险恶，连个向导也没好意思找。

夹金山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正南，理县之西，是一座海拔4900米的大雪山。红4团的口号喊得很响亮：“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动的抬着走，全团人人翻过夹金山！”陈光指挥团队拂晓出发，9点钟以前走完低海拔路段，他相信老头的说法：不能早，不能晚。争取下午3点以前翻过夹金山顶。4团以6连为前卫，在前面探路前进。

杨成武给6连连长交待说：“别他妈的不当回事！丢了一个你赔条腿，丢了两个你赔个脑袋！”南方人不知道高海拔雪山的厉害，4团又多是为全军开路在先的，团队中真还有些人不把翻雪山当回事的，说是“那么些高山大河都过来了，还能叫座雪山挡住？咱们虽说不是神仙，爬山虎，小蛟龙，可是名扬全军的！”

先头团行进在雪线以下的森林区，一株株挺拔的大松树裹着雪团耸立着，成群的雪鸡在森林边沿“咯咯”地觅食……气候幽凉，路也不难走，战士们走得欢欢乐乐的。越过雪线以后，干部战士便都茫然了。眼看要走到顶了，来到顶上，前面是更高的雪岭银峰。越往上走，可走的地方越来越窄，坡越来越陡，雪越来越深，气候越来越冷，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两条腿越来越沉。停下脚来举目望去，一片琼玉世界！雪岭茫茫，蓝天竖剑。前卫连长嘟囔道：“娘的，真还是那么回事哩！”接着又吼道：“走！不要停！不要……”说话都很吃力了。雪山高处，气候变化急骤，时而晴空

幽碧，骄阳把雪原照得一片银白，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时而一片云雾涌来，又飞起了“六月雪”，风卷雪流，雪片打在脸上，像是一把把刀子在划来划去。有个战士没有准备爬山棍，走得快爬下了，班长把棍子递上去说：“拉着吧，我的小蛟龙……”偶然间是一个大创造：没有棍子的，两个人牵一根棍子；两个都有棍子的，便像担架似的两手抓着棍子，后面走不动的前面拉，前面走不动的后面推。强帮弱、大帮小的问题也解决了。为了防止掉进雪坑，还有三五五个一伍，用绳子拴起来一起往上爬的。

陈光和杨成武爬到临近山顶的一个隘口，看到不远处有个背风的石框。到处都被厚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唯有这石框是裸露的。两个走上前去一看，石框上方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寒婆庙。庙里有一尊装束似藏似汉的寒婆像。陈光想：看来这就是老头说的烧香的地方了，既然有人到这里来凿这个庙，有善男信女来供奉寒婆，红军翻过夹金山该是不成问题的。他很高兴，跟杨成武说：“成武同志，难道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善男信女还不如信仰寒婆的善男信女么？没有问题了！”他看看身后雪岭间蜿蜒而来的队伍，又道：“成武同志，你不还是个读书人吗，写首诗吧？”杨成武大个子，需氧量大，他走得比师长吃力得多。此刻他一只手撑在崖框上，气喘嘘嘘地：“我，此刻需要的，不是诗，而是空气中的氧。但，但是，师长有令，不敢不从。刚才，刚才正想了两句，你再凑两句吧。”陈光说：“说吧。”杨成武吃力地挥手道：“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你接吧。”陈光说：“你这诗，好接。”他略一踌躇，说：“红军英雄汉，不，红军豪情壮，消融千年雪！怎么样？”杨成武脸上顿时来了神采，说：“师长同志，你这不是在接我的诗，是在给我鼓劲嘞，走！”

陈光说：“不忙不忙，得给中央发个报了。”

两个人便凑在一起草拟给中央军委的电文。

且说毛泽东在宝兴接到陈光和杨成武从夹金山顶发来的电报，知道部队翻越夹金山问题不大，心里很高兴。军委纵队当即出发向大碛前进。一到大碛，又接到陈光和杨成武的电报，说他们已经在达维同4方面军的韩东山师74团会师了，并告韩东山的25师已经占领了懋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个个顿时高兴的小伙子似地跳了起来。毛泽东说：“原来我们离得这么近呀！这夹金山不该叫夹金山，该叫挑金山！”会师消息传开，大碛一片欢腾，倒像是会师的事不是发生夹金山北麓，而是发生在这南麓似的。部队翻越夹金山的劲头更大，信心更足。毛泽东授意刘伯承：“发报给罗炳辉，告诉他们1军团先头部队已经同4方面军会师，9军团停止东进，立即北上，随5军团跟进，翻越夹金山！”

根据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后续部队在宝兴、大碛一线做了一番准备。买了一些辣椒、生姜、胡椒粉；能往身上披挂的衣物，只要买得到的都买上一些；从中央负责人到战士，每人一根爬山棍，谁手里没有棍子谁就不是个好同志；救护队还准备了一些绳子、长杆。各部队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伤病员提前一小时出发；身体强壮的组成担架队。总部宣传队还在部队中教唱了《两大主力会合歌》，把翻雪山的注意事项编成顺口溜唱给战士们听：

夹金山，高又高，
注意事项要记牢：
裹脚要用布和棕，

不紧不松好好包。
到了山顶莫停留，
坚持下去胜利了。
病号走不起，
帮他背东西。
大家互助想办法，
一定帮他过夹金！

.....

虽说做了充分的准备，大部队行动，各种各样料想不到的问题还是发生了。最大的问题是部队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征战，身体营养条件差，体弱有病的人多；许多战士又不知道爱惜体力，估计不到缺氧、雪盲带来的危害。在雪线以上向山顶前进的途中，各部队都有倒下没有再起来的，有的眼睛一发黑，掉到雪崖下去了.....

先头红4团全团顺利翻过夹金山是一个侥幸。那天，山上新雪不厚。4团过去以后，山上下了一夜的大雪，新雪积得很厚，盖死了先头部队的足迹，把一些雪坑也“伪装”了起来，有些人就是这样掉了下去，再也没有爬上来.....

军委纵队的行进是最困难的。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骑，他手执一根木棍，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边走边给警卫员说开心话：“这夹金山恐怕真是夹着金子嘞！金子重，就在下面拽我们的脚，这双脚就觉得重了。我们红军的脚都成了金腿了。”警卫员上气不接下气地“咯咯”着。毛泽东又道：“不准笑，笑也费力气嘞.....我们，多有一个同志爬过这座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呀。”警卫员戴天福挪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雪地里。毛泽东连忙上前：“不行不行。你坐在这里是很危险的。来，我背你走！”吴吉清赶紧把戴天福背了起来，毛泽东就在旁边双手扶着他们走。

朱德和刘伯承爬过雪山。“老经验”就在危险地段上，把一个一个的战士拉了上去。

“加油，同志们，快到山顶了！”

彭德怀率3军团随军委纵队前进。部队来到山脚暂憩，吃点干粮好翻山。彭德怀检查时，发现军团教导队队长孙毅没有东西吃，问道：“你的干粮呢？”孙毅不好意思说他分干粮时少分了一份，缺了他这个队长的，只好笑笑说：“我吃过了，饱饱的哩。”彭德怀说：“张嘴我看看！”孙毅哪敢张嘴，笑都是抿着嘴巴笑。彭德怀明白过来，把自己的干粮倒了一半给孙毅，孙毅不肯要，彭德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面分一半嘛！”军团部快到山顶，通信班长邱荣辉两眼一黑，倒了下去，彭德怀喘息着大声喊：“快，骑上骡子走！”邱荣辉拼命站了起来：“我，能走.....”没走几步，又倒了。彭德怀把他扶起来，再次要他骑上骡子，邱荣辉还是不肯，彭德怀要饲养员把骡子牵过来：“抓住尾巴，总行吧？”邱荣辉就是抓着军团长的骡子尾巴翻过夹金山的。

聂荣臻和左权是带病翻夹金山的。为了不拖累部队，他们天没亮就提前出发了。开始聂荣臻还坐了一段担架，上山的时候，他坚决不坐了：“我可以慢慢走，你们去帮帮左参谋长吧，他的病很重。”左权正一步一步地沿路走来，他的马和担架都让给伤病员了。担架员要左权坐担架，左权说：“不

了不了，我现在能走，注意帮帮军委纵队的同志吧。”来到半山腰，左权给周围的同志说：“这夹金山很可能是四川的一块宝地，胜利后我一定带部队来挖它。挖不到金子也把它挖矮一点，免得有这么多的雪！”

军委干部团工兵连副连长黄朝天，会理攻城战斗中负的伤，一直没有好，进入夏天，伤口化脓，翻夹金山前准备把他寄养了。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动员他说：“留下吧。我们同4方面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这一片兴许都是我们的。”黄朝天高低不同意，说：“最好的根据地是自己的队伍，还是让我跟队伍走吧！”宋任穷说：“要随队伍走也行，但有一条你得做到，骑我的马！”黄朝天便骑着宋任穷的马翻山。半山腰上，一阵狂风刮来，精疲力尽的马倒在雪地里，把黄朝天甩进一个雪坑，昏了过去。战士们把他抢救上来，让他躺在担架上，往他嘴里灌烧酒，然后抬着他前进。在最难走的时候，宋任穷和警卫员把担架抢了过来，抬着黄朝天一步一步地朝山顶挪去……

午后3点左右，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前后爬上了夹金山顶。毛泽东询问部队的行进情况，朱德说：“工作上还是有漏洞，有几十个同志恐怕是翻不过山来了。主要是有的单位对干部战士的身体情况摸得不准，有病的以为没有病；有些同志不会分配体力，对雪盲病估计不足。”毛泽东沉默一会，叹息了一声，又问：“几个老同志和娘子军上来了没有？”朱德说：“他们的情况还好，离这里只半里路了。”“博古和李洋人呢？”毛泽东又问。刘伯承说：“看来，这次翻夹金山，就他两个占便宜。博古有副眼镜，李德仗着身板硬。”周恩来说：“总的看来，我觉得比预想的还是要好一些的。最大的胜利，是我们实现了同4方面军的会师。”毛泽东的心情这才松了松，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里等他们一会。”

毛泽东站在雪岭银峰间，也是天公作美，这阵儿的夹金山顶，风平雪住，偏西的阳光洒在雪原上，闪烁着五彩的光芒。他禁不住想起了年初在猴场的那场雪。那一场瑞雪，竟预兆着今天翻夹金山……啊，千里岷山千里雪……诗情一来，原有的诗句便从脑子里蹦了出来，连成了一首：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战士过后尽开颜。（注）

毛泽东正在咀嚼着诗句，3位形影不离的“征途老马”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上了山顶。徐特立拄着棍子，喘息未定，便道：“看来，又，又有新的诗句了？”毛泽东回头看3匹“老马”，一个个满身雪花，长长的胡须上挂着冰溜子，脸色有些苍白，说：“好啊，上来了就好啊。诗嘛，有那么几句，下山再说。山上不能久留，我已经犯纪律了。”

先行下山的周恩来、朱德并没有走多远，他们在雪线处等着毛泽东。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下到了山脚，一行人走出沟口，骤然间山谷里响起了地动山摇的口号声：“热烈欢迎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举目望去，红旗招展处，队伍整整齐齐，

4方面军30军政委李先念和25师师长韩东山率部在沟口迎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人。

“你是李先念同志？我是毛泽东哇。”

李先念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竟不知怎么称呼毛泽东。

整个山谷都是口号声和歌声。

时间1935年6月14日。

注《长征》一诗，毛泽东自注作于1935年10月。研究家认为，诗中的“三军过后尽开颜”的“三军”，若指一、二、四方面军，该诗当成于1936年。

